



陈荒煤 陈 播 主编

周恩来 与电影

周恩来与电影

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领导民主——对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探索 (代序)

荒煤

附记：电影局党史领导小组编辑了一本《周恩来与电影》现已集稿完成。为了保存周恩来对新中国电影事业无微不至的热情关怀的全貌，这本文集尽可能把新时期以来电影界回忆、怀念周恩来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再经过反复认真地挑选，避免重复，最后才编选了这一本文集。

我读罢文集全稿，热泪盈眶，不能不感慨万千。所有的文章，不论长短，何时所写，都是电影战线上各个方面的同志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通过无数的和周恩来亲自交往和接触中的场景和细节的叙述，反映了周恩来这位伟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热情关注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崇高品德。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始终以“文艺界的一个朋友”的身份，时时刻刻密切地热情关心电影事业，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却严以律己。他对任何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既有严格的要求，却又尊重艺术的规律，发扬艺术民主，循循善诱，尊重创作者的个性与风格，给予亲切友好的支持、鼓励与帮助，也胸怀坦荡地、令人心服地给予真诚的期望与批评。这本文集里所写到的许多极其生动的事例，读来令人泪下，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周恩来至今仍然是一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热情鼓励、扶植文艺创作的楷模。他的思想和作风也是我们每个人永远应该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不永远怀念这位真诚的、亲切的知心的朋友！

因此，我认为这本文集不仅是电影界，而且是整个文艺界、思想文化战线各级领导人和理论研究工作者都应该学习、研究、参考的一本著作。特别是今天反复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弘扬主旋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特别要注意提高青年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的素质，培养跨世纪新人才的时候，这本文集的出版，显然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电影界为例，新中国第一个新片展览月，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的展览月，以及1961年故事片创作会议之后，在新侨会议周恩来讲话批评“左”的思潮鼓舞之下，电影界故事片创作在1961—1963年又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小高潮，这三个片段的创作繁荣，人才辈出，都可以说是周恩来热情鼓舞下所结下的丰富硕果。

很遗憾，我去年曾许诺在文集出版时写篇序言，但去冬因患急性心肌梗塞住院数月，至今尚未痊愈，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经再三考虑，特选了我1988年纪念周恩来90诞辰所写的一篇文章《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领导民主》作为代序。正好文集中还缺少对周恩来文艺思想进行探索的文章，所以也就希望藉此机会抛砖引玉引起电影理论工作者同志们的注意，再进一步去全面深入地探索周恩来的文艺思想。

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还需要结合当前的创作实践，真正理解周恩来的文艺思想，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电影道路来。这仍然是今后一个长远的主要的历史任务。

周恩来一贯要求电影艺术积极热情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同时又要求注意题材的多样化，多方面满足广大观众“各取所需”的问题；关于教育作用与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的问题；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尊重艺术规律与发扬艺术民主的关系问题等等

……这都是关系到电影艺术创作能否真正繁荣的一项根本问题。历史的经验也反复证明，如果我们不能结合创作的实践，对这些问题加以正确的解决，也就不能够真正坚持“二为”的方向，坚决贯彻“双百”方针，那么，中国电影要走自己的路，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我们还必需继续努力对周恩来文艺思想加以探索。所以，我以这篇文章作为代序。

1995.5.4

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 90 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还必须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同志几十年来领导文艺工作的思想和作风。

周恩来同志常常说 he 自己是“一个文艺界的朋友”。尽管他身为国家总理，在日理万机极为繁忙的工作中，却始终对文艺工作给予热情的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文艺队伍的成长与壮大，是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结果，也是周恩来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战斗所取得的伟大的成就。

周恩来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艺路线，他经常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更多地了解文艺工作与创作实践中存在的思想情况和种种困难，善于从实际出发，把握文艺的客观规律，因而，他的许多重要讲话，理论联系实际，符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都有所丰富和发展。

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新中国的文艺运动，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要贯彻十三大的精神，促使文艺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我们今天来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文艺思想，也就是对周恩来同志最好的纪念。

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的重庆时期，就一贯关注大后方的文艺运动，并亲自领导了这个运动，团结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扩大并加强了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力量。

新中国建立以来，周恩来同志也始终关注文艺工作。他和文艺工作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发表过许多讲话，作过许多具体指示。可惜，这些讲话和意见至今还没有完全整理出来。

我今天的发言，只想根据周恩来同志在 1959 年《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61 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三个公开发表的文献，谈一点个人学习的心得，期望对周恩来文艺思想作一些初步的探索，提供一些粗浅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这三个重要的讲话，表明周恩来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始终是一个以身作则，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楷模。

现在看来，在文艺工作中，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始终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事业能否正常发展，是否能够促进文艺创作真正繁荣，创作更多的丰富多采、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作品去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仍然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此，党和国家必须确定一个长期稳定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反复强调这是一个：

“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风风雨雨，这个方针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多次的反复，直到“文革”的发生，证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历史的经验证明，衡量文艺工作的成绩和兴衰，关键在于有没有真正的创作繁荣；

一切有关的领导机构、指导思想、行政管理、文化事业规模的大小、理论研究工作的是否活跃、有关的具体政策是否适当，归根到底，决定于创作的繁荣。创作不繁荣，千篇一律，一花独放，不能反映丰富多采的生活，不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能调动一切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缺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发展的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要，那么，不仅不能体现“双百”方针、贯彻“双百”方针，也就不能真正坚持“二为”的方向。“文革”期间，8 亿人民看 8 个样板戏的悲剧，就是证明。

事实也证明，只有创作繁荣，才能人才辈出；各方面的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认识、艺术修养、创作个性、表现的才能和风格，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想象的广阔天地，勇于探索和创新，在不断的实践中提高艺术的质量，于是有独特见解和专长的艺术家也就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出来了。

也只有创作繁荣起来，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作品不仅题材、风格、形式多样化，而且所表现的内容更加广阔，蕴有更丰富的内涵，才能促使理论研究工作活跃起来，促使百家争鸣。作家和评论家必然要努力去探索在创作实践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优点，提到理论的高度，去指导实践，推动创作。

因此，“双百”方针的贯彻，不决定于口头的诺言，理论上的泛论，而只决定于创作的是否繁荣。

抓创作，促使创作的繁荣，也因而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关键。

我认为，周恩来同志领导文艺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在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主要的也是从创作实践中存在的种种现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科学的回答，从而促进、推动了文艺创作的繁荣。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

但当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阐述。长时期以来，关于创作的百花齐放，往往被理解为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也没有从创作的实践和规律联系到题材问题来加以研究。而题材问题又往往被认为是创作的决定因素。把反映工农兵斗争的历史和现实题材，一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主要标准，也是衡量一部作品思想性的主要标准。

而不理解，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首要的前提，是要题材的广阔性和多样化。没有题材的多样化，就不可能有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在题材方面禁区重重，就无法使得艺术上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

周恩来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照文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在贯彻“双百”方针时，一贯强调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努力去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群众。

例如，在 1958 年 4 月，他就提出要求，希望故事片厂都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片，既可以迅速反映新的时代，也有利于创作人员熟悉新的生活。1959 年在国庆十周年新片展览月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电影首先要反映新的英雄，新的事物，“反映这方面的故事，纪录这方面的事迹，这就是我们电影的特点”。

但是，周恩来同时也非常明确地强调了题材的广阔性和题材的多样化。

他在 1956 年 4 月、5 月《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中，充分肯定《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指出：

“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像《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

他当时还赞成有些话剧团上演《十五贯》。

他还主张百花齐放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

大家也知道，他也积极支持和赞扬话剧《关汉卿》、《胆剑篇》、《王昭君》的演出和影片《林则徐》等作品的上映。

在 1958 年，夏衍同志向周总理汇报了国庆 10 周年献礼片的创作计划之后，周恩来同志就指出革命历史题材多了，缺少反映少数民族的题材和比较轻松愉快的题材。后来我们就又增加了《五朵金花》、《冰上姐妹》这两部影片。

在 1961 年，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从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统一的观点指出：

“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他一再强调剧种不同，观众不同，戏剧、电影在安排剧目时，既要考虑群众的需要，又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

总之，“……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创作题材要有个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92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95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7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8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9 页。

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

这些看来简单明了的道理，实质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非常明确地概括了文艺的特征：文艺要寓教育于娱乐，要多方面满足群众的需要，作者可以自由选择题材，不得用行政命令方式来干涉创作题材。

可惜，至今也还有些同志还不能认真地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

而且，就在这次会议上，张春桥就大肆叫嚣大写 13 年的十大优点，只有写 13 年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实际上荒谬地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反映历史和各个革命时期的作品都排斥在社会主义文艺之外。直到“文革”期间，批所谓反题材决定论，把新侨、广州话剧会议批为黑会，终于导致一场文化浩劫，万马齐暗、百花凋零的局面。

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题材的多样化，就不可能有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艺创作反映生活，反映现实和时代，再现历史，是作家艺术家对历史和现实再认识的过程和结果。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艺术家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思想认识、感性知识、文化素养、道德情操、艺术趣味和特色，发挥自己的特长，去选自己所熟悉的题材，通过自己所熟悉的典型形象（历史剧当然是经过深入研究、把握历史中人物的性格而创造的），去表现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的见解。

熟悉人是文艺创作的第一位工作。创造各种典型形象又是创作中最根本、最复杂的任务。

作家艺术家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们绝不可能轻易地熟悉一切入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复杂丰富的关系和种种矛盾。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最艰巨的工程恰恰就是对极为丰富复杂的灵魂的探索，表现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因而，对每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讲，他在有限的生命里，他所表现的题材终究是有限的，他绝不可能随心所欲任意去表现各种题材。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不能包罗万象，而只能表现生活海洋中的一个侧面。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作家不可能熟悉历史的各个方面，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一定要有局限性。”

作家选择什么题材，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分析、研究，对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有自己深切的感受，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觉得有兴趣，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才有可能作出决策。因而不是别人可以强加于他的。尊重创作题材选择的自由，就是尊重文艺创作的规律、作者的创作自由。而充分发挥创作的自由和特长，通过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广泛地反映历史和现实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各样的人物，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各种需要，才能让群众“各取所需”。

我认为，周恩来同志反复强调题材多样化，作家完全有选择题材的自由，正是高度重视艺术客观规律和创作自由，抓住了繁荣创作，贯彻“双百”方针的关键，是对“双百”方针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对列宁所讲的：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个科学论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长期以来，我们老是害怕提创作自由。

其实，说到底，作家如果真正有选择题材的自由，也才有真正的创作自

由。没有选择题材的自由，也就没有创作自由。那么，人民群众对各种文学艺术的创作也就无从选择，不能“各取所需”。

重温周恩来在 1961 年和 1962 年的两次讲话，就可以了解，在题材问题上的重重禁区、障碍，固然有一些是文艺理论中长期反复纠缠不清的问题，如人性、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如何理解时代精神、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但是，周恩来同志对这些问题作了简明透彻的回答之外，实质上延伸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党究竟怎样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回答，无不是围绕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加以论证阐述，而最后用辩证的观点，归纳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要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二、要发扬艺术民主。

同时证明，不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就不可能发扬艺术民主；不能发扬艺术民主，也就不可能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也就无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改变领导作风，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关于艺术的客观规律，周恩来同志非常简明扼要地指出：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

他指出文艺应当为劳动人民服务，这是政治标准。但“政治标准并不等于一切”。

“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

“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不能要求一个作品把时代的全部内容都反映了……不能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时代精神也只能通过时代的一个侧面表现出来。”

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艺创作和理论上的致命伤。

事实证明，正是长期以来，我们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写工农兵，时代精神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准反映敌我矛盾，写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暴露阴暗面，典型只是完美的英雄形象……等等，并且把这些简单的政治概念当作创作的准则，作为衡量、评价作品唯一的标准。实际上是政治标准唯一。而对于强调艺术的特征、形象思维、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创作自由、表现真实、表现真实的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等许多观点，都一律当作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加以批判，实质上否认了艺术客观规律。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不断有争论、有反复，可是周恩来同志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身份，公开地强调要尊重艺术的规律，发扬艺术民主，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风，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因为长期以来不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主要来自于一些简单的政治概念的干扰，如果就事论事，单纯地当作艺术性的问题去加以探讨是无法改变那种违反或否认艺术客观规律的现象的。

重读周恩来同志的三篇文献，特别是 1961 年与 1962 年的两次讲话，就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0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6 页。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 69 页。

可以发现，他主要是从政治的高度、群众观点、领导作风这三个方面来论述艺术的客观规律的。

在这两次讲话中，周恩来同志都首先是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这个角度来批评领导缺乏民主作风，违反艺术客观规律的。

而领导者缺乏民主作风，又主要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导致文艺创作中的许多清规戒律、禁区重重。

其次，领导作风缺乏民主精神，实质上也是由于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

不消除那种政治标准唯一，用一些简单的政治概念、行政方式来干预创作，又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也就不能发扬民主，不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因此，我认为，周恩来同志从政治要求、群众观点和领导作风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来阐述艺术的客观规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高瞻远瞩地指导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之所以能够以身作则和文艺界建立亲密无间、广泛团结的友谊，爱惜人才，发挥他们的长处，尊重他们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个正确领导文艺工作，关心文艺事业的楷模。

我认为，对周恩来这一光辉思想的研究和发挥，是对今后建设精神文明，文艺工作继续坚持“二为”的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引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理论依据。

四

最后，我想谈谈周恩来同志关于发扬艺术民主的思想，实质上也就是在文艺战线上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具体则表现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人的领导作风问题上。

周恩来总理在1961年和1962年的两次讲话中都严厉地批评了文艺战线上一些错误的领导作风，例如搞“一言堂”，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尊重党外专家，教条主义等许多不良现象。

我觉得产生这种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有思想认识问题，有政治气候问题，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思想僵化问题。

但是，周恩来同志强调“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这个思想，是解决尊重艺术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关键。

周恩来同志强调：

“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

他尖锐地批评了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川剧落后，说道：

“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之后进而指出：

“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

然后又进一步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统一的。

“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从以上这些讲话来看，在周恩来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始终有一个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问题，这就是：

把为准服务、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前提，来正确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把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统一起来考虑群众的需要，而强调艺术要经过人民批准，要获得群众的喜闻乐见，要面向人民，并承认群众的各取所需，从而明确了艺术的客观规律。

把领导的责任明确为政治上的敏锐主要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不能听其自由泛滥，艺术上少加干涉，以减少违反艺术规律的情况。

强调改进领导作风，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批评，听取不同意见。

总之，一切从群众出发，尊重群众的爱好和需要。艺术的客观规律，归根到底，就是承认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的统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经过群众批准。领导者要尊重艺术的规律，就要发扬民主，不要挫伤文艺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敢想、敢说、敢做，真正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群众观点的精神，同样也表现在要求改变领导作风方面。

周恩来同志在 1961 年与 1962 年的两次讲话中都反复强调了党的领导要发扬民主的问题。

他批评了“一言堂”的作风和党委包办一切缺乏调查研究，听不进不同意见，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因而产生许多缺点和错误的现象。

但他认为，改进这些缺点和错误。

“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7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7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38 页。

的意见对不对。”

他甚至还明确指出：

“政策上的偏差，中央负第一位的责任，省市负第二位责任。……根还是从上面来的。”

因而，周恩来认为：

“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

而且在1961年讲话最后还宣布：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周恩来同志这种发扬民主的坦荡的胸怀，真挚的感情，坚定的信念，亲切的关怀，无私的批评，当时激起了艺术家们强烈的反应，也使得我们这些搞文艺领导工作的人们既感到兴奋，也感到羞愧，不能不对过去受到一些“左”的思想影响，也抡过棍子打击过、挫伤过创作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错误感到深深的内疚，也的确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如电影界也的确在这一次会议之后，到1962年与1964年重新出现了一个创作的小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停战以后》、《阿娜尔罕》、《李双双》、《燎原》、《东进序曲》、《南海潮》、《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北国江南》、《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农奴》、《跟踪追击》、《兵临城下》、《英雄儿女》、《阿诗玛》、《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天山上的红花》等等许多优秀影片。

可是，新侨会议后来居然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成“大反复前夕”“牛鬼蛇神总动员”的黑会，把周恩来同志亲自到新侨饭店和一些创作人员欢快的交心的谈话，说成是“四条汉子”蓄谋策划，密调黑干将去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重型炮弹”，是“围攻总理”。

终于1961年与1962年这两次会议都被打成黑会，而电影界的许多优秀影片都被打成毒草。“文革”的兴起终于造成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战线上一场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大灾难！

新时期以来文化艺术战线出现了一片蓬勃发展的形势：创作繁荣、理论活跃、新人辈出的情况是历史上空前的。现在，党的十三大的召开，号召思想文化战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要努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建立有利于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社会舆论、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这是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面临的一个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为文艺创作开拓了前所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5页。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67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4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5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8页。

未有的最广阔、最自由的大地。

重温总理这三次重要讲话，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我认为加强对周恩来同志文艺思想的研究，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深入地、认真地结合实践学习周恩来文艺思想，这是推动我国文艺工作更好地从群众的需要出发，满足群众的需要，去获得群众批准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周恩来同志考虑一切工作，一切问题，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求群众批准的这种精神，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崇高的品德，也是获得人民群众热爱的品德。

我也希望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学习这种精神和品德，始终胸怀群众、面向群众、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苦、共欢乐，考虑群众的需要，多方面地满足群众的需要，为创作更多更好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有民族风格的、有时代特色的作品，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

1988年4月

一定要提高电影艺术的质量

夏 衍

附记：《电影创作》复刊，这对电影工作者是一件喜事。编者一再要我写文章，但因视力衰退，迄未成稿。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份1960年12月我在影协的讲话，内容主要是传达周恩来总理要求提高艺术质量的指示，我结合当时实际，讲了一些电影艺术—特别是编剧和表演方面的意见。这个讲话稿未曾发表过，现在看来，总理的指示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为此略加删节，并稍作文字修润，以偿文债。《电影创作》复刊的时候，正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三周年，回忆他19年前的谆谆教导，深以未能贯彻执行他的指示而感到内疚，希望《电影创作》今后对提高电影艺术质量这个问题作出不懈的努力。

作者

1978年12月20日影协要我来谈谈有关提高电影质量的问题。首先，我想传达一下周总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指示。11月11日，总理对一部分在北京的文艺工作者，主要是音乐舞蹈工作者讲了一段话。内容是谈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问题。我首先根据总理的讲话经过核对的记录传达一下。总理首先说，我们的艺术团体，今后还要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地去演出，应该要有新的东西，新节目。出国演出必须要不断提高质量，增加新的东西，新的主题。像我们这么一个国家，文采风流，必须要日新月异，而且要不断提高质量。不要老是拿那几出戏、几首歌、几个舞蹈，老是原来那个水平。人家说我们艺术丰富多采，我们自己看来，有的时候，还是觉得单调。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内容，同时也要有很好的艺术质量。你们是艺术表演团体，”因此，必须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思想，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反帝、反修正主义的思想。假如只靠几条标语口号，艺术质量不高的话，假如只用政治讲话，那么，我讲的要比你们讲的全面一些，准确一些，那就不需要艺术家了。你们必须通过艺术来传播我们的思想、表达思想。通过艺术来打动人。通过艺术，使观众都能接受，都能喜欢。

总理说：我们的京剧、舞蹈、电影在国际上很受欢迎，受各国人民重视，应该肯定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绩的，但绝对不能骄傲自满。绝对不应该停滞不前。人家越重视，我们就越要虚心，越要提高。事实上我们还有一批不成熟的艺术品，有些不成熟的话剧，不成熟的电影。戏曲方面也有老一套的毛病。在艺术方面，建国已经11年，总要有些新东西，总要比11年前的水平有所提高。仟国初期，看到腰鼓、大秧歌舞也很满足，可以接受，但是，现在，假如还停留在1949年的水平，那就有问题了。

总理说：我们必须提倡严格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这种严格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用在艺术上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乱写一气，写得多，写得快，不能叫做诗。艺术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论谁，如果把艺术创作看得很容易，看得太简单，他就是不懂得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

总理接着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是讲方向问题、方针问题，同时对艺术上最基本的问题也都已谈得很清楚，但是这方面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我们的艺术品不能老是粗糙下去。业余的可以，对专业文艺工作者，我们就有权利要求你们提高水平，提高艺术质量。一个表演艺

术家，演员，必须有一定的基本训练。现在，舞蹈演员、戏曲演员比较好一些，有一定的基本训练。但话剧演员、电影演员就很差，缺乏基本训练。这个问题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话剧、电影演员，台词说不清，咬字不准，许多电影演员缺乏基本训练，因此许多事情干不了。要骑马不能骑马，要唱歌不能唱歌，唱歌要别人配音。现在许多影

片中唱歌配音，比译制的外国影片的配音口型还要不准确，更不用讲能不能游泳、能不能开汽车了。唱歌一定要有很好的嗓子，现在的歌唱演员常常是哑嗓子。还有人本来很好的，不久以后就哑

了。这是训练方面和保护方面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建国以来，我一直就提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为上，还没有能很好的解决。文化部和各业务单位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同时，作曲家也应该爱护演员的嗓子，在他作曲的时候，应该注意到演员的嗓子。一个歌剧演员老唱，唱得很高，如何能不哑？

以上是总理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指示。按照总理的指示，不重视艺术质量，就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可见对这方面不加重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最近的一次文委书记会议预备会上，花了两天务虚。许多同志谈到，文教系统中干部发生的毛病，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对党的方针“体会不深”，“贯彻不力”，“五风不正”。——五风就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文化部务虚中检查出来，浮夸风、命令风比较突出，当然瞎指挥风也有。

讲到体会不深的问题，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体会不深，在文艺上来说，在电影艺术来说，突出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在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革命干劲很足，重视了不断革命这一方面，但对革命发展阶段论则注意不够；（二）在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上，对革命干劲重视了，但对科学分析就很差；（三）在藐视困难与重视困难方面，则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看起来不错，而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则很不足；（四）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重视了政治思想，这几年抓政治运动，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做了许多工作，这完全必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但重视艺术质量则抓得不紧；（五）在量与质的关系上，五八年以来，数量增加了不少，取得了成绩，但对提高质量却不够注意。主席提出的问题都是两面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战略上藐视困难与战术上重视困难相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辩证法都有两面，而我们则常常是一点论，或者重视了这一面，或者重视了那一面。量与质的问题，文化部党组这两天务虚就感到有问题，感到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贯彻不力，问题当然很多，应该承认和自我批评，我们没有很坚决地贯彻党的方针。

电影界情况也和我们国家情况基本相同，也可以说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绩伟大是没有疑问的，第三次文代会和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代表大会都作了报告，没有人能够否定我们的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看起来也还不少。

去年，周扬同志曾对我谈起：“现在中国电影似乎可以刮目相看了，进步很大，有很大成就，看了好电影很高兴。过去不喜欢看中国电影的，现在

也爱看了。看来可以作这样的估计，中国电影是革命的电影，健康的电影。”周扬同志接着说：“但是，似乎也应该承认，中国电影还不能说是艺术上最完美的电影，也不能说，我们电影的风格最多样化。”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的看法。这是11年来全国电影工作者在党的教育之下，通过各种斗争，所努力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上面总理提到过的电影艺术中还存在的缺点。因为，不能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思想，来说服观众，那就没有力量，没有感染力。这个问题必须很认真严肃地来考虑，想法解决。

艺术创作方面，也应肯定1958年以来是有进步的，产生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很不平衡、很不稳定。好的片子还没有在全部生产的影片中占优势。不平衡，就是说有的片子好些，有的片子差些；有的编导水平提高了，有的编导差一些。这种不平衡是难免的，但是悬殊似乎不应太大。不稳定，就是说同是一个剧作家写的，同是一个导演拍的，这部片子很好，下部片子很差……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是说，作品不能保持稳定的艺术水平。因此，总的来说，电影艺术与整个国家的进步速度、工农业发展水平，还是不相称，还是落后。

我曾问体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体育方面，究竟有哪几门与我们国家的地位相适应？他们说只有两门——乒乓球与登山。其他的还差，与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体育有了两门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那么，我们电影呢？一年80部影片，有几部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有多少是不相称的？或很不相称的？今年春天厂长会议，我们说要求1961年“七一”献礼片一定要相等或超过1959年国庆献礼片。现在看起来，也还不能乐观。最近看了一些剧本和毛片，能够争取相等于十周年献礼片的也还不大多。这也许是我求胜之心太急之故。

现在在艺术家中间，在主要创作人员中间，包括导演、编剧、演员，特别是编导，似乎有这么一种情绪，这就是但求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行了，艺术上，好嘛当然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反正不需要检讨，不会搞运动批评你。因此，但求政治上不犯错误就成。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这样一种思想有没有？我想，有的，从情绪上可以看出来。

刚才念的总理指示中说，如果把艺术创作看得很容易，不重视艺术质量的提高，就是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电影是艺术，是很有力的思想武器，可是，它必须通过艺术来表达。不重视艺术性这一条，对最有群众性的电影艺术来说，更是不应该的。这本

是老生常谈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这一段话，同志们也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毛主席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

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毛主席又说：“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

我们对于电影就没有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合。就没有结合好。主席所说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今天也还相当普遍。

以下，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谈电影创作上的问题。

在创作思想上，问题很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不敢写矛盾和正面接触矛盾。生活里面充满着矛盾，革命中间有矛盾，建设过程中也有矛盾，但是我们的作品常常在接触矛盾时，在有戏的地方一闪而过，有意避开，怕接触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着的矛盾，更谈不上通过辩证法、经过斗争来解决矛盾

了。这个问题是在创作上最普遍的问题，就是不敢描写矛盾，把生活简单化。周扬同志在文代会中的讲话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当然，生活是充满矛盾的。生活中的新事物，总是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我们的先进人物的特点，正是在于他敢于同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反面现象作斗争，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阻碍，而为新的生活开辟道路。我们正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使我们从根本上免于陷入无冲突论的危险。我们的文学艺术决不要回避缺点和困难，忽视消极现象和反面人物，冲淡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只会把生活简单化，把真正的先进人物描写成没有生命的稻草人。这样的作品，既不能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崇敬，也不能激起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憎恶，更不能引起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看过就会叫人马上忘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歌颂新人物、新思想，也要毫不留情地鞭挞旧事物、旧思想，要深刻地反映新事物同旧事物的尖锐斗争，因为坚强的崇高的英雄性格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这一段话，都是我们讨论过、学习过的。

现在我们的电影剧本中，有不少就是不敢正面去描写矛盾。人民内部有矛盾，譬如说封建性的残余，资本主义思想、感情，以及旧时代旧社会留下来的习惯势力，恐怕还要很长一个时期才能彻底反掉。

矛盾显然是存在的，我问过几个写电影剧本的同志，我说你们在农村中有没有发现人民内部矛盾？有没有这方面的尖锐的斗争？回答都说是有的，甚至还很尖锐。那么为什么不写？怕，一个怕字。怕写斗争，怕写矛盾，怕写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上还有顾虑。

在我们电影剧本中，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看起来，不管就人物来说，就故事来说，这个地方应该有斗争了，到了剧中人物要在困难前面经受到实际考验的时候了，但是恰恰就在这个地方，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了。最常见的办法是用几句话来解决问题，用开一个会来解决问题，没有通过斗争，这就是无冲突论，这是一个缺点，一个倾向，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

二、大多数写工农业、人民公社的剧本，很有拘泥于真人真事，不敢概括、虚构、集中写典型的情况。拘泥于真人真事，不敢大胆创造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现在，真人真事问题是我们创作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拍了真人真事的片子，也有了一些艺术加工，也有很不错的。但，这也只是基本上真人真事。拍了《黄主妹》，拍得不错。但《黄宝妹》中也有虚构成分。表扬先进人物是需要的，但原封不动，真人、真事、真名，这种创作方法，可以说是违反毛主席的文艺原则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不是

讲吗——艺术品是从生活中来的，但艺术品“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限于写真人真事，怎么概括呢？不虚构，不把各种人物性格更概括起来，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因此，写真人真事的剧本，几乎没有一个不引起纠纷的。《刘胡兰》写厂一个嫂嫂——落后分子，引起了“打官司”。苏联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写了一个指挥员投敌，这个人还活着，他提出抗议，书中写的还是用了假名字。你写一个真名真姓的劳动模范，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时代就是那个时代，那你很难概括和虚构了。这里就存在一个“情理”和“分寸”的问题。提得太高了，人家一看就会说：没有那回事！你写得不够，也会说：这不行，不像他！假如有了一个反面人物，人们就会说：本来是没有这个反面人物的呀！——反正都会发生问题。

拘泥于真人真事，不敢大胆创造、大胆概括地写典型，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同志下去访问了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回来就根据这些材料来写。如果根据一篇新闻报道，就写成一个电影剧本，那就太简单了、太方便了。反正材料都在这里，又不要找典型，只要把材料排一排就行。反正根据真人真事，不提炼，不概括集中，不使之典型化，这是最偷懒的办法。

三、创作历史戏和革命历史剧，我们也似乎有一些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现在的反历史主义，主要表现在把今人的思想、语言、行动强加于古人，把今天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的思想、行为、语言，强加于古代的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人们身上。

我们现在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这之前，高尔基谈到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曾说过“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他要求从革命发展中刻画现实，并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历史具体性如不去考虑，——在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如不考虑历史具体性，——把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强加于古人身上，这就是反历史主义了。历史上的事情，常常可以借古喻今。历史上也有巧合，古代有这件事，今天也可以有。但历史却永远不会重复，因为社会在发展。过去有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今天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时代背景不同，社会基础不同，上层建筑不同，人的思想不同、语言不同、行为不同，因此斗争方法也就不同，怎么可以把今人的行为强加到古人身上去呢？这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去年写几个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时，也跟个别作家谈过，也发现了一些苗头，当然不是太大的问题，只是语言上和行为上的，有些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地方，与编剧导演谈了，作了些修改。今年看到的一些历史片，特别是在戏曲中，反历史主义似乎又在抬头。写历史题材的剧本，请同志们注意两点，一是要防止政治上的影射国内外时事，借题发挥；二是注意创作方法上有没有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有些同志以为用这种方法，就是与政治结合，但这是机械的配合，简单化的做法，而且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倾向，或多或少表现在我们写历史题材剧里面。

创作技巧上，可能问题更多一些。外国人从理论上正面同我们辩论，我们都可以辩得过，他们没有法子驳倒毛主席的正确文艺方针。他们看了我们的电影，不管是友好的或者不友好的，大多是从艺术质量上提出批评。有的好意，有的恶意。外国同志、外国朋友对我们电影的批评，很少从正面说

我们的戏思想不好，或行说方向不对。他们可能心里有，正面提不出来。但对艺术范围的缺点，不论是结构上、表演上，乃至布景、摄影上，任何一点粗糙，不合电影文法，他们就振振有词。我不举恶意的，我只举几个对我们提出的好意批评的例子。

最近两年，我国影片在日本映出，反映很好。《白毛女》、《为了和平》、《祝福》、《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五朵金花》，一般都有好评。特别是进步方面对我们很有好评。一位日本电影评论家在报刊上写了文章，讲了很多对中国电影的好话。但他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谈中国电影创造技巧上的缺点。他说：当然，中国电影还有很多缺点，剧本中往往叙述占优势（我想，这就是说没有描写人物性格、冲突等问题）。他又说：有许多演技很好的演员，但有老一套，旧的演技，特别是喜剧表演不好。以上这几句话，正讲到我们的弱点。中国电影叙述占优势——这句话讲得很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电影就是讲故事，把故事讲清楚就完了。这是日本同志说的。新闻纪录片《欢腾的西藏》，在莱比锡电影节评奖时得了一个一等主要奖。在新影厂作过顾问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同志，看了这片子很高兴，他就去找评委会主席说，我看这部片子应得大奖。主席回答说：“我同意，但是我只同意你这意见的一半。这部片子很好，但它还有缺点——解释太多，讲话太多，有许多场面明明可以通过画面使人感动的，都用讲话代替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片子。”这是不是讲到了我们的缺点呢？我认为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伊文思在中国也对新影厂讲过，我在新闻纪录片会议上也讲过，讲过不只一次：讲话太多，根本可以不讲话的地方，加上了很多形容词，“伟大的”，“美丽的”，“壮丽的”，形容同真多呀。上述的许多意见，都是荷兰同志对我们的好心批评。还有一位外国话剧导演路过北京时，他要求看一些中国话剧。我们同意了。他看了不少话剧之后，说了许多好话。对于我们的剧院组织、民主作风、艺术与劳动相结合，全都同意和赞美。我们的同志就问他，你谈谈有什么缺点吧！他讲了三点：

（一）中国话剧中，剧作家、演员、导演不敢在剧里写抒情部分和恋爱场面。

（二）正面人物写得不错，反面人物写得不好。第一幕出来，我就能看出谁是反面人物和他们的结果怎么样。每个戏的结论都和我想的一样。反面人物公式化，从形象到对话、动作为止，全部是反面人物。

（三）话剧语言不好。很平淡、枯燥。既没有幽默，又没有警句。不动人，不简炼，讲得太多。他讲的是话剧，我看电影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是外国朋友，对我们有好感的朋友提的意见。实际上，在艺术创作技巧上来看，我们的缺点还不止于此。最近我看了几个老厂的一些重点片和分镜头剧本。据我看，写剧本方面，现存的最大的毛病是结构不好。很不讲究结构，平铺直叙，不能引人入胜，而且交代不清楚。很多片子松散冗长。片长9本的还很少，都是14本、15本，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胶片愈不够，片子愈长。为什么这么长？就是结构不严谨、不精炼、不考究，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影片长度正在向印度的方向发展。印度片子要看三四小时，照现在这种情况下去，我们的影片也快要到三小时了。

我也许神经过敏，我一看分镜头剧本，就先算尺数，一数就是1.3万尺、1.5万尺。我总想：这一个故事，是不是七八千尺就可以解决？我想是可以解决的。花点功夫就可以解决，不花功夫就要那么多。结构不讲究，有的影

片看了三本，三四千尺过去了，时代、环境、人物还没有介绍清楚。映了半小时，还没有提出问题。人物不清楚，这个人 and 那个人究竟是兄弟、邻居、上下级？观众无法弄清楚。很重要的人物，到戏演了一半才出场；前面很重要的人物，到后半部就没有了。编剧不讲究科学性，这是我们电影中的一个显著的弱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日本朋友批评的“叙述占优势”。不刻画人物性格，很少有典型和鲜明的英雄人物出来，使我们感动。都是把人物特点平均发展，没有特点，没有个性。我有一次和一些同志们谈过，要剧本抓住观众，吸引人，不外有这几条：

（一）情节戏，在话剧里面叫闹剧。故事紧张、紧凑、惊险，这种戏即使没有大多的人物性格描写，但故事抓住了人。

（二）情节不太突出，没有曲折的情节，但是人物性格突出，观众喜欢这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像周扬同志说的：不会马上叫人忘记。使人发生崇高的感觉，有教育人的力量。举几个例来说，比方《董存瑞》，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可是它并没有什么大多情节，也不曲折，当然情节是有的，但不是惊险片，就是董存瑞、鄧振标这几个人物性格是典型的，使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碰到过，是有这种人。它也抓住了观众。最近看了一个比较好的片子——《红色娘子军》，其中就是琼花那人物写得不错，男主角写得并不怎么好。琼花写得比较生动，有性格。写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有反抗性的农村少女，充满阶级仇恨，非革命不可。她的性格是鲜明、动人的，这部片子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人物性格站住了，所以把观众抓住了。我们的剧作家、演员、导演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花功夫，真正刻画出几个可爱的人物，或者是可恶的反面人物也可以。外国人不是批评我们反面人物公式化吗？《红色娘子军》中有个反面人物，地主的狗腿子，写得比较好，阴险得很，但不落套。写得像这么回事，社会上是有这么一种坏人。叫入觉得这样的人是可能有的。几个人物性格站住了，戏就站住了。我们片子的缺点之一，就是导演和编剧在人物性格上没有很好的花气力。

第三个问题是影片的背景很不讲究。这说的是整个时代背景与地方色彩很不讲究。一个戏出来，是写现代的？若干年前的？写南方的、北方的？是解放初期，还是大跃进以后？没有特定的色彩和气氛。我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讲过，一个是时代气氛，一个是政治脉搏。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戏一开始，看了几本，还不知道是哪一年、什么地方。现在有个通行的最简单的办法，开头就有一段字幕或一段旁白：“1958年在上海”。如不说这句话，而能把时代背景烘托出来，这是艺术家的本事。如果只要讲话，那就不要花什么功夫都行了。你要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背景和气氛，把政治脉搏和时代气氛，乃至地方色彩表现出来，要写得不讲一句话也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是1958年，这是大跃进中、这是大跃进以前、这是大跃进以后，这是1960年……使人看得出这些东西，要用真正艺术的方法来烘托时代背景。我们不大肯在这方面花气力，假若要花的时候，那就是分开写。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写故事的地方不写背景；写背景的地方不写人物，不写故事。因此，片子愈弄愈长。本来是一幅画面：前面是人物，后面是背景；现在把它分开了：一张是风景画，一张是人物画。结果变成了两个画面。片子拉长了一倍。

我们的影片中，对时代背景与政治气氛很少注意，这个问题比较普遍。

我看电影剧本的时候，开始总先要在本子上注明：写的是那一年那一个季节。可是看下去，常常发现编剧和分镜头导演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开头是春天，中间没有写时间过程，一下子就到了冬天。编剧的同志很少考虑季节感、政治背景。人物离开了背景，就等于鱼离开了水，就不是活的了。一个人的语言、动作都反映着他的时代，后面的时代又烘托了这个人。这才能使人发生真实感。

第四成问题是语言上的毛病。外国人说我们说话多，语言贫乏，不简炼。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志审查一个电影周的影片，听了那些话，他开玩笑说：“这是在政协礼堂讲的！”因为片子中的人物说：“我深信……必将……”等等。这真像是在政协礼堂讲的。在讲台上，在麦克风之前，照相机对准了的时候才讲的。这种语言在生活里面有，但不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都是这样讲的，讲究语言，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文学语言要精炼、准确、鲜明。毛主席说过语言的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中国有这个传统。古人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一个字都得推敲，我们有一些话剧、电影剧作家写下来就算，太不讲究。语言没有性格化，因此，有些电影里的语言，这个人可以讲，那个人也可以讲。当然也有一些剧本语言比较好，但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作品，对语言不够考究，语言非常贫乏。这个问题之外，还有编剧、导演对演员的使用问题。总理说，作曲家不爱护演员。我看我们也有一些电影编剧不大照顾演员。今天在场的也有编剧，也有演员，请原谅我讲得太直率。编剧写剧本，好像不大考虑这话写下来演员好不好讲。清朝李笠翁说过，创作家写对话，应使演者“上口”，同时要使观众“入耳”。我看这话很有群众观点。李笠翁这个人人格很坏，但不能因人废言，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编剧写下一句对话，假如既不考虑演员能不能“上口”，又不考虑观众能不能“入耳”，这难道是有群众观点吗？我看电影剧本时，有时禁不住拿起笔来改一两个字。因为对话中最后一个字用的是入声，那是很难讲的。演员讲起来很拗口，难讲，演员碰到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有许多话，只有看文字才能懂，讲起来听不懂的。这个情况很普遍，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是考验我们有没有决心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我看的剧本都是三稿四稿，或者是定稿。既然是送到文化部来的，我想当然是定稿了。但这些所谓“定稿”，大致都是作家写下来以后，没有经过第二遍第三遍细看一看的稿本。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引用的鲁迅在《北斗》杂志中所写的一段话，我们都应该一读再读才好。前几天，我向影协书记处建议，把苏联纪录片《托尔斯泰的手稿》拿来映一映。托尔斯泰写一部小说，原稿上一个字都要改来改去改无数遍，他的严肃性真是惊人，当时他80多岁了，全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还是这样认真。我们年纪还很轻，就这样写了就算了，不想改一改，那不太好，这样是不能提高的，这也是不负责任的写作态度。

第五是演技问题。中国演员的确是世界上很好的演员，很有表演才能，这应该肯定。但是，就像总理所讲的，缺乏基本训练。特别是口齿不清，这是大问题。总理讲了几年了，最近他还发表了这个意见。关于这件事，大约在1958年底，我写了一封信给几个老厂的厂长，请他们注意一下演员的口齿问题，这也不是我的意见，总理再三讲过这个问题。各个厂大概都抓了一下，但没有继续抓下去，贯彻下去。最近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说：话剧《林海雪原》很好，但开头一大段话听不懂。演员口齿不清，导演就马马虎虎算了。话说不清楚，不只一部片子，这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甲午海战》话剧，

第一幕的对话用心听也听不懂。口齿不清，再加上后面音响效果很响，因此，更听不清楚了。中国观众是最好的观众，是最富于耐心、最能原谅人的观众，同时，也应该说，演员说话说得清说不清，与剧本写的对话也有关系。我认为编剧、导演都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首先要让观众听清楚，特别是有关重要的话，关键性的字，一定要讲清楚。电影是很经济的东西，最关紧要的一句话不清楚，危害就很大。“你到哪里去？”“我到电影联谊会去。”假如“电影联谊会”这个词不讲清楚，以后的情节观众就不懂了。当然，表演上也有问题，但是讲话是基本训练。总理再三说，演员什么也不能干，开汽车也不会开，骑马也不会骑，也不会唱歌。年纪大的当然不能勉强。但培养年轻演员，如在电影学院里，应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学点东西。

应肯定我们成绩很大，取得很大进步。但问题不少，应该很重视，应该符合和达到总理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的作品，到外国去放映的时候，不论哪种人看了，都要使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懈可击，没有缺点可以挑。要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就要真的下点功夫。这些弱点，我们一定要下苦功克服。我相信中国人，这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有党的领导，有干劲，认真对待这些技术性的缺点，是一定可以克服的。但艺术上的缺点，不可能在几个月内改观，总得要有时。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扭转这个局面。影协等团体，是否可以造成一个下定决心、尽快扭转风气的局面，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把我们的缺点改正过来，真正使我们艺术提高，不论思想性也好，艺术性也好，都要进一步提高。

现在必须要在学术界、艺术界、造成勤学苦练、好学深思的风气。反对浮夸风，要实事求是，埋头苦干。

毛主席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文章，写了快20年了，到明年（1961年）就是20年。我们真要按照这篇文章的精神来工作，就一定要把我们的学习风气扭转过来，改造我们的学习。一定要把得过且过、不求甚解这种风气扭转。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求进步、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是不好的。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这样说，你作一件事，讲一篇话，必须要详细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分析，综合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就要学，就要花功夫，你写人民公社，不详细占有人民公社的材料，有足够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要写就很困难。不进行科学分析与综合研究，要写好就很困难。没有占有材料，要刻画人物性格是难的！必须要不断地在生活中去看，去分析，去综合。观察、分析，记录下来，综合起来，才能找到典型，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要找典型，怎么找呢？怎么塑造呢？京戏里有黑头这一个行当，但是黑头里既有张飞，也有李逵，同一行当中也有分别的。电影里没有脸谱，就更必须在各种各样的人中去观察，深入生活，记录下来，研究、分析、概括，才能创造典型。不花功夫，创造不出典型的，我们一定要讲积累，积累各种知识、各种形象、各种语言，这是创作的本钱。我们要从生产中学，从斗争中去学，从中外古今名著中去学，才能占有材料，积累本钱。要认真读书，造成好学深思的空气。我们的艺术工作者读得少，当然在劳逸安排上也有问题，太忙，就没有时间读书。

周扬同志最近跟我讲了几次话，他都说应该提倡读书。艺术家学问不够，基础不够。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订个计划：读哪些书，钻哪些问题，下去深入多少时间……。中国画家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路是感性知识，读书是间接知识。

总理说，1949年，你粗糙点还可以容忍，解放11年，你还是停留在1949年的水平，我就有资格要求你提高。1949年，战争刚结束，没有工夫研究学问，是可以原谅的。现在解放11年，还是那样，那就不行，党和政府有权利要求你们提高。

这个问题必须重视，特别是艺术家与别的行业不同。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和别的艺术家又有不同。皮匠只要懂得皮的性能、制鞋的方法就行了，而艺术家——灵魂的工程师，却要描写各种人，要描写古代人、现代人，农民、工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艺术家要懂得中外古今、男女老少，对于天文地理、现代科学技术都要懂一些。艺术家跟泥瓦匠、皮匠以及别的产业工人都有不同，钢铁工人懂得钢铁这门，基本可以完成任务。艺术家不具备各种各样的知识就不行。人、社会、阶级、时代，不懂得这些就不行。总理要我们艺术家多懂得一些东西，更丰富一点。周扬同志说他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有些作家一出名就骄傲自满？为什么郭老、茅盾、巴金……几十年不垮台？为什么他们不骄傲自满？茅盾同志最近为了写那篇文代会报告，看了上千万字的小说。66岁，很用功，不了解就不写，修改了很多遍。他基础好，还是不断用功地学。周扬同志说：一个人骄傲自满，就是因为他恨底太浅。艺术之道，本来是很难的事情，很艰苦，这里也有一个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问题。

电影界要花几年功夫，下定决心，扭转浮夸作风，反对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空气，真正在艺术界造成好学深思、老老实实做学问的空气，积累艺术上的技术和知识，勤学苦练，把我们艺术的武器磨练得更尖锐、更完美。那天，我跟一位影协的负责同志谈，《电影艺术》杂志就应提倡这种空气。学术空气，研究问题的风气，讨论问题的风气，不是一阵风的号召。必要的运动还是要搞，但是做学问正如吃饭、喝水、呼吸一样，什么时候都不要停止。实事求是，切切实实，埋头苦干，搞它几年。明年度的任务要根据实际重新考虑，从实际出发，1958年生产了103部故事片，1959年为了提高影片质量，降到80几部，明年为了胶片紧张和劳逸结合问题，可能还要压缩一些，数量压低了，但质量就必须提高。开会，不必要的、不是急需搞的事情，都要尽可能减少，让艺术家、创作人员下去深入生活，能够念书，真正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对艺术创作人员，一定要给他们学习时间、读书时间、下去生活的时间，使我们的创作干部，若干年后，大大提高一步。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的高峰，也没有不可学会的东西，只要有干劲，有决心，一定可以学得会。我们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既有干劲，又有优秀文化的历史，所以只要注意了这方面，就一定能克服我们现在所存在的缺点。我们十年来成绩很大，事实摆在前面，谁也否认不了。我今天谈的只是提高影片质量的问题，只要我们注意了，下大的决心来搞，缺点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心。可以预想一下，电影提高质量的问题，要几年才能过关？我想，七年到十年差不多吧，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方向、方针和方法，我们有了骨干队伍，而且有了一定的经验，只要我们很好总结一下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认真地努力一下，我想七年左右一定可以过关。

我的话完了。在座的都是老同志，熟人，话讲得坦率，很可能过火，甚至有错误，这些都只供参考，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永远铭刻在心间的会晤

荒 煤

进入 1992 年的春天，作为电影战线上的一个老退役兵，回忆在建国 40 周年和建党 70 周年双庆的日子里，看到电影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不禁感慨万千！电影界的朋友们拍摄了一批优秀的反映我国重大革命题材的影片，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等，这些影片塑造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领袖人物栩栩如生、生动感人的光辉形象，再现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崇高的品德与智慧，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伟大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勋，不仅对历史的真实有着深刻的揭示，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这些影片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不仅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也在世界电影艺术史上写下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中国电影艺术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回顾中国电影事业在发展的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缅怀周恩来总理对电影艺术那些无微不至的热情关怀，亲切教诲，我不能不心情激荡，无限感慨。

我回忆起和周总理的一些重要的会见和所听到的教诲，衷心

希望电影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好的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反映重大革命题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要看到反映现实题材的严重不足，继续前进。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周总理许多生动的印象，但最难忘怀的，还是 1959 年 4 月的一次会晤。

1959 年 4 月 22 日深夜，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周总理明天上午在北京医院要接见上海全国政协电影界几位委员，让我也去参加。

接到电话后，我不免有些疑虑，前两天还看到总理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见面，怎么住医院了？又为什么在医院还急着找我们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我立即联想到，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柯庆施已经宣布过，上海不欢迎夏衍、陈荒煤去干预上海的电影工作。我又触犯了什么呢？

而且，刚刚在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已经和我们见过面。总理见到沈浮、赵丹、郑君里、张瑞芳、陈鲤庭他们，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家庭情况。陈毅既是上海的老市长，又是上海文艺界的老朋友。所以这次见面，有如家人久别重逢，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领导汇报什么问题，希望总理讲点什么。

更没有想到陈毅同志突然向总理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总理，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让他们搞一部电影看看吧。”

总理也被陈老总那“请求”的神情逗笑了，就让我去安排。我赶忙给电影局打电话，得知放映室里只有一部刚刚送来的译制片（片名我忘了）。我问总理看着不着，没等总理答复，陈老总就说：“可以嘛，可以嘛。”笑嘻嘻地站起身来要走了。这时候，总理才说他还有点事，不去看了，要我们陪陈老总去看。

于是，我们就到文化部大楼地下室一个小放映室里，陪陈老总看了这场电影。

回想这些情况，我越发感到奇怪。总理突然进了医院，为什么还这样急于找我们谈话，到底为了什么？我不禁犯了职业病，把这一年赵丹、君里、瑞芳、沈浮等正在拍摄影片——特别是我喜欢和支持的影片，都在脑海里滤了一遍，想想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想到上海的一些情况，一夜没有睡好。

上海电影界的情况的确相当复杂。它的确是中国革命电影的发源地，有一大批从30年代起就从事电影工作的老同志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做出了重要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又的确有人认为这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的王国”。

最典型的例子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批判钟惦棐同志，有一条骇人听闻的罪状，就是惦棐同志讲过一句话：

“上海是电影界的半壁江山”，是企图煽动上海电影界搞“复辟”活动。

我也亲自听到一位吉林省的宣传部领导人对我讲：

“我们中国电影走面向工农兵的方向，要靠赵丹、白杨他们这些人，真可笑！”

在1958年12月我写了一篇很错误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不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判了许多影片，认为这些影片的错误：

“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动摇和背叛，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

这件事当然引起了柯庆施的不满。尽管后来我作了检讨，柯庆施也还是宣布，上海不欢迎陈某人来干预电影工作。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1956年我到上海时，柯庆施亲自找我谈话，让我回去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上海不欢迎夏衍同志再过问上海的电影工作，上海自己能够管好电影——不料到了1958年又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总之，柯庆施、张春桥实际上是要由他们任意控制电影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早就伙同江青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了。

张春桥在“文革”之前，就宣布电影界有一条夏（衍）、陈（荒煤）路线了。

4月23日上午我到了北京医院，才听到护士长告诉我，周总理因为痔疮复发，但正在忙着开人大、政协会议，不肯住院治疗，只让医生打针止血卧床休息一天。这位瘦小的护士长流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忧虑神情叹道：

“可又把你们找到病房里来谈话！”

总理住在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我们一走进去就把病房挤满了。

周总理平躺在病床上，笑容满面地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他才告诉我们，前两天和我们会见时，他原想谈谈他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没想到陈老总突然要看电影，结果没有谈成，所以趁着在医院休息一天的时间里，“请你们来谈”。

他然后伸手从枕头下面掏出一张纸条来，看来他还是作了准备的。

这时候，郑君里高兴地笑道：

“我们早就想听总理的指示了。”

41

总理听后又把纸条攥在手掌里，微笑着而又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指着赵丹等说道：“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是我在重庆时候就认识了——荒煤

倒是我回延安去之后才认识的——如果你们把我看成领导，要我作什么指示，我就不讲了，要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我倒愿意讲点心里话。”于是，君里又直点头，笑着表示道歉。赵丹着急地埋怨君里，两个人又急忙央求总理讲。他们那种神情，简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有些顽皮的笑容，不禁使总理和我们大家都欢乐地笑了起来。但我也的确感到这是一种真挚友情的流露，甚至可以说是君里、赵丹对这种友情的得意的享受和陶醉。连那位护士长也高兴地笑了起来，一面又流露出难以理解的神情，她恐怕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吧：一位总理和几个演员之间却有这样亲切的交谈。周总理后来不时看看那纸条，给我们谈了许多。当时我没有带笔记本，没有作记录。现在保存的只是张瑞芳同志当时记录下来的较简单的记录稿，但周总理当时讲的重要论点和精神都保存下来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周总理后来又重新归纳起来，于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文艺界代表、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总之，周总理根据他观察到的文艺界、电影界在“大跃进”期间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他的看法。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用辩证的观点去认识艺术客观规律的问题；就思想性与艺术性、数量和质量、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领导方法与作风和艺术领导民主，形式与风格等等问题，全面地阐述了一个观点：即对待艺术创作，用一个生动的形象比喻来说，必须学会用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

我现在根据记录稿和回忆，尽可能按照总理讲话的顺序和一些感受写下来。周总理一开始就讲，他通过每次会议，发现我们许多部门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会两条腿走路。他认为：

两条腿走路，这是做一切工作的规律，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毛主席运用这个方法非常熟练。

两条腿走路，去体会一下，就像小孩子开始学走路一样，一开始总是走不好的。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有片面性。尤其艺术作品，是精神产品，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会引起不同的意见。一张画有几处败笔，画坏了，就很突出。一部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叫人看不下去了。

这是从广大观众的角度来要求。

从我们领导上看，只要作品基本上是好的就可以了。可是艺术产品是给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的群众。

我现在回顾一下电影的历史，不能不感到惭愧和内疚，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周总理这一个重要的思想：

要求创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主要是照顾到广大群众的需要，要考虑到广大群众。

在电影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创作人员中形成一种思想：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

我们搞艺术生产的领导同志也往往是看重把政治关，而忽视艺术质量，只要领导上对政治上没有什么意见就可以了。我们很

43

少

想到“艺术创作是给广大群众看的”，因而要求艺术上的更加完美。

周总理却是从群众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从领导的角度，他反而强

调不要求全责备。

他认为：

“ 文艺创作不能粗糙，这是一个极其细致的工作。但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创作每一次都成功是没有的。所以不能人人作诗。毛主席作了很多的诗，发表的并没有许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多少。因此，创作也不能有一次失败就失去信心。作家不可能创作大多的作品，电影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 ”

第二点，总理指出：

“ 领导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认为领导什么都行，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要善于集中。想一鸣惊人是不行的。 ”

这时候，总理就指着我说：

“ 荒煤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没有和大家商量，就被袁文殊攻了一下。 ”

——这就是指我前面讲到的那篇错误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受到了袁文殊的批评，我同时也写了回信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承认：

“ 文章最主要的缺点，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我同意，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做‘白旗’是不恰当的。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对‘白旗’的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 ”

我当时也向总理说，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周总理随即又提出来，制片厂的领导要发扬民主的作风：

“ 电影厂的领导可以召集各级干部的会议——发牢骚的人也可以吸收，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就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要学会集中群众的意见。不会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不能领导群众。当然，人云亦云也不行。 ”

第三，周总理又强调指出，既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又要把握主导的方面，也就是引导正确的方向。事物的发展总有主导的方面。

他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跳舞，也在主导的一面。两个人都主导就不行了，就会乱了脚步。

他还指出在艺术创作方面，既要求十分细致，又不要求全责备。但应以要求细致作为主导方面。

他又指出：“ 导演也应该是这样，要善于听取集中群众的意见，并且坚持下去。之后，又不断吸收群众的意见，这就会使得创作更加丰富起来。 ”

第四，周总理对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创作提出极其宝贵的意见。

首先，他指出：“ 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大家心情舒畅，不要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之后就会带来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工作还是要一张一弛。

国庆献礼片不要搞得太多，要在可能条件下进行。

以后 4 个月不要再催制片厂了，必要的条件要给予支持。有些献礼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

上影有八部影片献礼，又和新疆合拍《绿洲凯歌》，是否太多了，可以与袁文殊说一下。

八九部献礼片，如果国庆节搞不出来，到年底交也可以。

好的影片，宁可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的下马。 ”

现在，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周总理和我们的这次谈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明确指出：

“艺术创作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细致一些好？”

他还举国庆工程为例，北京要上 14 个工程实在太紧张了，有两个工程决定下马了。

“而艺术是精神产品，就更应该注意质量。”

可惜，总理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发挥，在他 5 月 3 日紫光阁的讲话中也没有再强调这一点。

在“文革”之前，我多次在不同的会议上传达并阐述了我对总理这种意见的看法，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提高质量是为了更好的跃进》。

特别是我在 1959 年 7 月厂长会议上的发言中，对 1958 年电影界搞“大跃进”，刮浮夸风，最后归纳为三条：

1. 许多影片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面有片面浮夸风。
2. 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3. 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强调政治，忽视艺术。

而文化部党组 7 月 19 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也非常明确指出：

“1958 年艺术片生产中，这种只满足数量忽视质量，只注意‘政治’不注意艺术性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结果，到了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运动中，都成了我的右倾思想，受到了批评。我和夏衍都成了文化部党组“重点帮助”的对象；到了“文革”期间，就更加成为反对毛主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罪行”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感到，周总理在那时候提出，艺术生产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多快好省，应该注意质量的问题，的确是尊重艺术规律的一种科学态度。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是工农业生产也未必都能够多快好省，何况是艺术生产？

所以总理最后特别指出，一定要注意，使得创作人员“既要鼓足干劲——这是主导方面，又必须心情舒畅”。还举演员为例：

“不可能设想，演员要他哭就哭，舍不得用胶片。什么事都一样，要求过头了就成为荒谬。漂亮的人，如果脂粉抹多了，反倒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开。不然，创作人员就不能精神舒畅。”

第五，周总理指出：

“对国庆献礼片，也要两条腿走路：

“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这个经验也不是很容易得到的。国家工程的例子就是如此。你们献礼的影片，九部中有六部好的，我就满意了。如九部中有四部不好的，我宁可上六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还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集中使用了，人力物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一些了。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人力、物力、胶片都应该如此。”

他特别讲到演员不宜太紧张：

“演员刚刚把自己这个角色准备好，情绪集中了，你又让他去搞别的事情，他怎么能演好那个角色？

“毛主席做一件事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就都不管——当然，也有人要跑

龙套，比如我。但你们可不要学我。（总理指着赵丹他们说）你们演员拍的影片不能都是满面倦容的样子，拍我的片子可以。而演员是要和广大观众见面的啊！”

总理这里一再笑着以自己作例子，我们既感动又感到十分亲切，大家都高高兴兴笑了起来，病房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友情的气氛。

第六，周总理又指出：“影片既要强调思想性，也要讲究艺术性，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而主导方面是思想性。”

47

他以反映教育改革题材为例，说道：

“如表现教学改革的戏，要好好研究。因为还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弄不好就要犯错误。教学改革报告中写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在实践中还只有半年的时间，还会有很多的地方未必成熟。

“所以，国庆献礼的影片，实际上是十年经验的总结，要合乎时代的精神、思想、政策。

“前两年的影片可能粗糙一些。我听邓大姐讲，例如《你追我赶》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

“电影还是应该注意人物的色彩和动作。”

回忆总理这一段讲话，我觉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电影这一有广泛群众性的艺术，在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电视、录像的冲击，从电影生产的总体上来讲，如何正确地理解周总理的这一总体的要求？

电影艺术到底怎样去反映时代的精神、思想和政策，怎样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

这仍然是电影界值得深恩的一个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我认为这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一个根本任务。

国庆40周年和建党70周年双庆的一些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取得重大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优秀的作品，必然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因为作家创造了各种真实感人的形象，通过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所揭示的种种矛盾，从而展示出时代的潮流，启发人们思考，走什么道路，应该吸取什么经验，实质上终究是以一个时代的侧面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去反映时代精神。

这正如周总理在1962年讲话中提到的：

“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不能要求一个作品把时代的全部内容都反映了……只能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又一个侧面，不能反映各个侧面。”

这仍然是电影艺术不断前进、发展中始终不懈去追求、探索、攀登的一个高峰。

第七，周总理关于政治和业务学习问题讲了以下的意见：

“政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但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的生活实践相结合。”

总理指着自已脸上的一个小疮作例，说护士要等脓熟了再挤，否则就会挤出鲜血来。人人身上都有细菌和病毒，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身体健康加以吸收而排泄出去，再一个办法就是开刀——这就是革命。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就是要革命，而对于资产阶级就是改造。

总理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应如何和中国实际相结

合，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认为，“脱离实际，生吞活剥地学习理论是没有用的。”

对于业务学习，总理认为创作人员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还专门问我电影学院的教学情况，我告诉他，表演系学三年，除基础理论外，有基本训练：如舞蹈、太极拳等。

总理认为演员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有基本训练，要练嗓子，包括语言发音。他举例说，政协大会上由电台广播员读的文件就特别清楚。总之，“演员从身体到运动、歌唱都应有基本训练。”

现在我还有些记忆，谈到政治学习时，我当时听到总理那样讲：

“政治学习不要占很多时间，领导同志每周和大家谈谈就可以了——占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就有些担心某些领导人可能通不过。

49

事后，文化部党组有位重要领导人果然议论起来，认为这一条不能往下传，政治学习只占十分之一时间太少了。当然还没有想到后来决定整个讲话都不向下传达。

周总理讲到艺术创作人员的业务学习时，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创作人员“既要精通一行，又要是一个多面手”。“对演员来讲，基本训练是主导方面，主要是精通一行，但又要做一个多面手。”

“而且应该重视文艺修养，丰富演员的修养，使演员有多方面的才能。”

总理再三强调演员要精通一行，又是多面手，必须要有丰富的文艺修养时，还特别指出，不这样做，“就是一个杂货摊”。

他又一次以自己为例，说他是一个“杂货摊”，当然大家都不能同意这个看法，然而大家也能领会总理的胸怀：他随时随地以身作则，凡是有关人民利益的事情，他总是竭尽全力，倾注满腔热情加以关注，切实解决。他作为一个数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从不以主宰人民命运的领袖自居，始终谦逊地把自己称作是一个“跑龙套”的人。他真正是中国人民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孺子牛”！

第八，周总理谈到文艺工作者下去参加劳动的问题，他也有一个重要的看法，他认为，“下放劳动锻炼，要保护身体健康，也要保护人的坚强意志。”

他认为，在新社会，既要求干部下去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健康。甚至认为当时规定下放的时间是一年——“其实一年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且方式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医务人员可以到农村作一个时期的卫生工作。”

而我觉得，提出文艺工作者去下放，劳动锻炼，要注意身体健康，要锻炼人的坚强意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不像有些同志所想的，下放劳动，就是和群众一样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周总理当然一再指出，号召我们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然而他没有把下放劳动仅仅看作是一种改造的方式。而是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既是对干部的信任——不是把他们当作永远没有改造好、甚至难以改造的对象，而是希望他们保护健康，更重要的是锻炼坚强的意志，在与人民共同劳动中保持一种革命的坚强意志，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样来看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意义，是真正地高瞻远瞩了。

可惜的是，总理这个思想并没有为许多领导同志所领会。劳动锻炼始终

是对知识分子改造、惩罚的一种代名词，到了“文革”期间，“干校”不过是一个变相的劳改所罢了。

第九，周总理谈到政治挂帅和物质福利两个方面，也要注意两条腿走路。既要强调政治挂帅，又要注意物质利益。政治挂帅是主导方面，需要强调。但是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那就有偏差。

总理特别指出，在工农业方面应很好注意这两方面，否则，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会受影响。

“全国群众不可能都是先锋队。不能忘记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群众背后是有意见的。”

第十，周总理谈到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指出：

“我们既要理智又要热情，要二者兼备。而理智是主导方面。艺术家们容易热情激奋。领导则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把群众的热情鼓动起来，但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在工作方法方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当然要有科学的根据，不然就成了浪漫主义的空想。

“敢想、敢说和敢做要连结起来。

“一定要对敢想、敢说、敢做进行科学的分析。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的分析。”

51

第十一，周总理指出，在艺术创作方面，要注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艺术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既要兼容并蓄，又要有独特的风格。

他认为，他近年看到某些越剧是退步了，大概是听到别人批评它单调，作了一些修改，却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总理主张话剧、电影都要考虑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对沈浮等讲：

“沈浮、鲤庭、君里都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总理举例说，他看了江西戈阳腔排演的《昭君出塞》，觉得很好，也觉得有些话剧色彩。到后面去看到了石凌鹤，才知道是他排的。他从重庆时期排《棠棣之花》，到这台《昭君出塞》都很成功，就因为独特的风格。

所以，总理认为：

“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其不同的风格。”

“其实，演员表演也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演员‘自己’，就是主导的方面。”

四

从以上这次谈话的重要内容来看，周总理这次谈话，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感受，而是对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中一些错误思想有了很深的感受，进行反思的结果。是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解决一下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期望文艺界按照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常健康地发展。

可是，文化部党组怕这个谈话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不让向下传达。上海柯庆施只批准郑君里在20多人左右的少数创作人员中传达。

到了反右倾运动开始之后，文化部党组重点批判夏衍和我都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更谈不上对周总理这次讲话的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了。

好在，国庆十周年终于献出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尽管上海的同志回去不

能公开广泛的传达，可是总理讲话的内容还是不胫而走，如一股春风激荡着创作人员的心灵。他们献礼影片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等等，终究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

更有意思的是，文化部对夏衍和我进行的批判还正在热烈进行中，却又传来周总理的建议：国庆献礼影片创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文化部为什么不举行一次庆祝会？于是文化部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新片展览月的庆贺会。

周总理亲自参加了这次庆祝会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

“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进步，电影风格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出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

周总理 1961 年 6 月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特别说道：

1959 年这个讲话“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1962 年 2 月，周总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话中又重申：

“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53

重温这两次讲话，和 1959 年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相对照，就很清楚，后两次会议的讲话实际上是上次讲话的延伸和发展，总的精神是一致的，是对 1957 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发展到“大跃进”时期一些“左”的思想泛滥，违反艺术规律，缺乏艺术领导民主，瞎指挥，搞浮夸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现象的纠正和批评，希望电影、文艺界掌握和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去改正领导作风，纠正“左”的错误。

这些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又是根据当时的新形势，对创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文艺工作能够遵循这些教导，纠正错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如电影界称国庆献礼片所取得的成就，叫做“难忘的 1959 年”一样，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文革”的灾难发生了，周总理也无法预料到，新侨会议、广州会议都被林彪、“四人帮”打成黑会。被周总理称作“老朋友”的人毫不例外地纷纷被打成黑帮分子、黑干将，甚至叛徒、特务，被投入监狱！有的同志甚至受到残酷迫害而去世了。

建国以来，我国文艺工作尽管饱经坎坷，却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论是戏曲、话剧、电影、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各种文艺事业，都不断地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所以他能够洞察到“左”的思想的危害。可是，这不以他个人的意见为转移。他从 1959 年 4 月对电影界关于两条腿走路的谈话开始，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亲自主持会议批准了“文艺八条”的试行。他亲自抓国庆献礼片问题，要求也应有轻松愉快、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因而拍摄了《冰上姐妹》、《五朵金花》这样的影片。他亲自寄资料给郑君里，供拍摄《林则徐》参考。他曾亲自问我：“谢芳担任《青春之歌》的主角是否胜任？……”

是他亲自建议文化部开新片展览月的庆祝会，并到会讲话。

1961年又是他亲自建议，并在香山与电影界朋友们共庆“七一”党的生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欢乐的日子。

可是，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用“一根很粗的，自30年代就开始有的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这根绳子绞杀了一切。当然，也毫无例外地绞杀了周总理对文艺界的一切关怀和讲话，周总理也终于和文艺界的朋友们永别了。

我永远无法忘却，也永远怀念1959年4月23日这一天——这一天听到周总理如此真挚亲切的教诲！

我也受到了一次生动和深刻的教育！尽管我已经退离电影界了，有时候，看到听到一些电影界复杂的处境，我也仍然难免想到：

假如总理还健在？

假如总理又看，他1959年的这次讲话！……

假如我们问青年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讲话？又有多少中老年同志还记得这个讲话？

30多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学会了两条腿走路？！

1992年2月8日

渝沪多年垂爱深

于 伶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忽忽已近 20 年。他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垂爱如同三春的细雨，温馨润湿点点滴滴沁入心头。20 年来，每一次端详书柜上那张遗照，几十年往事潮水般的恩绪，总勾得回回潜然泪下，无语太息。

在我自己长长的生涯中，最早同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建立联系，是在 1937 年春天，距今已近 60 年。其实，在那以前 10 年，我就记得听到过周恩来的名字。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员，“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年岁不大就已担任中央军委书记。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在当时年轻的党员和革命战士中广为传诵。1933 年 1 月，我从北平调到上海“左翼剧联”工作后，从潘汉年、夏衍口中更多地知道了周恩来领导武装斗争、主持锄奸工作带有神秘意味的故事。这位党的领袖人物，似乎熟悉而又陌生，亲近而又遥远。我完全不曾想到，今后几十年，竟会多次地走进他的战斗序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政治形势进入新的局面。潘汉年随同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达成的协议之一，是同意中国工农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国民党政府则同意发给共产党军队几个旅的武器弹药。当时红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服装问题。红军主力经过十年苦战，万里长征，军服不齐，衣衫褴褛，到冬春之际还穿破旧单衣。西安的张学良将军曾给陕北送去一部分棉军衣，让红军换装。红军战士和机关干部领到新军衣后，情绪热烈，但高兴的同时，却又都不愿换下红军军服，取下军帽上的红星。那种泪珠滚滚、难分难舍之情，使不少身经百战、练就铁石心肠的领导干部也为之动容。

周恩来同志认为：这种感情是极宝贵的，它体现了红军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生死不渝的感情。待将来正式换装时，应该将它们记录下来，作为珍贵的革命资料，教育后代。他对当时准备从延安到上海来的潘汉年说，最好请上海地下党从电影界选派一位同志带摄影师赶快去陕北，将这些感人场面摄入镜头，再拍些红军生活，甚至还可以补拍些长征的片断场面。

地下党组织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我，我既感到意外，又禁不住万分激动。周恩来同志指定要带一位好的摄影师。我想来想去，只有周达民合适。周达民是“左翼剧联”的盟员，政治上可靠；曾先后为蔡楚生拍过好几部影片，摄影技术是第一流的。如果一起去陕北，必定能够胜任，而且他本人十之八九会欣然接受。

我就去找蔡楚生商量，蔡楚生一听，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达民一定能拍好的。”但是随即又皱了眉头：周达民正在拍《王老五》，脱不开身。最后我们商定，一等拍完，就立即启程。不料，《王老五》尚未停机，抗战的炮声响了。大家都投身抗日高潮中，去陕北拍纪录片的事也就因交通切断搁下来。四五年之后，才由延安电影团完成拍摄任务，增加了许多边区军民生活和生产的镜头，制成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由袁牧之带到莫斯科去制拷贝，以便能送到边区和大后方放映。后来不知由于什

么原因，拷贝不仅未能制成，连底片也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全部遗失，至今没

有下落。

多少年来，每次想起这件事，我总会涌起一阵歉疚。那年如果催得紧些，请蔡楚生快点拍完《王老五》，周达民和我就可能在芦沟桥事变之前赶到陕北，及时拍下周恩来同志所希望的历史性镜头，完成那件光荣任务。那些场面，可能袁牧之他们几年后未必再遇到了。真是遗憾！我也设想过：如果那次真的去了陕北，影片拍完之后，很可能就此留在延安从事电影工作。抗战开始后，袁牧之、陈波儿和一大批人不也都是从上海去的吗？那样，我也许不会再回到“孤岛”上继续公开活动，后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也就完全是另一种状况了。

“八·一三”抗日炮火纷飞中，当时担任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这个公开身份工作的潘汉年向我们传达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求上海文艺界尽快组织演剧宣传队，走向华北、西北各个战场和华中、西南大后方，播撒抗日救亡的种子，动员各阶层群众投身抗战洪流。这个决策是富有战略眼光的。恩来同志估计到战端一启，上海必难久守，迅速从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向广阔的内地输送文艺人才，既免遭损失，又让他们施展才能，对抗战大业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

当时夏衍同志已受命协助刚由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同志创办《救亡日报》，担任总编辑，无从分身管戏剧电影方面的工作。落实恩来同志的指示，组织演剧宣传队的具体事务，就交给我去完成。在连天炮火中夜以继日地奔忙，由于广大戏剧工作者高涨的爱国热情，踊跃参加，几天中就将十三个演剧宣传队一一建成，高唱战歌，分头出发，奔向各个战场和后方，将进步的戏剧种子撒向祖国的东南西北，出生入死倍受艰辛。此后几十年中，他们都成为戏剧运动的骨干。

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特别不放过当年的抗日救亡演剧队，污蔑他们是“反革命别动队”，将其中许多人投入监狱。林、江的终极目的，就是将其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演剧队离开上海后，我奉命留下来，组织上海剧艺社，坚持在“孤岛”演出。那几年的心情，有点寂寞，也有点悲愤。1939年我写的《花溅泪》首次上演时，曾写了一篇短文，最后有这么一段话：“要是这次演出《花溅泪》能有成就的话，是一群一心地直接间接合作者的心血与精力累积的代价。我自己将以更热情来回敬热情待我者，以更努力来报达合作者。为了戏剧，为了爱定了演剧艺术，我愿出生入死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这是我在“孤岛”时期心情的真实写照。我曾将这些话写给当时在远方的好友夏衍，也又发表在当时出版的《上海妇女》上。

时隔不久，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少文转告我一句话：远在重庆的恩来同志，看到这篇小文章，对最后一句话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决心可嘉。但是，“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这句话，提法不妥，是情绪不健康、政治思想锻炼不足的流露。

刘少文并没有详细转述周恩来同志讲这几句话时的背景和前言后语，只是说在重庆的邓颖超同志从《上海妇女》上看到于伶的文章，后来恩来同志也看到了，这才托他转一句话，希望于伶加强学习和思想锻炼。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未作更多思索写下的普通几句话，竟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而且这位领导人远

在万里以外的重庆，身负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后来改称南方局）书记重任，日理万机，折冲尊俎，眼睛注视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胸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命运，案头堆积着千头万绪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将那睿智深邃的眼光，射到敌后“孤岛”一角，抚慰着“孤岛”文化战线上斗士的心田，而不放过一点点黯淡的翳影。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奉党中央之命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需要大批干部。上海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拟定了一个包括各方面干部的名单，上报到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这份名单中就列有我的名字。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对此作了通盘考虑，认为凡是可以在外面公开活动的同志，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进根据地，去时容易出来难，到需要出来时，色彩红了，也就难于再公开活动了。恩来同志具体建议我和王任叔先不必去苏北，更适宜去南洋，到爱国华侨中去办报纸，办剧团，开展爱国进步文化工作。他考虑到，“皖南事变”后，如果形势恶化，也有可能是在抗战的同时又爆发内战，到那时，舆论工具都操纵在反动派手中，天天造谣诬蔑，混淆视听，而海外华侨得不到真实消息，听不到共产党的声音，会失望以至伤心的。他电告香港工委，要他们立即派人来上海转达这个意见。于是潘汉年奉命秘密赶来上海，同刘晓一起修改方案。我也奉命立即离开上海去香港，等办好护照即去新加坡。

护照没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几乎席卷东南亚，去南洋的路断了。香港很快沦陷。我随一批爱国人士和文化人脱险来到东江游击区。在那里又接到恩来同志转来的指示，要章混、江韵辉及我和柏李先到桂林暂住，以待机取道上海进苏北根据地，参加鲁迅艺术学院分院工作。

香港沦陷以后，由大后方经香港到上海的交通也断绝了，一时又去不了苏北。周恩来同志看到作为战时后方中心的重庆，需要有一个大型话剧团经常演出，以推动戏剧运动。我在桂林接到由张友渔、韩幽桐夫妇转来的组织通知，要我立即乔装就道，赶到重庆去报到。

四

我永远记得 1943 年元旦，是离开“孤岛”以后最兴奋的一天。不仅由于这是离开上海，又辗转香港、桂林的几年离乱后到战时首都度过的第一个新年，遇到了许多新知旧雨；更因为这一天见到了久已景仰的周恩来副主席，而且还能有机会同周公彻夜畅谈。

那天，我随徐冰、夏衍从城里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那里的新年联欢晚会。当恩来同志出现在晚会会场时，我紧握着那双灼热有力的手，仰望着慈祥和蔼的笑容，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恩来同志忽然想起什么对我说：“前两年，我曾经要接替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刘少文同志转话，批评过你一篇文章里的一个提法，对么？”我含着激动的眼泪，连声答应：“对，对！您批评的对极了！我……我那时的确……”

邓大姐似乎觉察了我过于激奋和紧张的神情，连忙抢过握住我的手，笑着对恩来同志说：“瞧你，第一次见面，就讲批评。”

周恩来同志爽朗地笑了：“对自己同志，我就要求严格些，你不会介意吧。我们晚上找个时间谈谈，好吗？”

61

联欢晚会结束后，恩来同志要我同车回市区，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已近深夜。恩来同志让我在会客室坐下，倒了一杯水：“于伶同志，我们是第

一次见面，可是我读过你不少剧本。”

说着，随即一一指出我在上海写的几个主要剧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说这些仅是他在重庆看到的舞台演出而言，其余的，让作者自己去总结吧。又要我将上海时期剧运回顾一下，总结经验教训。

我囁嚅地说：“我写的那些剧本，都是不成熟的急就章，剧团等着排演……”

恩来同志微微摆摆手：“你们在‘孤岛’坚持演出进步话剧不容易。”

我感激又惶恐：“我一直在白区工作，政治修养方面很幼稚

恩来同志换了个话题，解脱我的窘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读过了吗？《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了。”

“读过了，在桂林读过一遍。”

“读一遍是不够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在延安，在各个根据地的同志要学，在外面白区工作的同志更应该好好地学习。学要联系实际，联系自己，联系你搞的剧本和戏剧工作的实际，认真学。”

接着，他详细阐述这个讲话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创作和学习方面的重大意义，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学习体会。尤其关于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转变立场那一段，恩来同志结合自己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来讲思想立场的转变过程，娓娓道来，如话家常。那些话，对我来说都很新鲜，闻所未闻，而又讲得那么透彻，那么亲切。

他又一一询问了“孤岛”几年来的戏剧运动和文艺运动状况，关注许多留在上海的作家、教授、戏剧家、电影演员的遭遇。他问得那么细致，那么具体，对上海文艺界竟如此熟悉！有不少人和事，连我这个在上海住了多少年、而且天天在文艺圈中打滚的人都差点忘记，交不出答卷了。山城寒冬的一夜长谈，使我如坐春风，分明感受到了融融暖意。从此开始了我在重庆戏剧阵地的三年战斗。从此我也有幸成为周公馆的常客。直接听到他的教诲。

五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那本所谓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当时的“中万”、“中制”、“中青”和“中电”等官方戏剧电影机构中的所有工作人员，奉命都得集体学习这本书，在“中制”工作的电影导演陈铿然和女演员徐琴芳、路明三位同志，在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不曾发言。第二次再集体学习一开始，一个主持学习会的头头，立即声色俱厉地命令陈铿然发言，并且责问他们三人昨天的会上为什么不开口？陈铿然反问：发不出言，该怎么办？那头头拍着桌子说：滚蛋，开除出厂！于是这“三位一体”居然当场退席。这样，闹僵了，而这三位同志也就失业了。

我听说之后，向恩来同志作了反映。周公讲他已经听说了：这三位，勇气可嘉，但是在这样的场合，采取如此硬顶硬碰的态度，把事情闹僵，太不策略，太天真了！我连忙做检讨，是我没对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在上海沦陷成“孤岛”的前后，我跟他们有过较多的接触与交往。他们组织过上海救亡演剧第十三队，在上海与潮州等地做过许多宣传与演剧工作。他们在上海“孤岛”呆不下去时，到了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他们拒绝了汉奸的纠缠，冒险经过我们广东东江游击区，辗转来到重庆。满腔热情，而又满

63

腹牢骚，是我对他们帮助不够！周公听后指示说：现在，事已如此，我们应该对他们三位给以援助。张颖已经去安慰他们，稳定他们了。你应该设法帮

助他们有个出路。

在这次事件之前，他们三位已经和话剧演员周锋等酝酿组织话剧演出活动，铿然曾跟我谈过打算排演我在“孤岛”创作的《大明英烈传》，这次经过张颖和他们几次商谈，得到著名话剧演员江村等几位的合作以及许多道义的支持，由陈铿然导演，演出了这个戏。

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中特地去看了这次演出，对铿然、琴芳、路明、江村与周锋等给以鼓励。事后，夏衍、冯乃超、徐冰和我在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我请周恩来同志对于这次演出的《大明英烈传》，给予批评与意见。我先说明了这是于史无据的假历史剧，是为了能在“孤岛”的租界当局审查通得过的虚构的作品，艺术处理方面存在着缺点与不足，我自己是非常不安于心的。周恩来同志首先热情地肯定了处身于“孤岛”这样特殊环境中写戏的苦心，至于虚构的假历史剧，一般说，我们是不提倡的。为了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战斗，也应允许偶一为之。郭老在重庆创作了好几个新的历史剧，你可以深入地好好地学习学习。写法可以多样，个人对于各种历史题材跟现实题材同样可以有个人不同的写法。你既已经写了，而且在许多地方演出过了。那就不必老是有负担，应该向前看，努力做到今后写得好些就是了，等等。我理解，这是周公给了我婉转的批评和更大的鼓励与教育。

1943 年夏季即将来临时，当时重庆的雾季将要过去，日军飞机又将轰炸重庆，各个话剧团体只能停演，或者往外码头去作旅行公演。这时周恩来同志要回延安去开会，临行之前特约了各剧团的部分编导人员到天官府街郭老的住处，商谈下一个雾季各话剧团准备演出的剧目。到会的除了主人郭老，还有：夏衍、徐冰、冯乃超、阳翰笙、孙师毅、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章泯、宋之的、史东山、张骏祥、司徒慧敏、金山、张颖等同志和我（事隔多年，我记忆中到会的人可能有出入与遗漏）。周公首先扼要地讲了：1941 年“皖南事变”之前，反动派封闭了“生活”、“新知”与“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三家出版社开设在各地的上百家分店，1941 年与 1942 年内禁了戏剧与小说 270 多种。是郭老的扛鼎之作《屈原》，由冲破压力而崛起的“中华剧艺社”演出获得的大成功，给了重庆演剧界新的生机！下一个雾季中，大家准备演出哪些新的剧目呢？我想知道后，安心去延安，让延安的同志也高兴。大家接着汇报了已有的少数新剧目和准备中的题材、题名与设想等等。周公仔细听着，思考着，随时提问题随时发表了看法和意见。他谦逊他说是仅供参考。好些同志也时时率直地插话或提出问题进一步倾听周公意见。这时，我也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在桂林逗留期间想写的《夜上海》的续篇《杏花春雨江南》的详细构思与分场结构。请示周公和同志们：值不值得写？可不可以这样写？或应如何写？周公听了，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笑着说：你若是仍处在“孤岛”上海，你当然不可能这样地写它。你若是在延安和根据地，你就不会这样写它。今天，你是在重庆，我看，也只能如此着笔，也只能这样处理这个题材了。周公沉吟而愤慨地说：“遗民泪尽胡尘里”，这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游的旧诗么？现实是广大沦陷区人民盼望国军反攻，泪眼欲穿。救民于水火的呼声，是谁充耳不闻，一心在制造磨擦？你应该写，要写好它！在我无言的激动中，在座的朋友们给我打气。史东山严肃地说：这个戏，我已经向夏衍讨了差使：我来导演，金山主演，请周公批准。周总理笑着点点头。这一下，空气轻松了，郭老讲这个题名好，美。孙师毅说他有个“情报”：于伶还想写《骏马秋风塞北》，根据沙汀的《记贺龙》写贺龙

呢。周公听了就严肃地说：光有雄心壮志还

65

不成。你没有战斗生活的积累。沙汀的书只是记下贺老总的几点印象。写剧本，不仅要能理解熟悉全面的贺老总，还必须深刻理解熟悉他上下左右所有的人与事才行。这方面，在座的宋之的倒可以写报告文学，写写我们的几位老总。他到过我们抗战的前线。大家看着宋之的时，慧敏和宋之的把话题拉回到今天周公要谈的下个雾季各话剧团准备演出的剧目上来了。

抗战后期在重庆，只要有新戏上演，恩来同志只要在重庆，总要抽空去观赏演出，而且直率地表示他的意见。对那些由反动派搞的戏《野玫瑰》、《蓝蝴蝶》之类，他看过之后，指示一定要组织批评，在《新华日报》上刊登。有个别朋友被迫参加演出的，他也总是派秘书张颖、陈舜瑶去对他们耐心地帮助和教育。恩来同志每次看戏，我总是尽力作妥善的、安全的安排。

国民党政府打破了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愿望，一心挑起内战。1946年秋，上海思南路的“周公馆”准备撤退了。恩来同志亲自找留在上海的同志讨论应变措施。他特别关照于伶要花气力去做团结旧艺人的工作。

有一天，他找我和刘厚生去思南路长谈，详细询问戏剧界情况，具体谈了他对今后上海戏剧工作的设想：根据上海戏剧界人多、剧场多、观众多的实际，可以搞“三线作战”。上海剧艺社处在第一线，是进步话剧的旗帜，但它的面貌已经“红”了（过去在“孤岛”时期的政治倾向，早已被记录在案），只要环境许可，就要坚守阵地，不要轻易放弃，但随时要作撤退和隐蔽的准备。以刘厚生参加的观众的演出公司和另一些剧团作为二线，不能太“红”，也不要过去“左翼剧团”用过的名字，不要演政治色彩强烈的戏，可以演些历史题材的戏和外国戏，准备在上海剧艺社被迫停止活动时接替阵地。此外，要准备第三条线，到局势恶化到不能维持舞台演出、演话剧也不能维持生活时，就将人员分散到地方戏剧团体和电影公司去，求得生存。最后，他还关照我们要花力气去做团结旧艺人的工作，特别提出要关心和帮助越剧界的袁雪芬和她的雪声剧团。

全国解放后，恩来同志肩负政府重任，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关心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们。1953年11月初，他在过度劳累之后，偕同邓大姐来上海休养了十天。我去看望他，问他想看些什么戏，他说：“上海的淮剧、沪剧、越剧，都到北京参加过会演，看过了。这次想看看其他的剧种。”他又叮嘱，不要专门为他组织演出，买票去剧场看戏。

我安排总理看评弹《刘胡兰就义》。这个素来用吴侬软语唱才子佳人故事的曲艺叙述一个年轻共产党员英勇不屈的悲壮场面，竟使总理和邓大姐被感动得流泪。陈毅市长在旁轻声责怪：

“于伶你啷格搞的？总理和邓大姐身体不好，到上海来休养的嘛，你啷格搞这个节目，让他们看了心情不好受嘛！”

总理连忙宽慰说，这个节目就是好呀，能叫我们听了很感动受教育，真不容易。台上只有五个人，独唱、伴唱、伴奏，演出效果像个大乐队大合唱了。他说：应该重视和发展这门艺术，为人民服务嘛，江南人民喜闻乐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当他从评弹团负责人吴宗锡口中得知这个评弹团是当时全市第一个国营剧团、唱刘胡兰的女演员是当时地方戏曲剧团中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时，总理

欣慰地点点头：“所以唱得这样有感情。”又转头对邓大姐低声说：“你可得赶快认识认识她，好好向她致意啊！”邓大姐点点头，在小本子上记下了朱慧真的名字。

67

听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总理高兴地说：“我猜想这个团一定是到治淮工地参加过劳动，体验了生活，才能创作这样的节目，很好。我是第一次看到反映毛主席对治理淮河指示的艺术作品，我很高兴。大有希望！”

扬剧演的是两个小戏，其中一个几乎没有对白，全部是歌舞。总理非常欣赏，看得很满意，一面看一面说：“扬剧很美，曲调丰富，变化多，表演也细致，耐听又耐看。它同淮剧的家乡距离那么近，可是两个剧种的特点又是这样明显和突出，足见地方戏曲中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真是各有千秋，万不可一概而论，抹煞特点。”

江苏省锡剧团那时正从南京到上海演出，总理看了他们三个短剧。他过去很少看锡剧，就问锡剧同它的姐妹剧种：北面的扬剧、淮剧，南面的越剧、绍剧，东面的沪剧，艺术上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我回答：“早先苏州人以昆曲为中心。苏州人对苏州东西地区的民间曲调看不起，把东面的叫‘东乡调’，西面的叫‘西乡调’，认为它们乡里乡气，不登大雅之堂。所以当地由民间苏滩演变的苏剧，被压得发展很慢。”

周总理听了，严肃而又风趣地说：“可见大国主义应该反对。昆曲当年操在士大夫手里，好似大国沙文主义。结果被东西两面的人民群众造反，发展成现在的沪剧和锡剧，有机会我倒很想看看苏剧。”

也是在这期间总理知道了，上影在百般的艰难奋斗中，集中了全厂艺术、技术中坚骨干和工人群众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刚刚从攻克了千千万万个大小困难后，完成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短短的年把间就冲破了苏联专家的预言“中国要拍出彩色影片，得等10年20年后才有希望”。总理和邓大姐一定要亲来上影看看试片，慰问慰问大家。记得当时出席的有袁雪芬、范瑞娟、桑弧、黄绍芬、朱今明、陈鲤庭、张骏祥、黄佐临、金焰、刘琼、周峰、舒秀文、张瑞芳、张铮、黄宗英、孙铮、柏李、王晋元和我等等。看过试片，总理很欣慰也很高兴，又和大家作了亲切的交谈，询问了诸多人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之后还很风趣地鼓励说：谢谢你们，你们让我出风头了，我可以第一次用自己的彩色片招待各个国家的使节，可以第一次送到我们各个使馆宣传我们自己的艺术了。谁说只有英国、只有莎剧才有《罗米欧与朱丽叶》，我们也有，我们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要把这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片，第一次带到国外去参加正要召开的会议上。谢谢你们了。最后还与整屋的人合影留念。临行，总理又一再叮嘱我一定要用好人，人是最重要的。首先要为他们搞好有创作、有学习的良好气氛和环境，让人尽其才，人尽其能。使每一个有发展前途的，都能在新天地中，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影片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我一直将这嘱咐、叮咛默记在心。总理和邓大姐回北京后许久时间内，我还常感到抱愧，没有能让他俩看到绍剧、甬剧和苏剧。

七 1955年，我受“潘汉年案件”株连，停止了在上海的一切职务直到被暗中靠边几年，1960年7月到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接到通知时，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又可以聆听周恩来总理的精彩报告。时光如水，未亲承总理警歆（kai 指谈笑）五六年。这五六年里，我常常想念总理，多次想写信

向他反映上海文化工作

69

者的苦恼和要求，也想向总理诉说自己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几次又搁下笔来。总理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我不忍心也不应该再去干扰。

然而，敬爱的周总理却一直把我的遭遇记在心里。夏衍同志告诉过我：第三次文代会之前，周扬同志和他去向总理汇报筹备工作时，总理曾问起“于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次文代会他能来吗？”总理要他们通知上海，叫我去北京参加会，并请上海安排我的工作。文代会我是参加了，但是安排工作的事，由于柯庆施、张春桥等人的阻挠，始终没有落实。

十年祸乱刚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把十来顶的反动大帽子加到我头上，1966年8月就把我关进了监狱。周总理发现了，苦心地在暗中保护，不动声色地明确指示：于伶这个人我知道，想不到他的问题这么多，罪名这么大。要赶快送到北京来！他有严重肝病，不能让他死掉！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就搞不清楚了！

于是我被关的秦城监狱的牢门上，挂有“重病号”的小条子，医药不断，我得以不死。这是我出狱以后才听说的。九年狱中，我吟忆了许多七绝诗中，有好几首是想念周公的。这且不写吧。

1975年5月，邓小平同志代理病重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时，我得到清理处理出狱。5月17日晨，监狱管理人员在北京机场上把我移交给上海公安人员与市电影局的工宣队员。飞机窗口，感慨何止万千！时值“四人帮”正猖獗疯狂借所谓批林批孔而批周公，漫吟四句怀周总理：

囚居淑寂梦中吟，

渝沪多年垂爱深。

放眼机窗云幻变，

长安不见泪涔涔！往事追思不尽。但是我已年近九旬，体力衰弱，视力只有0.2，难以再执笔，只能和泪追溯了。

（袁鹰笔录整理）

电影事业时刻挂在他心中

司徒慧敏

烈风在呼啸，江河湖海翻起了狂涛，祖国的大地上，群山低头，万木肃立，一月的寒风啊，怎能抑制住亿万人民的热泪滔滔？！一年前的今天，当我听到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心情万分悲痛，我为失去一位始终热情关怀我们、教导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悲伤，为失去一位献出毕生心血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好总理而恸哭。

一年来，我眼前多少次浮现出总理慈祥可亲的面容，耳边多少次响起总理热情亲切的教诲。总理对于我们电影工作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使我终生难忘；总理对于人民电影事业的重视和具体指导，我永远铭记在心头。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的夏天，我初到重庆见到总理时，他就非常亲切地问到我们电影工作的情况。总理引用列宁的话：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鼓励我们要努力去掌握它。那时候，总理在重庆，和延安关山远隔，但他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电影团的工作十分关心。当时的延安电影团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缺乏电影摄影机、洗印机、剪辑器材，也缺乏胶片和药料。总理指示我们要为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作一些物质条件的准备，使电影团在延安能为当时的革命斗争留下重要的电影资料，做好电影宣传工作。后来，延安电影团能够拍摄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的战斗生活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战斗史料，就是同总理的这一指示和具体支持分不开的。

当时总理肩负着团结抗日爱国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重任。尽管工作十分繁重复杂，但他还是经常不分昼夜地和我们谈话，热情细致地指导我们，启发我们。有许多次，他和一些党外民主人士讨论达十个小时以上，回来后还和我们作彻夜长谈。那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思想是幼稚的，总理总是针对我们的思想状况，循循善诱，耐心地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

1943年秋至1944年，总理回延安，将近一年后重返重庆，给我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宝贵教导，传达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其它整风文献，一再向我们说明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向我们提出文艺工作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移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来。我们对于许多问题，当时虽然学习了，但理解还是很肤浅的。3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过去我们的工作，如有一点成绩，那就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教导的结果；而长时间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都是由于背离了这些教导，而这一点正是周总理在那时就已经告诫过我们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些同志倡议建立延安或华北解放区的电影基地。当我去向总理请示的时候，总理根据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思想，远见卓识地指示说：现在考虑我们的事业，包括党的电影事业，不仅是延安的问题，而是要向全国更广大地区发展。那时离我们取得全国胜利还有4年，而总理对建立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已经有了极其深远的考虑了。

建国以后，总理日理万机，工作更加繁重，但是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约见文艺界同志，促膝谈心，给以指示。1958年“五

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总理参加了天安门的庆祝活动后，不顾疲劳，打电话把负责电影工作的几个同志找到自己家里。那时候总理注意到当时相继出现了一些有缺点和有错误的影片。和我们一起重温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并指示我们努力改正。总理非常爱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快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总理还考虑到当时影片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指示我们电影工作者，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即使是技术工作者，都要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很好地向工农兵学习。从事故事片工作的导演、编剧、演员也可以拍摄一些纪录影片，反映现实、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总理指示说：这是艺术性纪录片。通过这一形式，可以迅速反映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祖国风貌，从而也可能迅速改变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

三年困难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电影界有些人思想上有些波动，受到左和右的思想干扰，1962年6月22日清晨，总理约了电影创作人员和部分领导干部到家里谈心。大家刚坐定，总理就说：“你们来北京，总是我找你们才来看我。”有同志说：“总理太忙……。”总理马上说：“你们老是用忙字把我孤立了。”总理非常亲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情况、学习情况，遇到过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等等。在长达十多个小时的谈话中，总理十分注意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对不明确的地方还作了细致的询问。看得出，他尽力抓住每个人发言的要点，并洞察所有的重大问题。总理非常认真而谦虚地谈到，前两个晚上，他再三仔细研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接着总理就用《讲话》的精神为指针，剖析了当时电影工作者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倾向。总理仔细地分析了那几年生产的影片，同意这样的说法：比之于当时国际上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倾向的东西，中国电影是最革命的、最健康的，但还不是最完美的。也确实存在思想上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总理对我们进行了细致的思想教育，他用自己的切身经历，现身说法，剖析自己，一直谈到入夜，使我们再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

那几天，总理一次又一次和大家深谈，提出问题和解决大家面临的问题，对有些过去拍过一些不好影片而目前正在努力改正的同志则热情加以鼓励。总理说：“不要以为艺术家有一点败笔就不行，要认识到有了败笔是不好，但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事物总是有正面的东西，也有反面的东西。”总理还问到一、两个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情况，当我们汇报到某人有所改变时，总理说：能改就好，也不必着急，多帮助他。后来还要我专门去把这些同志接来，总理同这些同志亲切交谈，既提出了批评，也给以鼓励。总理一再告诫我们说：“我们的影片中，必须要有革命性，没有革命性是不正常的……一部影片如果做到有革命性，应该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应该归功于人民。”并指出影片增加数量是必要的，但要逐渐增加，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得太多，主要还是提高质量，包括政治质量和艺术质量。总理那样忙，仍不辞辛苦地关心党的文艺事业、电影事业，关心我们的成长，总理为革命真是费尽了心血。

1964年末和1965年初，即三届人大前后，党内那个“理论权威”，配合林彪、江青之流向电影界投出否定一切的毒箭。总理认真分析当时情况，多次同我们观看当时拍摄的影片。总理充分肯定了电影工作者的成绩的同

时，也指出：有些影片确实有缺点甚至于错误。总理给我们讲述了鲁迅当年的工作和斗争精神，特别是晚年写作的杂文和政论，赞扬鲁迅对革命的贡献和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情拥护，以此来鼓励同志们努力改进。我多次听到总理对我们一些犯了这样那样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说：“还是用毛主席一

75

再教导我们的话，总结总结吧。”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对我们电影工作者有极大的教益。总理在和我们讨论问题时，总是问：“你看怎么样？”“你认为行得通吗？”有时，在对一些同志作出严肃的批评之后，他总是考虑我们能否理解，甚至事过几年之后，他还向我们重提：那一年、那一件事，“我说对了没有？你们看怎么样？”总理的谦虚谨慎，对同志的无限热忱，使我们深为感动，永世难忘。1943年春在重庆，为了安排工作的事总理批评了我，到了1952年我由国外回来以后，总理还记得那件事。总理还是慈祥和蔼地说：当时也许我太过份着急了，强迫你把工作接受下来。我马上回答说：总理做对了，那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对我的教育很大。

1964年，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前夕，首都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周总理辛勤指导下排练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了。国庆期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人民大会堂看了演出。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同一天下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接见了《东方红》全体创作和演出人员。就在这天晚上，我们到中南海去见总理，汇报工作。总理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开始了彻夜深谈。从《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和演出过程，谈到我国文艺工作的许多重要问题。总理指出，《东方红》所以得到如此优秀的成绩，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首先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再就是全体参加工作的同志的共同努力。邓颖超同志也高度评价了整个演出所表现出来的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这一个晚上，总理倡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说这部影片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都很有教育意义。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摄制工作，一直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进行的。1965年1月中旬，总理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东方红》影片可以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舞台演出的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可放在下一部《东方红》中继续编写和摄制。总理还鼓励我们在摄制过程中要更好地学习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从中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还要更好地重温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一系列对文艺问题的指示，在创作实践中改造自己，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在这以后，我们为拍摄影片进行了新的排练和电影技术方面新的探索。总理指示我们，要认真修改每一段情节、每一句唱词，研究如何使之适合于电影的特点和要求，而又能保留舞台原有的特色。在全片摄制的三个多月中，总理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十天半月，就同我们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我们的汇报，检查工作进度。由于他白天太忙，这些工作常常安排在晚上，甚至在午夜过后进行，直到凌晨。在拍摄中要修改的每个地方，总理也总要亲自看过，反复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当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时，也总是对我们说：“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你们看怎么样？”好多次，总理还约了陈毅、贺龙等同志一起来审看我们的排演和样片。周总理在这些老同志面前非常谦虚，他告诉我们，哪一段历史朱德同志比我更清楚，哪一段历史是贺龙同志、

陈毅同志亲自参加的等等，要我们认真地向老同志们请教。当时，全国有好几个省市也先后各自排演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理对各地的经验也十分重视，指示我们说：“不要只看到北京，不要老大，要学习各地专业和业余艺术工作者的经验。”因此，我们在摄制过程中也多次派出人员到武汉、上海、广州去观摩学习。

1965年9月18日晚，影片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总理带领我们，审看了全部样片。总理引用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教导，亲切地告诉我们：一个艺术品要达到完美的境界，越是接近高峰越是困难，越是要花更

77

大的气力。现在已经很好了，还要鼓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总理的指示，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1965年9月18日星期六这一大从入夜到拂晓，总理一直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担心总理太疲倦了，请他回去休息，可是总理还是要坚持下去。总理说，少睡一点，争取提前完成，在国庆上映。总理就是这样，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宣传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鞠躬尽瘁，不辞劳苦。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参加电影摄制的全体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使影片如期拍摄完成。回顾整个摄制过程，总理对我们的教育，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总理生前，对无产阶级电影事业的关怀，除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以及具体影片的指导外，还涉及对电影工业、电影技术工作的细致考虑。总理对电影工业和胶片生产非常关心，指出，这是建立电影事业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我们不能不尽快掌握它；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能只靠国外。今天回想起来，总理这些指示太重要了。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在1953年就开始把胶片工业筹办起来，使我们今天有了自己的胶片工业，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这一年秋天，南京电影机械厂已经制作出为广大农村服务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并把第一台放映机献给毛主席。这台我国自己制造的放映机，是总理亲自督促制造，并由总理亲自检查和呈送给毛主席的。1958年“大跃进”期间，总理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时，又亲自检查了移动式电影放映机的光源和提高光亮度的改进工作，详细询问我们采用新光源如碘钨灯、氙灯的发展方向规划。1965年初，总理亲自了解染印法影片的工艺和为广大农村、工矿地区服务的8毫米影片（同年年末规定为8.75毫米）的研制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一些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电影机械工业、胶片工业，包括染印法电影技术的发展，以及制片技术等，都受到种种阻碍。其后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和关怀，大大推动了这些工作向前发展。

展望今日文坛百花盛开的大好形势，我们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难以磨灭的记忆

钱筱璋每个人在他的生活经历和成长发展过程中，总是有一些难以磨灭的记忆，常常在自己的脑海里回荡，把自己引入深沉的思念之中。我也常常如此。在我走向革命征途的时刻，是敬爱的周总理给了我难忘的教诲和帮助，才使我能够踏上自己所憧憬的道路。虽然岁月已经消逝，但这些往事却深深地烙印在自己心中，成为不断鞭策自己的动力。尤其是在“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在失去人身自由和遭受迫害的严酷时刻，这些往事更是像一股沁人肺腑的暖流，时时刻刻在我的心头激荡……。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40年春天，那时我刚从香港回到重庆不久。有一天陈波儿同志通知我，说已经和周恩来同志约定了时间，要我去见他。这最初的会见主要是联系我的党的组织关系。我听到要去见周恩来同志，真是又惊又喜，我没有料到我的这点事竟会麻烦他，由他来亲自过问。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同志，但是我似乎早已认识他了，在那以前，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在斯诺的笔下周恩来同志传奇般的光辉形象，早已使我神往，深深地在我的心里植下了无限崇敬的思念。我也深知还在1938年筹建延安电影团时，周恩来同志就是积极的赞助者，为它的诞生付出了心血。现在我能有机会同他见面，这是多么值得兴奋的事啊！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曾家岩50号，这里就是重庆进步人士熟知的“周公馆”，也是被国民

党反动派特务宪警重重包围监视的“周公馆”。我被引到周恩来的办公室，他正在那里工作，见我去了，连忙放下手中的工作，亲切地招呼我和他隔着办公桌面对面的坐着谈起来。开始我很拘谨，神态不自然，这是因为我是带着旧社会固有的见识来看待周恩来同志。那时，人们都称他是副主席，我以为他是副主席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是个普通党员，一个平平常常的电影技术人员，而且是个年纪刚20出头的年轻人，政治上是很幼稚的。可是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由于我的幼稚而另眼相待，相反，周恩来同志很注意地听我的谈话，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同我见面的样子，我被他那种平易近人的非凡美德和循循善诱的教诲深深感动，我的拘谨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向他汇报了我从香港回来后的工作情况和想法，他似乎已有所了解。他和蔼地从当时的形势讲到应做的工作，最后特别嘱

咐：要在周围的群众中多做宣传工作，多交朋友，帮助他们进步，争取为将来建设延安的电影事业输送必要的技术力量。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无休止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他日理万机操劳无度，就在这样的时刻，他还为党的电影事业的建立，高瞻远瞩。精心筹划，他对我的深切关注，正是表明他对党的电影事业前途的殷切期望。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作了慎重的考虑。可能由于

当时重庆的政治情况和我所处的工作环境，他决定我直接和他单线联系。自那以后，我就和周恩来同志保持着这种特殊关系，我每隔一个时候总要到曾家岩50号去一次，而每次会见之后周恩来

同志总是要招呼我到“救亡室”去看看延安的报刊和文件，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能够有更多机会了解斗争形势，受到党的教育，

提高自己对革命的认识。

从香港到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高压下，生活感到十

81

分苦闷，渴望着解放区的自由生活，非常向往延安，真是朝思暮想，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那里。于是我去请示周恩来同志。我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说了出来，请求批准。出乎我的意料，周恩来同志认为我的要求不适合。他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耐心地说服，帮助我认识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对。我始终牢记不忘的是周恩来同志严肃地对我说的这句话：都到延安去，这里的工作谁来做？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对我是很好的教育，也是中肯的批评，帮助我打开思索的闸门。是啊，我不是一般的知识青年（那时知识青年到延安去是很多的），我是一个党员，党组织要我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争取为建立党的电影事业输送力量的工作还仅仅开始做，怎么能只考虑个人愿望放弃这里的工作阵地呢？周恩来同志从党的原则着想，严格地要求我，端正了我的认识，使我克服个人打算安下心来继续留在这里做我应做的工作。

这年夏天，组织上转来袁牧之同志从延安给我捎来的信。他刚从华北敌后拍完《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影片，跋山涉水回到延安。这封信辗转递到我的手中已经时隔几个月了。袁牧之同志在几页土纸上满怀深情地写着要我速去延安，那里的电影工作已经开展，是我去的时候了。我和袁牧之同志在武汉分别时曾约定，当他到延安工作到一定的时候，就通知我去。我激动地带着这封信去请见周恩来同志。他尽管工作很忙，还是抽空接待了我。他把延安来信仔细地看完，他为牧之同志信中谈到的电影团的工作情况而流露出愉快的笑容。他立即爽快地表示同意我就去延安。当时，我是以技术人员的身分在国民党所属的电影制片厂工作。周恩来同志考虑到这一点，明确地对我说：要考虑用什么方式走，不能秘密地走，要公开地走，免得给他们抓住把柄。没想到周恩来同志说完话，就拿起信笺，亲自挥笔，以他个人的名义为我给那个制片厂的厂长写信，大意是说，延安准备建立一个小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希望借我去帮助工作一个时期，请他给予支持准许我去。这位厂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任职时的学生，所以，周恩来同志才亲笔给他写信。周恩来同志想的很周到，照顾到当时两党统一战线的关系，严格地把这件事联系起来考虑，争取我能合法地去延安。周恩来同志的用心使我深受教育，遗憾的是这位厂长不肯放我走。周恩来同志得悉这个情况后又指示我：既然他们不肯放你走，只好等待以后的时机。我虽没有走成，却从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关切和帮助下，进一步体会到他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电影事业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动新的反共高潮，对我党和革命人民进行种种卑鄙的迫害活动，重庆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就在这个时刻，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同我见面谈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时，怕我这个缺乏斗争锻炼的人产生思想顾虑，非常爱护地对我说，目前形势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刻，可以继续留在那里坚持工作，有情况我们会知道的，到时通知你。周恩来同志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形势下镇定自若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极大的感染，他的话使我感到很体贴受到鼓舞，增强了我的斗争信念，坐信党的力量。更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同志的细心关怀，他的心里记挂着多少同志的安危啊！而他却总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忘我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重庆的政治形势更险恶了。这时，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工作场所，离开重庆。我秘密地隐蔽在长江岸边一个不为人注目的小客栈里住下，等待搭汽车向南边去，这是一次冒险的远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恩来同志派人想方设法找到我，给我送来了重要的通知，要我马上改变行动方向，往北撤到延安去。

83

听到这个信息，我是多么的高兴啊！这就是说我多年的宿愿可以实现了。按照约定的日期和地点，那天晚上我来到新华日报馆。由于一点事耽误了时间，我迟到了十多分钟，当我走上楼梯的时候，却看见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站在二楼的楼梯口，像是在等待什么人。我走到周恩来同志跟前，周恩来同志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为什么遵守时间，让我们等你这么久，不应当这样嘛。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受到这样严肃的批评。当时我真是万分羞愧，感到怎么能由于我的马虎而浪费周恩来同志的宝贵时间呢？而且在那样尖锐复杂的地下斗争环境中，准确地遵守约会时间是多么重要。这一次的不平常的批评，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它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我实在没有料到周恩来同志竟是这样的安排。这大晚上我要赶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去，以便在那里做好去延安的准备。可是要从重庆市内到郊区的红岩确实很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在途中设有重重关卡岗哨，到处有特务严密监视，要想进入红岩实在不易。周恩来同志为了我的安全让我乘他的汽车同他们一起上红岩。上了汽车，我坐在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身边。车在急驰，眼看着在夜幕笼罩中的山城逐渐从车窗两旁退去。此刻，我的心不平常地跳动着。车子把黑暗的重庆甩在后边，朝着郊区的红岩前进。车到红岩山下停了。我们下车沿着那条小路走上去。虽然夜色深沉，但是红岩却似高擎的火炬，远远地闪耀着亮光显现在我们前面。我跟随着周恩来同志和董老一起，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我的心潮澎湃，像游子回到了故乡，到了红岩就是到家了。按照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的周密布置，我在红岩做了出发的准备。我们一起去延安的有三十多人。从重庆到延安，路途是很远的，估计敌人不会顺顺当地让我们过去，他们不会不进行阻挠和破坏，甚至蓄意制造借口逮捕我们。党组织为了防范这种事变，采取了各种相应的措施，党组织决定不暴露我的电影工作者的真实身份，让我化名改装作为一名汽车修理工人，同时为了应付敌人的刁难和在危急情况下掩护我。还特意让三名真正的汽车修理工伪装我的徒弟，尽可能在途中保护我的安全。周恩来同志还把在他身边工作的龙飞虎同志，一位精明能干富有斗争经验的老红军派来当我们的领队。这种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建设党的电影事业的极大重视，怎不使我由衷感激。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精心照料，我们才平安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3年秋，延安电影团摄制完成了纪录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延安军民都亲切地把这部影片称作《南泥湾》，影片映出后轰动了陕甘宁边区，这是党的电影事业开创后制作的第一部完整的影片。虽然它在艺术和技术上还很落后，但在当时延安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能制出这样的影片已是很了不起了。影片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子弟兵，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成就。有一天，我们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中央领导同志和机关工作人员放映这部影片。这是一部无声影片，但是由于我们巧妙的创造，却把它映成了和有声电影毫无差异的有声影片了。影片映毕，观众

在掌声中散场。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位同志，他不是向场外走而是向银幕后面我们放置扩大器和留声机的地方走来。我们很快认出来，他是周恩来同志。他带着十分满意的喜悦心情走到我们面前，问这问那，亲切地鼓励我们把影片送到群众中去，广泛地给工农兵放映，使边区军民都能看到这部影片，鼓舞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建设边区，支援抗战，他的指示是对这部影片最好的评价。这是我到延安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我高兴的是我们电影团能用自己土法制作的影片来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我们的工作成果，让他看到他用心血灌溉培育的党的电影事业，终于突破重重困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长久以来对电影事业的期望开始得到实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

85

周恩来同志才以异常关切的心情，在观众散场之后，还亲自到放

映机旁来看望我们，他指点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要我们沿着无产阶级的文艺道路前进。这种感情使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面对着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我们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能够制出这样的影片而感到安慰。

这只是在党的电影事业初创时期，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关怀、教育和帮助的片断回忆。周恩来同志不仅对我一个人是这样，几乎参加党的电影事业创建的每个同志，都得到过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教育和帮助。是他把我们一个一个的组织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建设党的电影事业而团结到一起来，使我们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周恩来同志费尽心血缔造和哺育了我们党的电影事业。

战斗在雾重庆

张 颖

乌云滚滚，恶浪翻腾的 1976 年 1 月 8 日晚，我回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走进家门放下行装，立即听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因病去世的消息。真像晴天霹雳！难道是真的吗？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

那几天的清晨和傍晚，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伟大的祖国人民啊，就像流不尽的长河，默默地流向纪念碑旁。手上的小白花已筑成一道道白色的花墙。老太太带着儿子和孙女儿，一家都在哭泣，低声地喊着总理呀我们的好总理。我心中的眼泪和千百万人民的泪水已凝成冰块，留在纪念碑上。

夜晚，收音机里不断播送着全世界人民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深切悼念的声音。播音员同志的朗诵充满着激情，怎能使人不悲伤！但是，中国人民的声音呢？为什么听不到中国人民的声音？那只有在天安门前，在人民英雄的纪念碑下，在亿万人民的心里……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记忆的长河，在那些难寐的夜晚，一幕幕奔流而过……

1937 年 7 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进攻，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全中国。我像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满腔热情从祖国的最南方，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那时我仅是个十来岁的女孩子。1939 年夏天，领导同志突然告诉我，给我分派了新的工作，叫我立刻去杨家岭集合。我一口气跑到了集合处，是山下

87

一列平房，已经有不少男女同志在那里热烈地互相谈话。不一会儿一位领导同志随着爽朗的笑声走进来，同志们向他涌过去。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哩。一会儿他走近我，笑着问道：你是小广东吧？要把你调到蒋管区工作，怎么样？那时我心里真难过，委屈得要哭了。“我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我要去前方打仗抗日。”我太幼稚了，引得周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哪里都有工作，哪里都是抗日，你慢慢就会懂得的。于是，1939 年 7 月我调到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办事处。不久我开始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一些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8 年以后的几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疯狂侵略。虽说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但国民党中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汪精卫一伙，已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投降的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也节节失败，国民党的半壁河山都快守不住了，退到了四川重庆。蒋介石政府虽还没有公开投敌，却和日、汪勾勾搭搭，明说抗日实则反共。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

那时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首席代表，长期驻在重庆。还领导党的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我们党在蒋管区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极为繁重。在国民党军警特务重重包围和控制下，面临民族投降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同志力挽狂澜，以大无畏精神，机智从容，坚定不移又信心百倍地坚决贯彻毛主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路线，同时，在党内严厉

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写文章批判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谬论。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并反复对所有同志进行教育，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流毒，团结所有同志进行战斗。在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中，顽强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民党顽固派严密控制下，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大力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宣传我党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日团结进步的行列中来。并与当时在蒋管区的各政治党派、派别，文化艺术界，教育界，工商以及青年、妇女界人士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侵略者，孤立国民党顽固派。

在那极度繁忙紧张的几年里，周恩来同志对蒋管区的文艺统一战线工作，对文艺界朋友的思想改造工作也都极为关心。多少年来，周恩来同志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由衷喜爱；他一直把文艺看成是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所以即使在最紧张繁忙的斗争中，他总是把文艺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加以领导，加以应用，发挥文艺的积极作用。并对文艺工作者真诚爱护、关怀和耐心教育。当时重庆文艺界人士，他们大多数有抗日救国的思想，但对国民党明着抗日，暗里反共，有些人认识不清。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他们感到不满，但对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八路军又不了解。因此对抗战前途觉得渺茫，徘徊、苦恼，找不到出路。周恩来同志具体分析研究了文艺界的情况，决定把这些朋友争取过来，要作细致的工作。关键是使他们了解我们党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宣传八路军、解放区，揭露国民党。《新华日报》当然是最好的工具。但在国民党严厉控制下，订购《新华日报》有“罪”，阅读《新华日报》有“罪”。周恩来同志指示，在国民党猖狂反共的情况下，必须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为文艺界朋友通过种种渠道传递报刊和解放区出版的书本，还有表面经过伪装的毛主席著作。使他们逐渐了解情况，不断改变看法。周恩来同志还特别强调要在文艺界中广泛结交朋友，交朋友就可以沟通思

89

想，互相帮助，逐渐深交，就可以团结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就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由于战争的原因，重庆的电影生产已很困难，所以不少导演、编剧、演员都逐渐转到演话剧上来。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认为应该利用国民党控制的文化机构团体，通过对剧作家、

导演、演员做工作，把话剧这一武器夺过来，为我所用。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和激励下，在文艺界，戏剧界中，我们结识了不少朋友。周恩来同志对这批同志非常关心，只要他们提出愿望，想

见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在极端繁忙中都要抽出时间见他们，并且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他们的专业、年龄、爱好等等分别和他们交谈。每次见面都做非常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这些朋友讲解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国共两党以及抗日战争的形势，八路军解放区的情况。对朋友们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务必使朋友明

白才止，同时又非常耐心倾听朋友们谈到的多方面情况，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多少次难忘的夜晚，周恩来同志与文艺界朋友的谈话，从晚8点直至次日清晨。朋友们每次和周恩来同志详谈后，都心情激动，得到很大的

启发和鼓舞。以后多少天都要彼此交谈，领会周恩来同志谈话内容。逐渐，他们思想清楚了，斗争

目标明确了，也看到光明前途，充满信心。

周恩来同志当时在重庆的住处曾家岩 50 号，成了蒋管区中要求抗日进步的各界朋友的活动据点。朋友们后来把曾家岩 50 号看作是个领导和传播革命的地方。他们来到这里，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光荣，是他们进步的标志，他们到这里受了启发，得到帮助，增加了斗争勇气。而当时到曾家岩 50 号是要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朋友一天天多起来，这种难得的见面使同志们感到不满足了，自然地就采用了别的办法。那时，一些青年演员，进步的音乐爱好者，青年美术家，他们自己分别组成不固定的学习小组。不定期集会在一起。事先，我们把伪装过封面的毛主席著作或《新华日报》刊登的主要文件送给他们传阅，到时候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有时也讨论形势，研究各自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对青年朋友们自觉组合，要求进步的活动非常关切，非常支持。有一次，我们准备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周恩来同志知道后很高兴，并让我约这几位朋友到红岩村来，因为红岩村比起曾家岩 50 号既隐蔽又安静。周恩来同志想得多么周到啊。

记得那是 1942 年夏天，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朋友们一个个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都说，这可是到了解放区啦！我和他们在一间小会客室里一起阅读和议论。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说，能够有这样的地方来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真是莫大幸福啊！

重庆的夏日，酷热非常，太阳刚落，朋友们离开房子，散步到小山谷的尽头，那儿正是八路军办事处挖好的防空山洞，山边一条小溪水，小树林下堆着平整的碎石头。微风拂来些凉意。我们席地而坐，又兴奋地谈起来。突然，周恩来同志沿着山边的小路走过来，随着朗朗的笑声向朋友们伸出手。大家兴高采烈紧紧握着他的手。周恩来同志和大家一样，捡块石头坐下。问大家学习得怎样？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和大家亲切交谈。最后，他鼓励大家多阅读鲁迅的著作，从中可以吸取许多有用的东西。还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硬骨头精神。周恩来同志的话使朋友们像在云雾中渐渐看见了阳光。也逐渐鼓起勇气去迎接战斗。那一天直到黄昏，周恩来同志和朋友们一起散步，并把他们送到村边才告别。

那时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重庆《新

91

华日报》发表后，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组织当时文艺界朋友们学习。在曾家岩 50 号临着嘉陵江的小屋，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小楼上，朋友们常常聚会，学习讨论。周恩来同志不管是偶然遇到或事先知道，他都很关心，哪怕是很繁忙或者是在两次约会之间的几十分钟，周恩来同志都要和大家一起学习，谈一谈，给大家鼓舞。周恩来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对于每个同志和朋友都那样关怀备至；对人那样诚恳亲切。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愉快，没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谈。心中有什么疑难都欲向他倾吐。伟大的领袖人物和凡是接触过的群众都能水乳相融，这真是永远永远使人们怀念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我们党的公开机关和公开人员进行封锁监视，特务包围跟踪。同时对倾向进步的或与我们有来往接触的朋友也进

行种种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尽量保全力量的指示，具体计划部署把部分受到注意的有被迫害可能的文化界以及其他各界的朋友，作妥善安排和保护。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具体计划，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不能再在蒋管区留下去了，已经暴露的党员或骨干。这批同志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送回延安或去新四军，参加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二是留在重庆已不适宜，但以后还可能继续工作，这样送往别的地方，有去西南或香港的，到新的地区还可以开辟新的工作；那些尚可留在重庆，或是工作必须的，就还留下坚持战斗。这样的具体作法，不仅是保存进步力量，同时也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抵制与控诉。这种有组织的撤退，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曾有过一点抗战气氛的重庆，变成一座“死城”，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停顿了。

那时候的重庆，乌云压顶，风暴将至，面临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的严重危险，曾家岩 50 号被国民党特务重重封锁，但周恩来同志，董老和邓大姐仍然住在这里，和同志们一起坚持战斗。那时工作人员已不到 20 人了，由于情况危急，斗争复杂，面临国民党特务随时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每夜都有同志轮流值班，周恩来同志就住在小天井旁的小屋里，他常常紧张工作，通夜不眠，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深夜，我正在值勤，警惕着四周的敌人，突然周恩来同志走出房门来到我们身边，问道：环境很恶劣，面临着严峻考验，害怕吗？我立即回答说：不怕，有您和领导同志和我们在一起！周恩来同志用深沉的眼光望着我说，临危不惧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但为什么不怕呢？是有毛主席领导的党，有党领导的几十万军队作为我们的后盾。还有全国进步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啊！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时刻教育我们，鼓舞我们。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国民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紧张空气渐渐缓和了，重庆的文艺又逐渐活了，特别是话剧演出比较活跃。

那时《新华日报》对于话剧演出活动的评介文章比较突出。这固然是反映了那时候文艺活动的实际情况，也是周恩来同志利用活剧作为击败国民党高压政策的突破口。周恩来同志常说：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青人，影响比较大。所以，周恩来同志虽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还常常买票到剧场看话剧演出。对评介话剧的文章也很关心和重视，经常对我们编辑人员教育，周恩来同志常说：戏剧演出需要通过评论文章才能吸引观众和教育观众，也能把观众的意见转达给艺术家，使他们得以改进。评论也是有力的战斗。评论工作者是艺术家和观众的好朋友。同时，他还谆谆教导我们，在重庆那样的具体环境下，和解放区不一样。我们评论的标准也应该有所不同。凡是描写反帝反封建这一大方向的或者是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作品都应给予鼓励。反之，若是宣扬卖国投降，汉奸特务的，一定要严肃批判，旗帜鲜明。有时在一天繁忙工作之后，周恩来同

93

志还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研究编辑计划，讨论具体选题。常常向我们提出，某一文艺作品还不错，某一出戏为什么没有写评论。周恩来同志那种不辞辛苦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每一项具体工作，都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一天夜里，周恩来同志刚从外面归来，把我叫去谈起一位剧作家新编的剧本，他说：听说你们对这个话剧有不同看法，拿剧本给我看看。我知道他已经看过演出了，但对一个文艺作品，他总是非常谨慎，考虑再三，特别是

对朋友的作品。他常教育我们，既要批评帮助，又不能挫伤朋友的积极性，提出的意见得让朋友卜乙服，又可以取得教益。不久，周恩来同志找了我们几个人一起研究讨论这个剧本和演出，鼓励大家充分发表不同的看法，耐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说了几句：主题尚可取，也反映了作者向往进步的思想，那就应该肯定，缺点也可以提出来，供作者参考。并指定一个同志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整理出文章。周恩来同志还作了仔细的修改，才刊登出来。这位朋友看了心悦诚服，和我们更接近了。

当年《新华日报》副刊登载的戏剧评论文章是比较多的，虽然大多数不是专门家写的，但很受读者和文艺界朋友的欢迎。他们都想听听出自爱护的真诚意见。

1941年的雾重庆，各方面都死气沉沉，唯独话剧演出比较活跃，国民党中的文痞之流也绝不甘寂寞。除了严格它的检查机关，扼杀进步的演出之外，还要组织演反动戏。国民党反动文化头目张道藩奉命搞一个汉奸特务戏《野玫瑰》，这是当时在重庆的同志们都不会忘记的。当演员拿到剧本后，发现是个坏戏，就找我们商量对策。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具体情况。周恩来同志和大家研究后指示，要文艺界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和抵制。这个剧团的导演，演员团结一致联名写信拒绝排演，并说明这是个坏戏，演出后对剧团声誉不好。当然张道藩之流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为了扩大这出汉奸特务戏的演出效果，找了那时不少知名的导演，演员训话，要他们参加演出，甚至以解雇相威胁，但都遭到严同拒绝。国民党无奈，只好拼凑一个班子演出，而后我们曾经组织大家座谈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指出这是为国民党顽固派的所谓“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涂脂抹粉，为汉奸特务掩饰罪证。这正是顽固派投降、反共的真实写照。朋友们从这次斗争中受到了锻炼。但当时对这个坏戏演出没写批判文章。因为批判反会引起观众的注意，从反面替它作宣传。这是策略的运用。但在许多观众中这个戏是很臭的。

重庆当时在国民党严格控制下，朋友们要演出反映现实斗争或现实题材的戏剧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在1941年至1942年间，朋友们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黑暗统治，说出人民的一些心里话，曾创作演出了一些历史题材的话剧，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在提高蒋管区人民的爱国思想，反抗精神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郭沫若同志在这期间写了不少历史题材的戏剧，《棠棣之花》、《虎符》等受到大家的欢迎，特别是《屈原》的演出轰动一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政治上也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郭沫若同志以诗人的充沛感情，满腔义愤，借古讽今，给国民党反动派有力的抨击。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长期以来是战友，也是好朋友，周恩来同志对郭老不仅政治上、生活上都十分关怀，对他的创作也是十分尊重、喜爱和关切。在重庆时期，郭老每写出个新剧本，都要亲自念给周恩来同志听。周恩来同志还仔细阅读，经常认真提出中肯的意见，供郭老参考修改。对于演出《屈原》这个戏，周恩来同志更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具体关怀。当时在重庆是否演出《屈原》这个戏也曾有过争论。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应如何评价屈原这个历史人物，以

及对别的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周恩来同志非常认真，反复阅读了剧本，义和“专家们”一起详细研究讨论。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周恩来同志说，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不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古为今用”和“历史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吗？当时我正想着，周恩来同志突然指着我问：怎么不说话？你的意见呢？于是我冲口而出说：“没意见，同意您说的。”周恩来同志有点生气了，这是我从来没看见过的。他认真他说了我一顿：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没有意见呢？遇到问题你不思考吗？不懂的应该先学习准备嘛。我不喜欢你们一来就同意我的意见。那还要讨论作什么呢。你要学着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停顿了一下，他意识到我也许还不能领会哩。接着又很和蔼他说下去：青年人应该善于思考，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还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很重要的锻炼。只同意别人的话，你就会变成懒汉了。再说呢，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才能受到启发，才能全面看问题。领导人都那样聪明？都正确？好的领导是善于总结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正确意见的。这就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嘛。周恩来同志这番话既是对我的关怀教育，恐怕也是有感而发。给我极大的启发，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以后，慢慢我就养成习惯，凡遇到问题我都先考虑意见，不管正面反面的，甚至和他的意见完全相反的，但他从不责备，还表示高兴，谆谆教导，非常耐心说服教育。敬爱的周总来同志，您真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您有着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周恩来同志对《屈原》剧本，反复阅读，也曾到剧场看过几次排练。对“雷电颂”很欣赏。他曾笑着对一位同志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周恩来同志为了使这段戏充满更强烈的时代感情和政治效果，叫我把两个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念“雷电颂”给他听，反复念了好几次然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我们的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

《屈原》演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周恩来同志十分高兴，叫我到剧场去多买几张票，让红岩村和曾家岩 50 号的同志都轮流去看，通过看戏了解人民的斗争。还召集大家开座谈会，讨论这个戏的政治意义。还组织文章要大力宣传这个戏演出的成功和意义。

在重庆那段艰难的斗争岁月里，周恩来同志不仅和许多民主人士，政界人物，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领导人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和广大文艺界朋友结下深厚的情谊。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这个高大形象，是非常亲切的前辈，非常知心的朋友，深深刻印在同志们的心中。以后的多少年来，当他们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时，这些同志多么怀念周总理啊。而当他们有了新的创作，获得一点点成绩时，这些同志又是多么希望周总理能分享一点点喜悦啊。几十年来这样的感情与日共增，永生难忘。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那样繁重的工作重担，操持着国际国内的大事，但总理仍然没有忘记这些朋友和同志。一个也没有忘记。1971 年某一天他忽然问起我，1942 年我们曾经送了三青年音乐工作者去新四军。他们现在好吗？当时我心情万分激

动，告诉总理，他们都

97

很好。两个在总政文工团，一个在南京前线歌舞团。都是领导骨干。总理沉思着说：那时我们在重庆，日本飞机天天轰炸，在防空洞里，你们常常一起唱革命歌曲，这是很好的鼓舞啊。总理心里装着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国人民啊！

1973年9月，当我离开北京外出工作前，总理和邓大姐在家里接见了我们和孩子。其中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文艺新兵。总理见到后非常高兴，问到他在所在单位的情况。总理工作那样繁忙，身体已经不好，却还关心每一件事，记住每一个同志。他问起这个文艺单位的领导，其中一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剧作家，还有延安时代的作曲家、指挥，还有导演、歌唱演员，以至年青的舞蹈演员。总理记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创作和演出。总理说：我现在不管文艺工作了，但你们单位我很熟悉，也很关心。你把我的问候带给他们吧。你是文艺新兵，青年人，要努力学习毛主席思想，深入工农兵。老一辈为你们开创了道路，今后还靠你们年青一代走下去。记住要努力学习，要革命一辈子！总理对刚刚踏上征途的新兵多么爱护，给予了殷切的教导和希望。走到门口，总理又转过身来问我：最近你见到文艺界的同志吗？我说：将近十年我和文艺界的同志们来往很少。总理皱皱眉，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没有批评，只是说：不在文艺单位就不关心了？我听说某某同志身体不太好，思想上有些包袱，你去看看他，替我问好。当时我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总理那样忙碌还记挂着这些同志，而我却没有想到。第二天我立刻去看望这位同志，把总理的问候带给他。使他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让我向总理汇报他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感激的心情！他并表示将用有生之年继续为革命工作。不久后总理又特别问了这位同志的情况，还立刻想到要为这位同志安排一些社会活动，鼓舞他更健康地工作和生

活。

解放后不少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写出了一些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好作品。周总理一直是热情支持和倍加爱护的。特别是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话剧，1958年前后，1963年前后的不少作品，都是在总理的具体关怀和指导下创作和演出的；不仅是北京各剧团的演出，就是外地来的剧团所演的许多剧目，只要是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总理都去看。对《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杜鹃山》、《青春之歌》、《第二个春天》、《龙江颂》等等，总理不仅看演出，还和作者、导演、演员谈过话，共同研究讨论修改意见。总理给社会主义的话剧园地浇灌过多少雨露阳光。我们的这块园地也绝不是荒芜的野草。但是可恨的“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却胡说解放以来话剧创作是一片空白，话剧已经死了。还无耻他说以上那些话剧，她都进行过“帮助”，但人家不听她的。因此搞话剧的都没有好人，话剧界全是“残渣余孽”。她要救活话剧，等等等等，这真是无耻之极。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晴空万里，万众欢腾。人民的心，人民的思想又获得解放了！展望将来前程似锦。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永远跟着党中央奋勇前进！

一位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

张骏祥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 80 诞辰到了。他是一位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人。我们电影工作者多么深切地缅怀周总理对人民电影事业的培植和关怀啊！特别是这几天，正在开全国第五届人代大会和政协会议，我不能不想起过去每次人大、政协会后，敬爱的总理总要把参加会议的文艺界同志找在一起作长时间的座谈，了解大家的工作情况，解决大家要求解决的问题。大到如文艺工作中的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等十个对立统一的问题，小到一出戏一部电影的优缺点，指示得都是那么具体那么明确。每次会议结束，没有一个人不是带着更大的信心更足的干劲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到今天，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的恳切的声音，兴高彩烈地指挥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的形象，尽管自己这些年记忆力衰退得可怕，这些情景还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说起记忆力，我们电影圈子里的人谈起来，总是感到周总理的记忆力实在强得惊人。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他遇见一个多年未见的演员，提着名字问那个演员的孩子的情况，我就说了我们真佩服他的记忆力的话。可是总理却用他那爽朗的笑声回答说：“哪里话，比起毛主席来差得远了。毛主席的记忆力才真是了不起，简直是过目成诵。”他总是这样地推崇毛主席，总是谦虚他说：“我们不过是从毛主席那里学了一点东西，来向大家宣传的。”的确，多少年来，我们多少还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一点工作的话，都是和周总理的耐心教导分不开的。

大概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些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不把自己一生的经历翻来夏去想过，分析过自己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怎样会走上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的。

我本来是个读洋书的，从国外学了些关于戏剧的五花八门的東西，一脑子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胡涂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回到国内，在国民党办的戏剧学校教了一年书，不能满足自己成名成家的欲望，就拖走了一大批同学，想到重庆打天下，在那个年月，要办个剧团谈何容易，于是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机构里办起剧社来，还自以为我搞我的艺术，谁也管我不了。当然，事实上，我们当时不仅是替反动派撑了门面，而且我们那种艺术也正是反动派所能允许的！“四人帮”在被粉碎之前，把当年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指示组织的演剧队都打成什么反动派的别动队，我们这伙人就更不要提了。可是那时候，当我们在演出曹禹写的《北京

入》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却自己买了票到剧场里来看了戏。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握了他那双挽救了成千

上万徘徊歧途的人的手。过了两天，重庆《新华日报》上就刊出了一篇评论文章，肯定了这次演出的严肃认真，表扬了对重庆观众完全陌生的那些演员。这对我们这一伙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是什么样的鼓励啊！当时我也不懂党有统一战线工作，反正从此

开始，我就和当时党领导戏剧运动的同志们接近了，愿意听他们的话。跟我在一起的那些同学们后来也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然，经周总理影响教育，团结到革命阵营里来的人有千千万万，但我总不能不庆幸周总理来看《北京人》这件事对我后来所走的

道路的决定作用！

解放前夕，我们已经被迫到香港电影公司去拍片子。北京解

101

放后，看着许多朋友过港来京，心里真是羡慕。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在港的地下党就派人来通知，传达周总理（当时是党的副主席）要我们来北京的指示。那时的兴奋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的！

1949年“五一”前夕，我们在烟台登上祖国解放了的土地。从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革命干部了。

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周总理是怎样指导工作的。

文代会后，他把搞电影的代表召集起来，讨论电影工作的问题。这次会上有两件事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一是当时许多同志都七嘴八舌提出要求，这个要求修摄影棚，那个说国民党留下一堆烂摊子，摄影机都是“独眼龙”（即只有一只镜头），要求买摄影机……周恩来同志耐心地听大家谈话，又恳切地对大家说：这些要求都是应该的，将来也一定会办到的，但是眼下他脑子里还考虑不到这些事。他说：“我现在考虑的是百万大军南下了，南方蚊子多，战士们的蚊帐还没有解决。”我们听了都哑口无言，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可是，就在这同一个会上，恩来同志却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们是否想过拍电影的胶片解决了没有？这一下又把大家问呆了。因为当时恐怕确实谁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不如说，总以为反正自己不会生产胶片，只有去进口。又是敬爱的总理耐心地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大，人口多，电影是有力的宣传工具，将来胶片需要量大，一定要解决胶片工业问题，不能只想拿外汇到国外去买。恩来同志还说：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将来不仅要供应自己，还要解决亚洲许多国家的需要。敬爱的周总理这种既要脚踏实地看到当前的可能，又要看到未来的远大发展的精神，当时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在工作中永远必须学习的。

回忆起来，不知有多少事，我们由于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看法是错误的，或是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总是经过周总理的指点帮助，才改正过来。

记得1954年，我们有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中国电影周”。那时斯大林同志才去世一年多，可是在苏联文艺界已经露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当时陪同我们的苏联电影编导在看到我们影片里的战争场面时，竟然低下头去不看。后来有些我国留苏的学生也要求我们转告国内以后不要拍战争镜头，说苏联、波兰这些国家战争创伤很重，就怕看战争场面。代表团回国后就把这些意见都写进了总结。周总理看了这份总结，马上就把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找去，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说帝国主义还包围着我们，战争随时有发生的可能，我们今后不是不拍战争片子，而是要多拍。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某导演说自己不再拍打仗镜头，“不当战争贩子”的谬论。毛主席的要准备打仗的思想，今天当然我们都懂了。可是回想起来，在那个到处画着和平鸽子的年月，我们对要求和平与和平主义的区别还搞不清楚，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受资产阶级所谓反战文学影响根深的人，听了总理的话，真是感到闻所未闻，茅塞顿开！也是在这一次。周总理还向我们指出：我们拍影片首先是为了中国观众，也只有力我们的工农兵所接受的影片，对外国观众才有教育意义。我们不能去迎合外国观众的某些趣味，至于在什么电影节上得奖不得奖，更不要多考虑。

敬爱的周总理为我们的电影事业，真是费了不少心血。总理经常在考虑怎样解决电影工作不能适应形势的问题。可是回想起来，我们对这种心情是领会得很不够的。

1958年前后，为了解决电影工作者的主观世界与反映祖国建设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周总理想出了一个拍摄艺术性纪录片的办法，要求电影编、导、演，摄影等等一起投身到热火朝天的

103

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去，把先进人物先进事迹迅速反映出来。我们后来倒是去了，也拍出了不少叫做“纪录性艺术片”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认真领会周总理的意图。我们拍的仍然是用演员扮演的故事片，只是下去了解了一下先进人物和事迹，就很快地编成剧本拍了出来。应该说，毕竟是创作人员到工农兵当中去了，创作人员还是有所收获，有些影片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大多数的影

片不免质量不高，只能说是比较粗糙的故事片。在1961年这类影片形式就基本上被否定掉了！敬爱的周总理是一直为这事感到愤慨的。

后来，在1965年8月的电影创作会议上，总理又一次提出拍艺术性纪录片的要求，指示暂时少拍几部故事片是值得的，创作

人员通过拍摄艺术性纪录片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三五年后就会出大量的好故事片。他明确指出：他说的艺术性纪录片首先就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纪录片，不是用演员演的故事片。所以叫艺术性纪录片，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新闻纪录片，可以允许一定数量的事后布置补拍，因此也应该要求有更高的艺术性。

《大庆战歌》恐怕是第一部按照周总理的意思拍出来的这类影片。那是1965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布置的任务。当时我们正准备去大庆搞一部故事片，总理听了汇报以后说：“拍大庆很好，但我对拍这片子有些想法。”以后，在一次讨论电影工作的会议上，总理对拍摄大庆影片的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总理说，不要急于拍故事片，因为你们还不懂得大庆，不大熟悉大庆人。他要求我们全摄制组下去，向大庆人学习，用半年时间拍出一部艺术性纪录片来，让全国人民知道大庆人是怎样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拿下大油田的。经过和大庆工人、干部一起完成这部影片的劳动，才能

力拍好故事片打下基础。……应该承认，我们初去大庆时，对什么叫艺术性纪录片还是大不了然，幸亏周总理在电影创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求，《大庆战歌》才能按他指示的意图完成了。

周总理看了《大庆战歌》最初的样片，基本上肯定了这部影片。但是后来，这部影片就被“四人帮”左上海的余党禁锢了十年之久，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修剪完成和观众见了面。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没有能让他看到完成后的影片！这是我们终生遗憾的一件事！

我在这里写下的，仅是对个人直接有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情。

敬爱的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关怀和指示很多很多，应该好好收集起来，可以印成一本极宝贵的大书。

我们一定要记住敬爱的周总理的教导，努力拍出大量的好影片，把电影事业搞上去。

现在，我希望能再活20年30年，不仅是为了能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更是为了能使自己多作一点工作，在反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高歌猛

进的电影中有我一份儿劳动！

他为开创人民电影事业操劳

程 默

1938年秋，在周副主席具体策划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在党的阳光雨露下逐步开展了解放区的电影事业。

1939年11月周副主席在重庆曾家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接见大后方电影界进步人士贺孟斧、沈浮、陈晨等同志，同时在座的有我和张文今、童小鹏同志等。周副主席讲话，主要引导大后方文艺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国民党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大后方青年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周副主席讲话鼓舞了大家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各方进步人士，同时在当时重庆复杂环境中还不断输送人才，为创建人民电影建立基础。

日本投降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国共谈判开始时，中央决定利用和谈时机，派电影人员到国统区开展电影联系工作，发展统一战线。我们在陈波儿同志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陈波儿先去重庆、上海等地边治病，边进行电影联系工作。随后我和伊明、钱江、周从初同志等也去了重庆，到重庆后见到周副主席，他工作虽然紧张，但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关心，半夜里挤时间亲自接见陈波儿同志等，指示如何从电影方面开展统战工作，还具体介绍了一些重庆的进步人士。周副主席的教诲，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电影事业和党的整个事业是密不可分的，人民电影的每一步成长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周副主席和中共重庆办事处同志们的帮助下，陈波儿同志和上海地下党密切联络，我们在重庆、上海和电影工作者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在上海电影界进步人士蔡楚生、孟君谋同志的支援下，我们搞到了不少电影器材，其中有一台埃姆摄影机，二万米电影胶片和灯光器材。这些东西得来是非常不易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很严，地下党想了一切办法支援我们，帮助我们由上海把器材转运到南京。我在上海停留期间，我和周从初同志协助地下党同志做了一些工作，组织上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中共办事处，要上海地下党购买一所房子，当时在马斯南路用15根金条买下一座旧洋房和一个大花园，地下党委托我们看守那座房子，将近一个多月办事处才来人接管，以后不久马斯南路这房子即公开对外，称“周恩来公馆”。

我回南京向周副主席汇报上海的情况，他听我们搞到了这么多电影器材非常高兴，为了保证器材安全和争取时间运到延安，决定让我随同他一起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回延安。周副主席忙于国共谈判，时间非常紧张，从南京到延安要飞两个多小时，我们多么希望周副主席能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在飞机上休息一下，可是周副主席却给我们讲起了国共谈判的发展趋势，并谈到人民电影事业今后的发展，指示我们在解放区建立电影制片基地，开始着手培养电影工作的新生力量，周副主席强调要加强电影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嘱咐我们对电影技术干部要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把他们很好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周副主席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

陕甘宁自卫战争中，我随党中央指挥部到霞县朱官寨拍片，当时的任务是拍摄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活动，特别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及任弼时等中央负责同志，与边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和敌人斗争，以及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指挥全国

解放军大举反攻的情况。周副主席在百忙中抽时间接见我们，告诉我们目前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了转折点，由防御转入进攻，指示我们要尽可能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

材料。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非常兴奋。当时在朱官寨，我们几次请示要拍毛主席工作的镜头，毛主席总是不同意。我们说：全国人民都很关心您，都想看到您，我们拍一些镜头，可以满足群众的这种要求。可是主席说：你们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

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就请求周副主席帮助动员毛主席，果然成功了，毛主席同意让我们拍

了。这样我们顺利的完成拍摄毛主席在前线指挥和周副主席、任弼时等同志的宝贵历史资料。

为了考虑全国形势的大发展，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必需要跟上，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研究培养电影专业人材这个大问题。同时也为了将这批拍好的珍贵历史资料，尽快送往东北电影制片厂冲洗和制作，我和钟敬之、凌子风同志写了报告交西北局转中央周副主席，很快得到批准，指定由西北局和晋绥分局共同协助组织一支青年优秀干部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学习。这支新队伍的名称为：“西北电影工作队”，约有30人左右，领队是钟敬之、凌子风和我三人。1947年9月，我们到晋绥分局，在贺老总的大力支持下，晋绥分局调配了一批最优秀干部，10月中旬离开晋西北，向东北解放区长途行军。当我们到晋察冀边区的时候，已接近隆冬，加上去东北的途中要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形势非常紧张，晋察冀中央分局要我们暂时留下来，等明春再走。我们和华北军区电影队的全体同志会合一起，两队互相组织学习，为了抓紧时间，又怕拍好的胶片变质，我亲自在华北队用很简陋的土法把片冲洗出来了，总算放心地把这些珍贵资料底片冲洗完成任务。此后华北电影队需要摄影及技术干部，组织上研究商量后决定将我留在华北电影队工作。

党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华北军区派我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完成拍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的重要任务，我再次回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直到和平解放北平。同时，我们还与东影厂摄影队合拍我军进入北平城的大型纪录片《北平入城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建成后，我在该厂设在中南海的中央组工作多年，周总理经常给我们摄影工作者关心和指导，并时常邀我们到中南海西花厅他家里去作客。

建国以来我国电影事业迅速发展，在全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周总理对电影工作始终关怀分不开的。在他的教导下培育了一代老电影工作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回忆起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周总理身边的时刻就使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艰苦的战争年代从事摄影工作的情景，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日日夜夜，现在想起来还都是历历在目。那一段岁月虽然是漫长的，艰难的，但留下来的却是充实的，值得回忆的一页。无论是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还是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一切都将永远载入史册。但对于我们来说体会更深的则是，不管是陕甘宁的自卫战争，还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及中共中央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重要会议，和建国后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的各种重大会议。我们所拍的所有这些历史性的珍贵资料，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布置、指挥下完成的。他总是鼓励我们多

拍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周恩来同志的工作精神永远激励着我要努力工作，在有生之年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余热。

最难忘的一课

席 珍

我已是古稀之人，在人民解放军里从事电影工作已有 50 多年，在我坎坷的一生之中，令我最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教我们放映电影的一课。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大家都亲切称他为周副主席，当时党中央派他到武汉从事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8 年夏天，他在武汉筹备组织“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由总政副主任谭政兼任团长，李肃同志负责政治与行政工作，袁牧之任导演，吴印咸任摄影师，还有助理徐肖冰等。按照周副主席的意愿命名的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先在延安拍摄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活动，还摄制了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学习生活和延安军民参加抗战的活动，随后到晋察冀东南地区拍摄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1940 年，他们回到延安和放映队合并。

我和唐泽华是 1939 年 9 月 27 日从抗大调到电影团的，当时我们文化程度不高，以为是让我们演电影、当演员呢。当时把放映电影叫演电影，组织上是先送我们到延安城外的姚店子军委三局学习基本电学，我们有幸听到三局局长王锋、工程师钱文极亲

自授课，以后又向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常乾坤、王弼学习机械学、动力学，又向吴印咸学习摄影，使我们进入人民军队的电影队伍，从事电影放映工作，成为电影技术专业人员。

当时我们使用的是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苏联带回一套苏联制造的 K303 型 35 毫米皮包电影放映机，还带有苏联原文版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1918》、《我们来自喀琅斯达得》、《夏伯阳》、《十三个》、《祖国女儿》等，我和唐泽华边放映边学习。在当时的延安，从党中央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工厂、郊区农民、军队战士们，都看过我们放的电影，在当时是供给制，送电影上门，又不收费，真可以说是最早为工农兵和机关学校放电影，为人民服务了。有次在杨家岭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放电影，毛主席来到放映机前，问我们放电影有什么困难，还问我们的生活情况，我们非常受感动。当时我们大家都是吃小米，熬土豆萝卜，生活很艰苦，但精神十分愉快，每到一处放电影，都受到欢迎，都是和当地首长一块吃饭，有的老乡听说电影团来了，以为有好多人呢，他们抬着猪来慰问我们。只是我们开始放电影技术不高明，延安没有发电厂，靠自带的小发电机，用的是延安生产的上造汽油，不好燃烧，经常发生故障，观众总是耐心等待，直到看完电影，还热烈鼓掌，主要是观众受到这些苏联影片的革命和战斗故事所感动，激发了大家的革命感情，引起大家对列宁和影片中革命英雄人物的崇敬。1942 年 5 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引述了现实生活中的列宁和银幕上艺术创造的列宁，说明艺术来自于生活的源泉和艺术上创造加工的辩证关系，证明当时放映电影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当时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鼓励下，电影团克服困难自己动手，用手工操作洗印，先后制出《南泥湾》、《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边区参议会》和《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等纪录片，经过我们到延安各处放映，虽然创作技术比较粗糙，却是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因为观众看到了自己的领袖毛主席上了电影，群众也上了电影，看完电影，跺脚鼓

掌。

111

1942年春，电影团由总政划归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领导。我们从山上搬到山下小平房工作。最令人难忘的，是在这年金色的秋天里阳光明媚，照耀着大生产运动后获得丰收的延安，人们喜气洋洋，在一个中午，联政宣传部长肖向荣，电影团的领导吴印咸，陪同周副主席送来从重庆带回的一台美国制造的RCA型16毫米电影放映机，周副主席让我们把这台机器放在联政小礼堂观众厅里，开始手把手地教我们。这台机器用两个大的16毫米片盘，取代了35毫米十来本电影拷贝，轻便多了。他首先细心讲解这台机器的结构、性能和各种关键性部件的作用，和35毫米放映机原理相同和不同之处，然后又亲自装上16毫米影片拷贝作示范，要我们开动发电机，在银幕上对好焦点，开始放映，他特别教我们在第一大本影片拷贝放映完了之后，要学会很快换第二本。不使观众久等，他的动作非常熟练，使我们非常钦佩又非常感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他每次从重庆回延安部带给我们故事影片。如：第一任苏维埃主席的传记《斯维尔德洛夫》、《虹》、《他们有祖国》和纪录片《敖德萨大会战》，后来还带回《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使延安观众可以看到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生动感人的战争真实纪录，大大鼓舞延安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他在教我们放映电影之后，还同我们亲切交谈，关心我们的学习情况，鼓励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我们不仅作一个合格的电影放映员，还要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心中有党，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心中有人民，经常想着为人民服务，心中有祖国，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参加建立新中国。

周副主席既教我们放映电影的技术又鼓励我们学好政治，提高觉悟。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最难忘的一课，常常使我想起这一课对我的革命激励。敬爱的老师你好！你千秋万代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记周恩来与抗战电影

朱天纬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并分工负责主管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1933年，国民党南昌行营政训处成立的“汉口摄影场”抗战后迁到武汉，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划归第三厅管理。该厂厂长郑用之兼任第三厅下属电影科科长。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兼任“中制”编剧委员会主任。第三厅的成立以及中制划归第三厅，使电影生产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国共合作的机构中，（尽管“中制”的所有权属国民党，但在郑用之任厂长期间，在周恩来积极推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跟厂方还是保持了比较协调的状况）我们基本控制了影片的创作，而且，党组织可以按形势发展的需求去安排干部，使我们在电影工作中前进了一步。因而可以说，武汉时期和以后的电影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而且在一步步实现周恩来对党的电影工作的构想。

一发起抗日电影拍摄的热潮当时，武汉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抗战的活动中心。抗战初期，党在上海所组织的13支演剧队中派往敌后活动的11支，纷纷到达武汉，在左翼电影运动时期受党影响参加电影工作的各方面人士，由组织安排参加了“中制”。“中制”一方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拍摄了《热血忠魂》、《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故事片；同时，还派摄影师前往各抗日战场，拍摄新闻纪录片，编了几集《抗战特辑》，并制作了《抗战卡通》、《抗战歌唱》等。在第三厅组织的抗战宣传周中，设有专门的电影日。在电影日里放映了“中制”拍摄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受到武汉三镇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推动抗战宣传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对“中制”的工作非常关心，在彭德怀从前线来到武汉的时候，他陪彭德怀、叶剑英等八路军将领一起参观“中制”。第三厅的许多成员都随周恩来等人一起来到“中制”，他们一起与“中制”的编导演职员合影。周恩来还与夫人邓颖超一起在摄影棚中合影留念，他们后来还把这张照片题字后送给友人。

电影工作者在武汉还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这个组织包括了从事各方面工作的、持各种政治态度的电影界爱国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新华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协会的成立，并发表了协会的宣言和有关人士的文章。

二大力协助伊文思拍摄抗日影片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关注。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1938年1月来到中国，由于他是通过“美国援华协会”的关系来到中国的，由在蒋介石夫妇处负责外事的黄仁霖组成的五人委员会接待。准备去前线拍片的伊文思一行，在台儿庄战役已经打响后，还被迫留在汉口，伊文思曾

115

向黄仁霖提出政治部电影股愿派两人及一名翻译随同前往，黄仁霖以“情形不明”为由予以拒绝。但伊文思坚持己见，以“政治部是军事机关，不便拒绝”的理由，再度向黄提出要求。在僵持的情形下，伊文思找到周恩来，谈到围绕他去前线拍片一事所发生的情况，周恩来当即写信给郭沫若，提出“三

厅当派人协助伊文思拍片”的要求。信中还就如何与各方交涉及交涉时应提出什么理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的全文如下：

沫若兄：

顷见伊万士（文思）谈其赴前线拍影事，已得蒋夫人赞助，派黄仁霖等五人组成委员会经管此事。伊君曾向黄提出政治部电影股愿派两人及一译员随往，黄答以情形不明，最好不必加人。后伊君表示政治部系军事机关，亦不便拒绝。如兄以为然，可与用之兄商定，一面用陈部长名义（此层须与辞修说妥）致函黄仁霖告以拍制战争影片，应由政治部电影股派人员偕往（摄影师二，译员一）以昭慎重，另一面可由用之直接向黄提出，以便达到同去目的。如何，请兄决定并告伊君。专此。致以
敬礼！

周恩来
三月二十日

作为这封信的直接结果，三厅派出了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就参加了“剧联”等组织工作，并在193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反帝大会上，担任翻译的中共党员曹亮出任伊文思的翻译。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过问，伊文思很快就去了台儿庄，拍下了这次战役的一些情况。后来，周恩来委派王炳南，通过曹亮，与伊文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伊文思在《四万万人民》中拍到的中共长江局军事会议的那些著名镜头，就是通过这种联系通知伊文思拍摄的。曹亮为伊文思所做的一切，使伊文思称他为“政委”，他经常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曹亮，也很尊重曹亮的意见，包括去不去延安这样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也都征求了曹亮的意见。

《四万万人民》经过伊文思与他的同志们的努力，终于与世界人民见面，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他为我们记载下了历史，经过岁月的磨洗，我们愈发感到这些史料的可贵。但是，无论是伊文思自己，以及他的许多同代人，还是许多后来者，都不知道周恩来曾写过这样一封信，更不知道在这样一部伟大影片的诞生过程中，周恩来所做过的工作。

三克服重庆时期的艰难

尽力继续抗日电影的拍摄

中国电影制片厂从武汉迁到重庆后，通过阳翰笙与之密切联系，周恩来仍然关注着“中制”以及随后迁来的“中电”（中央电影摄影场）的电影创作，关心着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电影工作者。

“中制”在重庆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塞上风云》等影片，其在香港的分厂也拍摄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影片。“中电”也拍摄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影片。这些影片都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广告，还发表了大量的影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胶片来源完全中断，大批电影工作者转向戏剧舞台，周恩来依旧关照着他们，并曾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认真地提出意见。

为了广泛建立与电影工作者之间的感情联络，于1940年中秋节前的9

月8日，周恩来写信给郭沫若夫妇，提出：“中秋嘉会我们可开合股公司。兹送上50元，算作资本。客单请你们拟。上次在（郑）用之家请定之史东山，尹伯休、田寿昌（汉）夫妇，请

117

勿忘却也。”类似的活动，在《周恩来年谱》中多有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代表党对文艺、电影工作者是多么关怀备至！

在国民党反共高潮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极为细致的安排了包括电影界在内的各方面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香港沦陷后，他又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内地——回到大西南。

他还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安排重庆的电影工作者到延安去看一看，在他1944年8月31日给吴印咸、徐肖冰的关于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考伦拍片计划的信中，特别提到：“吴蔚云、陈晨都打算请来。”并要吴印咸写信给他们。信中提到的吴蔚云、陈晨都是“中制”的摄影师。

在重庆期间，“中制”虽然拍摄了一些影片，但拍摄过程中，跟国民党统治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影片《日本间谍》的拍摄，甚至“惊动”了蒋介石，他派遣蒋纬国亲自坐阵监督“修改”。而且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后，迫使与中共方面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郑用之去职，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头子吴树勋。鉴于此种情况，周恩来开始考虑如何在抗战胜利后建立我们自己的制片机构。为此，他处心积虑地对一直支持我们工作的剧院老板夏云瑚、从事化学工业的企业家章乃器以及任宗德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向周恩来许诺，一旦党建立自己的文化据点，他们保证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事实上，在抗战胜利后，我党领导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就是由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些朋友帮助建立的。

四开拓解放区人民电影的 基地——延安电影团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许多爱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延安。抗战爆发后，在延安先后成立了各类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协会也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成立声明。他们还派人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商谈协会成立之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題。

抗战爆发实行国共合作时，曾经发生非常生动感人的事：红军改制为八路军，许多红军战士舍不得脱掉红军的服装。为此，当时周恩来通过上海电影界党组织，想调一位摄影师到陕北来摄下这难忘的场面，上海党组织也安排了一位摄影师，但由于这位摄影师当时正在拍摄的影片还没有完成，难以动身去陕北。因此，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除去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拍摄过红军的活动影像外，没有任何电影资料留下来。这使周恩来终生感到遗憾。

当时已经到达武汉并在“中制”主演了《八百壮士》的袁牧之、陈波儿等人，向周恩来正式提出了到延安去的要求，由于这种契机，筹建延安电影团的想法，在周恩来的脑海中已经成熟。他开始着手进行这一工作。首先，他派遣袁牧之到香港购买胶片和摄影器材，袁牧之在香港的全部活动，得到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工委的支持，很快完成了任务。同时，周恩来接受袁牧之的建议，安排了与袁合作多年的摄影师吴印咸来到武汉。袁、吴二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先后会见了来中国拍摄表现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纪录片的荷兰著名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并得到伊文思送给中国人民的摄影机和胶片。

然后，他安排袁、吴二人到了延安。不久，直属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就这样在周恩来的缜密策划下成立了。在筹建延安电影团的工作中，周恩来表现出对艺术和科学规律的重视，以及对专业人才的尊重。除此，周恩来对延安军民的电影生活也十分关心，在他因右臂受伤去莫斯科治疗后回到延安时，还带回了几部苏联影片，在他回到重庆以后，也注意为延安搜集一些外国影片。他还利用一些联欢会的机会，亲自操作并教授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同志放映电影。

延安电影团利用有限的摄影器材和胶片，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电影历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这些史料，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他对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功勋，不可磨灭！

“你们守住这个阵地”——昆仑影业公司

季 洪

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中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告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及电影制片厂……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于是国民党中宣部接收了敌伪区所有的新闻机构和报纸、出版机构以及印刷所等文化机关，并划分上海、南京、北平、广州四个电影接收区，以“中央电影摄影场”为主，接收了上海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和北平的伪“华北电影公司”；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接收了南京的敌伪电影产业，还把战前上海私营的联华影业公司徐家汇摄影场也当作“敌伪”财产霸占。国民党的“劫收”行径，霸占公私电影机构和一切物资，大力加强对电影的垄断与控制，以阻挠进步影剧工作者的复员。

在抗战期间，遵循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同志曾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下属第三厅由郭沫若同志任厅长，阳翰笙同志任主任秘书，领导管理当时属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大批党与非党的进步影剧工作者，参加“中制”，拍摄了一批坚持抗战的进步电影；还组织了文学艺术界各抗敌协会和中国艺术剧社、中华剧艺社等话剧团体，在国统区开展进步戏剧运动。抗战胜利后，团结在我党周围的大批进步影剧工作者，怎样复员以及复员到上海后怎么办？这些情况，阳翰笙同志向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汇报后，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在国统区上海建立一个民营的电

影据点，摄制进步影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腐败与黑暗统治，唤起人民群众认清国民党的反人民阴谋，顶示光明的未来，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党十分重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电影宣传阵地的建立，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所作的重要报告《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的指导思想。他指出：“在打败

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

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这是一场复杂的斗争。……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

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我们党在国统区组建民营电影公司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与设备，我们只有人才，各种专业的权威性人才都在我们这里，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本。我们是靠党的领导和影响，组织进步的企业家来投资办民营公司。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同志布置阳翰笙与司徒慧敏、徐韬、袁青伟（庶华）等为核心进行筹备；由当时重庆《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约请曾资助过《新华日报》的四川江津、内江酒精厂经理任宗德投资；阳翰笙约请四川同乡曾支持过进步话剧活动的重庆国泰电影院和经销苏联影片的亚洲影片公司经理夏云瑚投资；袁庶华约请当时重庆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章乃器投资。

资金来源有着落后，影剧工作者整批复员缺之经费，只有分别依靠各自的原工作单位出资，陆续复员到上海，先由战前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过的史东山、郑君里、孟君谋等复员到上海后住进徐家汇联华摄影场，为以后陆续复员到上海的同志有个暂时落脚点。要拍摄影片没有摄影场地，当时联华摄影场已被“中制”袁丛美接管。经阳翰笙与史东山、蔡楚生、郑君里、孟君谋等商议，由孟君谋作为联华同仁代表出面，商同联华产业代理人陶伯逊，以联华是民营企业为理由，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发还联华摄影场，同时通过早年参加过共青团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并在周恩来、阳翰笙领导下工作过的副厂长罗静予，向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去做工作，说联华场地已破旧不堪，到处是烂泥滩不如找个好地方另建新厂，说服他们放弃联华基地；经多方交涉，联华场地终于发还。于是联华资方以部分摄影场地为投资，由陶伯逊为代理人与我们合作，成立联华影艺社。随即开始筹拍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拍片资金由任宗德、夏云瑚、章乃器各出十分之三，另缺十分之一，由中共地下党员蔡叔厚投入。联华影艺社由夏云瑚任经理，蔡叔厚为监察人。由于资金不足，《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摄制，基本人员由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同志参加，发扬他们战时演剧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不拿工资与酬金，每人只拿些生活津贴（昆仑成立后才正式发工资），拍片器材除从联华仓库里找出的废弃物资加以修整利用外，摄影、录音等主要器材，是依靠当时尚在国民党电影机构里的技术专家如罗静予、郑伯璋、吴蔚云、汪中熙等人或明或暗地进行帮助，或借、或送。这些活动，当时身为“中制”厂长的郑用之和中电一厂厂长裘逸苇都默认，没有干预，影片的洗印、剪接样片放映等后期加工，都是运用他们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进行的。

在拍完《八千里路云和月》和蔡楚生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后，资金见绌，增资不可能，银行贷款也非长久之计，兼以陶伯逊、章乃器相继退出，在任宗德和他夫人周宗琼的支持下，由他们出资改组联华影艺社为昆仑影业公司，租用联华部分场地继续拍片。经中共南方局批准同意，于1947年5月正式成立，由任宗德任总经理，单独出资除继续拍完《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外，还选定《新闺怨》、《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等七个剧目准备拍摄。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影响下，由阳翰笙同志团结组织了一批第一流电影艺术创作人才，如编导史东山、蔡楚生、陈白尘、陈鲤庭、沈浮、孙瑜、郑君里、徐韬、赵丹、王为一、张客、赵明、严恭等；演员有白杨、舒绣文、吴茵、上官云珠、黄宗英、蓝马、王苹、魏鹤龄、周伯勋、黄晨、卫禹平、李天济等；摄影有吴蔚云、朱今明、韩仲良，录音有郑伯璋、丁伯和，音乐有王云阶，美术设计有韩尚义、丁辰，制片管理有孟君谋等；还邀请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为昆仑编写剧本；并设立有副导演、联合导演等制度，以老带新，培养新的电影制作人员。昆仑的正式职工，由70多人增至一百三四十人。组成一个半摄制组，可同时拍摄两部影片。昆仑由袁庶华主持成立发行经理部，团结争取影片发行权威吴邦藩任经理，袁庶华副之。吴长期从事影片发行工作，有几家头轮影院属他管辖，发行经理部成立后，袁交了很多发行方面的朋友，昆仑影片由质取胜赢得观众，取得较好效益，有助于解决资金不足和周转上的困难。

先后担任经理的夏云瑚、任宗德，主要负责资金筹措和经营管理，以及

应付国民党反动当局等对外活动；公司的大政方针，均由阳翰笙同志主持的制片委员会会议决定。参加制片委员会的有蔡楚生、史东山、陈白尘、沈浮、陈鲤庭、郑君里、徐韬、王为一等编导人员，有夏云瑚、任宗德、袁庶华、孟君谋等制片与经营管理者。这个制片委员会类似董事会，但比董事会扩大，是个民主集中制的事业领导核心。有关事业规划、提案等由袁庶华设计，提交制片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贯彻实施；对准备投产的电影剧本和导演、主要演员等，都由制片委员会讨论决定；有关影片发行以及对付反动当局的斗争策略等，也都在会上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使昆仑内部步伐整齐，气氛融洽，对外则讲究斗争艺术，突破反动当局设置的禁令与阻挠。

史东山编导、王为一任副导演，陶金、白杨等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以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初期为历史背景，通过两个救亡演剧队队员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时消极逃跑，胜利后劫收发财，荒淫无耻的罪恶事实，影片在1947年初摄制完成后，史东山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谈他创作这部影片的心情：“长达八年的抗战”谁也有“不堪回首”的地方，“但在抗战的大前提下，我们还可以有所解释和自慰”，但“短短几个月胜利以来的现象，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伤痛。”反映他创作这部影片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这部影片是靠当时联华影艺社总经理夏云瑚与国民党影片检查官的同乡，“袍哥”的关系——以打牌转给他钱的办法进行疏通，才得以通过。影片在上海的沪光、皇后、卡尔登首轮映出后，获得观众的欢迎和舆论界一致赞扬，轰动全国和海内外。田汉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赞扬这部影片“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继承了战前国片的优良作风，而且将中国电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步。”

1947年10月，由蔡楚生编剧，蔡楚生、郑君里联合导演，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下集《天亮前后》摄制完成。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概括地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前后这段时期的历史生活真实。影片人物刻画成功，故事曲折动人，艺术处理有特色，结构填密，轰动了当时影坛。影片在上海首映后，引起强烈反映，出现万人空巷“成千上万人踩进戏院大门”的热烈景象。影片首轮连映三个多月，观众71万多人次，创中国影片历史最高的卖座纪录。上海《新闻报》发表西柳的《我为国产片骄傲》，赞扬影片“指出了国产电影前进的道路”；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以群的《中国电影新路向》，指出影片“概括了两个世界，两种人的生活”。在香港的夏衍和文艺界的朋友联合写信给蔡楚生和全体创作人员，赞扬新法的重大成功。信中说：“要是中国有更多一点自由，要是中国有更好一些的设备，我们相信你们的成就就会十倍百倍于今天。……你们能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产生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们就更想念起你们的劳苦，更感觉到这部影片的成功。”当时美帝国主义影片和某些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甚或含有毒素的影片充斥我国电影市场，昆仑集中优势兵力，创作摄制质量优秀的影片，赢得观众，以少胜多，以质胜量，占领电影市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腐败与黑暗统治，唤起人民群众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增强人民对未来的信心。

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内战，我中共代表团撤退，周恩来同志在临回延安前，约阳翰笙和于伶到马斯南路中共代表处去，交代他们要严守岗位，迎接解放。阳翰笙问周恩来：“你估计战争（内战）的前途如何？”周恩来说：“战胜敌人我们有信心，但时间可能长一些，因为敌人的力量还

很大。”阳问：“我们是撤退，还是……”？周说：“不，你们守住这个阵地，但思想上要准备时间长一些，为战胜敌人，与其把这场战争看得短一些，还不如看得长一些好。”阳又问：“我们的组织关系怎么办？”周说：“跟香港工委发生关系，主要找冯乃超。”阳又问：“跟上海的组织不发生关系吗？”周说：“这个不行？万一上海发生问题，相互影响。”当时党的组织系统是很严密的，不少党员是单线联系，不跟地方党发生关系，同志之间心照不宣，你知道我，我知道你，但谁也不暴露党员身份。在昆仑的党员中，徐韬、张客同志的组织关系在上海地方党。1948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再次建立“文委”，书记陈虞孙、委员冯宾符、吴小佩。在吴小佩领导下，建立以吕复为组长的党小组。（以上引号内阳翰笙与周恩来的对话，引自阳所写有关于昆仑公司的材料，）周恩来在撤离上海前，还找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到马斯南路中共代表处去作交代，要他们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这个电影据点，指出这是在敌人后方的一支文艺战斗队伍，是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据点，恩来同志还约文艺界的朋友进行座谈，白杨也在座，他交代文艺界的朋友要坚守住这个电影据

点。

一年以后，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任宗德等因形势所迫，相继离开上海去香港，翰笙同志在离沪前对留在上海的沈浮、陈鲤庭、袁庶华、孟君谋、徐韬、赵丹等作了布置，由陈鲤庭、沈浮负责制片委员会，袁庶华负责影片发行并筹措资金，当时资金来源，除影片发行收入外，并靠蔡叔厚同志的经常借垫资金，坚守住昆仑阵地。阳翰笙还找徐韬、朱今明谈话，要他们团结同志，坚持到底。翰笙同志等抵达香港后，周恩来指示在香港建立制片机构组建南国影业公司，一旦昆仑遭破坏时迁往香港，继续拍片。在上海解放前夕，任宗德又回到上海，与周宗琼尽力筹集资金，支持昆仑这个战斗集体，他们还从重庆运来大米，榨菜，在上海闹抢米风潮中，其他电影厂普遍无米存储，人心慌慌，唯独昆仑有米存储，人心安定，共度黎明前的黑夜。

从联华影艺社到昆仑影业公司1951年与“长江”厂合并为止，共摄制完成《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和史东山编导的《新闻怨》，欧阳予倩编剧、王为一与徐韬导演的《关不住的春光》，田汉编剧、陈鲤庭导演的《丽人行》，阳翰笙与沈浮合作创作、沈浮导演的《万家灯火》，沈浮编导的《希望在人间》，以及解放前摄制解放后完成的阳翰笙改编、赵明和严恭导演的《三毛流浪记》，陈白尘执笔、郑君里导演的《乌鸦与麻雀》，和解放后摄制完成的《武训传》、《迎春曲》、《纺花曲》。《人民的巨掌》、《我们夫妇之间》、《通宝河的故事》等16部影片。在解放前影片的摄制，是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阻挠，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争取完成的。如昆仑原拟筹拍陈白尘编剧，由史东山、王为一导演《天官赐福》，因该剧尖锐嘲讽国民党在战后的“劫收”丑剧，在剧本送审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禁止拍摄；沈浮编导的《希望在人间》，原在国民党“中电”三厂时就准备拍摄，因三厂当局阻挠，未能投产。沈浮转到昆仑后，对剧本又作了补充修改。准备拍摄，但在剧本送审中又遭国民党电影检查当局的留难，提出要修改18处之多，沈浮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坚决拒绝修改，经过多方的交涉与斗争，剧本最终得以通过，投入拍摄，拖到1949年3月摄制完成。又如《乌鸦与麻雀》，剧本一面送审，一面开拍，限于局势，剧本有些笔触比较隐晦，但国民党反动派仍以“违反勘乱”法令的罪名，勒令停拍，于是暂停拍摄，转为

修改剧本，把隐晦处改为明朗，直指反动政府与蒋介石，把修改后的剧本藏在摄影棚的大梁上，以防搜查，拖到上海解放后摄制完成。

为迎接上海解放，昆仑的中共党小组，在上海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深入国民党宣传部管辖的制片厂和私营电影厂，通过可靠的进步分子，开展宣传和护厂斗争，成立有迎接解放小组、护厂小组等，清查国民党官僚资本在上海电影机构的情况，团结广大电影界人士，保护这些机构和企业的器材，防止破坏及财物的流失，编造详细的人员和器材清册，为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准备了有利条件。在临近上海解放的时候，演员们还去私营电台用“昆仑星期晚会”的名义，播放直指反动统治为内容的歌舞短剧。上海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还布置昆仑党小组由朱今明负责拍摄上海解放前后和解放后群英大会活动的资料影片，这些资料片在上海解放后转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并在《百万雄师下江南》等大型纪录片中采用。

上海解放后，徐韬、张客同志等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领导下组织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影产业，在这基础上筹建上海电影制片厂，徐韬任新建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秘书长。有的昆仑同人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如蔡楚生任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史东

山任电影局制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罗静予任副主任委员兼技术处长，郑伯璋任技术处副处长，袁庶华负责电影局财务工作，……昆仑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积聚了骨干力量。

昆仑不仅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据点，还是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据点。最突出的事例是掩护周竹安同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周竹安同志是抗战开始后从法国回来的，抗战期间，他在任宗德的酒精厂里以任秘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昆仑公司作为任宗德的秘书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毛主席致程潜的亲笔信，就是由周竹安同志带着昆仑影片的发行人证明函件作掩护，潜往长沙，秘密而迅速稳妥地送达程潜手中。直至周竹安同志逝世后，才在他的悼词中公开宣称：周竹安同志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肯定昆仑影业公司是革命团体，昆仑职工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参加昆仑工作之日起算。

《松花江上》的回忆

张瑞芳

在我的一生当中，使我最难以忘怀的岁月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8年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岁月。

那是我的年青时代，也是战争的艰苦年代，同时也是我内心最感充实的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8年，在周围都是革命文艺巨匠和杰出人物的行列中，我这“普通一兵”被熏陶着，带动着，有种明确而强烈的使命感在激励着我。

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之行，使我亲身感受到在东北战场上，我军的“战略撤退”和“战略进攻”的战略战术是怎样神奇地运用着。同时我们在战争的间隙中抢拍出来的影片《松花江上》不但得到了广大观众（包括海外华人）的肯定，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特殊的色彩。

以上这一切，又都是和周总理在革命的各个时期，都重视发挥文艺队伍的特殊作用，给以热情的关心和指导分不开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

当消息还没公开发布前一天，文艺界消息灵通人士有的已经知道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向市中心区，想和所遇到的任何熟人，共享这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当时我和金山、沈刻、蓝马等中国艺术剧社的人走在一起。路过一个跳舞厅的时候，蓝马兴奋地推开门就大喊：“先生们，你们还在跳舞吗？知道不知道，抗战胜利了！”在昏暗灯影下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得发愣的时候，我们已经转身出去了……

在国泰电影院附近的热闹大街上，赵丹等人也迎面走来了，他们是从南岸坐轮渡过来的。金山和赵丹立刻像两个顽童一样拉扯在一起，嘴里喊着：“格老子……格老子！”（四川人的口头语）相互捶打着，拥抱着转着圈子。他们一脚踏进路边的拍卖行里（是熟人开的），把迎门的玻璃柜台撞破了。玻璃碎片扎进了赵丹的臀部，立刻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伤口，金山连忙跪下捏着流血的地方，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赵丹扶上了“滑竿”（用粗竹竿和麻绳缚成的抬轿）送到附近的医院里缝了好几针。尽管出了这样的“流血事件”，大家仍然嘻嘻哈哈心情舒畅。感到8年抗战终于结束了，可以马上复员回上海搞戏剧、电影了。

没想到抗战胜利的时局并不像大家希望的那么乐观，内战的阴影越来越重地压在了人们的心上。

8月28日，毛主席接受邀请来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舆论更是纷纷扬扬，莫衷一是。周恩来副主席为让各界了解谈判真相，安排各界爱国人士，也包括戏剧电影界和毛主席见面。我们前后受到接见的有：沈浮、赵丹、郑君里、吴永刚以及白杨、舒绣文、吴茵和我等人。在接见沈浮等人的时候，主席问：你们这里有北方人吗？周恩来副主席代为回答：沈浮是天津人。于是沈浮第一个发了言。

当时沈浮的发言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当面向毛主席呼吁说：希望谈判务必要成功，再也不能打仗了，人民盼望安居乐业盼了好多年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最幸福的是能活着看到革命的胜利，这方面孙中山没看到，列宁也

没能看到……

毛主席在最后讲话的时候，以诚恳而幽默的语调说：“我已经来重庆 20 几天了，只见过蒋先生一次，他要我见他才能见，这样下去，我回去也交不了差……，我谈判的对象如果是在座的先生们，我们几个钟头就谈好了，可我是和蒋先生谈……”在和大家握手告别时，毛主席称沈浮为“天真的朋友”。

憨厚的沈浮大哥，因为毛主席是湖南口音，他错把“天真的朋友”听成“天津的朋友”了。出门后问吴永刚：“毛主席怎么会记得我是天津人呢？”大家笑过一阵之后，头脑却清醒多了。

抗战胜利前夕，金山和我原本是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批准，接受美国一个大学要我们担任中文助教一年的聘书，正忙于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手续。

日本投降之后，当周恩来副主席得知金山的姊夫潘公弼（一位国民党的老文化人），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为东北特派员，将负责接收东北文化事业的时候，他同意金山放弃去美国的机会，准备做去东北的打算。周副主席知道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建有一个堪称远东第一的电影基地——“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军统”、“中统”都想去接收这个重要宣传阵地。

金山是 1932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在重庆的组织关系也是由周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因此当大家正纷纷寻找门路解决紧张的交通工具，急于复员回到上海的时候，金山则是紧张地寻找对象个别谈话，组织去东北的班子。金山以他在影剧界的地位和他的超常的活动能力，以及他三教九流上下贯通的社会关系，使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莫测高深的特殊人物，他的活动得到一些朋友的支持和理解，但也受到一些人的误解和非议。连他的老朋友蓝马当时都曾生他的气。拒绝他的邀请，拂袖而去。

1945 年 10 月 11 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国共双方虽签署了《双十协定》，但紧张的谈判仍在进行着。周副主席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万忙之中仍及时关心着金山的东北之行。

1945 年冬，周副主席派人送来他的手书：一个白色粗纸的中式信封，窄窄的毛边纸便笺上写着几行清秀的字。原信在“文革”中被抄走，从此无下落，现默写如下：

“山、芳：姊夫有去东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机北上。得知芳不幸发现肺病。相信她性格开朗，定能克服这样的疾病。

“如有信给我，请交来人。知名不具”

他是第一次将金山和我的名字写在一起。过去他总是分别通知我们和他见面，分别谈话交待任务。我和金山当时虽是夫妻关系，也不相互交换周副主席谈话的内容。这次的信也说明周副主席当时繁忙的程度。

接信后，金山当即以最快的速度南下京、沪，接受官方任命以及办理出关的必要事宜。然后乘飞机到北平（当时火车不通）。

我的出国护照因病不能签证，也决定回北平老家疗养。

1946 年 1 月，我离开重庆前几天，周副主席通知我见面。我像往常一样相隔一段距离跟着来人，在僻静的街角登上等候着的汽车。这次见面地点，不在红岩村，也不在曾家岩 50 号，而是在上清寺石坡上的一幢房子，是中共代表团的驻在地。

周副主席从堆满文件的书桌前站起身来，显然有疲劳的神色。他关心地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再次鼓励我要有克服疾病的信心。我有意用轻松的语调

说：“要不是出国检查，我还不知道自己有了肺结核病呢，好在并不严重。”

周副主席要我出国后，一要努力学习外语，二要养好身体，三要考察一下美国的戏剧电影情况，又沉吟自语似他说：“两年差不多了吧……”并交给我他写给在美国的龚普生同志的信。这是一封家书式的组织介绍信，笔调亲切幽默，要他好好照顾这位聪明可爱的小妹妹，说我们给她带的钱不多，总不能让她流落街头吧！信未署名大哥。（这封信未能交给龚普生同志，“文革”前我曾告诉过此事。原信在“文革”中被抄走。）

这是一次非常短促的接见，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很深。特别周副主席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讲的一段话，并让我将话带给金山。

周副上席严肃他说：“可能有一个阶段，党的机关离开你们远了，你们要慎重。”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党要作者实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1946年春3月，我回到北平老家休养。

金山约请同去东北的同志也陆续来到北平。

夏天，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当东北我军让出大城市，作战略性撤退的时候，金山和第一批伙伴们，随着国民党廖耀湘兵团进入长春。当时城中硝烟还没有散尽。在袁牧之以共产党名义接收“满映”之后，金山以国民党中宣部的名义再次接收了“满映”，被任命为长春电影厂的厂长。

来自重庆、北平先后参加工作的有盛家伦、戴浩、虞静子、沈剡及官质斌（录音技师）和杨霁明、冯四知、陈民魂等摄影师。还有在北平的演剧二队的赵寻、蓝光、田冲、赵鸿儒等也曾参加短期工作（后得组织通知进入解放区）。我的姊姊，姊夫张枏、王拓在皖南事变后，从重庆《新华日报》撤退隐蔽到西安，日本投降后到北平，也被邀来长春一同工作。

1946年10月10日，我的健康已经有了好转，但是美国聘书的期限已过，我征得徐冰同志的同意，在小雪纷飞中也来到了长春。徐冰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文化组的负责人。当时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

当时，长春厂内各部门机构已经建立就绪。重庆来的进步的文化人，不同于一般“五子登科”（位子、条子、房子、车子、女子）的接收大员，很快得到留厂人员的信任。大家正在热气腾腾地做拍电影的准备，但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器材设备。袁牧之撤退时，用了八个火车皮，装运走可以携带的器材，在佳木斯的兴山建立了根据地第一个电影厂，我们心里是很高兴的。对于职工的当面埋怨，金山故意长叹了一口气：“唯……这家伙，太不够朋友了，怎么不给我留一点？”

在解决拍片的各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处处感觉到进步戏剧电影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东北的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物之间，我们是受欢迎和被尊重的人，我们的要求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曾是我们的观众。特别是我们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以反映民族矛盾、反对外来侵略作为我们拍摄影片的主旨。我们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反复构思，由金山执笔完成的《松花江上》的文学剧本，其内容是一切爱国的炎黄子孙都会产生共鸣的。

对于全厂的创作、技术人员，金山就像当年郭床若在重庆对全剧组人员

声情并茂地朗读《屈原》剧本一样，他也向大家热情地朗读了《松花江上》的文学剧本，作为共同创作的开始，使东北的成员，特别是演员们感动不已。他们纷纷诉说，过去“满映”的创作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可以任意打骂中国人。演员根本没有权利看到剧本，往往等全片放映之后才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我们还要求大家共同关心化、服、道、摄、录、美的全面设计，因为我们和关外的同胞已经隔绝了整整 14 年了，要体现出典型的东北风貌，就必须依靠大家的帮助。

1947 年新年刚过，东北仍然是严寒时节。摄影机在外景地无法转动，况且胶片也几近断档。全厂放假过春节，我和金山飞回上海。我们探望了郭沫若、夏衍、田汉、阳翰笙、于伶等前辈以及赵丹、郑君里、蓝马、王莘诸多老朋友，他们的关怀，给我们以温暖，他们在上海创造的成绩，使我们深受鼓舞，并希望他们有机会去东北看看。

我们也去南京向宣传部长李维果述职。他是美国留学的高材生，是一位学者风度的官员，他欣赏《松花江上》的剧本构思，全力为我们解决拍片困难。我们成为他全家的客人。

（1949 年初，李维果被任命为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出国而去。当时金山和我正在香港，曾送他全家登上远洋轮。他深为感慨他说过：“我在东北工作中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两位艺术家和拍成一部《松花江上》影片。”）

当我们重返东北的时候，田汉同志曾赠诗一首，原诗在“文革”中被毁，“文革”后幸得朋友从 1947 年 3 月 23 日无锡的《锡报》旧报纸上抄写后寄给我。如今读来更觉往事历历在目。

送金山、瑞芳北行

田汉

比翼南飞值乱离，
莺飞草长羽书驰。
各余硬骨撑危局，
却喜明眸似昔时。

出关切作来年约，
忧国由他两鬓丝。
闻道松江冰百里，
愿加餐饭好添衣。

我们回长春后，立即抢拍在水吉市的深山老爷岭的镜头，描写东北义勇军出现的场景。当时国民党驻军不断催促我们加速完成，因为那里已经是两军进行拉锯战的前沿。

《松花江上》在 1947 年夏秋之交摄制完成了。在官质斌、杨弄明两位有经验的技师参与主持下，用零件凑成的录音设备只有一条声带。我们只能将对白、歌唱、音乐、效果一次录成。在录音棚里，既有大乐队也有全体演员，也有各种拟音用具，包括在角落里关着渲染农家生活气氛的鸡鸭。全部影片的底片是手工分段冲洗出来，用再生的胶片手工印出了第一个拷贝。

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秋季攻势开始了。战略反攻的部队已来到长春的外围，并且包围圈不断缩小。有一天夜里流弹有的都打到电

影厂的围墙上。当地驻军将电影厂周围的，包括院子里的所有郁郁葱葱的大树都砍光了，用来构筑工事，也怕里面藏着埋伏。电影厂是在郊区的，我们这些关内来人的住处在城区的边缘。上下班都要通过军队设的盘查岗哨和隔断城内外交通的铁丝网。最后，全城进入戒严状态，中长铁路也不通了，粮食和副食品已经相当紧张。我们就大家集中住在一起，吃着红高粱米和泡出芽的黄豆，从厂里搞来一台小放映机，自己学会放映，看一看“满映”过去拍的片子，长春市长赵君迈（也是金山家庭的朋友）好意赶来，邀请我们到中央银行地下室去躲避，说那里十分坚固。我们谢绝了。他惊讶地望着我说：“你这位女士胆子真大。”

他们哪里会想到我们当时的心情。在秋季攻势开始后，远在陕甘宁边区战场上的周副主席，仍及时通过长春地下党给金山带来口信，要我们：如能进关继续工作就撤进关内，如不能进关就在原地等待解放。

这时候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企图挽救他们在东北的危局，亲自来到沈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宣传部长李维果也随同来到沈阳。长春市的官员有的应召乘飞机集中沈阳，金山也在其内。

没想到隔不凡日，我得到金山的长途电话，要我立即携带《松花江上》的底片和拷贝去飞机场，李维果派出一架军用飞机正从沈阳飞来接我。大家刚来得及将底片和拷贝装进两个手提箱送我上路，飞机已经盘旋在机场上空准备降落了。我生平第一次一个人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在没有隔音装置的轰鸣声中，在长条的铁座椅上颠簸得滑来滑去，匆忙中我只穿着随身的旗袍，飞行员微笑着将他们的皮夹克送到我的手里，堆在我的脚下，因为高空十分寒冷。他们认得出我是演员。

金山开过会后仍返回长春，完成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设法将大家撤进关内继续工作，我的任务则将《松花江上》的底片和拷贝带到上海以保证影片能公开放映。当《松花江上》终于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首次上映的时候，文艺界和观众都给以相当高的评价。那时候，东北解放战争已获得伟大的胜利。

我1946年10月进入长春，1947年10月离开长春，仅仅一年的东北岁月，却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每当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在不同时期的音容，总是特别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1995.2.2.上海

为了创建人民电影事业

钟敬之

我与周恩来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但在会议上，在阅读文件中，我因工作感受，对他的讲话和指示，总是特别重视并牢记心头的。记得有一次在出席某国驻华使馆的招待会上，有许多电影界人士在场，当周恩来同志满面春风地出现并举杯绕室向许多熟人致意时，看见我站在人群的后排远处，便说：“你怎么站得那样远呢！出来，出来。”我十分感动地从前面同志们让出的空道中走出，同他碰了杯，真心感谢他还记得我这个不常“露面”的人！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忠诚与关怀，深深地蕴藏在每个人的心底。我现在就对自己感受最深而教益又大的几件往事作些回忆。

在战争频繁的艰苦年代，正当周恩来同志为革命事业四方奔波之际，他已着手擘画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了。我记得，1937年秋天，山西电影公司有位徐肖冰要参加八路军，他在太原经赵品三同志引荐，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热情接见，周恩来同志对他说：“你是电影工作者，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搞电影呢？不过，我们是要想办法把电影搞起来的，在全国和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不了解又想了解我们，而电影是一种极好的宣传工具。……”不久，赵品三回到延安便和几位党政军青及财经界的头面人物王若飞、谢翰文、朱光、沙可夫、曹菊如、高朗山七人组织筹委会，成立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还在《新中华报》上正式刊出了“成立启事”。当赵品三去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情况时，周恩来同志正在促成北上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决定先派袁牧之去香港购买必要的器材和胶片。然后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组织电影机构，与吴印咸同赴前方开始工作。后来又摄制了《战争与生产相结合》以及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录影片，成为最初出现的解放区的人民电影。在自卫战争期间，延安又产生一个自力更生摄制故事影片《边区劳动英雄》的电影拍摄机构。与此相应，当时东北已成立电影制片厂，生产了《民主东北》等几种影片，石家庄的军区电影队摄制出了《抗战新闻第一号》，同时电影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从此，周恩来同志说的“我们是要想办法把电影搞起来的”愿望，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周恩来是人民电影事业远见卓识的倡导者和关心备至的奠基人！

建国前后，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不论是对事业的经营方针，还是对干部队伍的团结培训，以及对创作的方向道路等问题，都随时给予指示和扶植。在全国电影事业集中管理之初，负责文化部电影局的袁牧之同志，创业雄心很大，也作出了不少成绩，但经营事业的经验却少，而且因为他在客观上囿于受苏联电影事业高度“国有化”的影响，曾经产生一些急于求成的想法在规划和建设上有些不切实际，几次重要关键时刻，都是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及时指出，才得以匡正的。据我所知，袁牧之当时对全国的基地建设和扩厂计划等问题以及干部的培训和使用上，的确颇有就近舍远，重此轻彼等局限性较大的“大集中”思想，还有集中所有的电影机构，计划在北京西郊新建“电影村”的设想，都是后来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及时指出才得以纠正的。周恩来同志认为发展新中国电影事业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发挥潜在力量，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求其发展。电影事业不能太集中，而且还要考虑各地区及少数民族的特点去建立电影厂，当前还是要首

先考虑利用现有设备。而且发展电影事业要求在高度技术条件下配合发展，电影工业更应该与其他工业部门协作，不能只靠自己搞，还说到，我们电影事业的全国统一领导重在政治思想上，不能把生产制作统一在一起那样就变成垄断，垄断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所反对的。在以上两个问题上，周恩来同志的重要指示对后来我国电影事业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袁牧之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后说“总理给我敲了警钟”。

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文化部电影局议订的计划中，要从1951年起，在全国电影制片和发行等方面施行“企业化”，强调要求计划生产，严格定额管理，实行节约成本，自负盈亏等等。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很难行通。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曾在一次专门讨论电影制片工作的会议上，明确表示在电影工作计划中现在就强调“企业化”，他是不同意的。他认为我国电影普及还非常不够，还需要国家大量的投资，不管是在物力还是人力方面，都是如此。所以强调“企业化”不能放在第一位，要等几年以后才能实现。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观点是完全对的。我在那些年间没有直接参与影片的创作活动，而从事些行政组织工作，与袁牧之的接触较多，也就常常会认同他的许多观点，甚至加以赏识。所以当周恩来同志及时指出和批评的时候，一旦自己醒悟之后，更感到亲切难忘。

1955年我已调入新筹建起来的北京电影学院工作。7月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成立这个学院，并允许聘请苏联教员来学院任教。我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和要求，举办了几个干部专修班，先抽调一批较有业务修养的艺术干部入班学习，郑君里同志参加了当时的导演专修班（后因多离开了）。有一次他对我谈起，说周总理非常关心苏联教员的教學情况，当听说我们这些中年以上的艺术专业人员在學習中对苏联教员的某些教學方法难以接受时，周总理非常注意，并和他谈到应如何对待学习外国的东西为我所用、并研究分析他们施教方法中的良好传统与如何取舍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周恩来同志的这种关心和指示，也对我们电影教育事业在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周恩来同志不仅无微不至地关怀着电影艺术家们的创作、生活、学习各方面，同时也密切注视电影事业的建设以及电影教育等问题，随时指明方向，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这沉沉的花圈……

王永芳

陈波儿——30年代的一位电影明星，一部《桃李劫》电影，几乎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姐，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一名战士、一位人民的艺术家。她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就在人们期待着她的事业更加辉煌的时刻，在她44岁的时候，却英年早逝了。1951年11月13日，在北京首都电影院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在人们沉痛哀悼她的时候，发现在灵堂的显著位置，摆放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送的花圈，花圈挽带写着：陈波儿同志千古！一位国家的总理，为一位逝世的普通艺术家送花圈，可以说是一桩希罕事。表面看上去，这花圈好像和别的花圈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却是多么不平常？它给人的感觉是沉沉的！是的，陈波儿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诲！在人们仔细端详那刚劲，有力的笔体的时候，仿佛又看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我们的人畏艺术家陈波儿之间的深情……

1938年的大武汉，笼罩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气氛中，陈波儿——这位献身于党的电影事业的文艺战士，和袁牧之、钱筱璋等从上海来到武汉。在党组织和周恩来、阳翰笙同志的关怀和安排

下，她参与创作了抗战影片《八百壮士》，还担负着重要的党的和社会的二作。她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党的文艺小组的成员之一，分工联系电影方面的工作，当时，武汉聚集了众多从上海来抗日的电影界的人士，党组织通过陈波儿去联系和团结这些人，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陈波儿的帮助下，钱筱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还穿梭在各野战医院，在伤病员中进行宣传和慰问活动。她工作出色，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当面表彰。在来武汉以前，陈波儿只听说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其人，但始终未曾谋面。这次到武汉，一见到周恩来同志，似乎是一见如故，感到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以，她非常愿意向他汇报工作，直接听到他的教诲。周恩来同志热情称赞《八百壮士》是一部好影片，并夸赞陈波儿、袁牧之的出色表演，这使陈波儿受到莫大鼓舞！

袁牧之来武汉之前有一个志向，就是去解放区、华北根据地拍摄我军军民抗战的纪录片，广泛宣传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但苦于没有条件（摄影机和胶片）。就在《八百壮士》的拍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为此事催陈波儿去请示周恩来同志。陈波儿通过阳翰笙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经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同意后，周恩来便约见袁牧之，共商此事。周恩来对袁牧之说：你的意见很重要，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我们不仅仅为拍摄一部纪录片，而还要从党的事业考虑，建立一支自己的电影队伍，为创立党的电影事业打好基础！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袁牧之全身热血沸腾，倍受鼓舞。从周恩来处出来后，他急不可待地找到陈波儿，把周恩来的这些话告诉了她。陈波儿听后，异常激动。她牢牢地记住了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重要指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在此后十几年的工作中，她都尽心竭力地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奋斗。

陈波儿是电影明星，但是在党组织和周恩来的教导下，她明白自己首先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服从组织是自己的天职。当周恩来指示她作为“积

蓄力量”不参加延安电影团筹建的时候，她愉快地接受了。在延安，她同样接受了中央组织部交予的组织和率领“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到华北敌后考察妇女儿童工作的任务。1939年1月，考察团团长陈波儿和副团长吴兢，率领三名成员：王紫菲、宋迪夏和张洁清，离开延安，经过绥德、米脂、佳县，渡过黄河，从晋西北，跨越同蒲路敌人封锁线，到达晋东北，经过晋察冀边区，再由冀西跨越正太路敌人封锁线到晋东南，以后又绕了一个圈子到晋南；再渡黄河到河南，经陕西西安，后来回到了重庆。考察团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两渡黄河，六过敌人封锁线。所到之处，受到我军官兵、地方干部和群众热烈欢迎。她们千辛万苦，历尽磨难，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英勇作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及妇女儿童支援八路军作战的许多生动事迹，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自己的身心也锻炼得更加坚强。

周恩来同志对考察团的工作和人身安全都十分关注，他经常通过重庆妇女组织领导人沈兹九等人询问考察团的情况。敌人报纸曾造谣说，陈波儿等被敌人抓去杀了，所谓考察团成员“全部牺牲”的消息，更使周恩来同志不安，直到她们平安地抵达重庆，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1940年2月，陈波儿率领着考察团成员宋迪夏，王紫菲和吴兢风尘仆仆地回到重庆，不顾休息，便立即去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她把从战区、敌后带来的一些战利品，拿给周副主席和办事处的同志们看。周恩来副主席当面表扬了陈波儿和考察团的同志们，指出她们此行取得了很大成绩，意义很大，并感叹他说：“妇女呀！不容易呀！过了多少道封锁线，都能活着过来，真不容易！”建议她们先休息，然后再做广泛的宣传。周副主席还精心为她们安排了住处——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化龙桥的一处房子。凡去红岩，都要从这里经过，住在这里比较可靠。尤其是这里离八路军办事处较近，假如发生什么意外，“八办”容易营救。

陈波儿率考察团回到重庆的消息不胫而走。重庆各界（包括文化、妇女、教育各个方面）都请陈波儿去作报告。陈波儿有时一天出席两三次演讲会、座谈会。

考察团的宣传活动，真实、生动地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转战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倒退、消极抗战行为，使得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恼火。重庆国民党当局采取行动，想要铲除这个令他们难堪的考察团。

1940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三周年的纪念日，考察团准备参加上午的纪念大会和下午的座谈会，不料，早晨4点钟，考察团的住地被包围了。住地周围一片嘈杂，大约有几十人朝这里冲过来。来的是国民党的警察特务，男男女女乱糟糟地挤在门前。杂乱的响声惊动了屋中的陈波儿，她觉察到他们的目标是朝自己来的，一想到有“八办”和周恩来同志作后盾，便镇定自若，和特务们英勇地周旋起来。

特务们以查户口为名，意欲逮捕、迫害陈波儿。他们进屋后翻箱倒柜，翻出了考察团搜集的日本旗等各种战利品、敌寇资料和各种宣传材料，他们如获至宝。特务们指着这些资料说：“你们私藏敌伪的东西就是汉奸。”陈波儿、宋迪夏据理驳斥：这些东西是“妇女儿童考察团”在华北前线和敌后根据地调查搜集的战利品，指出了特务的无知。然而，特务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顾陈波儿等待有国民党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所发护照，硬说考察团“没有登记，来历不明，是非法的”。特务们还故意找岔于说护照上的名字是假

的，要“请”她到“所”里走一趟，“把问题弄清楚”。面对敌人的威胁，陈波儿大义凛然：“要流血，就流在这里。就是死，也死在化龙桥这屋里，我们哪儿也不去。你就把我们杀死在这里吧！”陈波儿的英勇不屈的言行，震慑得特务们不敢贸然行动。

八路军办事处的哨兵看到这边乱哄哄的，立即向“八办”主任钱之光报告情况，钱之光怕出什么事，赶紧由办事处走过来。原来，为了陈波儿等人的安全，周恩来特意关照过“八办”要密切注视这边的动静，以防不测。

钱之光见此情景，便向特务说：“你们这样做，是要负责任的。”说罢，即出门回办事处去了。钱之光立即把特务们想抓人的情况，用电话报告给在城内曾家岩的“周公馆”。

过了一会儿，不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刹车声。原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来了。特务们看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下了汽车，都不敢再行动了，他们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有的特务偷偷把非法翻到手的材料放回了原处。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周恩来向这些特务问道。

“在这儿抓汉奸。”

“哪个是汉奸呀？”

“陈波儿。”

“陈波儿是汉奸？她是我们的干部！”周恩来生气了。

“她们有日本军旗，还有标语什么的。”特务们强词夺理。

周恩来说：“那些材料，都是我叫她们到前方收集的，我还没来得及看，你们怎么能给弄得这样乱？”

特务们没话说了。周副部长接着说：“她们几个人直接归我管，工作直接向我汇报。有什么问题，你们来问我好了。”

特务们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撤走了。

特务们走后，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又问了一下特务捣乱的全过程，波儿详细汇报了。邓大姐还帮助她们整理了杂乱的资料。

特务们从天刚亮一直闹到中午。她们原定去参加的纪念活动，也因特务们捣乱而没有去成。

这次特务来捣乱，波儿她们虽然脱险了，但这件事说明国民党时刻在注意着她们，她们的安全正严重地受着威胁，为了摆脱这局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考察团应尽快撤离重庆，返回延安。

对周副主席的关怀，陈波儿和考察团的其他成员，都感激不尽！

1942年，延安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陈波儿受到了深刻教育。同年5月，她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她决心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努力贯彻整风和文艺座谈会精神。她与在党校四部主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多幕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剧本所描写的内容，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在对敌斗争方面党存在的两来路线问题。这出戏由陈波儿任导演。由于这出戏的写作和导演上作，都是经过走群众路线完成的，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尤其是在语言的创作上，极具特色，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八路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同志远在重庆，就已经听说了由陈波儿导演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轰动延安的盛况，他对此极为关注。1944年12月7日，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这时，正是《同志，你走错了路！》的演出高潮时期。

周恩来同志很快观看了这出话剧。看后，就让人转告陈波儿说：“这出戏很成功，这是第一次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我们真实的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形象。过去，在舞台上也曾表现过共产党人、八路军、新四军，但无论在形象上还是语言上都不行。而《同志，你走错了路！》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形象、语言符合实际，人物、故事真实可信。你们的工作很不简单哪！”正在疗养院休养的陈波儿，听了这话，受到很大鼓舞，兴奋得不得了。

根据党校领导同志的建议，姚仲明和陈波儿同志都把《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创作经过，分别写了总结性的文章，发表在12月15日—19日的《解放日报》上。

12月19日，周恩来同志在读了姚、陈二人的文章后，又亲笔给他们写信，肯定他们的这一成功之作，并希望他们精益求精，继续修改得更完善。全信内容如下：

仲明、波儿两同志

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是全部同意，凡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已说了，但不知剧本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好，我很愿在你们付印前，得到一读的机会。可否？望告。

专此，致以

敬礼！

周恩来

十二月十九日姚仲明一连看了几遍，看罢，他立即把信送给疗养院的陈波儿。波儿看到这封信，更是激动不已，他们二人还把信送给党校领导看。从领导到学员，都在议论这封信，对周副主席如此关怀话剧事业和陈波儿、姚仲明的创作，都非常感动。

第二天，周恩来同志要求陈波儿和姚仲明带着剧本，在晚饭后到他那里去。陈波儿和姚仲明高兴极了，他们一起来到了杨家岭周副主席的窑洞。周副主席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背靠着写字台，他们二人坐在周副主席斜对面。周副主席看着波儿，关切地问道：“听说你病了，住了疗养院？”波儿风趣地回答说：“病是病了，一见到您的信和听说要来这里，病马上就好了。您看，这不是挺好吗？”周恩来同志不由开怀大笑，姚仲明、陈波儿也笑了。

周恩来同志问了姚仲明关于这个戏最初的创作经过后，又对波儿说：“波儿呀，你这次是上了个台阶儿，你在艺术上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你进入工农兵的新阶段。过去，你排的戏，都是表现知识分子的。现在呢，你已经工农兵化了，脱胎换骨，要祝贺你呀！”说得陈波儿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接着，周恩来同志又说：“我看了这出戏，在我思想上解决了一些问题。过去，我总是在想，将来这话剧、电影怎么办？我主要指的是语言问题。这语言问题有两个内容，一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语言，我们有我们的术语、习惯语言，经常说的话，跟外边不一样。如果把国民党在某种场合常用的语言，搬到我们的戏里，那我们就不能不伦不类了，那样不行。这回，我看，你们用的语言，都是我们的‘土产’。”说得大家又笑起来。周恩来同志接着说：“另外呢？就是这‘舞台腔’怎么办？大家都曾发过愁，不论什么人出来，都是学生腔、学生调，中不中，洋不洋，拿着一个腔调。这回，我一看，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戏里，有河北人，有山东人，有四川人，

也有湖南人，都是一口的家乡话。咳！听起来亲切、真实，南腔北调，这就是我们的队伍嘛！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

听到这里，波儿和姚仲明互相看了一眼，会心地笑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肯定，使他们受到了鼓舞，更坚定了他们今后工作的信心。特别是陈波儿，她觉得这个戏的成功，是向工农兵学习的结果，今后，必须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走下去，自己才会有“英雄用武之地”。她向周副主席表示：“通过这次导演，深深感到自己从前的幼稚可笑，真正认识到，导演工作，只是整个演出中的一个部分。要搞好这一工作，必须向一切有丰富经验的人学习，善于调动和发挥每个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周恩来同志鼓励她说：“希望你再接再厉，导演出更多的好戏来。”听到此，陈波儿眼圈有些湿润了。

在回党校的路上，陈波儿和姚仲明都在回味着这次幸福的会见。周恩来同志亲切的关怀，令他们终生难忘。根据周副主席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他们又奋战了一个月，对剧本作了进一步修改。

《同志，你走错了路！》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是光辉的一页。随着在延安的演出，各大解放区、各根据地以及部队的文艺团体，很多都排演了这出戏，反响之巨大，难以估量。直到1959年，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团体，仍在排演这出话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剧本作了进一步的修改，重新排演了此戏，周恩来总理观看了人艺的演出，作了充分肯定。

《同志，你走错了路！》的成功，是包含了周恩来同志的心血的！

由于陈波儿在艺术上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1944年11月和1945年初，她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和陕甘宁边区，被评为甲等文教英雄、马列学院模范工作者、中央党校模范党员。陈波儿得此殊荣，她明白，这应归功于党的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教诲！

四

日本投降以后，延安电影团的大部分同志奉命到东北去接收日伪“满映”，延安电影团即告结束。陈波儿觉得，延安的电影制片事业不能是一片空白，为此，她一方面向党中央打报告，建议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一方面，和伊明合作，创作出《边区劳动英雄》的电影剧本。不久，中央同意了陈波儿关于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建议。陈波儿立即着手“延安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经党中央同意，陈波儿率领程默、伊明、周从初等人一起去重庆转赴上海采购电影器材。

到了重庆，陈波儿首先到曾家岩，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关于筹建“延安电影制片厂”的事，并介绍了《边区劳动英雄》电影剧本的编写情况。周恩来同志高兴地说，“延安应该有个制片厂。”对于这个电影剧本，周恩来同志也很感兴趣。周恩来同志还向陈波儿介绍了重庆的文艺界的情况，当时，国民党加紧控制电影制片业，大批从事电影工作的同志，都转到了话剧舞台上，因而重庆的话剧界是相当活跃的。周恩来同志特意向陈波儿推荐了当时上演的一出好戏，就是陈白尘编剧的《升官图》，建议波儿抽时间去看一看。

《升官图》是一出讽刺喜剧。该剧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对反动政权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上演后轰动剧坛，观众反应极为强烈。陈波儿被这出戏的深刻主题和新颖手法深深感动了，很快写了一篇题为《从（升官图）中学习》的观后感，发表在1946年3月13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陈波儿对这一作品作了高度评价，表示虚心学习作者成功的创作经验。后来，在

周副主席面前，她感谢他推荐了这出戏给她看，使她受益匪浅。

陈波儿到上海，通过蔡楚生、孟君谋的关系，购买到了一批电影器材，回到南京，又见周副主席，一方面向他汇报在上海购置电影器材的情况，一方面要请示自己今后的工作问题。周恩来对波儿的工作问题，建议她去东北电影公司。周恩来同志说，东北长春原日伪“满映”已被我方接管，重建工作十分繁忙，该厂需要干部，陈波儿知道，原延安电影团的不少同志都在那里，他们与原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正在重建东北电影公司努力工作中。对于她来说，那里人既熟悉，事业又重要，于是她当即就表示愿意去东北。周恩来很高兴，说“你愿意去，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我也就放心了。”并告诉她：“最近，将有军调部的飞机去北平，你可以乘那架飞机去，然后再转去东北。”过了两天，周恩来同志交给陈波儿两张飞机票，让波儿把任克带上，同去东北。起飞的日子，就在第二天，任克当时还在上海，起飞前来不及把他接到南京。波儿只好写了封信发往上海，让儿子听从组织安排，她便只身飞往北平，经沈阳，然后乘火车，转道哈尔滨来到了兴山——东北电影公司所在地。从此，她为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又开始了呕心沥血的工作。

五

在东影期间，陈波儿和战友（后来与之结为伉俪的）袁牧之在交流从延安分别后的情况时，回顾了周恩来同志多次对她的接见和关心，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电影事业的关注，使袁牧之深受鼓舞。他们共同表示，一定不辜负周恩来的期望，把党的电影事

业办好。

陈波儿拖着病体，以惊人的毅力，在东影进行开创性的工作。

陈波儿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与各片种的创作人员交朋友，夜以继日地领导创作。在1947年5月至1949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东影摄制出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17辑，共106本。影片完成后，曾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审查，受到了包括周恩来同志在内的中央领导的一致称赞。在生产故事片方面，陈波儿付出的心血更多。在她的具体帮助下，剧作家于敏第一个写出了可供拍摄的剧本《桥》，东影据此拍成了第一部故事片。这是第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的影片，在我国人民电影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影片映出后，反映极为强烈。特别是广大工人群众，称赞

《桥》表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创造性，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做的电影”。《东北日报》发表短评称赞它“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后来，周恩来同志看了《桥》以后，热情地同导演和演员一一握手，高兴他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这曾使波儿异常兴奋。

陈波儿身体力行，除了成功地创作（导演）出我国第一部提线木偶片《皇帝梦》外，还深入生活，与工人交朋友，创作出

《光芒万丈》的剧本。陈波儿在创作人员中，建立起很高的威望！她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实现着周恩来同志所期待的：“我们应该有

《桥》的主创人员分别是：编剧于敏，导演王滨，摄影包杰，美术刘学尧，录音吕宪昌，作曲何士德。主要演员有王家乙、吕班、陈强。该片于1949年4月完成，5月1日首映。

自己的电影。我们不仅仅为拍摄一部纪录片，而还要从党的事业考虑，建立一支自己的电影队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开始了新的里程。陈波儿的担子也加重了。她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担任艺委会副主任和艺术处处长。这使她更有机会能从周总理处，经常听到直接或间接的指示。周总理更加关怀电影事业，大到电影事业的宏观规划、方针政策，小到影片的某些细节问题，总理都能实事求是地提出中肯意见；无论是创作人员的思想问题，还是创作上的困难，只要总理知道了，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中国电影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了检阅新中国电影初期的成绩，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在全国20个城市举办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展出了1950年三个（东北、北京、上海）国营电影制片厂生产的26部影片，其中包括《白毛女》、《钢铁战士》、《赵一曼》、《翠岗红旗》、《新儿女英雄传》等故事片20部。这次展览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创举，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为展览月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看到这一题词，陈波儿恩绪万千，更感欣慰。因为她感到这一成果，不正是周恩来同志几十年来所期待的吗！

作为一个领导者和朋友，周恩来对陈波儿的关怀无微不至！

长期以来，为了革命，波儿同志忘我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从1943年开始，心脏病就伴随着她了。在排《同志，你走错了路！》的过程中两次晕倒在现场。她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把戏排完。周恩来在每次见到她的时候，总要关切地询问病情，嘱咐她要看病、要休息好。然而，越是这样，波儿越是拼命地工作！

波儿生活当中有过不幸，她为革命奔波的时候，身边还要带着未成年的儿子任克。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非常喜爱任克。任克也非常喜欢他们，为了不让孩子影响波儿的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常帮助她安排好任克的事。

1938年底，她第一次从汉口来到重庆的时候，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功夫照料任克，常让孩子一个人在家玩耍。有一次，任克独自到重庆郊外野游，不小心掉到一个鱼塘里。鱼塘很深，孩子差一点被淹死。当地老乡发现了，把他救了上来。这件事，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知道了，为了安慰波儿母子，就让人去请他们母子到家里来。第二天，陈波儿就带着任克来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住处。任克见了陌生人有些腼腆，邓大姐就学着广东话对任克说：“快来！叫我也耶？”（意思是：叫我什么？）说着将任克抱起。聪明的任克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姑”，逗得大家笑起来。这时，周恩来同志从屋里走出来，拉着任克的手也笑着用广东话问：“叫我也耶？”此时，任克有些慌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叫什么才对，便用求援的目光看着母亲，又看看“阿姑”。周恩来同志拍着他的脑袋笑着说：“叫我伯伯吧！”当时，周恩来和邓大姐就在家设宴为他们压惊。从此，任克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时间久了，他们彼此之间更加亲密，也无拘无束了，任克就称邓颖超为“邓妈妈”。

1943年，为到上海采购电影器材路过重庆的时候，波儿就暂把任克寄放在新华日报社居住。一天，忽然一群流氓包围了报社，乱吼乱叫，用石头打碎门窗和报社宣传橱窗的玻璃，还要冲进报社。显然，这是特务捣乱。周恩来同志沉着地叫大家转移，特别叮嘱要保护好孩子。这样任克随着报社的叔

叔阿姨从后山坡的小门躲了出去。周恩来同志严厉地喝退了敌人的挑衅。到了晚上，任克才和大家一起又回到了报社。

陈波儿患有心脏病，况且她的行动有时还带着儿子任克同行，因此，周恩来同志常常亲自为她安排搭乘“军调部”飞机奔波各地。无论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还是从南京到东北，她都是乘飞机走的。

对陈波儿的病，周恩来同志也极为关注。在延安、在重庆、在南京、在北京……，他多次询问她的病情，并“命令”她休息、养病。然而，陈波儿哪里肯听？她感到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该是多么幸福！正因为如此，她才把生命置之度外，当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更加忘我工作，最终病死在工作岗位上！邓颖超同志在一份悼词中说：“波儿同志，你的死讯带给我沉重的悲痛。……两天来，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显然，这痛楚的哀音，也是代表周总理的。

陈波儿生前，珍藏着一张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 1938 年的合影，上边有如下题字：“波姊存，恩来、颖超赠”。尽管这张照片已微黄，但那上边的周恩来的字迹，却明显可见！

面对着这张照片，面对着那不寻常的花圈，再一次让人感到，他们之间不仅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更是亲切的同志和朋友，而且他们之间的友情又是多么的真挚和深厚！

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以制止内战、争取和平，签订了《双十协定》。后被蒋介石撕毁。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由于我方呼吁和平，迫使国民党根据“协定”条款，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的协议》，规定：由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各一人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国代表充任主席，对国共双方的争执进行“调处”。这个机构简称“军调部”。经常有军调部的飞机来往于南京和延安、重庆、北平之间，陈波儿乘坐的就是这种飞机。

难忘的目光

汪 洋

50多年前，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有一年秋天的某日，学校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来作报告，大家非常兴奋。周恩来同志的大名我早在上海工作时就听说过，关于他的种种近乎神奇的传说，在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青年们中流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处理西安“双十二事变”中的事。据说蒋介石是在和他交谈之后，沮丧他说：“为什么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里，国民党里没有一个他这样的人？！”想见到他，亲聆他的教诲，是深埋在我心底的渴望，这下子如愿以偿，怎能抑制内心的激动？

第二天，同学们早早起来，集合、列队在一个广场上，大家唱着歌，等待着周恩来同志。

他来了，穿着一身灰军装，双目炯炯，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全场起立，响起热烈持久的掌声。

他开始作报告，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党的任务、我们的方针政策、统一战线工作……滔滔不绝，他的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深入浅出的形象比喻，精辟深刻的分析，像溪水流过我们心田，又像阳光驱散了心头迷惑的云影。周恩来同志在微寒的秋风里整整讲了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到下午时，他那原本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就长出了胡子茬儿，青青的下巴在陕北秋天的夕阳下发着光，让我想到他身体里有多么旺盛的生命力！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没有想到，从那以后，我竟然有过许多次机会幸福地在他亲切的指导下工作。

北平解放后，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胜利会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我作为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代表与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他紧握着我的手，两眼注视着我，点点头说：“噢，你就是汪洋。”从那时起，总理就记住了我，记住了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

我永远不会忘记，每当我们遇到难题和不公正的待遇时，他总是给我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帮我们走向新的征程，周恩来同志是我国电影事业最体贴人心、最令人感动的良师益友。

1959年国庆前夕，陈毅同志审看了北影厂生产的建国10周年献礼影片《青春之歌》、《风暴》以后，激动他说：“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当时，陈伯达在看完《青春之歌》后说这影片“写了一群小资产阶级！”让我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陈毅同志不管这一切，向周总理推荐这两部影片。周总理看过影片后，亲切地邀我和崔鬼、陈怀皑、谢芳到他的住所西花厅去谈谈。

那天晚上9点多，我们如约而至。周总理正在吃晚饭，见我们来了，他匆匆吃完，立刻同我们谈话。这一次会见，怀皑同志有一篇长文记载，我这里无庸赘言。我只想着重指出他给我们的鼓励是如何令我激动。当谈到陈伯达的“意见”时，他轻轻一笑，清澈的目光凝视着我们，温和他说：“写小资产阶级怎样参加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成长为革命者，这很好吗，当然可以写。我们许多人就是在革命斗争中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嘛！重要的是写出他们怎样成长，改造成革命者的！”他又对谢芳同志亲切他说：“任何人都不背家庭包袱。家庭无法选择，重在个人的表现。”他鼓励我们好好工作。

我凝神望着他，内心难抑激动的心潮。当时，陈伯达是个大人物，他的责难给我们、给艺术家带来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周总理亲切的谈话拨云驱雾，澄清了我们心头的困惑，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望着他那风度翩翩的身影，我对自己说：“他是一位多么体贴人，关怀艺术家的领袖人物啊！谢谢您，我们的好总理！”

他的话让我激动了许许多多天，以至这种昂扬的情绪在庆祝献礼影片公映的酒会上迸发出来。面对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面对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我竟不能自己，端起酒杯即兴发表了一段祝酒辞。大意是说，党、人民、祖国是电影事业的母亲，电影艺术家一定能在祖国母亲的关怀下，作出更大的成绩，奉献出更好的艺术品。我讲得动情，真切，忘乎所以，因为这是我的真心话。应当说，这个举动，有点不合礼仪，因为不应当是我在那里作这番祝酒辞。没想到，北京市的领导同志笑着对我说：“汪洋啊，总理对你这段即兴祝酒辞很满意，说电影艺术家就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和激情。”

说实话，周总理的“满意”，让我自己对自己也“满意”了好久。每想到他的肯定，我的心就涌起热潮。

1961年，北影迁到小关新址。适时，《停战以后》拍竣，周总理邀陈毅，罗瑞卿同志一起在北影审片。审片间隙，我请周总理审查北影新址设计模型，周总理看了表示惊讶，说：“汪洋，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新厂？建这么大一个厂子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看完《停战以后》双片，总理很满意，指示我们第二天去听罗瑞卿同志的意见。说完就要回去。

陈毅同志怕总理工作太累，一定要留下总理再看部片子以解除疲劳。他大声说：“汪洋啊，你还有什么片子让我们看吗？”又对总理说：“你呀，回去又是工作，批文件、看材料，弄到很晚。不如在这里看片子，这也是工作嘛！”周总理笑笑，摇摇头，又坐下看片子。我又选出《野猪林》（崔嵬、陈怀皑导演，李少春、袁世海主演）来放映。陈帅和总理看后非常高兴。总理说：“汪洋啊，你们北影如果年年拍出这样的好片子，我支持你把这个新厂子建好。”

可惜，这个如梦的亚洲第一大电影厂的设计，也像梦一样被“四人帮”打破了。但周总理那种体贴、关怀电影事业和电影工作秆，坦荡磊落的胸怀却永久刻在我心里。

有一部影片，因为一些有关单位有不同意见，而一时未能公映。周总理看了这部片子，要我们和有关单位协商，说：“一定能改好！”又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几次催问落实情况。他这样关心

一部影片的生产，以日理万机之繁忙，而不忽视一件“小事”，实在是他伟大人格的表现。

“文革”前，曾有一段时间我受到无端攻击。我心头像压着块石头，觉得有言难吐。有一天，总理来北影厂审查上影张瑞芳主演的一部片子，见到我，他笑着说，“汪洋，你这个新厂建完，你的修正主义也完成了。最近有人检举你呢，我得告诉你！”非常明显，他的轻松的笑谈，表达了他对所谓“修正主义”的看法，给

了我巨大的支持。他的鲜明态度同当时北京市领导同志的态度一致，让我在颠倒是非的风浪中清醒了头脑，站稳了脚跟。

然而，一场更大、更混淆黑白的浊浪铺天盖地而来，“文革”的大潮把

我卷入漩涡。我多少次在难耐的污辱与痛苦中告诫自己：“周总理了解我！”是这种信念给了我勇气，让我度过了那场灾难。

周总理逝世的那一天。天寒地冻，朔风怒吼，哀云低垂。我被剥夺了向他遗体致敬的资格。我和朱德熊同志含着擦不掉的热泪，在人民大会堂外，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人民的悼念。我望着

阴云下的周总理那永含微笑的遗像，默默地说：“总理呀！我是您教导出来的电影工作者，您放心吧，我的一生都要献给这个事业，至死不渝！”

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电影事业，也是北影厂发展的真正主持者。正像世纪同龄者夏衍老人所说：“周总理为电影掌大舵！”

多少次，周总理亲自审查影片，提出切中要害的意见，切实可行又效果良好的建议。

多少次，周总理亲自接见电影工作者，为他们点亮心中的灯。为他们的

工作、生活排忧解难。多少次，周总理为文艺界指明方向。特别是 1961 年创作会议，他反对“左”倾错误，提出“寓教于乐”、尊重创作人员的创作特点、个性，至今仍然是不可更移的真理。

多少次，周总理谆谆教诲电影工作者，要摆正个人和祖国的关系，做一个优秀的人民艺术家……

周总理已离我们而去，离开我们快 20 年了，可他那永存和蔼微笑的面容，他那具有燃烧力的亲切的话语，他那慈祥清澈的目光，从没有离我远去，想到他，我就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催我奋进。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垂垂老矣，但我的心还是一个不老的青年。我还在尽自己所能从事此生苦苦热恋的电影事业。因为周总理的目光在看着我，看着我，在说：“噢，你就是汪洋！”……

一位对电影创作有关键性影响的人

徐桑楚

我于 1949 年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上影工作期间，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和他对中国电影事业和创作的指示。我深深感到在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刻，他给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周总理十分关心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 and 创作生产活动。

1952 年，他鼓励、支持我们用过期的彩色胶片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他携带此片去日内瓦参加会议回北京后，带信给上影，十分赞赏这一成就，影片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扬。1957 年底，他号召电影工作者深入生活，增强自身素质，演工农兵不能只是衣服是工农兵，而思想感情还不是。他对受反右运动冲击的创作干部仍然给以关心。一次他来到上影《林冲》摄制组看望大家，该片导演吴永刚因右派问题被撤了下来，改由舒适导演。吴水刚在组里就老是缩在角落里，看到周总理来了他就躲在人后不敢靠近，而总理看到他就主动叫他过来，合影时他往后退总理又主动请他。1958 年，他关心郑君里同志正在拍摄的影片《林则徐》，特地从广州寄来了他在视察时发现的三元里群众自觉抗英运动的资料，建议我们在《林则徐》结尾处加上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的场面。这份材料运用到影片创作中，使林则徐所进行的这场抗英斗争体现出更深厚的人民性，尽管林则徐本人被当时腐败的朝廷发配新疆，而抗英斗争仍在继续。编剧叶元在文章中也由衷地提到影片的这些情节是周恩来帮助我们发展的。1959 年初，当总理在上海开会时，得悉《林则徐》正在拍摄三元里斗争场面时，于深夜 12 时赶到上影厂看望摄制组人员，表示慰问和鼓励。当时摄制组的同志都无比激动，参加拍摄的一些外籍演员更是感叹不已：一位国家的总理这样亲临现场关心电影真是不可思议。总理对摄制组从创作人员到普通工人都亲切地问好。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总理听了介绍烟火工人夏存芳在工作时被炸伤一胳膊，光荣负伤的事迹后，就主动跟他合影，使全体同志都留下难忘印象。

1959 年上半年，张骏祥、张瑞芳自北京返沪后，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在医院治疗休养时约见了北京电影界人士，作文化工作中十大关系问题的讲话。总理说：我最近思考了“大跃进”中的许多问题，应该注意十大关系之间的对立和统一问题，比如政治与艺术关系，艺术与生活关系，内容与形式关系等等。他也特别注意了电影界也曾风行过“打擂台”、“放卫星”的头脑发热的做法，指出：艺术创作和生产如不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是要吃亏的，会受到历史惩罚的，要上海电影厂注意克服。他还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启发我们要尊重规律，正是由于总理的及时指示，我们才从热潮中清醒平静了下来，刮“打擂台”风，有的摄制组提出一天拍摄 150 个镜头，后来就注意纠正，对《林则徐》、《聂耳》摄制组，就不再提“放卫星”、“打擂台”了。这是听到周总理的讲话才敢这样做的。由于受周总理指导思想的影响，全国生产出了 22 部之多的优秀影片，向 1959 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上影也有 7、8 部之多。《林则徐》和《聂耳》获得了“红烧头尾”之美誉。当然总理也提出了忠告，这些影片在政治思想上是革命的，但艺术上还不是很完美的。

1961 年 6 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电影厂厂长会议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他提出艺术民主和反对领导上粗暴的干预，他反对一言堂，认为，一个作品的好坏最终要由全

体人民来裁决。这一报告无疑是在一个长久时期的沉闷的政治空气中打了个惊雷，发人深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揭开新的一页。总理的报告从强调发扬艺术民主入手，引发出许多反“左”的问题，是60年代初，文艺战线上的反“左”纲领。他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总结长期以来文艺中存在的“左”的教训；他带头自我批评，号召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粗暴行为赔礼道歉。我受到很大教育，接受报告中的观点，回厂后就向曾被我们厂领导过分干预，挫伤创作积极性的沈浮、徐韬、谢晋等同志赔礼道歉，使大家心情舒畅起来。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请全体与会代表到北京香山饭店休假三天。第三天，也就是30日上午，总理来看望我们，应大家的要求，他同代表们合影留念，但就是不同意站在中央的位置拍照，我现在仍保存着这张照片，总理站在右边尖角上，由赵丹几位围着他。摄影后，我和袁文殊、徐韬等五六位同志陪同总理在香山饭店小山坡上散步谈话，我清楚地记得谈话的主要内容，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我以后政治生活中的座右铭。

在这次谈话中，我向总理流露了许多畏难情绪，说：这几年电影厂工作很不顺利，工作很难做，这样做不对，那样做，错了，真是寸步难行，左右都挨批，今后不知怎样做才好。总理听了我的提问后，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说你有委屈情绪，可能你是对的，也可能你有缺点错误。但我给你说这样一个命题，人的智慧才能是有两部分组成的，一是成功的经验，二是失败的教训，只有这两方面的学问加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人的比较完整的知识，才能说这个人是比较成熟起来了，重视失败的教训成为我们自身一个财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求知的领域，我希望你好好研究这个问题，早日成熟起来。听了总理的开导，我心里顿觉开朗明亮，深深感到作为一个革命者要摆脱小的个人的自我，要正视和处理好现实的客观矛盾。使我摆脱了1959年反右倾中的委屈情绪，从吸取教训的角度来增强自己的思辨能力。后来在“文革”的残酷冲击中，我能经受得住也是靠了总理的教导。

中午时分，周总理请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午宴。许多同志频频向总理敬酒，这可急坏了随同总理来看望我们的童小鹏同志和秘书许明同志。他们向我们几个厂长说：你们要劝同志们不要这样敬他的酒，要伤身体，你们看他自己已要茅台酒喝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口舌，才制止了大家的敬酒。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与最敬爱的周总理一次难得的相聚机会啊。下午，我们全体围着他要求他晚上再同我们一起渡过一段美好的时刻，而总理说：我要回家了，你们邓大姐在等我，你们说，我能不去陪她吃晚饭呀。大家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总理。

更令人难忘的还有一次意外的亲切会见。1961年7月初，当我们开完创作会议后，北影厂汪洋和我相约在北京四川饭店聚餐，北影参加的有崔鬼、于蓝、陈怀皑和汪洋，上影有郑君里、赵丹、黄宗英、张瑞芳和我，又邀请了夏衍、陈荒煤、袁文殊等。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当我们正在热烈议论电影题材问题时，只听到门外走廊里周总理爽朗的声音：“你们在这里聚餐，为什么不请我呀！”说着就进了我们的房间。大家感到万分高兴，总理是那样平易近人，亲自找到饭店来聚谈，这种洒脱随和的交往作风只有周总理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具有，也只有中国文艺工作者才能享受到这样的最亲切的待遇。在这次聚会中，总理问了我们有什么制作计划，并鼓励大家有计划地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上影厂的同志要求总理多给些钱，武装和更新一下上影厂的设备，不能老是说上影是草堆里出凤凰。总理风趣地说：

你们做宣传工作的却不善于做宣传，我劝你们应该学会向上面做宣传工作，要求上面了解你们，就要学会做宣传。譬如，你们今天不是向我做宣传工作了，我了解了，就可以支持了。谈话是在极为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样就引发了赵丹同志对总理说，我有一句话向总理请求：我知道我讲话常常会走火，总理是知道我这心直口快的脾气，但我的本意是善良的，好的，我请求中央给我一块“免斗牌”。这句话引起大家一阵哄笑，说赵丹真是书呆子，天真烂漫像个孩子。总理对赵丹的讲话，却以严肃的神情说，这几年，连赵丹这样的艺术家都心有余悸了，这不好，完全没有必要那样的心惊肉跳嘛。我没有“免斗牌”，你也不必挂这个牌。这次四川饭店的聚会，可以说是世界上少见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和一批艺术家之间真挚的友谊，表现了周总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和大度。

1963年春节初三上午，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召见上影厂几位同志。我记得上海市委有石西民在座，上影有杨仁声、蒋贻、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吴伟和我。总理见到我就问我，“你喜欢拍传记片呀，据说有好几部戏？”我回答说，计划拍摄的有“吉鸿昌”、“阮玲玉”等五部。他笑着说：传记片当然可以拍，不过我劝你，拍传记片要慎重，中国这样大，历史这样久，人才这么多，你拍不完，也难以选择，再加上历史复杂，评价不易，我看还是少拍些，多制作艺术典型不是更好吗？比如：“吉鸿昌”吧，我想可以把董振堂和赵博生、吉鸿昌这三个人材料合起来，塑造一个典型人物形象就很有意义，有光彩。你了解董振堂吗？我说知道一点，不多，没有研究。总理说：是呀，董振堂原是国民党一员将军，他带着一万多部队投奔红军，长征途中，渡金沙江一役，他非常英勇，立了大功，赵博生是在东北作战的一位将领，这几位都是从旧军队里闯过来的人物，你以为怎样？我说，我接受总理的意见，将这三个人作为艺术典型来写。事后，我同文学部商量，改名为“将军新路”。这次召见，主要是总理要上影厂拍摄一部北朝鲜曾拍成的《李善子》，要我们重拍这部《李善子》的起因是总理感到我们过去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很不够，要学学朝鲜李善子的好做法，建议请张瑞芳演李善子，郑君里出任导演。总理认为，红军过去做政治思想工作都是做到人的心头上，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朴实作风，同李善子做人的思想工作是一样的，对我们当前政治思想工作有现实意义。

周总理非常重视电影创作者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一、第二两届“百花奖”颁奖活动他都亲自参加。那次《李双双》得最佳故事片奖，我去领奖时，总理一眼看到我就问：你怎么能来领奖，我说我是代编剧李準来领奖，他忙说：这可以。又鼓励我，要我们厂年年都拍出好影片来。周总理对我的教诲和对我国电影事业的关怀将永远铭记在心头。

他心中挂念着长影

苏 云

长春的夏天，气候宜人。长影的大接待室窗明几亮，长影一群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和厂的领导聚集在这里等待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到来。人们互相交谈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大家把总理不仅看成是敬爱的领导，而且是知心的朋友，感到特别的亲切。似乎什么话都可向他倾吐，什么困难都想向他诉说，见了他似乎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去年也就是1961年6月19日总理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讲话还在人们的脑海里回荡。总理说我看达吉离开养父去见生父时，眼泪刚要流下来，但导演把镜头拉开了，就是不让人哭出来。说明导演有顾虑，据说怕掉进“人性论”的深渊。不要顾虑么！我们革命者还是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么！总理一针见血地说中了导演在创作中的苦衷，其实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苦衷。同名小说的作者就曾经受到过批判。人们看到总理是这样的理解我们，心里感到暖烘烘的，似乎一切疑团都消逝了。电影艺术家们是以这种心情等待着，剧团的演员们还惦记着一件事：一定要请总理去看看他们排练的话剧《雾重庆》。厂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把茶杯摆好，茶杯里放上茶，一切齐备，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着总理从南湖宾馆出发的消息。铃声响了，电话里传来了急促的声音，工作人员说：总理就要出发了，还转告总理对我们在接待时摆茶水，大为不满，严厉的批评。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各级领导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渡过困难。中央决定接待国内客人一律不准请客，不准摆茶水香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执行。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赶快把茶撤了，有白开水就可以了。南湖宾馆离长影并不太远，坐车几分钟就到了。接电话后，办公室的同志又忙了一阵。艺术家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把茶叶倒出来？明白之后，人们在脑子里默默地思索着。总理以身作则的高风亮节，在人们身上产生着无形的力量。

不一会儿，总理穿着银灰色斜纹布中山装和邓大姐走进大接待室，厂长向总理一一介绍了长影的电影艺术家。总理对许多导演，演员都是很熟悉的，一见如故。当看到导演王逸时，总理便说：“你是王逸吧？我们认识，是王家乙的哥哥。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王逸握着总理的手，激动的泪水在眼圈里转，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总理你还认识我？我们还是长沙大火时认识的。”总理：“我没忘记你。”大家对总理惊人的记忆力早有所闻，今天亲眼所见，心里由衷的感到敬佩，感到高兴。

1962年6月10日，在长影人的记忆里是难忘的一天。敬爱的总理和邓大姐视察了长影演员剧团排练话剧《雾重庆》的片断，并告诫大家要加强演员基本功的锻炼，应会游泳、骑马……等。要加强艺术实践，任务少，可采取AB制的办法演出话剧。在台词录音棚，总理看到译制片演员译制《盲人音乐家》的配音工作，称他们是幕后英雄，是无名英雄，厂里应用别的办法介绍给观众。在混合录音室视察了《甲午风云》的混合录音工作，并向导演和作曲同志讲我们的影片有时音乐声音过大，压过台词，喧宾夺主。

总理这次到东北来，是视察吉林克服三年经济困难，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情况的，长影厂领导首先汇报这方面的情况，总理详细询问了各单位、各部门的人员构成情况，并要求我们大力进行精简、压缩编制，向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学习。厂领导在向总理告别时想让总理为长

影厂题写厂名，厂办的同志早已准备好笔砚。当向总理提出这个请求时，总理巧妙的予以回绝了，总理说等你们完成精简任务时再写，结果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

一年过去了，1963年6月20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和朴成哲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影参观访问，整个车队到汽车厂去了，而总理的车开进了长影，总理说崔庸健身体不舒服不来参观，本来我可以不来，可是很想看看你们，让陈老总陪他们去参观吧，我在这里等他们。大家坐下随便谈谈。陪同参观的艺术家和厂领导对总理的到来十分高兴，更感到幸运的是总理拿出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交谈。总理并没有忘记去年的会见。他不仅问到精简工作完成的怎么样，而且详细地询问了各个部门特别是编剧、导演、演员及其他摄、录、美等各方面人员状况。询问之详细具体使厂领导感到紧张，真像是上考场，生怕一些具体数字答不上来。

总理说上次来厂未来得及看你们厂的外貌，这次想看看你们这个庞然大物。大家陪总理来到办公大楼前边，正在这时陈老总陪着客人到厂了，大家还围着总理不肯走开。总理说你们赶快去接待外宾，我们是自己人嘛！

陈老总陪同客人入座之后，总理向客人说，我今天来长影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检查他们任务完成的情况。

总理挂念着长影，我们也想念着总理，在那不平凡的10年，更是如此。

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到长影，全厂同志沉浸在悲痛之中。为表达全厂同志的悼念，在大礼堂布置了周总理的灵堂。人们带起黑纱、白花。正在此时厂里接到上级革委会的电话，说上边有通知不准搞悼念活动，不准开追悼会。对此，厂领导同志产生无言的愤怒，实在想不通，一些人为什么对总理的死，也感到恐惧？为什么群众的吊唁，会给一些人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厂领导研究后，向上级反映：总理两次来长影，群众强烈要求要悼念，我们是否可作为例外举办？得到的答复是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但其他单位，仍然一律不准。当各单位的队伍已集合完毕并已陆续进入肃穆的会场时，办公室又接到上级通知长影也不准搞。怎么办？厂领导也想不通吊唁自己的总理会有什么罪？会犯什么错误，最后决定照常进行。

会场里庄严肃穆，除了哀乐声和抽泣声之外，什么也听不见，每个人迈着沉重的脚步在总理遗像前默哀。向我们敬爱的总理遗像告别，我们就这样举办了“不合法”的吊唁活动。

总理活在我们的心中，总理还在我们身边，这是什么禁令也禁不住的！

永留人间的光辉形象八一电影制片厂

每当我们默默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仰望着镌刻周总理道劲手书的碑文，就好象又见到了周总理高大魁伟的身影，又听到了周总理亲切和蔼的话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对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关怀和爱护。永远不会忘记见到周总理的那些珍贵的时刻。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周总理每次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每次接见我们的同志。每次带领我们外出工作，总是把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洒满我们的心窝，用党的关怀和期望激励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好工作。

周总理爱戴和崇敬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我们感受至深。他多次教导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责任感，想方设法拍好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一定要使我们的电影成为歌颂、宣传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武器。每当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执行任务时，周总理都事先把摄影记者召集在一起，亲自交代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甚至连什么时候去拍最好，什么时候不要去干扰毛主席，都讲得十分详细。有一次，毛主席要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一个大会。前一天深夜，我们在会场里做拍摄准备工作，突然周总理走了进来。他仔细检查了会场的布置，又亲切询问我们的准备工作情况。周总理走上主席台，长久地端详着毛主席的座位，然后告诉工作人员说，主席坐的地方，务必不要太挤，说着，他亲自动手把自己的座位往边上挪开些。周总理走时，我们看看手表，已近凌晨时分了。

1959年，我们拍完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故事影片《万水千山》，周总理亲自来厂进行审查。看过影片后，他就坐在放映室外过道里的椅子上，听取我们的汇报，高兴地对我们作了鼓励。后来，在庆祝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周总理又专门把我们厂的同志找去说，他看了《万水千山》以后想到，还应该把长征的前半部用电影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才能在银幕上得到完整的反映，才能全面体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伟大意义。周总理强调说，搞下一部影片时，一定要突出遵义会议，突出毛主席在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挽救党、挽救红军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还要写好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辉胜利，因为那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1964年，周总理又亲自倡议和领导了歌颂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和演出。在毛主席观看演出，予以肯定之后，周总理就指示我们同兄弟制片厂协作把它搬上银幕。为了早日拍好这部影片，周总理亲自确定摄制工作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亲自审定每一场戏的工作样片。有多少个夜晚和黎明，周总理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到拍摄场地，了解我们工作进行的情况，为我们解决困难。他老人家亲手把衣服盖在因疲劳而打瞌睡的青年演员身上。周总理为

了歌颂、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光辉思想，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精力啊！

周总理一生为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他总是那样谦虚谨慎。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我们曾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颂这一光辉事迹。但都由于周总理不同意，而一次又一次取消了摄制计划。1959年，军事博物馆正式展

出之前，我们得知周总理要去审查，便提前赶到现场，在红军馆陈列“八一”南昌起

义展品的地方，布置好灯光，架起了机器，准备为周总理拍摄一组镜头。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提到“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周总理立刻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派我去的嘛，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就越过南昌起义部分，径直去看以后的陈列了。我们只好失望地收起了摄影机。也是在这一年，江西省话剧团大型话剧《八一风暴》来京演出，我们和剧组商量把它改编成故事影片，多次请周总理来审查演出，为拍摄电影作出指示，可是我们又失望了。周总理说：你们演我，我就不看。在周总理生前，我们没有能多拍摄一些他的光辉形象，多创作一些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的影片，今天，我们仍然感到由衷的遗憾。但也正因为如此，敬爱的周总理一心为革命的高贵品德和坦荡无私的革命情操，更加深刻地印在我们心中。

周总理是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战争年代，周总理作为军委副主席，协助毛主席完成了历次重大战役的决策和指挥。建国以后，周总理日理万机，仍然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他的足迹遍及陆海空三军的营房、舰艇和机舱。我们曾经亲眼看到周总理在1964年夏天同陈毅同志、贺龙同志一道观看北京部队某部军事表演的动人情景。那天在练兵场上，周总理举起望远镜，亲切察看着战士们们的每一个动作，神情是那样专注。他不时走到作业场地，同参加汇报表演的战士一一握手，详细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入伍后的情况，叮嘱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的书，加强军事训练。当周总理看到战士们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高兴得开怀大笑，连声称赞说：要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当看到个别战士由于紧张而没有做好作业时，周总理关心地要部队停止演练，让战士赶紧休息。敬爱的周总理啊，您把我们每一个普通战士都放在心上！

周总理始终关怀着军队的电影工作。凡是有关电影的业务活动，他都指示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派人参加，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每当我们在边疆、前线或国外执行重要拍摄任务归来，周总理总要亲自听汇报，详细了解情况，作出具体指示。他老人家经常为我们亲自安排工作条件，帮助我们完成拍摄任务。有一次，周总理陪同外宾到沙石峪参观，随同执行摄影任务的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由于缺乏经验，开头有些镜头拍得不够理想。周总理知道后，亲切地安慰他说：不要紧，我来替你安排。接着，他就在参观点上亲自帮助记者组织场面。拍完之后，周总理微笑着问道：这次拍好了吧？我们从周总理的行动中受到多么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啊！周总理曾经在我们一个演员的笔记本上亲笔题词，“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工作。”这三句语重心长的嘱咐，一直激励着我们切实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深入工农兵群众，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努力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好党的电影工作。

敬爱的周总理啊，您在身患重病之后，仍然关心着党的电影事业，1973年元旦，您曾向我们发出了电影三年赶上去的战斗号召。我们感到万分痛心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这一希望没有能在您生前实现。我们决心努力，学习您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为早日实现您的指示，为拍出更多更好的革命电影而百倍努力地工作。

激励我前进的力量

陈 播

我在童年、少年时期，就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有种种见闻，听到过朱、毛的种种传说。到了青年学生时期，从进步书刊中，不仅知道关于毛泽东、朱德的故事，同时也知道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故事。抗战开始后不久，我参加了革命。长期战争环境，没有机缘见到周恩来同志，但从文件中，从同志间谈话中，对于周副主席的事迹知道得越来越多了。

直到全国解放之后，我才有幸多次遇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对我们的身教言教，犹如在昨天，他的思想，他的行动，总是在激励我继续前进。

看《万水千山》影片和

《战上海》的内景摄制

1952年我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厂长，到1959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八一厂和北影联合摄制了根据话剧改编的彩色宽银幕影片《万水千山》。经请示总政领导同志同意，我们准备将影片送给周总理看，总理办公室回电话说，总理不让送，他要亲自到八一厂来看。我们知道这是对八一厂的鼓励，立即报告了总政首长，甘泗淇副主任特地来厂接待周总理。周总理到八一厂之后，和《万水千山》影片的创作人员一一握手，以极大的兴趣看完了《万水千山》。他称赞了这是第一部表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彩色故

事片，在银幕上发展了原来话剧艺术上的成就，更真实更生动地表现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和过雪山草地时的艰苦情景，很感动人，对观众有很大的教育激励作用。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反映长征的战斗生活，有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在这之前，红军是在“左”的错误路线统治下，退出江西根据地，直到“遵义会议”之后，确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才在极端危险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壮举。周总理这一番重要指示，总政领导同志很重视，在八一厂由我主持，组织了王愿坚、陆柱国、冯毅夫三同志的写作组，到军事学院去研究史料，向在那里进修学习的将军们访问，曾经写出初稿。在当时条件下，写这样的题材是有一定困难的，主要是中央领导同志不能在剧中出场，关键的戏剧冲突无法表现出来，剧本写出曾送给周总理。后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告诉我，办公室同志作了讨论，认为剧本还未能表达出当时斗争主要转折阶段的历史面貌。曾打算排出多场话剧试演，因为“文革”开始，被迫放下来。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曾到江西根据地和长征路上各个战场，遵义、赤水等地调查访问过，与江西话剧团团长袁学超同志合写成话剧《伟大的转折》，并且在纪念毛主席90诞辰时，在南昌演出了9场。我们深感剧本不成熟，排演也匆促，所以没有继续演下去。周总理的指示和愿望没有实现！现在的写作条件比那时要好得多了。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实现总理的遗愿。

那天，周总理看完《万水千山》并作了重要指示之后，八一厂摄影棚里正在摄制《战上海》内景，我告诉了周总理，甘泗淇副主任担心总理太疲劳了，可是总理表示愿意去看看。到了摄影棚之后，正拍摄国民党军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召开紧急军

事会议，妄图顽抗守住上海，幻想美国出兵援救他们的场面。周总理等不得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布光和调度，要求将整场戏演一次给他看。导演王冰

指导演员们将整场戏表演了一遍，他非常有兴趣看完这场戏的演出。然后，他告诉导演和演员们，要研究汤恩伯的为人。汤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学了点日本军人的武士道气质。1926年时投靠蒋介石，一直受蒋介石的宠信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很骄横跋扈；抗战时，守河南，在日寇进攻中，溃败逃跑，可仍然得到蒋的重用；日寇投降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卫戍总司令，我军渡江时，他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从电影的情节看来，尽管过去的汤恩伯曾是威风凛凛，显赫一时；此时，不过是色厉内在，随时准备逃跑，无力也无心守住上海。要把汤恩伯故作姿态，实际上准备逃跑的心理状态演出来，就深刻了。当周总理说到这些意见时，他发现扮演汤恩伯的演员，就立即指着他说，你不就是王班同志吗？我在重庆时，就看过你的演出，我们早就认识了。说着周总理紧紧拉着他的手，王班同志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敬佩周总理的记忆力和对艺术家的关心。周总理在告别之前，又补充说，我只是说说我对汤恩伯的理解，电影中的

角色还是按照你们的理解去创造，我们送走了周总理之后，在场的同志都为之感动，久久不能平息。直到今天，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随周总理访问缅甸

1960年6月至7月，发生苏联赫鲁晓夫反华，攻击我党，撤走专家，撕毁合作协议的事件，他们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妄图压迫我国成为其附庸。

为打破苏联从陆地上和美国自海上对我国的封锁，周总理开展中缅友好外交，打开通向世界各国的通道。在1961年初，应缅甸政府吴努总理的邀请，周总理率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访问缅甸。这个代表团有政府代表团、军事代表团、文化代表团、电影代表团、佛教代表团、边境代表团、新闻代表团，在中国外交史上可谓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我是电影代表团的团长，代表团团员有崔嵬、桑弧、李恩杰、张瑞芳、秦怡、田华、王丹凤、杨丽坤、王苏娅、秦文、王心刚、庞学勤。代表团随周总理参加缅甸国庆节的活动，还要参加在仰光举行的“中国电影周”的开幕式。就在开幕式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照例要把第二天的日程仔细检查一遍，他发现参加这次在缅甸影展的中国影片中，有《杨门女将》，而参加开幕式的电影代表团名单中，没有随文化代表团来参加演出的饰演穆桂英的杨秋玲、饰演余太君的王晶华；开幕式首映影片《欢迎你，缅甸胞波》，是纪录缅甸政府总理吴努率强大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各地群众热烈欢迎的盛况。周总理想到首映影片的导演，又是这次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缅甸纪录片的导演，也应该和杨秋玲、王晶华一同上台，同电影代表团团员一起参加开幕式。总理的批示于凌晨两点，由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电话上告诉我，我赶紧与有关单位联系，作好安排，使得开幕式能按总理的批示顺利进行。当天下午，“中国电影周”在仰光市总统电影院隆重开幕，缅甸政府要人、文化界、电影界和观众挤满了影院，我和缅甸电影协会主席吴定内分别讲了话，我还代表中国政府文化部将这部首映的《欢迎你，缅甸胞波》，赠送给缅甸文化部，之后两国总理都上台与两国电影工作者亲切握手，全场热烈鼓掌。当帷幕拉开后，银幕上再现中国各地群众热烈欢迎缅甸胞波的感人情景，在此时此地，更是特别激动人心。此后，和缅甸的电影界及缅甸各界展开友谊交往活动。现在回顾，当时周总理的批示，要这三位艺术家参加开幕式，不只是一般礼仪，而是对她（他）们的劳动的尊重和应得到的荣誉，而我却没有想到。

在缅甸期间，缅方给电影代表团每人发了不少的缅币作零用费（这是按以前缅方人员访华时，我方发给他们的零用标准，以外汇折成缅币发的），缅甸的演员很热情地带领我们到仰光市的大商场去购买物品。而我们由于在国内都已领取了出国零用费的外汇补助，按当时的外事规定，缅方发的零用费，要一律上交，所以大家不敢去买，使得缅甸友人不解。我当时向陈毅副总理反映上述情况，因为涉及到政府规定，他要和周总理研究。第二天，陈毅副总理告诉我，经请示周总理，缅方发的零用费，都可以用，只是回国后，按外汇比价，以人民币按数归还给国家。大家听了，非常高兴，开始买自己所喜爱的纪念物品。周总理处理这件事，坚持原则，遵守法规，按实际情况又有一定的灵活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缅甸期间还有许多感人的事，如要求文化和电影代表团，以东方音乐舞蹈节目为基础，凡与我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有一个相应的节目，在总理告别宴上演，别开生面，使得各国外交人员为之感动。这次成功的经验，导致文化部组建东方歌舞团。

为拍电影看豫剧《社长的女儿》

1962年9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到在全国城乡搞“四清”运动，扩大了打击面。在这种情况下，河南商丘地区剧团创作演出了现代题材的豫剧《社长的女儿》，写一个曾被恶霸地主害死的农民，遗下的一个女孩为公社社长收养，长大后只学文化，认不清恶霸地主者婆阴谋复辟。剧中描写地主老婆猖狂倒算，小女孩还对她表示同情。于是，社长带她到烈士陵园告知她的父亲被地主害死的身世，并和地主老婆展开斗争。这出戏是按照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需要来编排的，一时很风行，各地剧团纷纷移植演出。八一厂编辑部选来准备拍电影。1964年3月间，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在国外访问归来，外交部办公厅安排这个剧团到钓鱼台宾馆小礼堂为代表团演出。我也借此想听听周总理的意见，就靠近周总理身边坐下，戏开始演出了，剧中地主老婆梦想变天，伪装苦情，想反攻倒算，表现又狡猾又猖狂，而农村干部无人抵制，烈士的女儿受欺骗反而同情她。总理看到这些情节，露出不满意的神色，不时皱起浓眉，发出阵阵叹息。我已多少揣摩到他的意向，当时也不便提问。戏演完之后，演员们出来谢幕时，观众的掌声不多。按照常规，外交部办公厅的同志要请总理上台和编剧、导演，演员们一一握手。可是这次周总理有些激动，离开座位，没有上台去，竟自到休息室去了，他的文教秘书许明同志拉着我陪总理到了休息室。总理坐下来向我说，“这个戏的情节我忍受不了！”他的卫士送来了安定片，他吃了之后，沉默了一阵之后，平静下来了。他告诉许明同志，通知剧团的演员，下了装以后我还要见他们，请剧团的领导和编剧、导演同志来谈谈。我的紧张情绪也随之松弛下来。待到团长、编剧、导演来了之后，周总理很平静，细心地询问这个剧本的生活依据，又问像剧中的烈士女儿不懂得阶级斗争，为什么社长不早些带女儿到烈士陵园进行教育呢？对多数没有发生过父亲被地主杀害的青年，又怎么进行教育呢？这样平静地提问、交谈，使得剧团团长、编剧、导演毫无拘束地介绍了创作情况。原来他们是先从阶级斗争教育的目的出发仅听到有个别地主女人对生活不好有点怨言，就加以发挥，夸张，编成现在的剧情。总理指出，写戏还是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不能从政治教育概念出发，依主观愿望去编排，像剧中地主老婆的形象，是因为你们要在戏中编成一个反面教员形象，夸张成那

样狡猾猖狂，违背了我们党领导土地改革后 10 年多的农村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是给地主留有一定的土地，安排劳动，使之有出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广大群众和干部不会容许像戏中的女地主那样猖狂的，使人看了忍受不了。文艺创作不从生活实际出发，仅仅为了教育别人而编排的剧情，是不真实也不能感人的，也就起不到潜移默化的深刻的教育作用。他建议剧团领导和编导再深入生活，改好这个戏。然后和他们一一握手，又和等待他的演员们见面，一个个认出他们在戏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看到演老社长的演员是一个青年，总理称赞他演得好，称赞所有演员都很出力，使得这些演员一个个喜笑颜开热烈鼓掌。感谢总理亲切地接见。

第二天，因为这个剧本还要作修改，电影投资大，我和厂里其他同志商量，八一厂决定暂停拍摄此剧了。同时我又将上述情况报告文化部，文化部重视总理的指示，通知各地剧团已移植这出戏的，也暂停演出。

10 多天后，周总理在他办公的西花厅召集文联和戏剧、电影方面的一些专家，负责人举行座谈，也通知我前往参加。座谈会上讨论了华东地区在京演出的《丰收之后》等三个话剧。记得陈毅副总理也参加了，座谈中肯定了《丰》剧创作和演出的成就，同时也提到不能在戏中表扬农民多献公粮的情节，应该鼓励“藏粮于民”，农民丰收了，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周总理对华东三个戏提了意见之后，又提到对《社长的女儿》的意见，并告知文化部，不要因为他说了意见就通知各地停演，应该是一面演，一面议论，推动作者去更好地修改剧本，这才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周总理看《社长的女儿》之后一系列的关心，使我们从总理的言行中，看到他锐敏深透的思想洞察力，对人循循善诱的思想作风，坚持党的“双百”方针的严肃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培育我们成长的动力。

摄制《东方红》电影的讨论会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动员了全国著名的音乐家、舞蹈家、诗人参加，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与深入细致指导下进行的。没有周总理直接关心，是很难完成的。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具体领导这一大型歌舞的创作活动，3000 名著名的舞蹈家、歌唱家、合唱团员参加了表演，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时盛况空前，后来上海、广州两地也排练演出了这个节目，仍不能满足全国各地人民的要求。于是周总理决定摄制成电影，以八一厂为主，北影、新影都参加联合摄制。1964 年底到 1965 年：月初，正在开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首次向全国人民提出我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闭幕之后，他请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著名文艺界代表、委员和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到大会堂北京厅，要求大家就如何拍好这部影片问题提意见。周总理对会上大家讲的意见，用笔记本一一记下。他在最后总结大家意见时，指出影片的样式、风格，要保持原演出的特点，又要发挥电影艺术创作的长处，而不是单纯纪实片。总理肯定了许多好的建议，要电影执行导演王莘同志有选择地斟酌。这次会上，有件事留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当时不只我一个人提出，《东方红》既表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也表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大众，这些是应该肯定的，但影片中没有表现“八一南昌起义”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一处不足。而周总理在总结时，还是说不必要增加这一场。记得当时参加会的彭真同志插话：总理呀，“八一南昌起义”是革命的历史，应当增加，不要因为是您领导的，你就谦

虚，周总理笑了笑，也不多解释，重复说，还是不要加这一场。这又使我想起了在 1961 年，周总理专门招待参加电影创作会议的同志们到香山去休息，他也和大家一起去逛香山，和大家边走边谈。我当时也趁机和他同走一段路，询问他，八一厂打算将江西话剧团演出的《八一风暴》改成电影，是否可以？他却回答说，戏已经演过了，何必再拍电影呢？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已有历史记载了，可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起义后还是想找海口，争取外援，由于敌人强大，难以实现，起义失败了。要写电影，就要写这支部队在朱老总领导下，上了井冈山，才走上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周总理这一番话，不仅反映他对党的革命事业所作贡献，表现出伟大而谦虚的品德，而且又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坚强党性原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周总理的这种崇高党性品德鼓舞下，1981 年我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时，积极支持上海电影制片厂，按照历史的面貌，创作摄制了《南昌起义》，影片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当年领导南昌起义的风采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贡献。放映后受到全国广大观众热烈欢迎，成为生动感人的历史教科书，现在每年“八一”节，许多城市多次放映这部影片。这是对伟大革命领袖的真诚的崇敬。

时隔三四十年，周恩来同志对我们的身教言教，体现着一位革命领袖坚持党性原则的高尚风范，深深地刻记在我的头脑中，成为促我前进、育我成长的巨大力量，使我永远难忘。每每想起这些往事，心潮起伏、热血沸腾，永远永远激励我继续向前，向前！

中外电影交流的推动者

罗光达

周恩来总理在 1954 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曾专电指示，要我立即乘飞机前往日内瓦，参加他宴请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并与卓氏商谈他的影片在我国发行放映问题。可是，接到电示时，离宴会只有四五天时间，那时乘飞机经苏联、捷克转日内瓦，途中就要整三天时间，在短短几天内要办理护照签证等手续，即使用最快的速度，估计也无法赶上，因此，经与文化部和电影局研究，决定改由正在捷克参加卡洛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我公司副经理杨少任同志就近前往参加，并电示他立即从布拉格直接飞往日内瓦。杨少任抵日内瓦后，周总理即面示杨代表中影公司与卓氏商谈将《大独裁者》、《摩登时代》等影片输入我国发行、放映问题，并指示中影公司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影片交流。当杨会见卓别林并提出这一建议时，卓氏答复说他所有影片的发行、放映权，已委托给他的法国代理人，因此，未获结果。

1955 年夏，我到瑞士参加洛加诺国际电影节之前，有一天在宴会上见到周总理，他当面指示我出国要广交朋友，争取多看看，并要我见到卓别林时，代表他邀请卓氏来我国访问，并通过卓氏将他的影片输入我国放映；同时要我把外国内容好的影片，设法输入我国放映；把我国的优秀影片介绍到国外去。

我国影片《鸡毛信》，参加洛加诺国际电影节正式放映，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观摩片放映，这两部影片都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与称赞。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不少国家的电影界人士，都纷纷邀请我前去访问并把他们认为好的影片给我观看。当电影节结束、我正要回国时，又接到周总理电示，要我继续留在瑞士，了解外国电影的情况并再次与卓别林商谈卓氏影片在中国发行、放映问题。经我驻瑞士大使冯铨的协助，特安排在卓氏观看我国京剧团演出时，介绍卓与我会见。卓氏虽已满头银发，但精神饱满，神采奕奕，非常友好地向我述说了 1954 年在日内瓦周总理接见和宴请他的难忘情景，并约我第三天到他家里作客。届时，我由大使馆秘书陪同前往卓氏的乡间别墅。卓氏把我们迎进客厅，向我介绍了他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对我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表示由衷的欢迎。我首先向卓氏转达了周总理的问候和访问我国的邀请，以及希望他的影片能早日与新中国电影观众见面的良好愿望。卓氏对周总理邀请他访问中国的盛情，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他向我表示，由于他当时的行动有难言之处，因此，一时无法成行，但他一再向我表示，他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争取实现访问伟大中国的愿望。关于在中国放映卓氏影片问题，由于他已将影片发行权全部委托给在巴黎的法国代理人，他已无权处理此项问题，他表示非常歉意，但他愿意将我介绍给他的代理人并从旁促成此事。同时，他邀请我观看他的新作——《一个国王在纽约》。他很谦虚地表示，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完成得很不理想，他希望能生前再拍几部影片。我和卓氏还对有关电影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在我向他告别时，他一再要我转达对周总理的敬意和问候，并预祝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繁荣昌盛。

为了实现周总理加强中外电影交流的指示，我继续在瑞士停留达四个多月之久，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卓氏代理人达成协议。在王炳南、冯铨的支持和协助下，选购了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法国影片《红与黑》

等，并与不少国家的电影界人士，商谈了影片交流问题。

为了进一步执行周总理加强中外影片交流的指示，中影公司不断加强影片输出、输入工作，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对输入卓氏影片做了不懈的努力，直到 1978 年才正式签订了卓氏的代表作《流浪汉》、《淘金记》、《大独裁者》、《舞台生涯》和《一个国王在纽约》等 12 部影片在中国的发行、放映的合同，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夙愿。从以上举出的一些具体事例，可以看出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对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是何等的重视和关心。

两位杰出人物的一次会见

向 黎

1954年7月1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见了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先生。（这年他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和平奖金”。）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活动，受到深刻的教育，增长许多见识。当时我还荣幸地承担了做记录的任务。近几天翻看当时的笔记本，重温了周总理与卓别林的谈话，感触很深，启发很大。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供广大读者参阅。

那天下午四时许，我们随周总理迎候在大门口，当卓别林偕夫人下汽车时，周总理热情地迎过去，亲切地说：“我是你的忠实观众，30多年的观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两位老朋友亲热地挽着手向大厅走去。我们几个年轻人，目睹这老友重逢般的见面，很受感动。周总理那热诚、谦逊的态度，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尊敬与钦佩之情。卓别林先生满头银发，一脸慈祥，面带笑容的长者风度，没有哪一点能引发我们联想到影片中那留着小胡子，戴着小圆帽，手中耍着一根拐棍，用八字脚走路的滑稽形象来。可是他所演的这些角色，都是替被压在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控诉资本主义罪恶的。我们都是流着泪看完这些影片的。现在，直接目睹这位银发长者——伟大艺术家的风采，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他们进入大厅，和与会者见面之后，周总理祝贺卓别林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金”时说：“你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向你致敬！”“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上，都深深感受到了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呼声……”卓别林激动地握住周总理的手，深情地望着他。周总理接着说：“从你演的无声片到最近拍的新片《杀人的喜剧》和《舞台生涯》，我们都看过了。非常赞赏！发人深思，回味无穷！”卓别林夫人也激动得热泪盈眶，紧握着身边范瑞娟的手。周总理兴奋地继续说：“在影片《大独裁者》中，你把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表演得非常精彩，叫人信服，又令人佩服！他幻想成为统治全世界的独裁者，妄想把地球当做任他玩耍的气球，摆在脚上玩……这当然也是你非凡的艺术想象所制造出来的精彩处理……。”周总理说着笑起来，卓别林也笑起来说：“可地球不是他摆弄的玩具，气球的爆炸惊醒了他的独裁梦，哈……总想征服别人，侵略别国的战争狂人，最后总是被战火把他吞噬掉，拿破仑征服了半个欧洲，他自封为统治全世界的英雄，可是最后被打死在异国土地上，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野鬼……。”他们两位越说越兴奋，我们听得入神，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前两天看过影片中的情节和人物。又听周总理说：“在观看你的一系列影片时，大家一直笑声不断，可有许多地方，人们是流着泪在笑啊！你拍的影片和所演的角色，都引起人们许多深思。”

卓别林情绪激动地说：“影片《淘金记》中很多情节都是生活中的真事。你们看我吃皮鞋吃得多香啊！在当时真是许多工人被资本家骗到矿山去，饿得把什么都吃光了，再也找不到吃的东西了，只有吃自己的皮鞋，……资本家工厂中的工人都成了会说话的机器，常是做单调的一件事，嗯，应该说每时每刻都只做同样的一个动作，不知道自己做活为什么？没有目标，生活没有目的。《摩登时代》中的那个工人，一天到晚总是在拧螺丝，这成了他的习惯动作，还控制不住地老要做那个动作，所以当他发现女人大衣上的钮扣，

就条件反射地追着去拧，看着可笑，实则可悲！可怜！那样的社会造就出了许多精神病患者啊！那些可笑的事情又是令人痛心的……悲剧和喜剧就是界限不大的，”他用手比划着：“一线之隔吧！”

周总理说：“从这几部作品中完全体会了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压榨太残酷了。”

卓别林夫人见我们几个年轻人听得入神，她亲切地抚摸着乌日娜的手臂（她是影片《草原上的人们》中女主角），我们用微笑和她默默地交流着。这时听见“开饭啦！请入席！”我们几个女同志扶着卓别林夫人一起入席了。当卓别林发现他夫人身边坐着我们几个，他微笑着指着夫人问我们：“她也有和你们一样的黑眼睛，黑的头发，是你们的同宗同族吧！一位东方夫人？！”当我们欣喜地欣赏她俊秀的面庞时，她微笑着轻声说：“我倒是真愿意是一个东方人！其实我有吉卜赛人的血统。”我们几个女同志亲热地拥抱了她好一阵。接着，用餐时，卓别林看着满桌中国特色的美味佳肴，他放下刀叉，兴致勃勃地请翻译同志教他用筷子吃菜，经过一小会儿的学习，他最终用筷子夹起了一只虾，大家为他助兴鼓掌。他兴奋地说：“1932年我发现了东方，1936年去过上海，看过梅兰芳先生的京剧，令我钦佩！还看过马连良先生的戏，真是好极了！”他说着拿起餐巾当马鞭一挥，一踮腿，真像我们戏曲中上马的动作，即席的同志们又一次为他兴奋地鼓了掌。他接着说：“你们的艺术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艺术本该是有特点，有个性的。越是民族特色浓郁的艺术，也正是人类艺术宝库催灿的瑰宝。”卓别林越说越兴奋：“你们的国家是新生的，有前途的，你们的人民很热爱生活，你们的艺术也是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因为你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西方则不同，笼罩着没落的气氛，他们自己也在恐惧，他们的艺术也表现了这一点。除了色情，就是凶杀、暴力，充塞着邪恶的东西，都染上了时代病，摩登病，一片绝望情绪。我不与好莱坞合作，他们很恼火，从各方面给我施加压力，想要我听从他们的指挥棒。资本主义不仅搞经济上的垄断，文化艺术上也要搞垄断，可是艺术品不能像工业品一样，搞统一化，标准化，我的祖父是皮鞋匠，他每做一双鞋都是新花样，做完总是要欣赏半天。因为那是他的艺术品……。”周总理微笑着赞同地点头说：“我们国家在文化艺术和学术领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繁荣文化艺术事业。”卓别林听周总理讲“双百”方针很感兴趣，他沉思着，琢磨一下，微笑着恳请翻译同志再给他细致的解释了“双百”方针的内涵。

周总理接着说：“看了你演的《舞台生涯》，我们都为那位老艺人流下了同情之泪，一位深受众多观众热爱的艺术家，他一生带给群众无限欢乐的老艺人，到了晚年竟流浪街头，最后在群众的哀悼中倒在了舞台上……，而在我们国家里老一辈的艺术家们生活得很幸福。国家不仅安排条件保证他们安度晚年，还为他们的传艺、培育新人创造条件，也保证他们各自流派的继承，发展和流传下去。”

卓别林用很欣慰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受着良好培育的幸运人们，当他看到范瑞娟时说：“中国的戏曲艺术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各个民族，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极富特色的剧种。她们算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戏吧？！”（指越剧）瑞娟微笑地点头向他致意。周总理热情地握了一下卓别林的手说：“你对我们了解得很多，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好朋友！是‘知音’。”这时大家都积极热情地要求瑞娟唱一段越剧，她爽快地答应了，唱了《梁祝哀

史》中“楼台会”的一段，做为这个会见活动的收场节目。

告别时，卓别林夫妇依依不舍地说，“感谢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多么美好、难忘的黄昏，充满友情和欢愉的夜晚，还有这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晚宴，这一切都将深藏在心灵深处的重要位置。”周总理诚恳热情地邀请他们夫妇二人再访中国时说：“热情欢迎你们再访中国！看一看解放后的新中国的新面貌！”卓别林非常激动地欣然接受了周总理的邀请。我们又跟随周总理身后，目送他们两位登车归去。

“百花”开二度、总理喜相祝

沈基宇周总理的工作那么繁忙，时间那么宝贵，但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一直精心地培育着电影之花。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电影界的人仍记忆犹新，怀念不已。如在1961年6月，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实践做了深刻的总结，对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会议上还制订了电影工作32条，决定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扩大创作题材范围，提高艺术质量。这给我国电影工作者带来极大鼓舞力量！

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当时，《大众电影》编辑部根据周总理这些重要指示的精神和群众强烈的要求，决定从1961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群众性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这是由《大众电影》主办，经由广大电影观众投票产生的群众性电影“百花奖”，又名“群众奖”。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是从1960—1961年的国产影片中评选出来的，参加评选的有11万多观众；第二届电影“百花奖”参加评选的增加到18万多观众。事实证明，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为电影工作者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揭开了新的一页，这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影片评选活动，它不仅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与文艺界的重视和支持，广大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观众也一致赞扬：电影“百花奖”办得好！

1962年5月22日，正值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前夕，《大众电影》编辑部在首都的政协礼堂，隆重地举行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和庆祝晚会。郭沫若、周扬、谢觉哉、齐燕铭、夏衍、荣高棠、陈荒煤和田方等同志参加了授奖大会，并放映了彩色影片《东进序曲》。接着，在三楼大厅里，电影工作者与全体获奖者举行热烈的联欢晚会。当时参加26届世乒锦标赛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男女健儿，也到会作了一场场具有国际水平而超乎寻常的精彩“表演赛”，给整个晚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带来了无限的美享受。

此时此刻，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特地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联欢晚会，向全体获奖者表示衷心的祝贺。他俩有时与获奖者尽情地跳舞联欢，有时坐下亲切地交谈。周总理好像对每个人都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显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顿然使整个大厅的四周气氛更加活跃起来。周总理对获奖者语重心长地说：“观众给你们的荣誉要珍惜啊！”他对这次在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琼花、获得最佳女演员的祝希娟说：“希望你很好地学习和生活，在表演艺术上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祝希娟表示：“周总理对我的希望，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希望，也是对所有青年演员的希望。总理的话使我永生难忘，也使我感到莫大的幸福。”陈毅副总理为最佳长纪录片《两种命运的决战》的奖状题词，在联欢晚会上传为佳话。

在联欢晚会上，周总理还十分亲切地向《大众电影》编辑部一些同志，详细地询问了电影“百花奖”评选的情况。他认为通过这种群众性的评选活动，对于电影工作者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要求，是一个好办法；有利于促进电影艺术的繁荣，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我们早就听说周总理很喜爱《洪湖赤卫队》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

他不但向演员学会唱这首歌，还带领群众一起唱。他对它予以高度的评价：“它把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统一起来了，这是许多歌曲所没有做到的。一般人容易把二者对立起来，其实那是不对的。”这次，他听到影片《洪湖赤卫队》获得最佳音乐奖时，就兴致勃勃赞赏地说：“这是革命抒情歌曲，王玉珍同志唱得好，‘洪湖水浪打浪’多么动听啊！”

联欢晚会结束后，《大众电影》编辑部一些同志是最后离开政协礼堂的。我们送周总理到大门口，顿然感到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倾吐，可是半晌说不出话来，我们只是说了一句：“总理辛苦了，谢谢您的关怀和支持。”当他听到我们谈起这届电影“百花奖”只是限于近两年出品的影片参加评选活动的时候，就不免感到有点惋惜地说：“我以为影片《林则徐》不错，《青春之歌》不错，《五朵金花》也不错……却没有赶上这次电影‘百花奖’的评选，总觉得有点‘不公平’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他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一边稳健地走下台阶，一边大声爽朗地笑着。他的笑声在北京初夏宁静的、温馨的夜空中飘荡着，飘荡着。这时夜阑人静，月光如水，在明月的衬托下，周总理身穿褪了色的浅灰制服的高大身影，显得多么慈祥可亲啊！当我们举手高喊一声：“再见！”时，我们再一次从心底勾起对总理的无限崇敬之情。此情此景，使我们终生难忘。

1963年举办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时，又得到周总理更多的关注。如在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统计完成、评选结果揭晓之前，当时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袁文殊同志与《大众电影》编辑部一些同志经认真研究后把评选情况和结果向周总理作了如实的全面的汇报。不久，周总理让秘书转告了他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对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选统计投票工作已顺利、圆满地完成任务，深表高兴和祝贺。他又强调指出：“通过群众性评选活动，对电影工作者听取广大观众的宝贵的意见和中肯批评，了解到观众的喜爱是什么要求是什么……既是对电影工作的热情的鼓励，也是一种有力的鞭策。因此，这种评选活动并非搞锦标主义，并非比个人的高低，而是加强了电影工作者与广大观众的联系……”当时，《大众电影》编辑部按照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再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和意见，在第二届电影“百花奖”原有规定各种奖项之外，再依照投票票数的多少，另增加了一项“荣誉奖”，其中获奖的影片有：故事片《槐树庄》，短纪录片《保卫古巴》、《在激流中》，科教片《中国武术》、《巧种多收》。

1963年5月29日，又迎来一个难忘的夜晚。这天晚上，又在首都的政协礼堂隆重地举行了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授奖和庆祝大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出席了联欢晚会，他俩亲切地接见了全体获奖者，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出席授奖大会和庆祝晚会的，还有首都文艺界负责人士和著名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工人、农民、战士、干部、学生代表2000多人。

记得，在这次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全体获奖者合影之前，有一段含意深长的插曲，至今仍令人怀念不已。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进入大厅时，大家就立即向他俩围拢过来，顿时爆发了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当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与全体获奖者合影留念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让周总理坐在前排中间。可是，周总理却不愿在中间坐下来，他恳切地说：“今天，我来为你们获奖表示祝贺的，你们是主，我是客，是你们中的一个普通观众，我不坐在中间，应让年长的坐在中间。”他让这次获得最佳戏曲片奖《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的导演杨小仲同志坐在中间；而他自己很快地走到左边前排，与这次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的张良同志坐在一起；陈毅同志见此情景，也笑呵呵地转身走到右边前排，与这次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张瑞芳同志坐在一起。周总理欣然地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了，他与大家心连心，平等地坐在一起，正是反映了他一贯所倡导的民主作风的一个真实写照。至今，从这张照片上看到他显得目光炯炯，神采照人，那深邃的眼神里，闪烁着动人的微笑，给大家带来了感染力。每个人的脸上也都泛起喜悦的微笑，这微笑表达出对党的衷心感激和不寻常的幸福感！

周总理对电影工作者一向是很关心的，经常给予亲切的教诲。例如张瑞芳同志可以说是在周总理的直接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她每拍一部影片，周总理都要认真地观看，耐心的帮助，热情的鼓励。1962年，影片《李双双》开拍，张瑞芳扮演了女主角李双双，可是当时有些人看了影片表示不满意，还随意地给它扣上“喜剧不喜”、“内容不好”的帽子。但影片《李双双》上映后，普遍地受到观众的喜爱。周总理看了影片《李双双》很兴奋，特地把张瑞芳找去说：“你拍了一部好戏！影片的内容好，艺术上也有不少可取的地方。”在授奖大会上，周总理看到张瑞芳扮演李双双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又高兴地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

周总理也向王苹的《槐树庄》获得的最佳导演奖表示祝贺，他说：“你和张瑞芳是老战友了，这次你俩老战友又一起获奖，真是难得的盛会啊！”早在1937年她们就参加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那时张瑞芳正在北京念书，参加了北京学生组织的演剧队到了南京；而王苹是随上海演剧第一队到南京的。当她们提到第一次在南京见面时，王苹说：“当时我看了你演的《放下你的鞭子》，直到今天还有深刻的印象。”张瑞芳接着说：“那时我还是一个‘新兵’哩，你已是一个文艺战士了。”1941年中国青年艺术剧社在重庆成立，她们又碰到一起，并且在话剧《家》中同台演出，张瑞芳扮演瑞珏，王苹扮演陈姨太。

周总理还对杨小仲同志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得好，有你导演的一份功劳！”杨小仲听了，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笑着。周总理还与崔嵬紧紧地握手，对他叮嘱着：“你是老导演，老演员，对年轻的要多帮助啊！”崔嵬却这样回答：“我们要互相学习！”周总理还与站立旁边的张良握手，又指着他的肩膀说：“祝贺你这次得奖，希望你继续努力！”

当时，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著名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同志是这次授奖大会的主持者。周总理见到蔡楚生就兴冲冲地问着：“你这个电影协会主席当得怎么样？通过‘百花奖’要创作出更多的各种题材、多样风格的好影片，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啊！行不行？”蔡楚生作了欣然、自信的回答：“有了正确的领导，共同的努力，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看我们的行动吧。请你下次再来参加‘百花奖’的联欢晚会！”周总理爽然地答应：“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再来参加的。”

可是，谁知道自这一次盛会以后，周总理再也没有机会来参加“百花奖”的联欢晚会了。

林彪、“四人帮”妄图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电影战线上的巨大成就，“四人帮”的一伙亲信竟倒打一耙，又硬给“百花奖”扣上什么宣扬“锦标主义”、“个人主义”等帽子，并对获奖者大肆诬陷、残酷迫害，这实际上是恶毒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历史是无情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

现在每逢《大众电影》编辑部举办一年一度的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又在我们眼前浮现出来。

今天，更是值得一提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为奖励优秀影片，表彰成绩卓著的电影和推动电影创作的发展，设立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并于1981年鸡年首次举办了这个一年一度的专业性评奖活动。从此十多年来，每次获奖后除可得到一尊高昂冠首的金鸡之外，并还得到一幅周总理亲书“闻鸡起舞”四字墨宝的立轴复制品，这是节选自1945年周副主席为叶挺将军的二公子叶正明题写的——“闻鸡起舞，要做一个革命将军的好儿子”中的“闻鸡起舞”四字。

一个偶然的时机，叶正明的夫人安琪讲出了周恩来题词的来历，陈荒煤同志知道了，把这事告诉了当时影协主办电影“金鸡奖”的同志。影协的同志们觉得用敬爱的周总理亲笔题写的“闻鸡起舞”四个字来鼓舞我国的电影工作者十分合适，又正好合奖名“金鸡奖”。于是就把这个题词借去制了版，成为后来大家都看到过的“金鸡奖”得主得到的周总理手书“闻鸡起舞”的立轴条幅。这又再次表现了我国电影工作者与周总理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啊！

周恩来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几次指示

高维进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近 20 年了。他的谆谆教诲、亲切关怀永远使人难忘。许多往事情绕梦牵，他关怀新闻纪录电影的建立和成长的事说不尽，道不完。这里记述几件感受最深的事，以表达对他的思念。

一、关心党的新闻纪录电影的建立

电影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又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花费一定财力的。因此在中国革命进程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电影事业。十年土地革命和长征，都没有留下电影资料。直到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甘宁苏区，有了较稳固的根据地，1936 年以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哈利·邓汉姆先后来陕甘苏区和延安，才得以拍摄了红军及延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情况，还有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宝贵资料素材。此后，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开始筹划电影事业。据于伶同志谈，1937 年上半年，潘汉年同志从陕北到上海后，曾提到，周恩来副主席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国共谈判之后，曾说国共合作有望，红军有可能改编，去华北前线。要他约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前去延安拍摄新闻纪录片。当时于伶准备请摄影师周达明和他一起同去延安，而周正在拍摄蔡楚生导演的《王老五》，完成后才能动身，但接着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使他们未能成行。总理这一次的期望落了空。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 年冬，在山西太原，徐肖冰同志经赵品三引荐，见到周恩来同志，提出参加八路军。周副主席说，当前解放区还不具备条件开展电影工作。电影是个很好的宣传工具，等以后形势好一点，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解放区的电影搞起来。果然，到 1938 年夏，在延安成立抗敌电影社之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在武汉邀请电影导演袁牧之，去香港购买了摄影机、放映机及胶片等电影器材，和摄影师吴印咸一起去延安拍摄纪录影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送别袁牧之和吴印咸时，周副主席和他们亲切的谈话，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抗击日本侵略军中的许多壮举，在克服物质困难中的艰苦奋斗精神，都应该用影片记录下来，以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团结教育人民。袁牧之、吴印咸二人到延安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辖下成立了电影团，开始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正式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

1940 年影片素材拍摄完毕，当时延安没有条件洗印制作，袁牧之同志携带所拍摄的素材，偕同作曲家冼星海同志去苏联进行后期制作。他们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恰好周副主席刚从苏联养病回国，从延安经这里去重庆。他在西安专门设宴欢送袁牧之和冼星海，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就是这时在西安办事处。作为党的领袖，我们早就熟悉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个传奇式人物。这次见到他，果然觉得他亲切爽朗、风度翩翩让人敬爱。他给西安办事处的人员作形势报告，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小院里，门前摆着桌子是讲台。我坐在通道边上。那时，从国民党区来的人穿便服，八路军穿灰军衣，而我的又瘦又长的绿布军装特别的显眼，可能是引起了周副主席的注意。他走过我身边时，停下来亲切地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从豫皖苏新四军六支队来，等车去延安的。他说：“啊，我还以为你是从竹沟来的呢！”这时竹沟事变才过去几个月，我想他是关心着那里的情况和同志们啊！他的讲话仔细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虽然具体内容现在

已记不起了，但他站在那里神采奕奕地一口气讲了三个钟头，观点明确、条理清晰、材料翔实、语言生动，使人听得津津有味，给人极大鼓舞和振奋的力量，渴望他长久讲下去的那种心情，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历历在目，好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这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的印象竟是那么深刻、永远难忘。

二、关心新闻电影工作者的工作

建国后，周恩来同志是政府总理，国务繁忙，但他在工作上对新闻纪录电影仍关怀备至。中央召开一些大型会议，凡有毛主席出席时他都要事先亲自检查会场上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他对新闻摄影师的位置特别注意，总要走到摆在主席台前的摄影机旁，询

问对主席台的前后左右能否拍摄周全，看看摄影机是否遮挡台下群众观看主席台的视线。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周总理来了，他从代表席的各个角度察看安放在台口的摄影机是否挡住了代表们看主席的视线。他对摄影师说，“代表们千里迢迢来开会，都想看到毛主席。他们见一次主席不容易，你们既要拍好主席的形象，又

不要挡他们的视线久了。要拍得快，拍完就把机器降下来。”工作完毕后他常常是到新闻记者们面前，道声辛苦问问拍摄得怎么样？有无遗漏重要材料。有时摄影师跟随周总理到国外访问，在飞行途中，周总理还亲自参加摄影小组研究拍摄计划的会议。告诉摄影师，力求影片能表现出被访问国家的特点。还对摄影师说，我们是大国，要平等待人。

周总理不只一次说我们的摄影师动作不够敏捷，选镜头太慢，没有外国记者那么快，使被拍摄的人非常拘束。不是你们服从人家，而要人家服从你们。有一次某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他看到外国记者身上挂着摄影机、照相机，拍摄时跑前跑后、爬上爬下，甚至躺在地上寻找好的角度，抢拍精彩的场面。他批评我们的记者，“只会摆好了拍”，“不会照活的，不是你们服从人家，而要人家服从你们。美国记者背了那么多东西，趴在地下照，你们就不敢。”周总理还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害了你们’。”我体会他的批评不仅是说我们的记者动作慢，不会抢新闻，而是提高到思想认识问题，体制问题来看。指出我们的记者有铁饭碗，大锅饭，拍好拍不好与个人利益无关，因而缺乏竞争意识，缺乏灵活性与主动性。就只会摆好了场面四平八稳地拍摄。或者只会按照事先计划好了的拍摄。不会机动灵活、独立思考，抢拍有价值、有趣味的镜头。

记得早在1952年夏，我编辑《印度文化代表团访问新中国》时，一次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代表团长潘迪特夫人，摄影师在室内拍完“会见”，就收拾机器坐等结束。周总理陪潘迪特夫人出了大厅后并未即刻送客上车，却同她往湖边漫步，摄影师一看到这情况，赶快取出摄影机去追赶。周总理走过花坛时，摘下一朵月季花，佩戴到潘迪特夫人胸前。摄影师没有赶上拍摄，我们非常遗憾。这么富有情趣又表现友好的镜头，却没有能留在电影史册上，应该说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周恩来同志对许多重要的影片，从样片、解说词到完成片，多次审看提比修改意见，像关心一个婴儿诞生一样关心影片的完成和完善。他不只对影片的解说词逐字逐句的修改。我再次领受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是编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时。那是建国前夕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徐肖冰和苏河清同志拍摄了会议的情况。我在编出样片后，

听说周副主席要来审看样片，在等待期间我写了解说词，一个晚上周副主席来到北影看故事片同时看了《新政协》的样片，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说材料还很充分，赶快录音制作吧！我们将解说词送他审查，他当晚就仔细地看过，而且逐句逐字的修改，甚至标点符号都给改正。他在拟定送审的三个片名中圈定了现在采用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的片名。在解说词上作了眉批：一处是“电影是给群众看的，一般的直称姓名，不加先生与同志为要。对话上则可根据实况加以区别。”（这是针对原文中对民主人士称先生、共产党领导人称同志而批注的。）对周副主席主持开会有一段同时声的讲话，他作了这样的眉批，“只录一个人的不好，我看只用头一句，‘现在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然后大家鼓掌。或者再加一个镜头说最后一句，‘首先请毛主席讲话’，大家又鼓掌，如此已很够。”他对全部解说词修改后还写道：我已修改过了，送请燕铭（即筹备会秘书长齐燕铭）再审阅一下，看有无错误，然后再送电影局袁牧之同志收。从这些批语中使人看出周副主席仔细、认真和谦逊的态度。当我收到批改的稿子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既感到莫大的幸福又惭愧自己的不足。当影片录制完成后，我跟随徐肖冰同志将影片送中南海请周副主席审查完成影片，由于当时那里没有座机，是从厂里带去的手提皮包机放映。试了好久，光线不好，声音忽高忽低，急得放映员满头大汗，越急越搞不好，我们忐忑不安，怕多耽误了周副主席的时间，徐肖冰前去解释，周副主席反而安慰说，别着急，慢慢来，别紧张，我今晚有时间。后来虽放映了，但声音仍不清晰，看完后周副主席说，从内容看么，可以了。他还向放映员道了辛苦，不久，周副主席到北影厂来向全厂职工讲过一次话，还特别谆谆嘱咐大家要好好学习。这次工作中使我感触特别深的是：第一，“电影是给群众看的”，“影片首先从内容着眼，从政治上考虑。”其二，要重视学习问题，自己离完成工作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再就是要学习他严肃认真、循循善诱和谦逊的态度，从摄影师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还可举几个例子。他常给摄影师说，你们要有群众观点，拍照时不要老照我，要给大家照照么！一次在遵化县建明公社，他对摄影师说，你的镜头没有转，只对着中间照，你没有照到两旁的群众，你没有群众观点。一次在上钢一厂，摄影师要拍周总理在工人食堂吃饭，他又说你们不要照我，要多照工人。一次周总理在广东新会视察农村时，他看到跟去的摄影师就问，你来干什么？摄影师说想拍些总理视察的资料。总理说我是来向人民学习的，你不要拍，你跟我一块向人民学习吧！

周总理也很关心同志们的工作条件。他看到照明同志搬几十斤重的照明灯，一再提出要改进装备，要“轻便化”，经过多年来科技人员的努力，现在可以告慰总理英灵的是我们国产的照明灯，只要一个几斤重的小手提箱就能拿走使用。摄影师大多用上16毫米无噪声同时录音的摄影机，大大减轻了体力劳动，更便于灵活机动的拍摄了。

三、关心新闻纪录电影理论建设

周恩来同志多次在谈话中涉及新闻纪录电影的基本理论问题。

记得在1953年，总理看过一些《新闻简报》后曾指出：新闻简报要“有头有尾，交待清楚”。说“中国农民看不惯外国电影那种快节奏的变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跳来跳去。”因为当时我们的《新闻简报》，每本映十分钟包括六、七个小题目，政治、经济、文化、国际新闻……内容多而分散。他怕观众跟不上影片的跳跃，看不懂。后来他又发现我们的其他影片也有受

到外国影片影响的倾向，他更明确地提出：新闻纪录片要“主题突出，交待清楚，有头有尾，层次分明”。这实际上提出的是群众观点问题，我们的电影如何从中国观众的实际出发，使中国观众能看懂。同时又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影片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的气派。也就是创造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新闻纪录电影。

记得在1963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之后，为奖励新影和八一厂参战的摄影师，文化部在新影举行授奖大会。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到新影来接见受奖的摄影师们。他亲切地询问了每个摄影同志的情况，特别对负伤的赵民俊同志身体的恢复非常关心。晚上，周恩来总理谈到他看过的几部纪录片，对其中一部曾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短纪录片奖的影片，说，“其中有几个镜头让人觉得是假的。”特别提出“如果国民党人看了会不佩服，不相信。纪录片一定要完全真实，如果有几个镜头与事实不符，会使人甚至连其他材料也不相信。有人会只攻一点，不着全面。”总理又说：“纪录片要全部用真实的材料，要么用漫画手法。”他举以前几天报道刘少奇主席从国外回来时的照片为例说“那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把郭沫若等人的头剪下来换了人，腿是画上去的，矮个子变成了高个子，瘦子变成了胖子，这是‘客里空’。”又说：“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吧！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看第二天报上发表的照片，人的位置全搬了家，当时就留下很不好的印象。这样做法我反对，照相就是照相，照相就是反映真实的，位置也不要动，这不叫自然主义，因为这不是艺术片。”这是我直接听到的一次他有关真实性的谈话。一位摄影师也说就在这之前几天，周总理曾就5月22日《人民日报》上的那张照片对新华社记者严肃地指出过：新闻照片上的人头搬来搬去，是错误的做法，是伪造照片。发稿不从政治上考虑，只从形式上考虑、不讲统一战线、不讲团结，连民主人士也不要了。你们拍照是首长路线，不要群众也不要统一战线。这次机场欢迎，请了一些女同志，发一个满堂红多好，可是请出来了，都被剪掉了，你们要好好听完这些问题。”关于真实性问题，早在1958年“大跃进”中浮夸风泛滥时，他在看过宽银幕纪录片《祖国颂》时就曾批评过这方面的问题。指出：“新闻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人民才能起宣传教育作用。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不能脱离历史，弄虚作假，不能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新闻片要真实、自然。各新闻单位要讨论一下，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美，是不是穿得漂亮就是美了，什么是典型！新闻片应该从生活中选择典型的東西，而不能塑造。”不久，他又讲道：“电影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

周总理如上一些意见都是切中新闻纪录电影要害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诸如新闻纪录电影的特性、作用和美学观点；新闻纪录电影与时代、与群众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到现在仍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因为这些方面的问题仍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中，特别是影片如何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如何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等问题，现在也未完全解决。重温周总理这些教导，不仅有助于提高影片的质量，也可以加强新闻纪录电影的理论建树。为了使新闻纪录电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应该不辜负周总理的关心和期望，把他的教导坚决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纪录电影而努力。

用心血浇灌新闻电影之花的人

徐肖冰

作为大半辈子都在搞新闻纪录电影的一名战士来说，我亲眼看到了这项事业怎样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也亲眼看到了周恩来总理怎样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这个事业当中。

我们的新闻电影事业之所以有今天，是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胜利地领导了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深切关怀分不开的。

1937年，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在政治上还是非常幼稚的。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明白的，这个军队跟别的军队不一样，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因此，一心想参加八路军，跟他们拍电影。我找到驻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久他们让我去见一位领导同志，我一见到他，就被他那英姿勃勃、神采奕奕、热情如火、意志如钢的革命精神所感奋。没有想到，我见到的这位领导同志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当时非常亲切地问我：“搞了几年摄影工作？从上海到北方，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没有？”当我要求参加革命队伍搞电影时，他鼓励说：“革命队伍是艰苦的，但是工作的意义很伟大，因为这是人民的事业。人民需要电影。”他的谈话真是语重心长、感人肺腑。就是这次谈话，更加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决心。也就是这次谈话，使我对拍电影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我只把它当作“混饭吃”的一种手艺，这时才认识到它是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方面，从而确立了我为人民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就在这一年的10月，周副主席把我送往革命圣地延安。到了延安，我就幸福地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是在一个北风凛冽的上午，主席给从蒋管区来的知识青年讲大课。在露天里，毛主席穿着一件破旧的棉大衣，冒着寒风，讲得有声有色，那有力的手势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使我们完全忘掉了寒冷。毛主席讲的马列主义，通俗易懂，深刻生动。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当时非常激动地拍下了这些镜头。

周副主席十分关怀革命电影事业的发展。1938年，他在武汉紧张复杂的斗争中，仍继续为筹备人民的电影事业操劳。在他的关切和教育下，又有一批电影工作者来到延安。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终于在山沟里办起了八路军总政治部所属的延安电影团。这就是人民电影事业最初的萌芽。不久，敬爱的周副主席从武汉回到延安。有一次日寇突然袭击延安，疯狂轰炸。我们电影团的住房中了炸弹，墙倒屋塌，烟火弥漫。我当时被埋在瓦砾之下，刚钻出来，就看到周副主席已经站在那里，他是专门来看望我们的。周副主席亲自用手帮我拍去身上的灰土，非常关切地问道：“伤了没有？去找医生看看，检查一下身体。这次轰炸仅仅是开始，但它算不得什么。你们搞电影的要到前方，拍摄我们的军队英勇抗战的场面，去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那比现在挨几颗炸弹要残酷得多、激烈得多！”现在，这些殷切教导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就在接受了这次战火的考验之后，延安电影团迈开坚定的步伐，走向抗战的前方。

40年代初，蒋介石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并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封锁。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光辉思想，边区开

展了大生产运动。 1943年，我们拍摄了南泥湾开荒生产的纪录片。毛主席亲自为影片题了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印出了拷贝，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放映时，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地看了这部影片。当我们向副主席汇报如何在窑洞里用土办法制成这部影片时，周副主席赞扬我们自力更生的精神，指示我们一定要让广大工农兵看到这部片子，并且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召开，毛主席在这个座谈会上所作的光辉讲话已经发表，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思想深入人心。遵照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方向和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赶着小毛驴、驮着放映机和片子，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走遍延河两岸。我们所到之处，倍受欢迎。英雄的延安儿女对初生的人民电影满腔热情，对这部影片有鼓励、有建议、有嘱托，那种热爱自己电影事业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这一年的秋天，我们又给周副主席送去一份拍摄影片的提纲，副主席不但向我们提出书面指示，并约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他的屋子陈设非常简朴。他让我坐在他旁边，亲切地讲：“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在讲到“人民”和“领袖”这四个字时，他特地加重了语气，还反复向我强调了这两者的血肉联系。周副主席又说：“你们还要努力拍好八路军，要反映革命部队英勇抗战的业绩，也要反映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表现军民团结。”这些指示，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形势有了极大的发展。1945年，我们到了东北，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开辟了第一个基地，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就是今天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我们拍摄了《民主东北》，送到关内，请中央审查。周副主席亲自看了这部片子，特地拍电报鼓励我们，同时指示我们要用电影来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服务。 1948年，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随军进关，解放北平后，我们接管了中电三厂，为人民电影事业开辟了第二个基地，成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就是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至今我还深深记得，党中央从西柏坡迁来北京时，我们兴高采烈地在西郊机场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的、久经考验的战友周副主席的情景。那一天，机场上人山人海，广大群众和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都来欢迎自己的领袖。周副主席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我们，高兴地跟我们打招呼，又特地接见了我们，问我们工作和学习得怎么样，还亲切地同我们一起照了相。从这里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对电影事业多么关心，对电影工作者多么热情！

建国以来，周总理日理万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不知疲倦地工作，连睡眠的时间都很难保证。尽管是这样，总理还是经常直接地关怀我们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1959年，总理亲自力我们确定题材，让我们去拍广东东江人民战胜洪水的斗争，并亲自命题为《人定胜天》。总理还多次来我厂看工作样片，对于我们的劳动，总是给予亲切的慰问；对于我们的优点、成绩，总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总是给予耐心的教育；对于我们的思想改造，总是提出严格的要求。有好些影片总理亲自替我们把政策关、路线关；甚至还为我们修改提纲、解说词，连错了的标点符号也一一纠正。总理这种一丝不苟的革命责任心和充沛的工作精力，使我们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感动！但是，最使人感动和钦佩的，也

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周总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总理一贯指示我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镜头，同时又要爱护毛主席的身体，灯光不能太强，拍摄时不要影响主席的活动。总理说：“一定要多拍毛主席的活动，因为这是人类宝贵的历史资料，是我党的珍贵财富，是教育人民的极好教材。”为了拍好毛主席的镜头，只要周总理在场，他总是尽力为我们创造方便条件，有时还亲自为我们调度场面，成了我们的导演。现在，每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毛主席的宝贵镜头时，常常深深地怀念周总理，这里面蕴含着总理多少感人至深的辛勤劳动啊！

周总理从来都是唯恐我们把毛主席的镜头拍少了；相反，对于他自己，则从来都是唯恐我们拍多了。每当我们拍总理到工厂、农村和部队视察时，总理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我们；“少拍我，多拍其他领导同志，多拍人民群众！”有时候，我们在拍总理时，他就向我们摆手势，并指向群众，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少拍他，多拍群众！

总理处处对我们爱护，有一件事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前沿，以前是没有栏杆的。那时候要拍主席台正面的镜头，摄影人员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也很不安全。有一次，我正在城楼侧身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总理一把攥住了我的衣襟，怕我摔下去。由于总理的关怀和指示，城楼从此安装了卫护栏杆。

周总理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的人民电影事业，如今已经化作春花和芳草，正呈现出一片繁茂的生机。周总理的教诲将永远鼓舞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

珍藏心间的亲切教诲

石益民

敬爱的周总理对党的电影事业的关心，对电影工作者的爱护，一直倍受人们称道。无论是环境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电影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离不开周总理的关怀，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几十年的摄影工作，使我有机会聆听过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因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194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我随第四野战军拍完了辽沈、平津战役的纪录片后，接着又拍摄解放军进北平的入城式。还来不及洗去满身的硝烟，顾不得脱去饱浸着火药味的棉军衣，又接到新的任务：毛主席、党中央从西柏坡来到了北平。主席、周副主席将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我们将拍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阅兵场面。

3月25日清晨，天空特别晴朗，我们很早就到了北平西苑机场。电影局袁牧之局长亲自布置任务说：“这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一定要把镜头拍好。”我们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上午10点钟毛主席、周副主席坐吉普车检阅了部队。阅兵结束后，主席、周副主席走下了吉普车，亲切地和我们几个摄影的同志一一握了手，合影留念。我们先和主席合影后，周副主席又把我拉在身边一道合影。虽是初春时节，我却感到分外温暖。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我在北京又见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此时此刻我也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为了拍下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镜头，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下。今天，可以告慰他们了，我们迎接了胜利。胜利后，我们将开创新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们几位普普通通电影摄影师的合影，不正说明对我的信任，关怀和期望吗！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中国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晚会，招待与会的各国及地区的代表、中外新闻记者。

周总理作为中国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亲自参加了晚会。当乐队奏起欢快的乐曲，各国来宾们翩翩起舞的时候，我还在抢拍一些镜头。突然，我发现周总理已经站在身旁，总理亲切地嘱咐道：“工作了一整天，摄影机又很重，很累了，可要注意休息。”

望着年已半百的周总理不顾自己的疲劳，却来关心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名普通的新闻摄影记者，我不知如何用语言来表达我激动的心情。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周总理那亲切的笑容、暖人的话语。

1955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人民群众一起欢庆节日的场面。

10月1日上午10点钟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济济一堂。为了拍好这一组镜头，我拿着摄影机，身子探在城楼上栏杆外面，选好角度拍了起来。周总理看到后，让秘书来对我说：“总理要你又要拍好镜头，又要注意安全。”我只顾上说了一句：“请总理放心。”又继续拍了起来。周总理的话，使我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浑身是劲，最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敬爱的周总理不但对我们摄影记者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对许多具体工作做了具体指示。

那是1952年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与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

人，也有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在拍摄过程中，周总理要身边

的新闻秘书过来转达了几句话：“不要只拍我们，要多拍民主人士，不要忘了统一战线。”

周总理的指示，使我及时领悟了其中的重要意义，提高了我对党的政策的认识，我便急忙把场内的各界人士摄入了镜头，避免了拍摄工作中的不足。

周总理和新闻电影

葛 娴

周总理和新闻纪录电影的关系、非常密切，又非同寻常。这是我在访问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时候，一些曾经跟随总理工作多年的新闻摄影师，共同表达的一种幸福心情。

亲自筹建第一支电影队伍

早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周副主席就亲自筹建了我们党第一支新闻电影队伍，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同志就是最早的电影队伍成员。后来，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立了电影团，以后周副主席又把钱筱璋、程默等在大后方的好几位同志调到延安，扩大了电影队伍。电影团成立后，着手拍摄一部题名《延安与八路军》大型纪录片（该片因其他原因而未完成），并拍摄了有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题字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南泥湾》。影片在杨家岭放映时，周副主席很高兴地去看，并鼓励他们：走遍陕甘宁把影片送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些情景，摄影师现在谈起来还记忆犹新。徐肖冰同志拿出他深藏多年的一份珍贵资料来。那是1944年，总理为发展电影等文化事业给他和吴印咸同志的一封信。信是用粗糙的黄纸写的，虽然旧了，但总理那刚劲有力的毛笔字仍跃然纸上。这是他在拍摄另一部影片之前，送给总理一份关于拍摄影片的提纲后，周副主席作的书面指示。全国解放以后，周副主席对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对电影队伍的培养，更是费尽了心血，一些老摄影师谈起来心情就非常激动。

拍工人 别拍我

周总理常常对摄影师说：群众场面要多拍，我的场面要少拍。有时，当摄影师想拍总理的时候，总理马上就向摄影师摆手势，并指向群众。可是摄影师却唯恐总理的活动拍少了。有一次，总理到三门峡视察，摄影师得知后，想拍摄一部总理和三门峡工人在一起的影片，就不让总理知道，偷偷地坐火车跟了去。当总理见到他们并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后，就很生气，说：你们要拍别拍我，动人场面在下头，赶快到三门峡工地去拍工人。摄影师只好照总理的意思去做。晚上回到住地，总理把他们找去，询问拍摄的经过，又交代了下一步怎么拍，都是讲的拍群众。第二天，总理又步行到工地视察，摄影师想拍总理，他还是说：别拍我，拍工人。弄得摄影师没有办法。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还是抢拍下了总理和三门峡工人在一起的几个有意义的镜头。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摄影师们都感到，除非是国事安排，总理的活动特别难拍。

要爱护毛主席的健康

摄影灯具改革前，在拍摄人物照射时，光源对人体和眼睛有伤害。摄影师出于对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总想多拍主席。周总理怕光源伤害主席的健康，每次都事先亲自叮嘱摄影师，照的时间不要过长，不要把灯光正面直照毛主席，刺着主席的眼睛，并亲自为摄影师选择角度。他不仅多次要求摄影师想办法，把摄影灯光的有害光源滤掉，而且还为这事专门召开会议，亲自抓到底。经过许多部门的协作和努力，终于在1974年12月研制成功了一种叫DS—8型无害新闻照明灯，用这种灯，在相距人体三米处，可以允许照射几十分钟无伤害。而在实际工作中，每次照明一般都不超过三分钟。现在用的就是这种灯，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在灯具改革的试验过程中，

总理一再关照摄影师：用试验灯光照我，试验好了再照主席。

轻便化 割“尾巴”

摄影师拍影片时，要背着笨重的摄影机、电瓶和胶片包，共 17.5 公斤的器材，负担很重，体力消耗大，尤其是女摄影师，工作更吃力，遇到赶拍紧急镜头时，总是弄得满身大汗，而且机子响声大，干扰别人。1963 年底，摄影师跟随总理出访亚非欧 14 国的时候，就是带的这种摄影机。总理问女摄影师舒士俊：带这么个大东西呀，多少重？他扛起来掂掂分量后，指示摄影师要改革。到非洲时气温高达四十度，摄影师扛着笨重的摄影机，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总理说：你们的西服都成“水服”了。他总是让自己的医护人员注意摄影师的健康，加意护理。在回国的时候，总理把摄影师调到他的飞机上来，专门谈了摄影机械的轻便化问题。总理说：以后出国不要再用 35 毫米胶片的片子了，国际上已经不用这么笨重的机器。同时他详细询问了摄影师需要什么器材，包括洗印等全套设备要多少钱，当时就批了十多万美金的需用款。摄影师对总理的亲切关怀非常感动，永志不忘。现在他们出国用的已是 16 毫米摄影、电视两用的摄影机。但国内使用的摄影机由于后来“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至今尚待改革。

摄影照明设备中，原来拖了老长的一条电线“尾巴”，照明到那里，电线就拖到那里。每次工作时一套笨重的设备要装满一大卡车，不得不提前半天到现场作准备。也是周总理多次让改进，总理把这叫做割“尾巴”。在总理的关怀下，笨重的设备一次次的改进，最后连“尾巴”也割掉了。改革以后的照明设备，一个人背着就能工作，轻便灵活，减轻了体力消耗，提高了工作效率。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总理对摄影师常常谈到新闻摄影要真实，力戒吹嘘、浮夸、片面。有一次，摄影记者在机场拍摄一张合影照片，见报时第一排有的人物被剪去拼贴在第二排上去了。剪贴的时候又把一位民主人士和几位女同志漏掉了。总理看了很生气，第二天摄影师到人民大会堂工作的时候，总理拿出这张报纸，指着照片要他们看：这不是叫人头搬家吗？并严肃指出宣传报道不要群众，也不要统一战线，把人物搬来搬去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总理说：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不允许弄虚作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他要求摄影师就这件事回去转达，共同吸取教训做好工作。总理忙于国家大事，有几次他还利用夜间片刻时间到新影厂审看影片，深夜看完影片后，又把解说词带回去连夜修改。有一次一位同志制作影片时，由于缺少知识，把《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影片上的地图少画了一个“点”，总理审片子时看出来，便严肃地指出：少了这个“点”，就把祖国的领土给人家了。由于总理的审查细致，纠正了一次政治错误。有时，总理把摄影师找到他那里去，叫坐在他身边，一边看影片，一边说意见，使摄影师深受教育。

一丝不苟

摄影师有一次看见陈毅副总理陪同总理接见外宾，当时陈老总因脚病，穿了双球鞋。总理看见了，对他说：陈毅同志，你是外交部长，穿球鞋见外宾不礼貌。陈毅同志说：我脚疼。总理说，脚疼也要忍耐点。陈毅同志接受了总理的意见。摄影师们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深知总理作风十分严细，他们在见总理的时候，事先都要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有，包括鞋袜穿戴，连风纪扣都要扣好，不让总理操心。总理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在出访亚非欧 14 国时，总理和摄影师在飞机上一起研究拍摄提纲，成立新闻组，总理鼓励摄影师庄唯大胆主持小组工作，并说：我也是你们小组的一员，我们一起研究。后来到达非洲一个国家时，摄影师见总理因劳累过度，身体不适，一次在研究摄影报道工作时就没有去麻烦总理。那知会开了一半，总理来了，就批评他们说：我不是说好了是你们小组成员嘛，开会怎么不通知我。大家对总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都很感动。

摄影师跟随总理工作，事先总理都要为他们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并亲自作细致安排。每逢节日有庆祝活动的头晚，总理就带着摄影师一块到天安门城楼去布置工作。有一次总理把摄影师牟森带上天安门城楼，问他：明天你站在那个位置拍，怎么拍。牟森说：我就站在这个边上。总理说，那不行，你这个位置既挡了领袖看群众，也挡了群众看领袖。便亲自给他选最好的角度。总理又怕各新闻单位摄影记者一哄而上抢拍镜头，挡了场面，又为各家记者做了仔细安排。摄影师都说：凡是总理过问的事，我们完成任务都有底，在总理身边工作，感到温暖亲切，劲使不完。

关 怀

1964 年初，摄影师跟随总理出访亚非欧 14 国安全胜利归来，总理很高兴，要同出访人员连同他们的爱人孩子一块聚餐，虽是普通的饭菜，却体现了总理的一片心意。席间，总理走到新闻摄影记者的桌前来，却发现他们没有带家属来。总理就问：你们的爱人孩子怎么都没有来？记者说没有这样的通知。当时总理很生气，马上把有关人员找来，批评说：领导人员可以带家属，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的老婆孩子为什么不能来？你们不要只看到首长，记者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工作可以分工不同，但任务是一个。我历来反对三六九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分三六九等。一席话使摄影人员很感动，也很受教育。还有一次摄影师跟随总理工作，从云南回到北京机场时已是下午一点了，机场餐厅只摆了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两副餐具。但总理一定要摄影师一块吃饭，摄影师饿着肚子正要跨上汽车回家，听见总理叫吃饭，就一个个高兴地走来。陈老总说，快来快来，你们再不来，总理要“罢吃”了。可见总理对摄影师多么关怀体贴。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每当工作结束后，总理都要亲切地向摄影师致意：同志们辛苦了！秀才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并一个个握手告别。摄影师韩德福有一次工作中被车撞伤，总理见了马上把他扶到自己车上，并亲自打电话给有关负责人照顾他，使他感动得落泪。徐肖冰同志谈起有一件事终生难忘：现在天安门城楼的前沿栏杆以往是没有的，那时摄影记者拍主席台正面镜头非常困难而且又不安全。有一次他正在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总理拉住了他的衣襟，怕他摔下去。为了摄影记者们的安全，在总理的指示下，天安门城楼前沿才有了栏杆。

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

1975 年 7 月，总理已经病危，摄影师牟森等同志在医院参加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的拍摄任务完成以后，请总理再同他们合照个相。总理说：咱们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总理说话很轻。大家见到总理慈祥的面容日益消瘦下来，下陷的眼眶内含着泪水，心里都非常难过。但此刻谁也不相信总理的话会是真的，可总理重复着又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谁料事情竟真如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总理！一些老摄影师回想 30 年前，和总理合照的第一张相片，仍然宛如昨日。那是刚解放时，党中央从西柏坡搬来北京，徐肖冰、刘德源、石益民等一些摄影师兴致勃勃地到机场去迎接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

领导同志进城。总理从拥挤的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他们，走过来亲切地向他们打招呼，问长问短，紧紧地拥抱他们，就在机场同他们一起照了相。时光流逝，今天，总理已经不在了，但总理的光辉永远激励新影厂的摄影师们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奋勇向前。

难忘的往事

陈凯初

作为一个新闻纪录电影的摄影师，从青年时代起，我经历过许多事，结识过许多人，但是最使我难忘的却是拍摄周恩来总理时，那感人的往事。至今，虽然已过去了20多年，可周总理那平易近人的风度，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仍旧经常萦绕在我的心中。

1965年，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周总理和陈毅外长陪同奈温总统去昆明访问。我和女摄影师陈锦俦随团采访，当时随团采访的还有新华社及中央台等单位的记者。云南省外办安排所有记者乘坐一辆面包车，记者们业务不同，有的要始终随团活动，有的则要用车去发报或打电话发稿。大家对只有一辆车颇有微词。因为是面包车，活动时又总是排在车队的最后，摄影记者们都不高

兴。

那天，代表团到昆明大观楼游览，所有小车都直接驶进门去，单单把记者坐的面包车挡住，理由是除了小车，任何车辆不准开进门内。为了不影响采访，我们只好下车，跑步去追赶车队。到达湖边时，代表团早已上了船，总理说：“好了，记者们都到了，开船吧。”我们在船上安定了下来，开始了拍摄工作。这时，陈老总指着陈锦俦问总理：“这个小陈的爱人是谁？”总理说：“你怎么忘了？1956年随我们去参加日内瓦会议拍电影的记者，叫龙庆云。”陈老总说：“总理的记忆真好。”

游艇在湖上游览一周后靠岸停泊。这时，我看到所有的车辆已经排列在岸边，只是没有面包车。我立即向礼宾官打听，下一个节目去哪里？答复是：上午回宾馆吃饭，下午再访问别的地方。我松了一口气，对陈锦俦说：“上午没事了，我们慢慢走吧。”准备到大门外去坐车。这时，我看到插有中、缅两国国旗的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以为总理他们已回宾馆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辆汽车轻轻的煞车声，接着，听到一句问话：“小陈，你们的车呢？”我以为是礼宾司的同志因事落后了，顺便才问我们一声，当时正有些不高兴的我就头也没回，抢先答道：“还车呢？老远哩，在大门外边。”“那，快上我的车吧！”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是周总理让车子停下了，要我们上他的车，这便怎么好！我急忙说：“总理，我们有车。”“决上吧，不要耽搁时间。”总理和蔼地说。这时，后面一辆空车驶来，是云南省外办的备用车。一位同志告诉总理，有车在这里，就把我们拉上车开走了。

也是在1965年，李宗仁先生回国时，周总理、陈毅外长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去迎接，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当时，接待厅里没有空调设备，虽然有一两台电风扇，但因为人多，大家都汗流浃背。我们身上挎着摄影机、电瓶和胶片包，衣服都湿透了。这时，有两位服务员走来，给领导同志送毛巾擦汗。当送给总理时，总理没有接。他向站在一旁的记者们指着说：“同志呀，你看看他们多么辛苦，为什么先给我毛巾呢？”总理的一句话，使我们一下子精神振奋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了。

有一年冬天，周总理、陈老总在广州机场送别了一个外国代表团，准备返京。我和陈锦俦也登上了专机，跟着回来，机舱里一共有七名记者，大家完成了任务，觉得很轻松。这时，空中小姐端着一小碟荔枝，一共十来颗，对我们轻轻地说：“同志们，请大家帮个忙好吗？”我们都问什么事？她说：

“飞机上一共只有这几颗荔枝，是陶铸同志叫送给总理吃的。一会儿我给总理送去，他一定会来请大家一起吃。这样，一人一颗也不够，大家帮忙说一句，都吃过了，周总理就会吃了。不过，我保证给大家先送香蕉来。”我们都笑着说：“一定帮忙。”等我们吃完了香蕉，服务员把荔枝送到总理的小间里去，不一会儿，总理亲自端着那碟荔枝走来，对大家说：“同志们，来吃荔枝。”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总理，我们吃过了。”总理又问了一句：“都吃过啦？”我们说：“真的刚

吃过。”总理连声说好，回到他的小间去了。

飞机临近北京时，时针已过了12点，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走过来，对大家说，“有件事要请大家原谅。飞机大约12点半到达北京，机场给总理、陈老总预备了午餐，来不及准备更多的饭了。不过，我们已经给各位的单位发了电报，同志们下飞机后，单位

的汽车也到了，回家就可以吃饭，实在对不起。”我们听说有车来接，又不很晚，都说很周到，没有事的。

飞机着陆后，我因为带的设备多，在后面走出机舱。这时，远远看到厂里的司机小王在车旁向我们招手，心里很高兴。低头望

去，只见周总理，陈老总在舷梯旁同记者一一握手，大家都对总理说再见。我向下走着，听到总理一边握手，一边数着“一个，两

个，三个……”轮到我，我也说，“总理再见。”总理点点头，说“七个。”我很纳闷，总理为什么要数数呢？

上了车，小王边开车边说，“打来了电报，已经通知你们家里准备了饭，到家就可以吃饭了。”正说着，后面一辆汽车按着喇叭追来，又是成元功走过来。“大家快回去，总理不高兴了，一定要大家一起吃饭。”我们说，“不是说好了回家吃的吗？”“快回去罢，不要耽搁总理的时间了。”我们只得赶紧调头。走进机场的小餐厅时，看到周总理和陈老总坐在餐桌边，桌上有面条、米饭和三、四个菜碟，摆了好几副碗筷，杯箸未动。看到我们进来，总理高兴了，说“同志们，快坐下来吃饭。”我们坐下时，总理又数了一遍，“一个，两个，三个……七个，到齐了，吃吧。”

1966年3月7日晚上，家里的电灯突然剧烈摇摆起来，我预感到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可能会有任务。清晨，我和任福堂同志坐上空军的专机，飞向石家庄，是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中午，周总理和曾山同志乘坐的专机到达石家庄。于是，我们又忙碌起来，不停地拍摄总理听取汇报、观察地图、下达指示等内容。天慢慢地黑了下來，周总理提出要马上去察看灾情。任福堂同志和我急忙向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请求派车跟总理一起去。林铁同志请示总理说，打算派五辆吉普车下去。总理立即说：“现在救灾要紧，派那么多车做什么？”林铁同志说：“那就派三辆，地震后道路不好，一辆车前面探路警卫，一辆总理用，一辆给记者。”总理却说：“记者可以明天去嘛，也用不着警卫。现在一切车辆都要用来救灾，只要一辆吉普车就可以了，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又要求林铁同志无论如何得给我们记者一辆车。林铁说：“周总理决定了，我也不好再说话了。”那天晚上，我们没去成，也一夜没睡觉。

第二天一清早，周总理又忙着要直升飞机视察灾情。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了。我们商量好，任福堂上总理的飞机，我奔向曾部长的飞

机。飞机的螺旋桨正在转动，任福堂急忙跑来，拍着我身边的玻璃窗大叫：“记住，马兰！”我明白了，他没能上总理的飞机，而马兰是总理要去的地方。我只好先拿起摄影机在空中拍摄灾情。当飞机在一个村子降落时，我急忙拍摄了几个曾山同志视察灾情的镜头，然后对曾部长说，我得走了，要去找周总理。曾部长嘱咐说“你怎么找呀？注意安全啊！”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军用帐篷，奔了过去：“我是记者，请问这里谁是首长？可否单独讲几句话？”“我是参谋长，有什么事？”我轻轻地对他说：“周总理来了。”他精神一振：“在哪里？”“正在天上，要去马兰，你有地图吗？”他翻开地图说：“有两个马兰，一个南，一个北。”“哪个灾情重？”“北马兰灾情最重。”“你有车吗？”“只有一辆吉普，还有许多事要用。”“送我去北马兰，马上让车子回来。”参谋长告诉司机，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快到马兰时，看到一架直升飞机正缓缓降落。我跳下车，对着飞机转动了摄影机。周总理下了飞机，地面上一片废墟。总理终于找到了一个木箱，登了上去，对慢慢围上来的群众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毛主席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在严重的灾害面前重建家园，去争取胜利……”当周总理走下木箱，向人群走去时，一位妇女拉住周总理的衣袖跪了下去，哭了起来，总理连声说，不要这样，不要难过。人们认出了周总理，纷纷拥上前来，拼命去拉总理的手，我被挤倒了，人们把总理护送到直升飞机上。这是总理视察过的地方，我留了下来。一个星期后，任福堂同志在马兰找到了我。

“要多拍战士”

张世鸿

1964年5月20日下午，在解放军某部的营门前，罗瑞卿大将像班长一样下达整队口令，不到一个班的“战士”，为首的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站在他后面的是张南生中将与滕海清中将等，他们随着罗总长的口令，认真列队。将军们精神焕发，脸上还带着迎宾的激动。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彭真同志、陈毅元帅、贺龙元帅都来了。罗总长上前报告并陪同周总理步入表演场，顿时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周总理微笑着，显露出对参观军事表演的浓厚兴趣。表演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四名战士，他们随着指挥员的口令，“叭、叭、叭”的枪声像爆豆似的响彻原野。周总理举着望远镜，一面观看一面兴奋地说：“打着了，看，都打到一个地方了。”靶场上突然静了下来，160发子弹在单发急速射的4名战士手中，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打了出去，并命中了159发。表演的战士快速跑步，各自扛着被自己射中的靶子请首长核验，周总理看着密密麻麻的弹着点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并亲切地向战士握手祝贺。我作为八一厂的摄影师，把这些精彩场面都摄入了镜头。

侦察兵搜索“敌人”的表演扣人心弦，六米多高的楼房不用任何器材，只靠四肢紧夹墙角，两脚蹬着砖缝，硬是往上爬去。坐在下面参观的中央首长，被战士的顽强斗志所吸引，都站了起来关切地注视每一个动作。快到屋顶了，突然一个战士纵身跃起，一把抓往屋檐上固定电线的瓷瓶，翻身上屋，就在这几十米的人形屋顶与“敌”遭遇，展开一场惊险的搏斗，不一会儿，战士制服了“敌人”并把他捆好，用绳索从屋顶上押解下来。周总理对这些能飞檐走壁的战士报以了热烈的鼓掌。

周总理参观了几个项目的表演兴趣更浓了，他和彭真同志以及陈、贺二位元帅索性来到表演场中，近看几位表演的战士，他们没有发出震耳的声音，也没有汽车兵飞越铁轨桥的惊人动作，只靠两只手的军械员，无声地分解着武器，眨眼间又把它一件件地组合起来。这种功夫依靠对武器的熟悉也不算难。如果，带着厚厚的眼罩模拟着漆黑的夜间，把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零件全拆散，使其混搅在一起，然后又分别组合起来，这就不能说是不难了，周总理看着他们麻利的动作，便蹲在战士的跟前仔细地察看他们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有的武器零件小得如火柴棒一样，但是由于军械员们对本职业的精熟程度，凭一双灵巧的手，只花了三分多种，就使三种武器分毫不差地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周总理看了这种景象爽朗地笑着对身边的罗总长说：“每个战士都应该学会这种本领。”

当每个节目表演完毕，周总理都要和表演的干部、战士握手交谈，就在周总理有力的握手和战士亲切交谈的同时，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说：“要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并指着战士对我说：“要多拍战士。”“要多拍战士”这句普通的话包含着总理对战士多么深切的关怀！也给部队摄影工作指出了鲜明的方向。战士是部队的主体，反映好战士的形象，是我们最有意义的工作。如何表现好战士的阳刚之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是我们永恒的主题，多少年来我无论是在拍摄《钢铁长城》还是拍摄《国庆阅兵》的大型纪录片中，“要多拍战士”的亲切教诲总在我脑海里闪烁着，我要让我们的战士形象永远在银幕上光彩照人。

周总理这次视察部队训练的实况，编辑在八一厂当年的纪录片《要把兵练成这个样子》中。

我们得到总理具体细致的指导

张 永

50年代，我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曾在中央摄影队、中南海摄影科工作5年，并随周总理访问了东南亚和东欧的11个国家，与周总理接触较多。周总理对待普通工作人员满腔热忱，遇事替工作人员着想。每当有拍摄任务时，周总理担心我们完不成任务，总是为我们提供和创造良好的机会。如拍摄与外宾握手，接受献花等节奏快，环境又比较乱的场面时，周总理部给予摄影记者默契的配合。当我们圆满完成拍摄任务时，从心里感激周总理的亲切和党的温暖。

“要提高技术”

1951年春天，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住处接见外宾，我在现场拍摄。周总理和外宾谈得十分融洽，说说笑笑特别高兴。友好的气氛和欢快的情绪吸引了我，拍的镜头多了些，当时总理没有说什么，送走外宾后，周总理笑着对我说：“怎么拍那么多？”我回答说，回去还要剪裁，总理风趣地说：“原来是没有把握。”随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讲：“要提高技术嘛。”

提高技术。只有提高技术，才能做好工作，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牢记周总理的教导把“要提高技术”这句话做为自已工作的准则和前进的动力，鼓励和鞭策我做一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

“要多拍民主人士”

1954年9月，举国瞩目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云集了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及各界代表，这次大会要选举国家主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我国各民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荣幸地参加了拍摄大会纪录片的工作。摄制组领导考虑到我在中南海摄影科工作，和中央首长接触较多，就分配我主要拍摄大会主席台上的活动。事先周总理曾嘱咐我们，不要只拍我们党的几位领导人，要注意多拍民主人士。会议进行中，一位民主人士发言，因为我事先已拿到讲话稿，知道他的发言较长，就没有及时拍，想选择最佳情绪时再拍。这时周总理叫工作人员送来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发言为什么不拍？”于是我马上拍下了这位民主人士发言的镜头。

事后，我想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还关心着我们影片每个具体镜头的拍摄。这是周总理对电影事业的关怀，同时，也体现了周总理与民主人士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坦荡胸怀。

“要多拍群众”

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我和孔令锋同志做为摄影记者随同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等11国。新中国的威望，周总理卓越的外交才能，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风度，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周总理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

1957年1月27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拉提士尔，周总理在当地官员陪同下，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300年前建筑的国王宫殿。拉提士尔人民争睹新中国总理的风采，无数群众涌到现场热烈欢呼，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和欢迎。当时我与孔令锋同志做了分工，我拍总理，他拍群众场面。周总理戴着花环，满面笑容，不断向群众招手致意，我赶紧把这些

动人的场面一一拍了下来。周总理见我总是把镜头对着他，一再对我说：“拍群众”，“多拍群众！”

周总理最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此次出访，进一步加深了与各国人民群众之间的友谊。在印度，与当地群众联欢；在尼泊尔，资助孤儿院；在巴基斯坦，救济贫困工人；在锡兰喝群众送的椰子水……，这许多动人的场面，不但留在电影胶片上，更是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要注意休息”

这次出国访问，时间短，任务重，3个月时间，走访了11个国家的40多个城市或乡镇。每到一地，周总理要参加欢迎会、会见当地官员、会谈、参观游览、参加晚会等，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如在印度，10天访问了17个城市；在缅甸10天（其中还有两天和缅甸总理一起到我国云南省芒市，参加中缅边界协议签订的庆祝活动），访问了8个城镇。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乘飞机出发，到达访问地点紧接着参加活动。到各项活动结束时，虽然差不多已经到深夜了，但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讲话稿。周总理就是这样，白天得不到休息，夜里睡觉的时间也很少。我们都担心总理累坏身体，但他从不考虑自己，却时刻关心着别人。他多次对我们讲：“你们太累了，要注意休息。”

回国后，首先到达重庆。刚住下，周总理就关照我们说：“要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玩玩，这里有温泉，可以去洗个澡。”周总理还不顾疲劳亲自带领我们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参观，并讲述了当时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下的工作情况，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

在重庆期间，随行记者提出想与周总理合影的希望，周总理欣然同意，在百忙中抽空与我们全体记者和随行人员合影留念。至今，我仍珍藏着这张照片。每当我看到照片上周总理慈祥的面容，就回忆起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情景，回忆起周总理对我的亲切关怀。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人员，从心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珍贵的历史镜头

陆 方

前不久，在第十届电影百花奖的发奖大会上，我偶然看到了一段珍贵的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为第二届百花奖发奖的生动场面，真实地再现在眼前。意外的心灵撞击，使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又一次想起25年前，就在北京政协礼堂……同一个舞台上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一页。

那是1963年的春天，我做为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短纪录片《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编辑，代表摄制组到政协礼堂去领奖。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听说周总理将亲自为我们发奖，心情特别激动，高兴得真想跳起来。由于我是第一次出席那样隆重的场面，在参加领奖的许多电影界老前辈和名导演、名演员面前，感到十分拘谨与胆怯。上台领奖时，我走在人后，心中还默默念叨着：“我是个军人，千万可别忘了向周总理敬礼呀！”台上，记者簇拥，人声鼎沸，镁光灯不停地闪烁，时间显得分外短促，使我几乎都没有看清周总理慈祥的笑脸。我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顺着人流走进后台，恍惚间听到有人在喊：“请大家不要走散，到会议厅集合，周总理还要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这好消息顿时又使我振奋起来。

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谈笑风生地走进会议厅时，张瑞芳同志（“李双双”的扮演者）、王苹同志（《槐树庄》的导演）都迎了上去。周总理热情地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忽然看到站在门边，人群后面的张良同志（《哥俩好》中的大虎、二虎的扮演者）和我，他走过来，拉起我们的手亲切而又风趣地说：“不，不，今天你们是主角，让我来当导演。我们要请年纪最大的杨小仲同志（戏曲片《三打白骨精》的导演）坐中间，瑞芳和王苹同志坐在他两边，……我呢，就和解放军同志坐在一起。”他用温暖的手拉着张良和我，在他的两边坐下，又回头询问大家：“你们说这样好不好啊？我也是个解放军嘛！”在大家一片欢声笑语中，我紧张拘谨的情绪早已消失，而摄影师也就在大家情绪最好的瞬间，拍下了这张令人难忘的照片。

但是，更使我终生难忘的，还不仅是照片上可以看到的这些。就在这次发奖大会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又接见了八一电影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参加拍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摄影同志们。我虽然也是《自卫反击》那部纪录片的编辑之一，这次却未能前去。周总理在座谈会上问道：“八一厂编辑《人民公敌蒋介石》那部短片的女同志来了没有？在百花奖发奖的那天，后来在联欢跳舞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她。我想告诉她，那部短片在紧密配合形势与任务方面（当时正是台湾国民党军队妄图袭扰东南沿海大陆的时候），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可是，影片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蒋介石这个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国共合作，后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抗日战争时期又一次国共合作，后来又发动了皖南事变……，我和他打过很多年交道嘛，要知道历史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人也是很复杂的呀，影片表现得过于简单了。”当同志们事后把周总理的指示转告给我时，我又是多么激动啊！我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百忙中竟然还记得这部短纪录片！虽然我十分遗憾，错过了这样好的机会，没有能亲自聆听周总理精辟深邃的教诲，但是，周总理对年轻一代电影工作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却使我镌刻在心间，永难忘怀！尽管岁月流逝，但是在后来的25年间，每当接受一项新的纪录片编辑任务，每当在工作中取得一点进步，或是又走上那类似的舞台去

领奖的时候，我都还会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他那亲切的教诲始终鞭策着我，要努力学习、努力实践，力求使自己所从事的新闻纪录片的创作，能在政治上、艺术上逐渐成熟起来，既要能反映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形势发展的需要，又要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如今，这张照片我已珍藏了 25 年，每次看到它，都使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每次看到它，都引起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尽的思念！

鲜为人知的厚爱

杨 采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里，长时期有一个专门负责摄制国防科研影片的部门——第四制片室。这个制片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电影直观形象地向中央和军委首长汇报我国尖端武器研制、试验和发展的具体情况。也为科研留下直观纪录资料，同时，还可以向全国人民作宣传介绍，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教材。身为中共中央尖端技术专门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总理，对这个单位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厚爱。总理曾多次亲临八一厂看片。在执行历次重大任务中，总理有过许多重要指示和亲切关怀。过去，由于保密的原因，不能公开披露，我们只能默默地铭记在心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讲了，因此，把它写下来，以表达我们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深切缅怀。

重要指示

1956年，毛主席曾庄严宣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1958年，毛主席又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64年9月，我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在中央讨论原子弹爆炸的时机选择时，毛主席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在毛主席伟大战略思想指导下，在以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委的具体组织实施下，我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八一电影制片厂为执行拍摄任务，在有关科研和试验基地的大力协助下，组成了精干的摄影队，成员多是各业务部门的技术骨干和在战争年代担任过摄影记者的摄影师，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很有过硬。同志们满怀着发展我国尖端军事科学事业的强烈愿望和首次执行这种特殊任务的兴奋心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兵分两路投入了光荣的战斗。一路乘飞机直接前往原子弹制造工厂，拍摄核弹的组装和空中运输；另一路奔赴西北荒漠中的核试验场，拍摄原子弹爆炸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国进行这种试验尚属首次。许多科学技术上的未知数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验证，才能揭开原子弹的奥秘。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仔”。所以，国家在安全防护措施方面，规定的很细、很严。但是，做为一个具体的科研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中，没有一点勇敢精神也是不行的。在测试项目中，有一个从早期蘑菇状烟云中收取放射性样品的任务。在国外，通常是用无人驾驶飞机穿云取样的办法去完成。而我们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只能用所谓的“土”办法，即炮伞取样的办法去实现。炮伞取样是将高射炮预先设置在距爆心较近的地方，作业人员则隐蔽在坚固的地下工事里，在躲过核爆炸的光辐射和冲击波之后，立即冲出工事，在巨大火球翻滚升腾的时候，做好发射前的准备，等白色蘑菇状烟云基本稳定时，将上百枚特制的伞弹发射到烟云顶端，通过降落伞的坠落，将放射性烟云收集下来，并且还要在蘑菇烟云中的放射性微尘降落到地面之前，迅速、安全地撤离阵地，这总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试想，这是一场多么紧张而又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啊！确切他说是一次原子条件下的实战演习。我们的摄影师柴森同志凭着他的果敢精神和熟练的摄影技术圆满的完成了这一任务。

在原子弹爆炸后不几天，洗印车间刚把从核试验场拍回来的胶片冲洗出来，就接到周总理要来厂看片的通知。当时我们既高兴又紧张，紧张的是：

工作样片还未进行整理，怎么给总理看呢？国防科委的同志解释说：总理就是要看原始资料，目的是了解核试验场的真实情况。于是，我们赶忙把所有样片粗粗接好，就请总理来了。记得当时随同总理来厂看片的还有彭真同志和罗瑞卿总参谋长。

周总理看片时非常入神，非常动情，当看到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的时候，高兴地鼓掌说：“我们胜利了。毛主席讲要奖给赫各晓大一吨重的大勋章，感谢他促使我们搞出了原子弹。”周总理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我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志气和胜利喜悦。

总理看完影片后高兴他说：这些资料很重要，不论对国防科研，还是对部队进行国防现代化教育都很有用。”接着总理特别指示说：“你们八一厂要组织一班人，专门做这件事。”周总理的这一重要指示，为八一厂第四制片室的组织建设和制片方针奠定了基础。对我们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八一厂很快从各方面选调人员，组建了第四制片室。以记录我国尖端武器发展历程为主要任务的四片室，伴随着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自己的战斗历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成为八一厂光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隆重接见

1965年5月15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这是一次由飞机投掷的原子弹空爆试验，它标志着我国已经有了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周总理对这次试验十分重视，十分关心。5月5日，中央专委从基地召回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和基地司令张蕴钰同志到北京作试验前的准备情况汇报时，周总理又一次谈到了电影，周总理说：“上次电影照得不错。”接着贺老总补充说，“这次要比上次照得更好。”这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和鞭策。同志们听了传达后，心情无比振奋，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这次试验中，我们拍摄的重点除航弹本身外还有机组的投弹动作、爆炸景象、威力半径以及各军兵种小分队在原子条件下的军事演习。整个试验更具有实战性，在拍摄上更具有纪实性，不可能重拍和补拍，必须一次完成。所以，在技术上难度更大。比如投弹动作，从弹仓打开、航弹脱钩、坠落到原子弹空中爆炸，一个镜头拍到底，绝不能有丝毫误差。为了拍摄原子弹爆后最早进入沾染区作业的坦克分队穿越爆区的战斗场景，从战争年代就从事摄影记者的郑治国同志，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气概，他要求随坦克分队一同进入爆区，在蘑菇烟云笼罩下把坦克穿越爆心的惊险场景逼真地记录下来。

航弹试验成功之后，我们接到试验委员会的通知：周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接见在第一、第二次试验中的有功人员，并派专机来接，当时指定我代表八一厂前去接受接见，全摄制组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我们连夜把已拍好的胶片整理好，随同专机带回北京，以便让总理早日看到这次试验的实况。

5月下旬的一天，总理又一次亲临八一厂看样片。总理对这次试验十分重视和关心，在爆炸成功的当日下午，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发去的贺电中就特别表彰了执行投弹任务的机组人员，今天，总理又在银幕上直接看到空军飞行团长李源一带领的机组驾驶我国自行改装的轰六型飞机，从万米高空把原子弹准确地投向靶心，并在预定的高度爆炸的景象时，显得格外兴奋，大为

赞许。总理对样片中坦克在蘑菇烟云下穿越爆心的作业场面也很满意。5月30日，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陈毅元帅、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大将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接见和宴请。周总理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歉疚他说：“大家辛苦了。去年10月，本来应该和大家见面的。因为忙，延迟到现在，真对不起。这次空爆成功、计划圆满完成，老总们很高兴，都要来见见有功之臣。”

陈老总朗朗笑道：“是来喝庆功酒啊！”

合影后，老总们在欢笑声中，招呼科学家们入席，每桌都有一位领导同志陪餐，宴会厅里充满了亲切、和谐、欢畅的气氛。总理即席发表了讲话，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攀登下一个高峰，尽快掌握氢弹技术，加强国防，保卫和平作出更大贡献。我们的摄影人员把这些动人场面一一摄入了镜头，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亲切关怀

1966年5月9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这是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其威力比普通原子弹大得多。根据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参试单位除相关的部队外，还有国务院各部委的科研部门，试验规模空前浩大。因而拍电影的任务也十分繁重。在规定爆炸的前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摄制组同志们11点钟才躺下休息。突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核试验场总指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打来的，让我马上到他那里去有要事谈。我立即穿好衣服，踏着星光照亮的小道，穿过一片片帐篷群，一路小跑到了张副总长的住处。张副总长见到我，以一种临战的神情对我说：“刚才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对场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有一条就是嘱咐你们八一厂的摄影人员在明天拍片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回去立即向大家传达，一定要按总理的指示办。”听了张副总长传达总理的指示后，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我深深体会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操劳中，还考虑到我们摄制组的事，这不仅体现了总理一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一贯关心人，爱护人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是对我们从事的电影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褒奖。

我返回住处后，摄制组的同志都在关注地等着我，没有入睡。听了我的传达，大家都激动不已，我们连夜进行了讨论和落实。尽管这一夜同志们睡得很少，但第二天一清早又都精神饱满地投入了新的战斗。这次试验的拍摄任务很繁重，质量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有些效应物要求在核爆炸的瞬间拍摄到受破坏的真实景况和动态变化。所以，摄影机不能由人去操作，而要通过有线控制和光电控制摄影机开关的手段去完成。由于摄影设备离爆心很近，为防止光辐射、冲击波和各种射线对胶片的破坏，必须把它防护起来。在这方面、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同志们给了我们热情指导和大力帮助。在核爆炸之后，有些效应物还要不失时机的回收，因此，摄影人员需要多次进入沾染区工作。所以，要求大家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去工作。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重要指示，给我们下了一场及时雨。

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在这次试验中，同志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确保了安全。摄制组继第一次核试验。中立了集体一等功之后，又一次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同志们以实际行动回报了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厚爱。

直接指导

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连续进行了三次跳跃式的核试验，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对国外也很有影响。总理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把三次试验的部分实况剪辑成纪录片，向全国放映。

以前，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曾在1964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给人大代表放映过一个小片段。许多代表说太短了，没看够，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心愿，决定制作一部纪录片。因为这部纪录片政策性很强，所以，从下达任务、解说词的修改、完成片的审定都是总理一手抓的。

在审查影片初编后，总理问朱光亚同志：“纪录片这样剪辑行不行？有心人能看出什么秘密吗？”朱光亚同志说：“第三次试验的画面不宜出现太多。”

周总理笑道：“内容少了，群众可不满意呀！”接着总理又问：“前两次试验的爆炸景象画面可不可以多选一些呢？”我们都同意总理的意见，只是觉得秘密的界限不好掌握。总理说：“这方面的问题由光亚同志把关，你们去搞吧！”

为了落实总理的指示，尽快把影片编出来，朱光亚同志深入到八一厂剪辑车间和编导廖峰同志一起工作，对画面逐格的斟酌，在既不泄密又让群众看得振奋的前提下，寻找最佳剪接点。为了让总理审查方便，我们几天几夜连续工作，完成了双片。

总理对解说词的审阅，尤其认真细致，逐字逐句的推敲，甚至连标点符号都十分注意，凡是点对了的，总理还重点一次；点错了的，总理就改过来。面对着总理审批回来的解说词上留下的笔迹，使我们不由联想到总理对尖端武器核试中的十六字教导：“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四句话不正是总理自己工作作风的鲜明写照吗？总理堪称为身体力行的楷模。给我的教育极深，极深。

确保安全

1967年夏季，“文革”的夺权风潮席卷全国，社会上的大动乱也波及到了八一厂。一日，某大学的造反派突然闯入了八一厂生产区，进行煽风点火，使正在冲洗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影片的洗印车间受到干扰和威胁。第四制片室的同志们无不心急如焚，纷纷向上反映。当总理得知上述情况后，迅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来了部队，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确保了国家重要机密的安全。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这些往事不觉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但在我们脑海里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每每回想起来，心情总是很不平静。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

从我们经历的这一个小小的侧面，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周总理为发展我国的尖端国防事业，而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的伟大的工作精神和特殊的人格魅力。这些，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载入共和国的光荣史册。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军队电影工作者。

关于艺术性纪录序的一次报告

程季华

整整 30 年前，我听过一次周总理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听总理做报告。

那一天，是 1965 年 8 月 11 日。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出席听报告的有文化部各单位的负责干部、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和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报告会的主持人，是当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肖望东。

上午 9 点多钟，做报告的时间已经到了，总理还没有来。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出来通知：总理从昨天夜里办公到现在，还没有休息过。因为有几件急事需要处理，还要过一会儿才能来。总理说，请大家稍候。

通知刚完，台下就议论开了：“总理一夜没有休息，太累了！”

“应该请总理去休息！”

“办了一夜的公，还要来做报告，这样怎么行！”

“报告会可以改期，请总理休息！”

“应该去给主持会的人提建议，报告会改期！”

真的有几位同志去找主持人提意见去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来小时，总理办公室的那位同志又出来通知：总理急事还未处理完毕，还要再过一会儿才能来。总理说，召集同志们来开一次会不容易，就不要改期了。总理说，他的讲话，可能要耽误大家吃午饭的时间，要我们弄点吃的东西，给同志们点点心。因为是临时说起，一时准备不了这么多人吃的东西，从几个地方凑了一点，请大家随意吃一些，还增添了热茶。

通知完毕，就送来了不少馒头、花卷、面包、糕点等等。各式各样，看得出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还拿来了许多茶杯。大家一面吃点心，一面又议论开了：“总理太辛劳了！”

“总理考虑得太周到了，还怕耽误了大家吃午餐的时间！”

到 11 点 30 分，不知疲倦的总理来了，他神采依然，大步走向台口，刚一坐下就说：很对不起大家，劳同志们久等了。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回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总理说：这次开会是我向文化部建议的。我说，各种类型的电影片，是不是可以讨论讨论。因为大家对所谓艺术性纪录片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大家一道讨论讨论嘛。我说的是艺术性纪录片，后来一变，成为纪录性艺术片。整来整去，到底是艺术性的纪录片，还是纪录性的艺术片？我既然提出开这个电影方面的会议，总向大家表示一点意见吧。我这个人是不隐瞒态度的，错了我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总理的嗓音不像往日那么洪亮，有点嘶哑。

这时，工作人员给总理送来点心。总理说，我今天还没吃过早点，现在还真有点饿了。好在大家都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气了。

大家看着总理匆匆地吃早点，（不！应该说是午点了）都感到心疼，都为总理为国务辛勤操劳不知疲倦而心疼！大家多么希望。总理在吃完早点后，能稍事休息片刻！

没有休息，总理在匆匆地（真是匆匆地啊）吃完早点后，接着继续讲了，……

总理今天的报告，一共讲了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总理分为七点，讲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任务问题。在

讲到当时文艺工作的情况时，总理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针已经宣布了23年，但是，可以说还没有认真的执行和贯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执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还是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但如何服务？如何熟悉和懂得他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化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当前这些实事出发，从当前这些任务出发，我们就会正确认识文艺工作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讲了目前我们文艺的方针。总理说，不仅是电影问题，包括戏曲、话剧，舞蹈、歌剧、音乐、美术等等。今天，我们文艺的方针，当然还是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就是要跟今天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求配合。毛主席说，革命工作如果没有文艺工作配合动员，就不能取胜。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这就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你如果不到百分之九十的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去，到工农兵中间去，你依靠谁呀！而且这对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也确是一个机会。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只是才开始，有一部分下乡的，有初步的结合，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没有下去。到农村中去，要依靠贫下中农，在城市中依靠劳动人民，主要是产业工人。你要依靠他，就先要拿党的政策来教育他，鼓舞他，另一方面要向他们学习，没有学习，光是教人是不行的，要先学而后才教。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当然，有一部分身体老弱的，那也不能勉强，去看看，参观参观，联系联系是可以的。

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要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你就要熟悉他，懂得他。如何能够熟悉呢？就要先从认识上解决，这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学习社会，就是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群众，提高认识，打通思想。要有好的艺术实践，必须先有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我们过去没有把次序摆恰当。最好先有生活实践，然后才能出现更好的艺术实践，也可以同时搞，但总有个先后。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抓紧社教运动这个有利时机，时不再来呀！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有两年半，顶多在1968年初就结束。所谓时不再来，不是将来不搞了，将来搞，你们年纪就大了。

所以我认为要抓紧今后5年时间。这正是毛主席说的，你要彻底解决你的人生观，非要有10年8年时间不可，主席预言了这个问题没有这个时间不行。我们要有这个决心，也许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5年就搞好了。

我提议，我们文艺队伍要在今后5年，多则三分之二的的时间，就是用3年时间下去。戏剧队伍最好一年8个月下去，4个月回来总结，做一些艺术实践，演一点小戏，研究一下，再下去，你搞5年，那情况就改观了，就会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就会起一个初步变化，好的，还可能起质的变化。我是着眼在今后5年，不希望大家创作很多，而是希望大家多在实际生活中锻炼，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艺术实践，但重点是摆在生活实践，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第三个问题，总理说：主席讲了个普及和提高问题，这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一个中心问题，你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得懂得工农兵，生活实践是一个基本功，你还得通过艺术实践表现出来，这就是艺术实践问题。主席说，只有了解工农兵的需要，以他们能接受的东西去普及，然后在上工农兵的生活和前进的方向上提高。你要表现他，歌颂他首先得了解他，了解他需要的，他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一般的带普及性的，开始总是一般一点，粗糙一点。毛主席《讲话》的总结第二部分，有很长一段讲艺术源泉究竟从何而来？从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一句，一直到“鲁迅在他的遗嘱里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为止，这一段最深刻了，我看，这是千回读，万回读也有意义。普及上提高总是有个先后、高低、粗细、快慢、文野之分嘛。我们承认，如果搞个艺术性的纪录片，当然比完整的故事片低一点，但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的。野一点，粗一点，但可以快一点。我们的艺术实践，首先要是真正表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事迹，要表现工农兵所需要的，所能接受的东西，开始从普及入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在工农兵生活和前进方向来提高，这样才提高得对。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提高指导下普及，向他们学习才能表现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专家，向群众学习嘛！

在这个意义上，对电影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工作重点就是社会实践。所谓“体验”生活，“体验”两个字，现在看来也不那末恰当。就是要通过生活实践，因为不是浅尝辄止，硬是生活实践，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在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中打成一片，这是第一要求，这是主要的任务。但是文艺界的人，总要有所表现，这时候可以产生一点普及作品。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对电影就提出搞一种完整一点的纪录片。我看到刘白羽同志找了我1958年给同志们讲的一段话，的确，那时候的思想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那时候出了几个故事片，太粗糙了，不行。我说，还不如先搞纪录片。但那个纪录片要区别于新闻纪录片，那个时候，我想通过一些艺术加工，叫艺术性纪录片。我是有个想法的。后来，七搞八搞，变成纪录性艺术片了，把我说的歪曲了，还一定算在我的帐上，我一直不承认，我到现在还说艺术性纪录片嘛，他们还出版了一本叫《论纪录性艺术片》的书，书写得可快了，那上头是不是用了我的话，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也没有工夫去看。文责自负。

我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搞艺术性纪录片，与其粗制滥造的搞故事片，不像样，又受批评，还不如搞素材，这个素材又要比新闻纪录片有一点艺术加工，新闻纪录片就是即时现场拍下来，真实、快速，当天晚上就在电视上出现。或者，长纪录片顶多加一点剪裁，隔些时再映出，都是现场即时拍摄的。我说的是纪录片的加工，就是像毛主席说的，把这个艺术源泉——工农兵的突出的典型的生活抓住，叫它更系统化、更突出，用艺术手法注意那些侧面，而且跟党的政策结合起来，有宣传教育的意义。就是要吸收我们艺术源泉的丰富的养料，吸收多了，你生活熟悉了，思想感情融成一片了，你将来就会产生大作品。任何人总是从普及而后提高的，这是一个发展的阶段。

我在这里再解释几句，我所提的艺术性的纪录片，既区别于一般的新闻纪录片，也区别于故事片。故事片一定要有典型故事，有着想象和虚构，把它加以发展，并由演员来扮演，一般新闻纪录片那是现场拍摄的，能抢拍到多少就是多少，能够抢拍到一些精彩镜头，那就是新闻纪录片成功的地方。但既然是艺术性纪录片，那就容许他艺术加工，就是可以事后补拍。因此，有些场地，要重新稍微布置一下，也不能离着这个现实很远。完全假的也不行，就是在原来那个地方又重新搞一下，进行补拍，这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允许的。但是只能补拍，而不许用演员上去替代。艺术性纪录片总要有真实性。我完全不同意这个纪录性艺术片，当时，他们有许多理论，我说，你这个结果就变成艺术片、故事片了，不是我所设想的了。比如《李双双》也好，《三八河边》也好，尽管那是真人真事，那还是艺术片，因为是用演员扮演的，还有个故事，也比原来的故事有些变化，这只能是艺术片。反正是艺术

片；你们在前面加什么冠词我不管，我讲的是这个艺术性纪录

片，是不能用演员来扮演的，因为一扮演就假了嘛，那还是什么纪录片呢？

搞艺术性纪录片，不要虚构，不要造假，要把目前生活的伟大时代迅速反映在银幕上，要生动，要吸引人，要感人，还要看到发展，也要看到前途，并有教育意义。首先是为了教育广大人

民，包括我们干部在内，教育人民和干部，同时又可以改造自己。因为要看你对目前这个时代这个侧面是怎么看法，怎么认识的，你的思想是不是吃透了两头，你是不是抓住了毛主席的艺术思想和工农兵的生活实践，表现在你这个初期的艺术形式，艺术实践上，

看你表现得如何？就是看你吃透了多少？这是一个考验。这就等于从初级到高级，你积累这么多东西，你将来再提高那不更好吗？就拿普通练写字来说，开始，总得一张张丢掉。绘画，先搞些素描，然后才能搞成一个样子。作家也是先写短篇，然后才有大的著作。

第四个问题，总理说：我为什么着重提到电影，因为电影是重要武器，这是列宁说的，它最容易普及，容易教育人民，鼓舞

人民，也就是赞颂他们。也是毛主席说的。这是一个最普通的最有广泛意义的艺术形式。没有再比电影容易推广的事，看的人次之多，其他都不及。面向农村，电影也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广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特别重视电影。

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要搞二年半，所以我们提出，在近两三年中，电影不可能有很大批的生产，更不可能大批的产生故事片，因为我们的电影队伍也像其他文艺队伍一样，要分期分批地下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搞社教运动，去进行学习和生活实践。所以在今后两三年中艺术性的纪录片会比故事片还多，应该占很大的数量。现在相反。故事片倒有不少主题，已经有人在那里写，反而这个艺术性纪录片搞的很少，且越搞越像故事片。这

三五年内，艺术性纪录片多搞一点，故事片少搞一点，将来五年以后，我们故事片会大发展，才能出现更好的、质量更高的故事片。

“接着，总理就拍摄艺术性纪录片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矛盾，讲了些解决矛盾的具体意见。

第五个问题，总理就如何从艺术性纪录片入手，概括他讲了几个问题：（一）如何有组织的深入生活；（二）如何取材、如何选择对象；如何提出主题；（三）如何进行有计划的拍摄；（四）如何防止片面性；（五）影片插曲如何与影片本身的主题切合。总理说，关于艺术性纪录片，1958年我就提倡过，现在我又来建议，也许还会再一次失败。我说，不要紧，再失败一次，我不灰心，我站得住。

总理最后说：今天讲了五个问题，前面讲了形势和一般文艺方针问题，后面说的都是电影。这次讲话，完全是讲我的思想，跟大家交换意见。这是我读了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的一点认识。我说这些话，就是要想抛砖引玉，是为了要引起你们的注意，完全允许你们的批评，不同的意见尽管提。我相信，如果大家认真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再读几次，再进行讨论，我想我的这些话也许对你们有点参考意义。

报告会在下午2点30分结束。

总理的这次报告，没有正式发表过，以上的这些摘要，是从当年我现场

记录的笔记本上摘录的。这些话大多是总理的原话。但我全部未加上“ ”号，以表示是未经总理本人审定认可的，在逻辑上和行文的精确程度上，肯定会有不足之处。当然，摘录中如有不妥的地方，那就要怨我当时记录不够确切，由我来承担责任。

1958年，总理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艺术性纪录片问题，是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提出来的。自从那位“理论权威”康生在“长影”一次讲话中，把1957年出品的一些影片指为“毒草”，提出要“拔银幕的白旗”之后，电影界的空气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这些情况已经反映给总理了，引起了总理的重视。1958年4月18日，总理约见了参加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厂长会议的代表，谈了他的意见。

总理说，他最近看了几部影片，确实感到很别扭。他指出电影界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影片风格、情调不高，不能反映时代，缺乏伟大理想的召唤，其原因是因为创作者缺乏生活实践。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有些作家、艺术家，在解放初期还熟悉农村、部队，现在时间久了，就慢慢不熟悉了。总理提出：我想如果目前不能生产出好的故事片，是否可以多拍摄一些纪录片，纪录片倒可以反映生气勃勃的时代面貌，既可以满足观众的需要，也可以教育创作人员，总理反复强调，让大家多务虚，多座谈几天，中心问题是如何把电影的风格提高一步。要像毛主席所指示的，创作出具有无产阶级的民族的风格、思想性高、艺术完整的作品来。我们不怕毒草，但主流应该是好的。还一再叮嘱：不要光看到几部影片，要想一下去年的思潮，想得多一些，把眼界放开来，看得远一些，超脱一些，以后总要出些风格高的影片。

5月1日下午，总理又一次接见了厂长会议的代表。总理说，他又重新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一遍。他正式提出建议，故事片厂要长期打算，可组织艺术家们到生活中去，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片，对一些重大题材的纪录片，要求艺术性更完美一些，既可以迅速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面貌，而创作者也可藉此深入生活，为今后的创作积累丰富资料，拍摄出较高风格的影片，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多。总理还形象地用“蜜蜂不到花丛中去怎么酿得出蜜？蚕不吃桑叶怎么吐得出丝”的比喻，提醒我们除了深入到创作的源泉中去，就谈不到进入创作过程。

经过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康生“拔白旗”之后，广大创作人员精神上很紧张。周总理要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其实也含有让大家休养生息，缓一口气的深意。但在当时“大跃进”片面地强调要迅速增加产量，和“拔白旗”的形势下，在“左”的气氛中，大家头脑都发热，对总理的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深刻理解，正确的领会，反而在具体贯彻中严重的歪曲了，把总理提倡的艺术性纪录片，变成所谓“新样式”的纪录性艺术片，艺术性纪录片与纪录性艺术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片种，前者是指经过艺术加工的纪录片，属于纪录片类；后者则指带有纪录性特点的艺术片，应归于艺术片之列，二者之间是不能等同、混淆的。

作为一种新样式的探索，纪录性艺术片不是不可以拍摄，但有的制片厂的领导没有真正领会总理对艺术性纪录片这一指示的精神、而是错误地从解决影片数量出发，按照自己歪曲的理解，对这一指示表示了欢迎。当时有的制片厂剧本来源一直很紧张，年年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而所谓的“大跃进”又要求迅速增加产量，正苦于无法解决，就把拍摄纪录性艺术片当作了解决数量问题的途径。创作人员到工厂农村去只为了要收集先进事迹，迅

速编成剧本，迅速拍成影片，仍然是过去拍片的办法，拍的仍旧是由演员扮演的影片，片面地极不合理地追求摄制进度和完成的数字。这样，影片的艺术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其中的一部分，甚至粗制滥造，还美其名为纪录性艺术片。这样的影片，当然不受观众的欢迎，受到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同志的责难，其责任完全在文化部和电影局的领导。因此，1959年7月，文化部党组关于电影故事片问题，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提高艺术质量的报告》，其中就检查了有关纪录性艺术片的错误：“1958年103部中50%是反映大跃进题材的，其中纪录性艺术片有49部”。纪录性艺术片的“另一性质的错误，即宣传党的政策方面有片面性，许多反映大跃进的影片，不符合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许多浮夸和缺乏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报告这时还没有认识到，当时所提倡的纪录性艺术片，根本不符合总理提出的艺术性纪录片的原意和精神。

1965年1月，总理听说上影准备到大庆油田去拍大庆会战的故事片，就指示不要急于搞故事片，要全体摄制组人员到大庆去，向大庆上入学习，依靠大庆的党组织和油田广大工人及干部，尽快拍摄出一部反映大庆会战艰苦创业的艺术性纪录片来。总理说：

当时全国已经知道在大庆拿下了一个大油田，但是还不知道大庆人是怎样披荆斩棘取得这一伟大胜利的，应尽快拍出一部艺术性纪录片，向全国广泛宣传大庆精神大庆人。二、创作人员还不熟悉大庆人大庆精神，不了解大庆会战艰苦战斗的历程，暂时还没有条件拍出好的故事片来，应该通过和大庆人一起拍摄艺术性纪录片，给拍摄故事片准备条件、打下基础。

总理再次指出，他说的艺术性纪录片，首先就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纪录片，不是用演员扮演的故事片。所以叫艺术性纪录片者，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新闻纪录片，可以允许一定数量的事后布置补拍。因此也应该要求有更高艺术性。

张骏祥编导的《大庆战歌》就是按照周总理的设想拍出来的第一部艺术性纪录片，总理指示要以反映大会战、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为主，不要面面俱到地搞油田发展史。摄制组在大庆工委领导下：反复研究如何反映大会战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和领会大庆经验的过程。摄制组和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大庆家属和技术人员生活和战斗在一起，了解他们战天斗地的事迹，正是学习和理解英雄的大庆人的过程。大庆职工发出了“一定要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庄严誓言，铁人王进喜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斩钉截铁的豪言壮语。科技人员狠批西方资产阶级宣布的“中国贫油”论，立志丢掉洋拐棍，打破洋框框，坚持通过群众的实践，为闯出我国自己的油田开发道路。影片就是要努力表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庆人这种雄心壮志，表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的胜利。

在《大庆战歌》中，通过镜头的纪录，表现出了大庆工人当年天当房子地当炕，爬冰卧雪、排除万难的大无畏精神；反映出了大庆家属开荒种地，“五把铁锹闹革命”的决心；反映出了技术人员出陋就简用扁担挑水，作了几万次化验，取得几万个数据的毅力。表现出大庆人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

影片还歌颂了大庆“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当油田起重工人发现一段钢丝绳上有两处断头，把90多米的钢绳一寸一寸地检查；技术员在大雨中送砂样，不小心在路上失落一包，连夜打着电筒在泥泞的草原上一步一步沿着

来路，坚持找到这包砂样；研究人员为了弄清油层，几年如一日地分析对比了成千上万条电测曲线；钻井工人为了坚持从上千米的井底，捞起一小截遗漏了的岩心，整整一天一夜不下钻台，把上百根钻杆一根根重新下钻又一杆杆重新取上来。影片就是这样通过镜头的纪录，热情歌颂了大庆人对革命负责一辈子的精神，歌颂了这种一丝不苟的高度责任心。

大庆精神是通过具体的大庆人的行为体现的，影片用了较大的篇幅，纪录了铁人王进喜的感人的事迹。王进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代表，铁人精神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的体现。正是这个小时讨饭受欺，年青时寒冬腊月衣不蔽体，靠他拉的骆驼颈下长须盖着身体睡觉，在苦水里泡大的王进喜，第一个喊出了：“敌人想用石油卡我们，这万万办不到！”正是这个“要做一辈子人民的老黄牛”的王进喜，在大量钻机和物资运到，吊车、汽车不够用的状况下，为了争分夺秒，率领全队在冰天雪地里把几十吨的钻机人拉肩扛到井位上，用人力安装起来。正是这个铁人，在供水设备跟不上，配制泥浆等不及的时候，带头用脸盆一盆一盆端了几十吨水，保证了开钻。正是这个铁人在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带头跳进泥浆池搅拌泥浆，压注了井喷。“石油工人

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句豪言壮语里包含着多少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啊！还是这个铁人工进喜说过：“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提出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响亮口号！

《大庆战歌》这部按照总理的意图拍摄的第一部艺术性纪录片，受到“四人帮”一伙的攻击，妄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再地阻挠映出，被禁闭了十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和广大观众见面。更令人气愤的是，提出拍摄此片任务，始终关怀并支持这部影片拍摄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也未能看到《大庆战歌》的完成拷贝，成为永久性的遗憾！在十年浩劫期间，电影

工作者受到了残酷迫害，已经不可能按照总理的设想，来进行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来开拓艺术性纪录片这条新的艺术道路了。

总理一贯关怀电影创作人员，为解决电影创作人员对工农兵不熟不懂的问题，想出了拍摄艺术性纪录片这一好办法，使我们既能及时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又在与工农兵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当中向工农兵学习，改造世界观，从而为拍好故事片准备条件。可惋惜的是，从总理在 1958 年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到 1965 年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他这一番苦心并没有为我们所理解，他的这一宝贵的指示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辜负了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的关怀。时间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我国务条战线的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年总理提出的拍摄艺术性纪录片的理由，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认真地领会，因为他是根据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基本观点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而如何认识我们时代的本质。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大局，如何认识我们所从事的电影工作与时代和大局的关系，仍然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观察事物的宇宙观、世界观。为提高电影从业人员的思想水平，加强电影队伍的建设，最基本的就是要认

真学习邓小平的这一科学理论武器，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电影队伍思想建设的核心，是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加强思想建设，就是要重新强调世界观的改造。人们总是需要在改造客观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主观符合于客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抑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3—94页）否则，就很难成为一个受人民欢迎的电影艺术家，很难创作出受观众喜爱的优秀的影片来。

我们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亿万人民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开创性事业而忘我斗争，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电影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丰厚的生活资源，提供了大量崭新的题材、主题和人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广大观众审美情趣的多样化，又对我国电影创作提出了崭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承认影片的商品属性，但是更应该注重电影的特殊属性。电影创作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它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广大观众具有强烈的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邓小平曾经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页）

邓小平还深刻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页）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采用多种形式，有计划地组织电影艺术家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投身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然后，才有可能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影片。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也是我们国家大局的要求。我国的电影艺术家，都应该深入生活、勤于学习、努力创作、奋发工作，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实现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并慰周恩来总理的在天之灵。

记周恩来关心美术电影的几件事

鲍齐贵梁莘周恩来非常关心中国美术电影事业，在中国美术电影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他的光辉足迹。

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2月初，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工作，推动了抗战初期的抗日动员、组织、宣传工作，同时，也直接地推动了抗日电影、戏剧工作的发展。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关心下，使刚开创不久的中国动画事业，在抗日战火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1926年，万籁鸣、万古贻、万超尘、万涤寰（人们称：万氏兄弟）在一无场地、二无资金、三无资料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开创了我国动画事业。但由于无人投资和动乱时局的影响，使刚开创的中国动画事业就面临着生存的威胁。1937年深秋，为了中国动画事业的前途，万氏兄弟怀着强烈的爱国心（老四留沪看家没去），离别妻儿到武汉政治部领导下的第三厅管辖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拿起画笔和动画电影摄影机，参加了反帝抗日的行列。“中制”距政治部很近，周恩来、郭沫若、彭德怀、叶挺等领导非常关心“中制”，经常到“中制”讲时局形势，看望搞电影的这些文化人。这里，有一段艺术家万籁鸣为一代伟人周恩来剪影的佳话。

1938年4月的一个下午，周恩来、邓大姐、郭沫若等领导到“中制”看望大家，当周恩来听到介绍万氏兄弟是中国美术电影创始人时，非常高兴地和万氏三兄弟一一握手，说：“你们做了很好的事，对人民很有贡献啊！”三兄弟竟激动得一句话说不出来。这时，一个人大声说了一句，“大万还是中国人像剪影的开创者哩！”陪同周恩来的“中制”厂领导便以征询的口吻说：“周副部长，是否请大万也为你剪个影？”周恩来朝大万笑着点点头：“好哇！”大万有点紧张起来，生怕自己的剪刀会有损伟人的形象。这次，大万特别认真，整整用了二分钟（本来只需一分钟）才完成。周恩来接过这帧剪影，笑着和大万边握手边说：“剪得很像，你还会这一套哇，谢谢你。”大万感到一股暖流从手中传了过来，忙说：“没剪好，没剪好，下次再剪吧！”周恩来把剪影带走了。后来，这剪影以标题《画家万籁鸣为周恩来先生剪影》刊登在《抗战日报》上。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万氏三兄弟在“中制”这一年时间里，用动画形式绘制了三集《抗战歌辑》、四集《抗日标语卡通》和抗日动画片《王老五去当兵》、木偶片《上前线》等，深受广大抗日军民的欢迎。1938年3月底，阳翰笙在《抗战电影》杂志上发表关于建立国防电影的五点建议，其中第四点指出：“标语卡通、歌唱短片”拍摄，以达到迅速及时配合抗战宣传的目的，在这时期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万氏兄弟绘制的动画片紧密配合抗战，紧紧地为政治服务。这样，使开创不久的中国美术电影沿着健康的创作生产方向发展，走着与欧美动画截然不同的道路。当时欧美动画商很多是搞荒诞不经、低级趣味的动画片，以获取暴利。

1949年7月26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贺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闭幕的盛会上，剧作家欧阳予倩向周恩来同志介绍木偶艺术家虞哲光时，周恩来紧握着虞哲光的手说：“苏联、捷克的木偶戏很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也一定要赶上去。”1950年4月，虞哲光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担任木偶

片技师和导演。几十年来，在周总理指示鼓舞下，他先后和他人一起创作了《小小英雄》、《小梅的梦》、《神笔》等几十部木偶影片。《神笔》等影片多次在国内外获奖。1960年，虞哲光又创造了折纸片，为中国美术电影增加了一个新片种。

在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1月7日，中国电影周在缅甸仰光隆重举行，中国周恩来总理和缅甸吴努总理出席开幕式。在电影周上放映九部故事片和一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美术片集锦》。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广大职工看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带着中国美术片出席电影周，深受鼓舞，决心生产更多美术片来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50年代，日本第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时说：“中国美术电影走的是独立自主的道路，在中国电影界也是优秀的部门。”这是周总理对中国美术电影的总评价。周总理的总评价，不仅给中日电影交流增添重要内容，而且一直鼓舞着中国美术电影工作者创作生产出更多更好美术片的积极性。在周总理指示鼓舞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广大职工坚持走自己民族特色的道路，在原有动画片、木偶片的基础上，吸取中国民间特有的窗花剪纸传统文化，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剪纸片、折纸片；吸取中国独有水墨画，创造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水墨动画片，深受国内外高度称赞。

现在，我们把周恩来直接关心美术电影的几件小事记述下来，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时代伟人、开国元勋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武训传》事件始末

夏 衍

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现在文艺界 50 岁以上的人，大多数是知道的，中国电影史料——特别是《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电影》（上卷）有较详细的叙述。但这些只能说是“局外人言”，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具体经过。这部影片是私营昆仑影业公司 1950 年出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是 1951 年 5 月 20 日。

《武训传》的事说来话长，得从抗战末期的 1944 年的重庆说起。当时进步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当时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孙瑜正为有拍片机会而没有剧本发愁，于是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纲，据说还得到过当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郭沫若的赞许，（这是孙瑜后来和我说的，当时我在重庆分管统战工作，不管文艺方面的事。）这样，这部片子于 1948 年冬在中央制片厂开拍。但不久，就因经费短缺而停拍，接着抗战胜利，孙瑜等人相继于 1946 年（或 47 年）回到上海。那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再一次发动内战，于是进步文化工作者就不愿意再在国民政府办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史东山、孙瑜、赵丹等人都加入了昆仑制片厂。大概在 1949 年秋冬之间，昆仑公司老板任宗德和孙瑜、赵丹三人到文化局来找我（当时我是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长），大意是说：昆仑有人才，有资金，有厂棚可以拍片，但是缺少剧本，因此，他们向“中央”买下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现在打算开拍了。因此，向我提了两条要求：一、昆仑向文比局请求贷款三亿元（折合人民币三万元）；二、要我审定及修改剧本。我都婉言拒绝了。第一，不仅文化局没有钱，连文管会也很穷，你们说这件事七月间曾得到过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的支持，这笔钱还是向政务院或文教委请求为好；第二件事，我坦率他说，我认为：“武训不足为训”（这件事后来孙瑜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对编导（武训传）的检讨》中提到过），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必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影片。但是任宗德和孙瑜都坚持要拍，说大批导演、演员没有事做，政府又要我们恢复生产，只有这部片子才能让许多有能耐的电影工作者在事业上有所发挥。于是我就提议：你们既然已经向中央文教委员会备过案，最好是你们跑一趟北京。这样，贷款和审定剧本就可以由文教会决定。这样，任、孙二人就去了北京。很快，大约十几天之后，任宗德告诉我，事情办得很顺利，钱借到了，剧本送中宣部，也说没有问题，所以这部片子快开拍了，争取 1950 年上半年出片。又给我送来一张演员名单和赵丹的化妆照片。事已至此，我当然只能祝贺他们开拍大吉了。

当时我工作很忙，对这部影片何时拍完，也就顾不得了，但片于很长，拍了上下两集。赵丹很兴奋，不止一次对我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拍得最好的一部影片。

影片先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审查，姚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于伶（市文化局副局长）都认为这是昆仑一部重点片，国家贷款拍的，最好还是清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我请示舒同，他表示同意了，说冯定、匡亚明等几位副部长都想“先睹为快”。于是就约定了试映的地点和时间，由我通知任宗德。因为在华东局机关放映，所以公司方面除孙瑜、赵丹

外，其他有关人员尽可能少去。由于影片太长，华东局和上海市负责人天刚黑就集合了。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参加当晚审查的人不多，除华东局的领导外，上海市的只有姚溱、于伶、黄源、陆万美等。尽管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小道消息”，但是通过昆仑公司的人，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作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

这一年4月初，上海市委接到中央通知，要刘晓（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和我立即赴京，准备参加以林伯渠为团长、沈钧儒为副团长的中苏友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建国之后第一个访苏代表团。团员共25人，有工人、农民、部队代表（加上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代表）、青年、妇女等各方面的代表，也有竺可桢那样的大科学家，欧阳予倩那样的戏剧界元老，谭惕吾这样知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我和刘晓及上海市的工人代表陆阿狗等于4月10日到北京，原定刘晓任这个代表团的秘书长，但是到北京不久，记得是15日，刘晓忽然向林老报告，说全党要搞整党，上海要他留在上海主持这一工作，所以就由两位团长决定，由我任秘书长（代表团内还有一个临时党组，也由林老指定我为党组书记）。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一是这是建国后第一个访苏民间代表团，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没有外事经验；二是这个代表团来自五湖四海，有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又是第一次汇在一起出国访问，对内对外有一个团结问题，又有一个内外有别问题。加上两位团长都是高龄的长者，他们不可能管团内外的具体工作，所以我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上实在是力不胜任。我找了一位无党无派的科学家袁翰青为副秘书长，帮我做一些日常工作。这个代表团4月12日在北京集合，16日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莫斯科。在苏联访问了十天，后经中央电报通知，要组织一个以沈钧儒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德友好代表团，访问新成立的民主德国，因此从4月中旬到同年6月，我一直在国外。

《人民日报》批判《武训传》的事，是我从德国回国途中经莫斯科时，当时的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告诉我的。我记不起具体日期了，回到北京，已经是6月下旬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头写“出访总结”，周扬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见面之后，既没有寒暄，也不问我访苏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我说：我回国途中在戈宝权处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具体情况不了解，现在正在赶写出访总结，还来不及考虑这件事情。周扬接着就说，总结之类的事让别人去干，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对此我很意外，我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我与周扬是老熟人，尽管他现在是中宣部分管文教的常务副部长，是顶头上司，但我还是敢于同他抬扛。我有点感情激

动，而周扬却非常平静，他说：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字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他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我正要讲话，周扬很严肃他说：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我想到了“只讲团结，不讲改造”的问题，想起了“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等等，于是我就说：好吧，明天写完出访总结，后天就回上海，这时周扬才露出了笑容，说这样就对了，现在我们是执政党，党员——特别是共产党员要勇于负责，要你写检讨，主要是因为你是华东和上海的文艺界领导。

回到宿舍，我就托人买了下一天回上海的车票（当时还没有定期空运航班），同时也给恩来同志办公厅打了电话，说原定向他汇报访苏访德的事，因为有要事赶回上海，所以只能请他看书面总结了。意想不到，正在第二天下午收拾行装，准备赴车站的时刻，恩来同志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当天到西花厅去，说除汇报外，还想和我谈谈其他问题。我只能说，一小时后我就要上火车回上海，所以只能请他电话中指示了。总理迟疑了一下之后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说你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饶漱石和舒同。这个电话使我放了心。我对总理说：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我当负主要责任。我回去后一定要公开作自我批评，还要对我在上海的领导工作进行一次检讨。总理又重复了一次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

回到上海，我先向饶漱石、舒同作了汇报（这时陈毅在南京），饶漱石面无表情，更不讲他对《武训传》的看法，只是听我说要公开作自我批评和写文章检讨时，点头表示同意。

我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约 100 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在《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26 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此文发表前夕，周扬还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他还亲笔修改，有一段话是他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说：“检讨了就好”，所以要你“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对我来说，这件事问题不大，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后还约我去谈话，在座的还有市教育局局长戴白韬（他因为写文章捧过《武、训传》，也受到了批评和作了公开检讨）。陈毅说：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 5 月 23 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由于此，上海只开过两次电影界的 100 人左右的会，基本上没有搞运动。当然，《武训传》批判对电影界，对知识分子，

影响还是很大的，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大锅饭”、“铁饭碗”的毛病，这时候已经看得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周恩来同志对这一事件表示的宽广胸怀和负责态度。除了前面已经讲过的对孙瑜、赵丹的关怀之外，1952年3月，恩来同志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万人大会作报告的时候，他提到了《武训传》问题，他说：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时，当孙瑜向他提出想拍《武训传》时，他只提了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和刘少奇一起看的）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对此他负有责任。同时，他还说，孙瑜和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在解放前的困难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千万不要追究个人政治责任。

《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个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不会甘心的，“文革”开始，上海首当其冲的是电影界，就是郑君里和赵丹。这些具体情况在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黄晨（郑君里夫人）揭露得很详细，当时报刊上也有记载，不详说了。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6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50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10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者舍、曹禹，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

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 40 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 年的反右派，1959 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 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1991 年秋·北京

从一部影片的复生说起

干学伟

每当我听到《周总理，你在哪里？》这一哀歌时，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总理在日理万机之间，不仅对整个电影事业的规划都亲自过问，而且对我们的创作思想、生活、工作都曾亲切关怀，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一 《内蒙春光》的夭折

1950年，当我们迎来了开国以来第一个春天的时候，我初次执导的电影《内蒙春光》上映，受到了热烈欢迎。

《人民日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好评。

全北京影院上映十来天后，上座仍然甚佳，影片发行公司决定继续上映。

突然，中央电影局通知我，当夜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复审。

夜里，来复审的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维汉和戏剧电影界前辈全国文联领导阳翰笙同志。见面时，他们都对我很亲切。可看完影片后，李维汉同志很惋惜地认为这部影片不宜再映出，它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

他说，“你在影片里虽说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在形象处理上却大量暴露他们，以至被国民党反动派败兵由抢劫而枪杀

我其实是想表现他勾结反动派引狼入室自食其果。

“明眼人可一下看出，这是‘借刀杀人’，你前边暴露太多，后边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这样就决定停映。

那天夜里，阳翰笙同志送我回住处，在车上他安慰我说，“小兄弟，别难过……”

我口头上说，“没关系，再拍一部……”可内心深处却深感痛楚。这是我梦寐以求几年才拍成的第一部影片。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深入内蒙草原陈巴尔虎旗，看套马、摔跤，参观喇嘛庙、吃奶茶。睡在蒙古包里的皮垫上……研究蒙古史、收集蒙古民歌；8月8日出外景，烈日晒脱了两层皮，等大雪纷飞才回厂拍内景，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内蒙春光》夭折了，我饮食无味，通宵失眠。

二周总理来了！

正在此时，忽然接到电影局通知说周总理要看电影，让我准时出席。这更使我感到意外和不安。一部电影竟然惊动了总理。

晚上，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放映厅。不一会儿，就来了中宣部陆定一同志，周扬同志，文化部的沈雁冰部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刘格平主任，人民日报社的邓拓同志，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戏剧、电影界的袁牧之、陈波儿、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等前辈艺术家。甚至素未参予电影的一些作家如赵树理也来了……到场约100多人，而且仍有人陆续进来。这真使我不知如何接应才好。

不久有人告我：“总理来了！”

我急急忙忙往外迎，总理已经步履轻捷地进入了放映厅，陈波儿和袁牧之同志将我介绍给总理，总理微笑着伸出手来和我有力地握手，并说，“我见到过你的剧照……”我想他指的大约是在《带枪的人》中我饰列宁的那张照片。那是1942年曾由我党驻重庆办事处转交给塔斯社驻中国分社，寄往苏联的。当时，在重庆的鲁艺老同学张颖同志告诉过我，并寄来了放大的剧照。

总理竟然记得那张照片，他的神情使我惶惶不安的心情稳定了一些。

总理同郭老等先到的几位谈了几句，就建议大家先看电影再讨论。请大家就坐，并叫我坐在他身边去。

灯灭了，银幕上出现了大量的蒙族演员，总理轻轻地对我说：“这么多蒙族演员，好，你从那里找来的？”

我说：“内蒙文工团！”

总理说：“拍蒙族题材的影片，应该多用蒙族演员！”

当时，我只想到总理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团结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以后我才想到总理之所以赞同，也可能是从演员气质上考虑的。在我们汉族演员中要找像影片中主角顿得布这样剽悍、粗扩有力的人物实在很难。蒙族演员恩和森饰的顿得布，这个王爷的牧人，走几步路，也能让你感到这是草原上长大的。而且对于这些蒙族角色的性格、神采、风俗、心理、骑术等，由蒙族演员演，他们领会人物的深度，甚至会超过编剧和导演。

当银幕上出现内蒙领导机关的办公室时，总理又问我：“这办公室那么大？”

“内蒙接收了敌伪产业，我们制景时又作了点加工。”当初，我总觉得我们解放了全中国，我们的领导机关应该有点气派、庄严。“像样点！”

总理马上纠正说：“不要这么大，要朴素！”

我心想，“糟了！”当时内蒙虽然接收了敌伪产业，实际上并不铺张。我记得在内蒙体验生活时，有部分时间住内蒙党委，就同党委书记、部长们一起生活，他们还是过供给制生活，吃集体伙食。但我的艺术加工却帮了个倒忙。景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当然是联系着的。

故事发展到牧人顿得布去找他爱人时，那个牧羊姑娘正唱着牧歌。总理又问我：

“这曲于是民歌还是创作？”

我说：“在民歌基础上加了点工。”

总理说：“还是用原来的民歌好！”

我立刻感到自己原来的处理多么粗浅。我本以为民间创作是“豆芽菜”，总应该加以润色。却没想到民歌是家喻户晓的，如果在银幕上原封不动地搬上去，群众在欣赏影片时肯定会感到更亲切，自然地使歌曲融化于剧情之中。现在将民歌改动后，当内蒙群众听到自己熟悉的民歌中出现了新的音节，即使改得非常好，也会突然一愣，从欣赏剧情中走神。从此可见总理在看电影时不只从政治思想上考虑，而且也在深入地体会、揣摩蒙族观众的审美心态，才提出这样的意见来的。他的审美观就是那么富于人民性……即使从处理如何运用插曲来说，也是具有普遍的意义。

电影放到王爷府宴会一场，我低声告诉总理，“这个中间跳舞的是乌兰夫同志的儿媳妇。”

总理高兴他说，“噢，他有这么大的儿子啦？！”

电影放完了，灯亮了，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

第一位发言的就是郭沫若副总理，令我惊奇而又欣喜的是郭老的发言既真诚又直率。他说：“我原来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想把它拿去换一些外汇来呢！现在看来可以改一下……”于是他说出了他的设想，一个很简单又令人发笑的改法。

洪深老和欧阳老认为这部影片不能改，在他们看来影片的蒙太奇处理的

构思较严谨，改动很难，改不好就乱了。

周扬同志认为为了避免不利影响，可以在东部地区放映。

田汉老认为党的政策是全国性的，不可以在某些地区放映不利就在另一些地区放映。

总理想请邓拓同志发言说，“人民日报社的邓拓来了吗？你们不是发了赞扬的文章了吗？”

邓拓同志站了起来检讨了对于民族政策理解不足。

有人主张这部影片再过几年再放。

蔡楚生同志发言说：“电影在技术上发展很快，如在仓库中搁上几年就可惜了，损失太大了，还是修改的好……”

于是就有人赞同蔡老的意见。

最后，总理作了指示，那已经是深夜了。

总理的讲话较长，我在当时的记录和电影局发给我的印件已在“文革”中散失。现在我凭记忆记得的大致如下：

总理首先指出这部影片的责任不在编剧，而是我们领导部门对民族政策的认识不一致，对统一战线认识不足。

总理指出，历来，旧社会的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总是采取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的。一方面是欺骗、分化并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同时又压迫剥削少数民族，使其贫困、愚昧而受到削弱，以达到统治者易于驾驭的目的。这些统治者将少数民族逐步赶上高山、逐向沙漠，逐出较富裕的地方。因此解放前，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造成的。

接着总理指出我们的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我们当然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应该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人民群众都理解只有各兄弟民族之间团结和互助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的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应该努力争取团结，使其明了我们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兄弟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从而消除对我们的误解，接受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政策，以便有利于达到全国各兄弟民族大团结的目的。我们要从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逐步对少数民族给予帮助；有的地区应使少数民族迁下山来，注到较富庶的地方来，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以解决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的问题。

最后总理宣布这部影片决定修改，并请座上的同志们多提建议，给予扶植。总理的讲话不仅使我对影片的修改有了深刻、准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使我对马列主义在中国民族政策上的体现，有了更广泛深入的领会。他从历史到现状都作了全面的分析，并阐明了决定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我想，这对于所有到会的同志们都是受益匪浅的。

散会后，我向总理表示一定认真地将它修改好。

在总理讲话时，郭老因为耳背，要了我的记录去看，并在会后用车送我回住处。

在波儿、牧之、蔡楚生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推敲，影片终于改拍完成，经过文化部审查，波儿同志又让我请总理审查。

那天夜间，我和白大方同志到了中南海，邓颖超同志正在看纪录片，那是皮包机放映的，影像很不稳定。我心里很难过，心想一定要给电影局反映

一下，改装放映机座机。为了避免打扰她，我们就悄悄地坐在后边。她看完了，没有发现我们。

一会儿总理从外边回来，见到我们很高兴。一面脱大衣一面说，“你们辛苦了！”说着就一起坐下看电影。他见到影片在争取上层分子方面加强了，上层分子内部出现了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包括倾向我们的人物；这样基本上符合了政策精神，关于办公室和有民歌的两场戏也改拍了。

总理看完后，稍加思索，即表示他对影片已没有什么意见，再请中央的其他同志看看。

接着他问我：“这是你导演的第几部片子？”

我说：“第一部，一面工作一面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

“互相学习嘛！”总理说：“你们长影有多少演员？”

这一下可把我“将”住了。因我当时除拍片以外对其他的事什么也不下闻不问，只能估计着：“大约两百多人吧！”

“怎么会那么多呢？”他很惊异。

幸亏片中饰王爷的白大方同志回答了一下：“141人。”他本是长影的副书记。

总理笑着瞅了我一眼说：“这还差不多！”

于是又站着谈到北影演员科的学习问题。据他说演员每天要到科里报到，集体看报或学习。总理说，“都是有文化的人，为什么要集体学习呢？各人都可以自己看报嘛！你们回去告诉牧之同志，不必这样……另外，上海的白杨想来北京工作，怎么说，北京的生活条件不如上海好，拒绝人家呢？应该欢迎人家来嘛！”最后，总理叮嘱我们将以上两件事转达给牧之同志。

我真没想到总理消息这么灵，对于干部的情况了解得那么细致。

这部影片又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看了。因主席觉得片名不好，我就请主席改个片名，主席给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并指出前边加上一场戏。

这样，经过周总理的关怀，已被停演的影片得以“再生”！这对我的创作进程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这部影片后来得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的文学奖，并在1951年国庆节，同时上映于莫斯科的18家影院。

三教书还是创作

1961年6月间召开了电影创作会议，这是“大跃进”后，开始整顿、调整的一部分。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有关创作思想和电影事业领导作风的报告。

他在讲话中提出不应以粗暴的方式来领导电影创作，对命令主义的作风作了批评。认为应按电影创作的规律来领导创作，并鼓励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现实地反映和描绘矛盾中的人物，而不应避开或削弱矛盾。当时，他举了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为例，认为影片的导演和作者还没有敢将两个父亲——一个生父和一个养父之间、女儿同她两个父亲之间的矛盾表现够。究竟认不认生父，究竟让不让孩子跟生父走……都没有充分表现够，这样就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总理所举例子虽然不多，但在实质上已指出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3年中创作思想方面一大弊端，就是不敢正确地深入表现矛盾，而粉饰现实生活。

这次会议中总理的报告活跃了创作情绪，很多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通过了电影创作的八条原则，其中有一条我记得是电影导演有权选择剧本。显然，这对繁荣电影创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仅如此，总理还深入到创作人员中来，启发帮助我们。

有天晚上，会议期间集中住在新侨饭店的大多数人都去影协看电影了。我正在房里看简报。

“老干，总理来了，快去赵丹房里……”成荫同志通知了我就回身走了。

我走过过道，见吴大同志还在房，就叫上了他。

我们到了那里，才知总理是同曹民同志一起来的。房里还有：赵丹、黄宗英、陈荒煤、袁文殊、成荫等同志。

赵丹要将我介绍给总理，总理说：“我认识，老朋友了……”就伸出手来。

我急忙握住总理的手向他问好。

赵丹让服务员送来了一瓶茅台、一碟炒杏仁和一碟糖炒核桃仁。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话。气氛很轻松也很活跃。

我因有点胃病，不敢喝酒，赵丹劝我说，“总理来了，喝一点！”总理也举着杯微笑着，我就稍喝了一口。

“抗战8年，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总理看着赵丹说，大概回忆起在重庆时期认识赵丹的时候了。“开国以来，可真觉得时间快得很快都赶不上……”

赵丹说：“总理，你们年轻时期怎么就能做那么多事情，我们怎么就不行呢？”赵丹是个既活泼又爽直的人。

总理微笑着说，“时代不一样嘛！你们要在那时代，也可以做很多事！”总理总是那么鼓舞人。

忽然，总理问我：“你在干什么？怎么好久没见你的片子？”

我说，“我在电影学院。”

“当副院长？”

“不，教书。”

“怎么，你不想拍戏了？”他似乎很有点诧异。

“我想拍！”

“对，你还是拍戏好！”

其实，我那里会不想拍戏呢？当时，我虽已从事戏剧、电影工作20多年，但在电影方面只导演了3部影片。我在电影工作方面经验还很不足，我怎么会舍得丢下创作而“好为人师”呢？可是主管领导要我教书，我也只能服从要求。当时，我真想立刻请求总理同荒煤同志说一下，只要他同意，我就可以搞创作了。可是又想这一点事还是下边解决为好，反正总理问我时，荒煤同志也在，这事容易办。

后来总理说，“你们开了好多天会也该休息一下了，明天是星期天，去香山玩一下怎样？我也去！”当然，大家都高兴。

总理又问，“孙师毅最近表现怎样？”

袁文殊同志说，“还好！”

总理就说把他也叫上，再叫上王莹。

第二天，总理在香山的双清别墅见到我，又拉着我的手向我讲搞创作的事，正好于蓝同志在旁插了几句话，就把话题打断了。当时，有个记者抢着拍了照片。照片中总理握着我手，这照片我至今珍藏着。

总理对创作人员就是这样关怀备至的。
我怎能不铭记终生呢？

导梦觅踪，重沐甘霖

岳 野

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时间稍事停留。弹指 30 年未到北戴河来了。建国后，我的几个电影和话剧《熔炼》、《詹天佑》、《同甘共苦》、《友与敌》等都是在这里的海浪催拍下完成的。今年不同，未带任何文具和腹稿，纯为避暑消夏而来，只是带来 7 岁的小外孙安奇做伴。安奇的存在可以随时提醒我已远非争强好胜、远游海心的青壮年代，下海时得注些意了。然而心不老、性难移，每每带他下海戏水或去海滨闲步，如烟往事索满心头。由于“三代不离姥姥门”，安奇长得酷似他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二舅彩轮；他的撒欢、他的喊叫一次次令我产生幻觉，总把我拉回到彩轮幼时随我来北戴河时情景之中。啊，那不虑梦破翅折紧扣人生之门，直闯生活海洋的自感奇佳的 40 上下的年华哟……

远在建国初，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前后，当时主事的陈波儿同志为了给创作人员选一写作的场所，便想到了当时还未被人们注意的北戴河，立即派了杜谈同志等前去“号房”。他们一眼看中了中海滩那座由英人金达营造的别墅，因为它地处距海滩不到 300 米的斜坡之上。海浪松涛谐鸣尽收耳目，在房间里换上游泳衣，便可直步沙滩入海。而四邻建筑也皆松隔数百米，互不干扰。可谓休养写作佳境所在。1958 年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撤消，一少半人员分发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另一大半则由当时担任编辑部主任的我带进北京电影制片厂，同时也把北戴河这座休养所（最初便是为了在当地取得休养所的供应而取名）带给了北影。令人惋惜不尽的是到了全面遭劫的“史无前例”年代，由驻北冰军宣队头目宣布为“黑窝子”、“修正主义温床”、“炮制封资修影片的基地”，在中央机关无暇顾及的情况下，一声令下交给了当地政府，“文革”后数次派人交涉，要求收归北影，已难如泼出之水。原来这座楼院早就为中央机关及当地领导看中，曾数次要合并划归他们，所幸最后由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说了话，北影的使用权才一直未有人再敢问津。当然，最有力的支援，还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莅临，亲往视察慰问在那里正搞创作的同志们。行动是最强音也最实惠。正如那天之后，当时还是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说的好：“凡事只要有总理，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时光流逝，物是人非，可是那个英国铁路工程师金达在中海滩设计修建他的安乐别墅时，万万没想到将一切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中国的人民的总理竟也会走进他这座楼院。

这是 1962 年夏天的事。

中海滩北影“休养所”里，又一次汇集了一群影、剧界的知名人士，不，有的还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身为中央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同志也住进那楼院十数天。先后来的是白杨、金山、张水华、谢添、孙维世、岳野、田方、于蓝、海默、赵慧深、孟广钧、谢芳等。编、导、演们有的在写本子，有的在分镜头，有的在准备角色，可谓忙做一团。但每每抽空下海，便又是各显其能、云翻阵黑，兴之所至便呼啸东去金山嘴腋部郭老（沫若）住处邀他老和夫人于立群一块下海比游。有时住在附近的曹禹同志也来参加，可谓是飘一海。要说最有勇气向生活挑战的还是白杨。她不谙水性，屡见大家嘻笑弄潮，这天她实在忍耐不住，便不顾一切跳入海中，胡乱向深处

“划”去，此时海里人正争相“表现”，沙滩上的人正在海吹胡擂，谁也未察觉白杨有此“绝技”，得方金山偶一抹眼，发现小杨（文艺界惯称白杨之名）正在胡乱扑腾。大口大口吞咽海水，但并不呼叫。老金便一把将我推进海里去救，方才幸免这颗大明星的“过早殒落”。事后问她明明不会水，为什么愣往深海去游，她却没事般笑道：我看你们在里边都舒服地漂游，我想我也成。天真的机械论！

一天下午，孙维世乘一辆大型卧车自外面回所，司机同志进院坐了坐，走了走看了看，便驱车回去了。然而，不一小会儿工夫，他又将车开回到后院门外，仔细地倒好了车，稳妥地开走了。当时有人问孙维世是怎么回事，她笑而未答。事后方才明白，原来那天孙维世去西山看望她的周爸和小超妈妈，叙述我们这里的情况，引起了两位老人的浓厚兴趣。周总理说，天天忙，总想好好休息半天，正好到你们那里看望大家，聊聊天，松散一下。细心的司机同志在送孙维世回所后，便也仔细地看了看地貌地形，他发现卧车从北戴河干线东经路弯进保五路，下坡至北影休养所时，路窄，还有两个直角的拐弯，卧车车体较大，几乎拐不进来。当周总理知道了这情况后，便坚持在东经路保五路路口下车，步行下坡走向北影休养所。司机和警卫、秘书那里肯许。因为自保五路口至休养所还要路经几处破旧建筑，其中一所房里还住着一位荷兰国老太太，不安定因素较多，司机便以其高超驾驶技术练习了两趟，次日下午便稳妥安全地将周总理和邓大姐送到北影休养所后院门口。

总理下车后夸奖了司机，便携邓大姐步入院内，受到我们这帮文化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伸出手来与每个人谦恭握手，说谦恭是一点也不错的。总理握手时总是双目友好尊重的看着对方，在他看来那是信条：对人嘛，就是要尊重。而表达尊重的标志便是视眼中有没有别人。当总理发现伙房门口立着炊事员时，他便紧步上前主动与之握手，弄得炊事员连忙在围裙上把手擦了又擦方不好意思地伸出双手握住了总理的手，细心人皆不难发现，我们的炊事员两眼闪着泪光。关于总理尊重、平等待人的事可以举出很多很多。1960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复排上演话剧《抓壮丁》，那晚总理也去剧场看戏，正巧我带着方9岁的大孩子岳重就坐在总理的身后。当岳重发现总理后，一向观剧神情最专注的他，便再也看不清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兴奋得只是望着他眼前的只在照片上看到过的伟大的周爷爷了。中间休息时总理被请到剧场休息室，金山招手叫我去陪陪。进入休息室，总理并没立即就坐，他等着与每个人握手致意。当总理与我握手时，岳重却胆怯地躲在我的身后。这哪能逃得过总理的眼睛，于是他竟绕到我的身后去与岳重握手，那神态是那样平等、谦和而又慈爱，简直把岳重当驻华使节对待了。平时给人的深刻印象，周总理运用最多的体势语便是握手，他在不同场合，与不同人握手，常常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深深打动人们的心。总理那晚环视室内看已与所有人握手致意了，这才步向沙发坐了下来。他神态自然，仪态万千，无与伦比的杰出，又无与伦比的平易近人。这种伟大人格，伟大风范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华民族礼仪精华，是他那丰富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至于他那机敏睿智、练达大度更是令人感佩。当邓颖超同志见到总理与炊事员握过了手，便笑着缓解他的情绪问：你给他们（指我们）吃过“无肠公子”没有？这一下把炊事员问得更情了。总理笑道：“无肠公子”吃可以吃，但决不能学它，一无心肠，二横行霸道。这时大家方才明白，他们二老说的是螃蟹，于是又是一阵欢笑，总理补充说：是啊，搞艺术创作没心没肠怎么行？现在就是要求你

们心眼多些，肠子弯弯多些个嘛！

笑声中，大家把总理和大姐拥入朝向海岸的那间小客厅，其实就是我们的餐厅。总理并不坐向显著位子，与邓大姐并排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时谁都一肚子话要向总理说，许多问题要向总理请示，多盼望能听听他那精辟服人的回答呀。可是都又知道，总理即是在北戴河期间仍然是日理万机，国内外大事无一不经过他的思虑然后提出可行方案，最后请毛主席一锤定音，他太累了。今天再不能把一些烦恼事，把问题提到他面前了。为了让他有一会儿休息，让他得到些轻松愉快，不约而同，大家全都会意，“莫谈国事”，偎依在邓大姐身旁坐着的孙维世向我示以眼色，意思是让我说个笑话，金山带头喊了：欢迎岳老讲笑话！说实在的，我真是一无思想准备，要该着平时，笑话还是能说上一篓半筐的，可是面对总理和大姐，却不知那些笑话都躲到哪里去了！看春总理望着我那期待的目光，我再也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临时便把前不久，袁文殊同志由上海到北京时，在火车上发生的一个误会说给了总理和大姐听。事情是这样：袁文殊同志已调到上海市电影局当局长，还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但是家仍住北京西单花园饭店，一时还未搬去，所以隔些时间便回京看看。那晚从上海站一上火车，却也巧，他的软卧票是在车体一头，是个半间的软席房间，因此，便只有一面上下铺位。中途夜里袁文殊正睡着，忽被上铺的那位乘客喷气惊醒，连忙起身一看，那人口吐白沫，急病发作，他便连忙叫来列车长设法，列车长即指令广播室呼求旅客中之医生前来抢救，不料迟迟未有人来，眼见病人情况严重，便不得不下令到前方车站停车，以把病人速送往医院治疗。一切联系妥当，但临时停车只能停留一分钟，当地医院准时开救护车前来迎接。当担架进车厢将病人抬下车时，列车长突然想到，由于病人昏迷，无法问明其发病经过及姓名地址所属单位等，便请袁文殊做个证人，并写下姓名、地址、所属单位，袁文殊匆匆忙忙写好，列车长抓在手里，追到正抬下车的担架旁，把袁文殊的留条，一下塞到病的人的枕下，站停一分钟已到，列车便开走了，一场大误会便也发生了。当地医院为病人登记时，便把那病人认为是袁文殊了，于是上海、北京当晚皆收到加急电报。上海电影制片厂由于袁文殊赴京途中病重，下车就医，事关重大，便连夜通知了上海市电影局，上海电影局又连夜通知了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而北京花园饭店袁文殊的爱人肖龙一夜之内一连接到医院、上海共三封加急电报和中央电影局值班室的电话，本来就有严重心脏病的肖龙，哪里经受得起这突来的意外撞击，但也顾不了许多，连夜搭乘南下列车，直奔病人下车的医院而去。及至到了医院，奔入病房，她也昏倒过去。等她醒来，扑向病床始发现袁文殊大变了模样……

正当北京上海忙做一团时，袁文殊却一人安睡在火车好梦连篇，到达北京站后却不见有人来接车。等了一小时、两小时仍不见一个人影，在没有出租车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大包小包一人提上公共汽车，好不容易才到了家，他提着东西，生气地把家门踢开，嘴里还大声嚷嚷着：怎么搞的？可是家里却不见有人，直到第二天夜里才见到爱人肖龙匆匆赶回家来。其实我讲述得自己并不满意，可是总理笑得前仰后合，几次带头鼓掌。我当时想，总理啊，只要你笑笑轻松轻松自己，我这个没讲好的笑话的价值便也值千金了。慈母心肠、仁爱宽厚的邓大姐笑完便说：人家病了、肖龙急死了，可是我们倒还乐呀乐呀的。总理大度地说：好在是场喜剧。并进一步以此为例说明现实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是创作的源泉，常常你坐在屋子里想不出来的情节，可是

生活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却是十分生动、真实，是你们搞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由于我们的“导向”正确，唯一的目标是逗总理乐，让他得到哪怕是片刻的休息，反正净说些“不正经”的事，逗得总理拍手笑着，他兴之所至，还与赵慧深开了句玩笑。临行他宣布了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明天，在他与邓大姐的北戴河住处，请我们大家去吃晚饭！

汽车慢慢驶入西山，这中央领导同志的居住区，林径见清幽，属北方地域的渤海湾，山山翠绿、树木葱笼，却少见竹林，因而便也没有在与南国山林中“好竹连山觉笋香”的感觉，但另有壑走泉声、槐柳苍虬的浸人的凉爽。平时本来我们只要聚在一起便哗笑成海，由于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时车上却升腾起一种朝圣的庄严感，仿佛我们也都有了“四面海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之慨，去总理家做客呀！

总理卧车分三批把我们接到他所住的那座老式楼前。这座楼什么年代为什么人所建未敢细打听，给人的印象是一座空阔的楼房，这首先是由于它那空阔的大客厅给人的印象使然，厅的左侧是一张长大的案子，有近三米宽、近十米长，案子周围一把一把整齐地摆放着靠背藤椅，而每把藤椅前的长案边沿放着一把大芭蕉扇，真是令人起敬，不设电扇用芭蕉，清廉之风可见！不难想见总理在这里经常召集各种会议，有“内阁”成员，也有各路贤达，自古得天下以人心为牵，理天下靠四方贤才同治，真是胸纳四海，支手托天。这么一个刚刚解放了的大国要百废俱兴，何次于做天之难？单就今日他这大有古贤“饰责帛而礼儒生”“不暇于诗书”之情怀，岂非其执政良划之举？

到客厅中前方，那里有书案书橱、报架、全国各类新出版之杂志陈列，厅之右侧靠里摆放着乒乓球台和台球设备，好动的谢添、海默等一见便要上前比赛。正在此时从大厅一侧通向楼上的高高楼梯上款步走下来周总理，一声欢迎，使得各有其姿的我们立时“定格”，旋即皆序然迎向穿一身夏日便服今日做东的周总理。总理微笑着走到我们中间，又是一握握手，然后说：大家随便玩玩吧，吃饭还有段时间。大家便像是回到姥姥家的一群孩子，撒开欢看这看那、玩这玩那，好奇加兴奋，便也忘乎所以了。

我正在陈放杂志的案头翻阅一本画报，觉得身后有人轻步走来，当我转身一望时，却原来正是总理翩然步来。

总理望了一眼我手中的画报问：

“你在写什么啦？”

我忙答：“在写，不，在修改加工电影本子《詹天佑》。”

总理问：“不是年初已经发表出来了吗？”

我答：“是的。听了些意见，特别是张骏祥同志要执导、金山要主演，他们提出了许多好意见，所以，此来就是要进行些修改、加工。”

总理稍事沉吟道：“詹天佑是中国人的光荣，你可要把这个大本子写好、改好！”

古人云，好官明察秋毫，周总理不但了解文艺界动态，连我这个普通创作人员正在写的本子他也了解并给予关怀。实令我立觉在立于地茂天青之境，心门大开，并憬然顿悟，增强了任务意识，找准了“我在做什么”的感觉。

说到电影本子《詹天佑》可算赛剥之极。30年来许多车辆皆从它身旁超越驰去唯有它还一直绕行在慢行道上，迄未达终点。1964年北影力排争议

成立了摄制组，由凌于风任导演，开拍在即，便开始了文艺界的“四清运动”，被上纲到“帝王将相”题材，甚是“卖国主义”而拉下马来。“文革”后，北影导演傅杰又打算拍摄，天下谋，志未竟，他溘然逝去！再往后便是众所周知的理由“不卖钱”，搁浅至今。由于痛感有辜周恩来总理的当面教诲，在许多好心领导和友人支持下，正当我70岁正，我将其改写成八集电视边疆剧，得到吕老正操的关怀支持，铁道部正致意与中央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但愿有志者事竟成。

那天在总理的住处临吃饭时，先闻其声，后见其人，陈老总携夫人张茜同志来了。周总理立即宣告，今日我和小超（总理平时对邓大姐称呼）请大家吃便饭，特邀请陈毅同志张茜同志做陪，陈老总连连拱手，荣幸之至。饭是中餐西吃，每人一碟菜，主食有馒头、蒸饼和米饭可以自取。菜盘内有柔香而不腻，晶莹如琥珀般的红烧肉五六块，有油菜、菠菜，还有榨菜丝等几样，人手一份，或坐或立，不围桌，不成席，随意自在，孙维世以主家大小姐姿态，忙出忙进帮着炊事员端菜、端汤，照顾大家。总理说，饭菜不好一定管饱，大肚汉们可食双份。话音既落，瞧有几个馋客便立即加快速度，再食第二盘。陈老总边吃边大声道破了一个惊人的内情。他说今天总理夫妇请客，未动用国家一文钱、一两米、一两肉、一根菜，完全是他老两口平时供应的节余。同志们吃着、听着，心里极力不平静，1962年我国正处三年困难时期，每人的主副食皆定量供给，我们这群素不拘礼仪的“老九”们，想到多吃多占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口粮及副食供应，也感愧交加了。陈老总边吃边向邻近的同志低声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此时我们每个人对每粒饭、每块肉更细加品味起来，鸡吃萤火虫，心知肚明，不能只图个齿颊嘴香，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哺育啊！

陈老总放下餐碟，接过孙维世送来的热汤，继而对大家说，我和张茜同志不得不向各位同志抱歉，我们俩口子请大家不起，因为总理老两口没有孩子，他们口粮有得节余，我们孩子多，多没啥剩余，实在惭愧。总理总是相国从容、策划有方，立即指着陈老总说，你刚从日内瓦外长会议上回来，他们搞文艺创作，很需要多了解些国际形势，那你就给他们讲讲日内瓦会议，给他们一次精神会餐吧！话音未落，大家敲盘喊好，陈老总爽朗起身：好！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完成！又是鼓掌欢呼声把会餐推向了高潮，陈老总坐下来向身旁的人低声说，总理不但以正治国，还善于以奇用兵，我一出头，便抓了我个官差，说时大笑起来。

饭后又吃了西瓜，总理便又提议搞文娱活动，第一部分说唱，第二部分比赛乒乓球，等轮到周总理出节目时，邓颖超同志报幕：下一个节目，男声独唱《洪湖赤卫队》选曲，演唱者：周恩来！总理不拒不推，正正经经走到大家面前的“表演区”，只是临时拉了一位女演员同他一齐唱了起来，总理的平朴可亲令睹者心灵震颤，闻者动情泪落。

是的，总理的工作方法高明巧妙。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文艺界谈到有关文艺创作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说出了一些为大家所熟记的名言，比如他对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归纳为：“长期积累，偶一得之”；还有那丰富了典型化理论的观点，“以特殊的个别反映一般”，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之“寓教于乐”其实两天来总理对我们这批艺术工作者的教育便是寓于欢乐的娱乐之中的，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中让我们获得了教益与启示。……

山川风月本无常主，闲杆便是主人，我想今年来北戴河既未带任何任务，

便领着小外孙安奇漫游 30 年前曾经到过的地方，特别是中海滩一带，那座楼现已无权居住了，中海滩仿佛也不是我们的了。那天我真的如梦又似真地登上原北影休养所前沙滩与海浪相吻拍处的一座孤石“清脑台”，是说有谁创作思路堵塞，灵感不来，便到此清清头脑、登台让心灵面海呼啸一阵，但清脑之名，仅为我等竖子戏称，未广闻天下也。因而只在我等心中保有“专利”，临台不禁失笑成声。

今日上得“台”来，令我吃惊的是腰违 30 年，它的沟壑坎楞依旧，似昨日我就来过一样容貌清晰，我又坐在最靠前的那不平的石楞上，立即便陷入了沉恩，小安奇在一旁沙滩上高喊他要捡贝壳，要我等他。声音很远很弱，更似东风对马耳，我竟未做任何回应。也许是年龄关系，也许是职业养成，反正触景生情屡屡止我陷入痴迷状态。不敢说已达到“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那种境界，但是那些永远是生鲜的往事呀，每每便满心头，令人沉醉。

1938 年抗日战争热潮中，周恩来副主席在武汉亲自组织成立（并一直领导）了 10 支抗敌演剧队，（即“文革”中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别动队”者）10 支演剧队的老同志们是在晏华林成立大会上都亲聆了周副主席的教诲，他根据毛主席所著《论持久战》一书向演剧队以他那闻名于世的雄辩之才做了令人永世难忘的报告。即令是后来才参加到演剧队工作的同志们，也都不止一次地听老同志们转述。这也就成为我们长期坚持抗战的思想武器，1946 年 6 月国共两党谈判破裂、统一战线彻底崩溃，我们五、七两队在广州处境险恶，当时广州行辕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大特务、蒋介石手下十三太保之一黄珍吾殚思苦虑，决心将我们一网打尽，投入监牢。我们地下党的领导人派专人密飞上海去请示即将飞返延安的周副主席，当他听了我们两队的处境后，立即发出：“相机撤退”的指示，我们两队同志才得以胜利地撤到香港，免遭灭顶之灾。

1948 年底，也就是我们在泰国、马来亚、新加坡的巡回演出的最后阶段，当时英殖民主义统治者再也无法容留我们的“红色宣传”，向我们发出了限期离境的最后通牒，由英国警察强行将我们押上码头。——对照着护照送我们上船。7 天后才又回到了香港。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我们进行整治学习，总结了 3 年海外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全体开赴东江游击区参加解放华南的战斗，临出发之前，突然接到通知，选派我和另外两同志由港赴天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青代大会及文代大会。

在刚解放不久的北京，一次在北京饭店举办的联欢晚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我两眼饱含热泪，将由港秘密带来的我们全体签名向他和党中央的致敬信亲手呈交在他手上。我哭了，周副主席抚肩相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请再对已入东江游击区并立即成立了华南文工团的战友们给予指示，他以那惯用的身姿一笑说，你们全都回到了家，我还指示什么，回去问大家好吧。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上，周副主席做了长达 4 个小时的报告，在谈到文艺问题时说我们每一位代表约代表了 100 名文艺工作者，700 多代表便代表着七万多文艺工作者，强调团结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会议期间各代表团还带了文工团，演出了精彩节目，唯独我们南方代表团由于代表分散在各地到北京后方集中到一起的，便没有节目上演。我们的周副主席察觉了这一点，便向团领导欧阳予倩、戏剧家洪深、田汉等指示说，南方代表团里有众多为大家所熟悉的明星和话剧演

员，你们应当拿出一套节目来与大会代表交流。于是便由洪深邀上洗群和我联合将翟白音所著话剧《南下列车》改编加工，并由洪深亲自执导和主演突击排练出来上演了。这里面担任角色的演员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黎莉莉、欧阳红缨、洗群、耿震等，负责服装的是大师辛汉文，我也在这剧中担任了演员，而且是我在北京舞台上参加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怕也是我此生最后一个戏了。至今我再也未上台演出过话剧，专耍笔杆子来。周到的周副主席，无论大事小事都逃不脱他的眼睛，大至国内外大事，小到一出戏的上演，一部片子的拍摄、题材规划、演员的选用……他都操心，有时往往是亲自参与，谁都清楚地感到他的关心，谁都沐浴过他的爱心喷出来的甘霖。

由于工作需要，在北京参加完青代、文代两大会后，组织上便调派我转业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在前门火车站我登上了赴长春的火车，我的姐姐张瑞芳（我小时瑞芳便要我以姐称她）赶来送行，刚好我就托她再见到周副主席时告诉他一声我去了长影。然而就在建国后不久中央电影局成立，又把我们编导人员集中调回北京，由中央电影局艺术处领导。

经过近半年的深入生活，写出了建国后我的第一部电影《荣誉属于谁》（成荫导演，陈戈主演）。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出之后，1950年末送来北京，试映后得到好评。《文艺报》预备发表专文推荐，中宣部领导看完影片后亲自向我祝贺说，你这部电影值得一个勋章。当这部电影即将参加建国后26部国产故事影片举行的展映时，刚刚出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江青站了出来，说这部影片毛主席看了，指出有重大问题，要立即停映检查。我是编剧，因而也就是罪魁祸首。当时还不到30岁的我突地承受此重击当然是感到吃不消。但最终还是体察创作干部甘苦的周总理采取一切措施为我及导演、演员等释压，并且指明方向，继续前进。先是负责艺术创作的陈波儿同志承担了全部责任，继而是周总理亲自出马化个别为一般，就是说从一部影片的问题说开去，全面讨论电影生产领导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提高了认识。影片被关3年之后，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召开期间，做为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大会情况时，席间毛主席问到电影片子。《荣誉属于谁》为什么未见上演？修改一下上演吗！这才解除了囚禁，同时也有力地拆穿了江青“就地正法，执行枪决”，这“决定”并非毛主席的原意。在影片修改过程中，我们才慢慢把一些不理解的问题弄清楚。比如：问题出在片名是高岗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的同义变形。高岗的文章名为《荣誉是属于谁的？》，影片为《荣誉属于谁》。影片中的故事主线是学不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之争，其实也是根据毛主席当时一再讲的，建设社会主义也要“一边倒”、全部学习苏联。甚至还说在工业建设上有些东西可以“照搬”。我在东北深入生活时，也正是中长铁路派有苏联专家大力贯彻推广苏联先进经验之秋。因而影片是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影片中矛盾的双方，即一方为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有成绩者，另一方便是拒绝学习的保守者。自然荣誉也就归于前者。这自然是讲的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决非说的是中国革命的全部。但江青咬定说影片歪曲了事实，宣扬的中国革命成功需要“照搬苏联”。其实这是一般人都明白的，最明显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便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江青在扼杀这部电影时便是不分青红皂白，以这根大棒为手中武器的。至于就片中以家庭母子情代替党性和党的领导等则纯属无限上纲，乱扣大帽子了。恰恰相反在当时一般化、概念化盛行

之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有些人情味正是一次创新，这曾被一些大师们、领导人所肯定。因而修改时仅轻轻触笔未做大的改动。最后这部影片改名为《在前进的道路上》，于1954年公开上映了。这也部分表明了我国人民电影事业初创时期的步履艰难。使我永远难忘的是敬爱的周总理为这部影片还有另一前后发生故障的影片《内蒙春光》（后改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公映）日夜召开会议，讨论问题所在，寻求修改方案。由于他亲自召集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首任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政务院文化指导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还有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副局长蔡楚生等等，也每次都谨恭出席。记得一次夜里在原新影（现为科影）小放映室开会，总理先命放影片，看后便又即席讨论，为了解除为各级负重，总理自己先做了检讨，检讨自己对电影故事片生产关心不够。可是他这一检讨不要紧，部长们、主任便依次起身检讨，众口一言片子是他们通过的，责任便应由他们负。我当时难以猜度坐在一旁的“胜利者”江青是什么心态。我做为一个小兵，一个电影新兵反正是雷鸣电闪深感震撼并深感愧疚，平生从未想到会惊动一国总理和各部要员，如此呕心沥血认真负责几乎做为国事进行讨论。话得两面说，没有《在前进的道路上》便没有《英雄司机》，更没有《同甘共苦》。陈波儿同志为丰富我的生活源泉，建议我到老革命区去住一时期。我与王血波、杨润月、张学新等一块去了河北建屏县，半年多的农村生活，为写《同甘共苦》打下了生活基础。于是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北影招待所小楼上便写了出来。旋即由中央实验话剧院首演，继而《剧本》月刊发表，被首页介荐文章誉为话剧创作的新生面，引起轰动。全国各省市话剧院团皆相继上演。有的省市如辽宁、北京同时各有三个院团三台演出。周总理观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并与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北影未忘让我完成改写电影的任务，但是“乾坤无奈视诗亡”，反右派斗争风势渐猛，本来已有“人性论”等非议的《同甘共苦》越来越被视为可射杀的靶子，1957年也仍是在北戴河北影休养所改写出来的电影本子也只好连忙收起，否则电影拍出来，随时可看可批，岂不更为遭

殃？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话剧的尾巴早已被牢牢抓住，做为靶子的命运是逃不脱的事了。连篇累牍的长文，步步上纲、帽子飞舞，“人性论”之上冠以“资产阶级”，又加“修正主义”，还有“封建大男子主义”等，看来虽有了辉煌的开始，很难有灿烂的结尾了。不久在《剧本》月刊发表介荐文章的李河同志被打成“右派”了，有男儿脸刻黄金印，在笑也难轻藐白虎堂了。在那一根竹杆打倒一船人的时代，认命吧！就在这危急关头，《同甘共苦》话剧导演孙维世同志把我的处境对周总理讲了，总理摇了摇头说：“岳野不是‘右派’，我知道他。”也就是总理的这句话救了我，把我这个擦边球（判严些为出界，判宽些为擦边）判为界内，使我过了生死大关。反右派斗争还未完全刹尾，“大跃进”开始了，趁机我请求下到火热斗争中去，赶快离开北京去了东北一工厂深入生活，免得碍“左”先生们的眼。领导给了任务，自1958年夏我开始根据生活积累写作电影剧本《熔炼》便又到了北戴河这座北影休养所，地上不长无名之草，等我把本子交出来，居然受到了肯定，一冬及次年一春我都是在日夜修改加工中度过。一遍又一遍，恰如钻进长大山洞之中，努力向前就是总看不见出洞口的光亮，不过，当时我想，就是苦苦挣扎至死也认了，不是未让你当右派吗？

时间仍然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它稍做停留，1959年是建国10年大

庆了，决策者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节日，早已开始抓献礼影片的生产，10部影片题材有革命历史、有现实生活，可是当向总理汇报时，百鸟嘈嘈、鸡啼为明，他胸怀宏观，一语破的：缺少轻松愉快、寓教于乐的影片！由于短缺这类影片，10部题材皆觉花色单一。

幸运又降临到我头上，在所有备有题材中仅有一个游泳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的体育片符合要求。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将任务下达给北影，厂领导便下令平时喜爱游泳的我暂且放下又是一个工业题材的《熔炼》，去与谢添突击《水上春秋》，当我见到谢添，不禁惊呼：我的天！眼下已是阳春3月，合共到“十一”，离上演还有7个月，干得出来吗？可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下到国家游泳队，边采访边熟悉生活边构思，最后写出故事梗概，由夏衍同志亲自把关修改，然后把我关进颐和园龙王庙饭庄，20几个日日夜夜终于把文学剧本突击了出来，由此我也得了严重失眠症，可是导演谢添在筹备拍摄过程中又遇上了一个难题，剧中女主角江玉玲的条件是身材修长，面部俊美，会游泳、会弹钢琴。结果在全国各地遍选无着，以致影响了如期开拍，由于周总理关心这一部电影的摄制，经常询问进展情况，夏衍同志便如实汇报女演员尚未找到，总理闻听也着急起来，他一有机会便讲做为演员尤其是电影必备的修养和技艺应当全面些，比如演员要会游泳、开车、还有会唱会舞等，方能演来逼真，不必去找替身。当夏衍同志谈到导演有意去香港选邀一位女演员时，总理想了想说，我和你们一起在内陆寻找解决，最后幸亏有人想到已脱离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接近条件，才如期拍摄完毕，参加了国庆10周年献礼。贺龙元帅看了影片很高兴，肯定是一部成功的体育片，并说有机会一定请总理观看。吃尽滋味盐好，走尽天下娘好。文艺战线谁又能忘掉周总理的关怀和领导？

1960年夏，周总理去西山休息，约了电影、戏剧界几十位编、导、演人员作陪。先是请大家吃了一顿便饭，令人难忘的是总理自带去一瓶茅台酒，席间他拿了出来说平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外宾时他的杯子里是假茅台——矿泉水，今是得宽余和大家一块于两杯过过瘾。总理平时是很有酒量的，只是保卫人员和医生不让他多喝，甚至不让喝。一连干了好几杯，他的保卫人员紧张起来，大家也感到总理如此饮法对他的身体健康确实不利，于是不约而同纷纷起身举杯去问他要茅台喝，抢在前面的，他一一给酌满了杯子，因为酒瓶一直是他把在自己手中的。第二拨再上去把杯子举到他面前时，思想敏锐的他举了举酒瓶，但并没给谁倒酒，笑笑说你们这是“阴谋”，是要把我的酒瓶干了。大家这才重新回到座位上，有伶俐鬼立即上去把个茅台酒瓶抢在手中，拿去做永远的纪念品了。

饭后，周总理号召大家去散步，其实，他是要和大家交谈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大家跟在他身后，他兴致浓厚他说这说那。等走到一座仅留有屋基的地方，站定对大家说，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这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那座房子，写出那首气势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地方，说时他还惋惜地自语了一句，这房子不应扒，应当留着嘛！此时我正好立在他身后，立即想到1949年5月的一天我们参加全国第一次青代会的全体代表列队来此见毛主席的情景，毛主席接见之后，由朱老总主持，请刘少奇同志给我们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时事报告。那情怀、那赤诚、那纯洁又是何等的壮烈啊！总理转脸发现了我问：“岳野，在写什么啦？”这一问我简直像个小孩见到可敬的长辈一样，一脸苦瓜似的回答说：“我，正在写检讨。”总理严厉追

问：“写什么检讨？”我答说：“就是你看的那个戏《同甘共苦》，人家批评说是个坏戏。”总理正色未加思考提高声音：“什么坏戏？我看那是中等以上的好戏嘛！”我是万万没想到总理在政治上证明我非右派，今天又在这场合为我的作品平反，当时我简直就像挣扎在苦水潭中，在无救的绝望情绪中看到了光明，并突然伸来一只巨大而又温暖的手一把将我拉上岸来。我赶快躲开去，怕激动过头失态。就在一年多后的1962年，周总理专程到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会议，两个会除了一块听报告之外便分头又开了20几天，那次开的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会议，皆简称为“广州会议”，在后来的日子里，“四人帮”则称为“广州黑会”。我庆幸自己虽中箭而终未落马，所以便也被邀参加，其实这次大会对正常人来说，都会有“人来无不醉，人离魂不归”之感。周恩来在国事繁忙中亲自召开了会并亲自为两会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们虽然很勤劳、很辛苦、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而精神上都有些不愉快，但仍然各自取得了显著成绩。总理为此换了语速，向受了错误批判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做“精神退赔”，并为知识分子摘帽子，如后来陈毅元帅单独为戏剧创作会议做报告时行“脱帽”鞠躬礼。为了不再乱“挖根子”，总理在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之后，“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远在20年前总理的胆识和的见对未来的历史有着多么犀利的穿透力，有着多么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热烈的掌声和热泪盈眶中，到会的人谁不以自己就在这“绝大多数”之中而自豪！如果遵照这一指示对待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帮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皆心情舒畅地努力做出贡献，国家的兴旺何至延误那么多的年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又焉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浩劫，国力受到那么大的损伤！周总理在做报告时，不，他简直是在与大家谈心，态度是那样平等待人，心地是那样坦诚，看上去他剑眉入鬓，才俊杰出，但他谦逊亲切，他是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最靠得住的朋友又是领导者。他在大会报告中讲他个人如何进行改造、如何走向革命怎样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着辫子……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他接着说：“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但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周总理劝大家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应当目光明确认识自己。总理以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看待自己，他说：“我小时候也还信过菩萨，后来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要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是革命知识分子了。”由此总理便进一步阐明了广大知识分子解放后，学习、锻炼、转变立场提高觉悟，很多人参加了共产党，怎么能仍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总理的报告像春风似盆火温暖抚慰着人的心田。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但这决非说周总理不辨是非，爱憎不明。不！但他也决不轻易发火。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一次真正生了气，发起火来。那是1953年，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他做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影片《翠岗红旗》时，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那是由于我国电影代表团携带这部影片到东欧一个国家参加国际电影节。竞选放映时，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产生了轰动效应。认为我国这部故事影片形象地

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影片中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离开江西老区的家乡，别离了妻子，踏上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20年后，已是人民解放军将军的他又亲率大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们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荣获大奖，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坚持不接受，并再三自甘居后向人家说明，细述这部影片不配获得大奖的殊荣，各国评委无法理解，以至目瞪口呆。每个国家代表皆力争自己的影片获奖，天下居然有中国电影代表团如此的谦虚。当总理说到这件事时他是真地生了气，他严厉批评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他激动难已，高声说，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一时全场给吓住了，受到了很大冲击和震动。那天我正坐在前排左角的位子上，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但见他强力自控了一下，稍事停息，又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的嘛！接着他又详细说明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在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不足那样不足，但是难道历届国际电影节所有获奖之作都那么完美无缺吗？只可惜《翠岗红旗》永远无法收回历史对它的亏欠了。

从那以后，反正我再没见到周总理发过火了。特别是“广州会议”上，他温和令人心醉。一位记者在采访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写道：“历史需要创造者去创造伟大的事件，伟大的事件需要目击者去证实它曾经被创造过。我骄傲，我曾经在那儿！”做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的业绩，决非我这篇文章所能尽述于万一，但周总理与之文艺，与之文艺工作者的交往和友谊，他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教诲，确实我曾经亲眼目睹，有的还是耳聆身受，我也可以响亮地说一句：我骄傲、我曾经在那儿！

得到最后一次周总理的春风般的关怀是在1964年。哪知“广州会议”之后好景不长，回到北京还没“心情舒畅”几天，“左”风又刮了起来，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了一种声音，说周总理在广州开会是“右”了。“退让”得（向知识分子）多了……次年的冬季便也真的又一次开始了文艺界的整风，这场整风也并非和风细雨。也是小会批、大会批，指名道姓、剑拔弩张。当然，刚刚给我的“精神退赔”就又收了回去，还外加一些“利息”。我为《同甘共苦》写了从没写过的那么多的检讨，在小组会上不知检讨了多少遍，仍不过关。即令如此，“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四人帮”仍说这是一场“假整风”。当然，他们搞的“文化大革命”许多老干部、群众遭杀身那才是“真的革命”！

“假整风”也叫文艺界的“四清运动”，一直持续到1964年春。由于农村开展“四清”，便在一个会议上因势利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应当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斗争，应当动员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从而解放他们，放他们到农村的广阔的天地中去锻炼。总理细心周到，他并不只是发出一般号召“算”完，而且具体提出，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公社“四清运动”搞得很红火，北京电影制片厂同在北京地区，应当立即指派编剧人员就近下到那里去深入生活，写出本子，千万不要丢掉这大好时机。不幸之中大幸，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能写，我在北影任编剧，身体较好，写作较勤，正是雨点打在香头上，巧打巧。我被第一个选中，当我得到通知第二天便卷起行李扔下了检讨稿，下到金盏公社去贯彻“三同”。由于市委

领导得知是周总理提出下放的，因而也倍受青睐。想到无论如何应当完成总理交下来的任务，不能令他失望，后期我便写出了一部话剧《芮苗英》，打算由北京人艺上演，然后再改写成电影，殊不料我又为即将开展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新靶子，徒又增添了一桩大罪，这也是为周总理始料不及的，但我至今无怨无悔，因为我遵照周总理的意愿去做了，做好做坏那就是我的水平问题了。不干事的整干事的，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这是不正之风中的顽症，何况在那种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特定年代里，又何怪之有？

太阳的光芒无私地照射着大地每个角落，伟人的言行如甘霖普洒给善良的人，我受过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聆听过他的亲切教诲。我觉得仅仅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评述周恩来如19世纪爱尔兰伟大爱国者查尔斯·帕纳尔那样：“他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那是远远不够的。但这却有力地说明着一个事实：即令是周恩来的多年对手，也都虔敬地称他是位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政治家。在我们文艺战线普通一兵看来，不，整个文艺界皆越来越把这样一个共识凝聚为一座丰碑，他是人民的好总理，文艺工作者们的庇护神和可敬可亲的良师益友！只可惜好人不长寿，万恶的“四人帮”将他折磨得病情日重一日，终于与世长辞。

足顿胸捶，肝裂心碎，泪纷飞，巨星中天坠。人民的好总理他去了，“三拜九跪，心往神追，痛忆教诲，学品德高贵，奋臂遗志遂。”

周总理的去世损失之大无法计量并令人哀伤欲绝。每每想起，哀思便涌满心头。

长思之中重沐了周恩来总理撒落的侵人肺腑的甘霖。……

这是人生最大安慰

颜一烟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总理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教诲，是我终生难忘的。现在，把我一直深深铭刻在心的几件事，记录下来，以表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感谢和怀念！

一 周副主席给我们作报告

1937年，我在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任秘书、编剧、演员。秋天，我们到了武汉，住在精武体育会。

一天清早，大家刚刚洗漱完毕，副队长金山就宣布说：“今天上午谁也不要出去，准备下午流动舞台和晚上剧场演出的节目吧！”说完，他匆匆忙忙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嘱咐了一句：“千万不要出去啊！”

不出去就是了，干嘛这么婆婆妈妈的？谁也没怎么特别在意。吃完早饭，大家就紧张地准备起节目来。

忽然，星海从外边跑了回来，一上楼就兴奋地喊：“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周恩来先生要来给我们作报告！”

这真是惊人的大喜讯！大家都兴奋极了！有的忙着打扫屋子，有的忙着收拾地铺，有的去烧开水，有的就拿自己积蓄下来的生活费，跑出去买最好的香烟和茶叶，每人都换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即洗得干净的。我们两个女队员，一律穿上了蓝地白印花

的土布旗袍，准备干净整洁地迎接贵宾。

可是，有的人却始终不敢相信哩。几个人一边忙着，一边就悄悄嘀咕开了：“真是周恩来先生要来给咱们做报告吗？我可真没想到啊！”“周恩来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吗？”是啊，我也是想：共产党的副主席，真会来给我们作报告？

真的，是真的！周恩来先生真的按时来了！他在洪深、金山、田方陪同下，走上了精武体育会的二楼。

在这样一位巨人面前，我们一个个木然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了。

谁想，这样一位声震世界的人物，竟是那样文雅，那样平易近人，那样谦虚和蔼、诚挚可亲。他大步走到我们面前，浓黑的卧蚕眉下，一对炯炯有神的眼，发出热情的光芒，直射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他微笑着和我们一个个地握手。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周副主席走到我面前了。

周副主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向我说：“同志！你好！”我激动得连“周副主席好”都不会说了！同志！是周恩来副主席

叫我“同志”啊！谁能想到，周副主席的亲切握手，热情地一声“同志！”给我这“流浪儿”、“逃亡者”的心里注入了多少信心和力量啊！紧握着周副主席的大手，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周副主席大概是为了转换一下气氛吧，他微笑着，慈蔼而又风趣地向我说：“老太婆变成小姑娘了，怎么还哭呀？”

这句话，使得大家都笑了。这也真是出乎我们每个人的意料：周副主席管着多少大事，工作多么忙啊，竟能挤出时间看我们的救亡宣传剧，还看得那么仔细，连我扮演老太婆都看出来，而且记得那么清楚。

房子里不用说床，连桌椅板凳都没有，我们非常过意不去。周副主席却

毫不介意，他非常随便地坐在我们放服装道具的箱子上，那样和蔼亲切，像和亲友们说家常话似地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且使劲往脑子里记。

周副主席讲完了，洪先生接着说：“好！现在我考考你们，周副主席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老太婆变成的小姑娘，先说说吧。”

万万没想到洪先生竟然点到了我。我从来没在这样的伟人面前说过话呀！一下子慌了神儿啦！站起来结结巴巴他说：“给我们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重要性……叫我们，下……下乡……。下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不要……特殊！……”

周副主席笑着点点头说：“意思不错，不过，可没你说台同说得好好呀。怎么结巴起来了呢？下去跟老乡们讲话，这样可不行噢！”

“跟老乡说话就不这样了。”我自语似地低声这么说了。一句。

“那么说，是我特殊了？哈哈！”周副主席笑了笑：“你就当你在台上，我在台下嘛！哈哈哈哈哈！”说着又转向大家：“好了，有什么困难，就向我提出来，随时都会设法为你们解决。”

最后，周副主席又诚挚热情地和我们每一个人紧紧握手。

我们都不会速记，心情又都很激动，许多重要的话都没能记录下来。但是，在周副主席那伟大的襟怀之中，竟还有我们这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小演剧队，他在百忙中，竟还能挤出时间来，亲自对我们这十几名年轻的文艺战士给予这么亲切热情的关怀、爱护和教育，这确实使我们永远难忘，并将永远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

听了周副主席的报告，我们更看清了抗战的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也更具体地认识到我们工作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也更明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只有十几个年轻人的一个小小演剧队，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这就是因为我们是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一起。是党，时刻关心着我们，哺育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在战斗中成长。

二周副主席在延安看《日出》

1939年冬，毛主席特邀鲁艺的领导同志叙谈。说起延安也应当上演一些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并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于是，立刻成立了《日出》演出筹备组，决定由“鲁艺”和“抗大”等单位联合演出。这是“五四”以来优秀剧目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党中央和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毛主席亲自指示：“这个戏是几个单位联合演出的，一定要团结互助，搞好合作关系。”并指示：要成立个临时党支部，来保证这个任务的顺利完成。

不久，导演王滨宣布了演员名单：

陈白露——李丽莲	方达生——张成中
张乔治——干学伟	王福生——刘笑生
潘月亭——王 异	顾八奶奶——颜一烟
李石清——方 深	李太太——李 郁
黄省三——刘 镇	黑 三——田 方
胡 四——范景宇	小东西——林白
翠 喜——韩 冰	小顺子——石畅
哑 吧——林 农	

《日出》于1939年12月28日在延安北门外中组部礼堂预演审查。 28

日这天，从下午就飘起了雪花。瑞雪兆丰年，人们都高高兴兴准备过年了。可在中组部礼堂里，也是飞雪迎春了——因为，礼堂的所谓“窗户”，只有用木条钉的几个框框，甭说玻璃，连糊窗纸都没有，长长的木板钉的凳上，盖上了一层雪。能让观众坐在这样的位子上看戏吗？更何况今天还有首长来审查？全体职、演员就忙着打扫剧场。有的扫雪，有的找了一些谷草麦秸等堵塞窗框。

第二幕开幕没多久时间，“顾八奶奶”正向“陈白露”讲她的“恋爱哲学”，“爱情，是你甘心情愿地拿出钱来叫他花，他怎么胡花你也不心疼——那就是，爱情……”忽然，大幕落下来了。李丽莲和我们都怔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幕一闭，立刻有位同志拿着棉军眼过来给我们披上。

我们忙问：“出了什么事？”

原来，丽莲和我穿的都是绸子旗袍，高跟鞋。数九隆冬，外边下着大雪，里边飞着雪花，我俩在台上冻得发抖，牙齿咯咯地相碰，台词都说不大清楚了。那位同志告诉我们：“中央首长冒雪来审查。周副主席看见你俩在台上冻成那样，就跟领导发了脾气：你们太不爱护演员！怎么把她们冻成这个样子呢？导演说：没想到今晚下这么大雪，我们也没法子呀！周副主席问：有没有毛衣裤？叫她们穿在里面。导演解释：没有。再说，有也不好穿，她们的绸旗袍是紧包身的。里面要穿上毛衣毛裤，外出显出一道一道的，不好看，也不够真实啊！周副主席生气了：把演员冻病了就真实？——你们是怎么理解艺术真实的？你们见过资本家的太太小姐坐在豪华的大饭店里冻得发抖吗？——现在演员冻得话都说不清楚，难道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吗？”

那位同志还告诉我们：“周副主席已派人去给你们找毛衣毛裤和木炭了，叫你们好好休息，暖和暖和。”

听了这些活，丽莲和我们都感动的热泪盈眶，强忍着不让它滚下来，因为怕毁了妆。

不大功夫，服装员就给我们拿来了用土毛捻成线，手织的毛衣裤，叫我们穿在绸旗袍的里边。

舞台工作人员在凡是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如沙发、木柜等家具的后面，都生上了炭火盆儿，盆中炭烧旺了，这才打铃重新开幕。

三九隆冬，礼堂外飘着雪花，而礼堂内，舞台上，我们演员的心里，却先温暖如春啊！

60年代初，外地一个剧团来京公演《日出》后，该团扮演

“顾八奶奶”的演员告诉我，周总理看了我们的戏，给了很大的鼓励。谈到我演的角色时，总理说：“还是我们延安的好。”

“我们延安的”，说得那么亲切感人！这和当时给我们送来木炭、毛衣裤一样使我终生难忘！

三周总理指导我创作

我的第一部电影习作《中华女儿》，由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拍成影片。开国大典时，《中华女儿》随其它7部长短故事片及长短纪录片《民主东北》等被东影带进北京向新中国献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审查了这部影片。在文代会上，周总理指着我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影片《中华女儿》的作者。”毛主席向我微笑点头，亲切和我握手。对我这个电影战线上的新兵来说，这又是多么巨大的鞭策啊！

1951年，毛主席亲自给任务，要拍一部影片揭露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罪恶。当时和我同在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的一位

同志，立刻积极响应，主动要求写这个剧本。他采访了一段时间后，非常同情那些被骗去当“三才”的女孩子，觉得她们是受害者，是中国的“玛丝洛娃”。他决定以一个“天才”为模特儿，写一部像《复活》那样的巨著。

时刻关注着电影事业发展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亲自打电话给所领导陈波儿同志说：“像《复活》那样的巨著，当然需要。但是当前更需要的是，及时拍出一部影片来，揭露‘一贯道’的罪恶活动，配合当前的‘镇反’运动。”并说，“我们是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但‘一贯道’决不是宗教，而是反动会道门，是一定要取缔的！”

波儿同志向那位同志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他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说要他很快的改变思路是困难的。波儿同志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催你，但这个任务很紧急，我就另找个快手吧！”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剧本于1952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片名《一贯害人道》。放映后，对当时的“镇反”运动确曾起到了一定的配合作用。总理要我们敏锐反映现实生活的重要指示，始终是我们创作的指导方针。

影片《翠岗红旗》初映之后，有不同的反映，甚至有些议论，说什么艺术性不强，是政治宣传等等。在政务院讨论1952年电影制作工作计划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说：“……成绩很大，缺点尚多，前途有望……编剧今后的政治锻炼与斗争实践相结合是主要的。编剧、导演、演员都要如此才对……编、导、演三者之间还可以互相帮助，例如《翠岗红旗》这个片子，大家看了觉得很好，主席看了，也受感动……”1953年，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总理作报告时，特别提到《翠岗红旗》，说：“《翠岗红旗》是部很好的影片，当时有些专门家对这部影片品头论足，这样不好。我请了很多位当时在瑞金、老区苏维埃的同志们来看，特别是与主人公有同样遭遇的人来看，大家看了都流了眼泪，说是好影片。《翠岗红旗》是我们自己的片子，是人民电影，应该全力扶持。不应该贬得那么厉害……”我有幸听了这个报告，回来后向该片编剧杜谈同志传达后，说：“你该高兴了吧？总理肯定了《翠岗红旗》。”杜谈同志听了后，非常振奋，让我把记录给他看。他看后，流着泪说：“这是人生最大的安慰！”

每次听了总理的重要指示后，感到“这是人生最大安慰”的，何止杜谈同志一个。我们电影工作者，哪一个不是由衷地感谢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的爱护、关怀和培育啊！

老舍先生奉命写《人同此心》的前前后后

齐锡宝

1951年早春2月，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一天早晨，还没有到上班的时候，就听见陈波儿同志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得十分急促。我拿起话筒一听，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电话是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当我告诉对方，昨晚波儿同志他们讨论剧本，会散得很晚，所以现在她还没有来办公室时，话筒里却传来周总理本人的声音。他要我放下电话后马上去找几份1月31日的《人民日报》。等波儿同志一来，就请她和艺委会、创作所的几位同志阅读第三版上步春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他说：毛主席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说它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解放后思想感情的变化，应该是故事片电影的好题材，建议电影局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请波儿同志和大家研究一下，怎样完成毛主席交代的这个任务，并且告诉我他们的决定。

一放下电话，我立即从各个办公室搜罗出4份1月31日的《人民日报》。波儿同志听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马上把报纸分送给艺委会主任蔡楚生、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和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并请他们读完《我家两年来的变化》一文后，到办公室来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当天下午几位看过了文章的同志聚齐了。大家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请谁来写这部影片的文学剧本，因为在人民电影事业草创初期，调到电影局来担任编剧的同志，不是来自延安，就是来自各大军区搞文艺或宣传工作的同志。大家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引下，都把深入和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塑造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生活在国统区刚解放的知识分子，不但不熟悉，而且也没有想到要去熟悉。因此，在电影局现有的编剧中，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事有凑巧，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龙须沟》正轰动全城，《龙须沟》的作者正是50年代初刚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先生。一想到老舍先生那么快就写出了反映新旧社会伟大变化的好作品，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非请老舍先生来写这个文学剧本不可。当陈波儿同志向周总理汇报电影局将尽全力完成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并决定商请老舍先生担任影片的编剧时，周总理十分高兴，说请老舍先生写剧本，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过了两天，又是一个大清早，波儿同志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极为严肃地向我交代说：“老舍先生已经答应为电影局写这部影片的文学剧本，但是市委的领导同志说，他的腿脚不方便，要我们给他配备一个助手，为他采访、收集素材。我考虑你过去在复旦大学听过他的《文学讲座》，现在又在文学研究所听他讲《文协时期的斗争》，是他的晚辈、学生，你去做他的助手，可能他会觉得比较方便，所以决定派你去给老舍先生当采访助手。你赶紧交代一下工作，同时也给文学研究所打个招呼，今天就去丰盛胡同10号老舍先生家里报到吧。”

工作很快就交代了，倒是向文学研究所请假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往老舍先生家里走时，竟忘了打听酒兹府丰盛胡同该怎么走。到了西单牌楼，正碰上一辆三轮车。我叫住三轮，说我要到酒兹府丰盛胡同10号，问他能不能把我拉到那里，要多少钱。蹬三轮的同志把车停下说：“您是上舒先生家不是？”

上车吧，您哪！”因为事先没有说价钱，等车拉到后，我递给他旧人民币五千元，就往大门里走，蹬三轮的拦住我，找还给我三千元，说：“到这儿，两千元够了。”我略感意外地看着他。他笑了笑，和从小院南屋出来的同志打了个招呼，出门拉着车走了。对这件事，我当时确实觉得奇怪，以后常坐三轮或人力车去老舍先生家，几乎每次都一样，只要说一声拉到丰盛胡同10号，根本不用讲价钱，车一停，给二千元准行。我还了解到很多蹬车的和拉车的都曾经掏钱买票去看过《龙须沟》，他们对老舍先生把干他们这一行的写进戏里，着实有一份真挚的感激之情。更有趣的是，当天气热起来时，每当车拉到了，我往里走，拉车的人也会同我一起走进小跨院，往影壁前的小板凳上一坐，干脆休息一下，喝杯大瓷壶里彻好的茶再走。如果遇上卖小金鱼儿的，卖花的也在小院里歇脚、喝茶，那他们兴许就坐在那里聊开了。原来老舍先生家的大门，是向所有这些劳动群众大敞开着的，无怪大家对丰盛胡同10号竟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丰盛胡同10号是一座小四合院，经过影壁走进去，里面是一个较大的院子，院子的两边有修整得干净利落的花畦和东西厢房，中间一条铺着方砖的小路一直通向北屋，客厅和老舍先生的书房、卧室都在这北屋。往客厅走的时候，我不免有些紧张。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先生应复旦大学洪深、伍蠡甫、陈子展等几位教授的邀请，到复旦来主讲《文学讲座》，因为洪深先生他们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一向都叫伯伯，所以老舍先生一到复旦，我见了他也就叫伯伯。现在参加革命了，革命队伍里对准都称同志，可1950年冲着洪深先生叫了声“洪深同志！”却惹得他大为恼火。这经验又让我觉得管父执辈的叫“同志”未免不合适，在文学研究所听老舍先生讲课，为这称呼不好办的疙瘩，我就没有特地过去向他问好，现在面对面地见到他，该怎么称呼呢？从影壁到北屋这短短的一段距离，不容我想出个子午卯酉就走到了。老舍先生已经坐在客厅里，还没有等我开口，就听见他高兴地大声说：“啊，锡宝，原来派来了个你呀！”听到他那亲切高兴的声音，我很快松弛下来，脱口而出叫了声：“舒伯伯！”就跨进了客厅。他笑着从桌上的瓷筒里抽出一支冰糖葫芦递给我，让我先喝热茶，吃糖葫芦。然后说：“你先坐下，我们好好谈谈，这可是个光荣的任务啊！咱们得加把劲，争取尽快完成。”我说：“是啊，周总理在电话里说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波儿同志他们研究了半天，也请示了总理，认为只有请您写剧本才有把握完成任务。我能来跟您学习，实在太幸运了，我一定努力工作。”他想了想说：“写东西本来应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琢磨、酝酿，也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下笔才能准确、传神。这次写作时间不允许拖长，必须收集极为丰富的材料来弥补时间仓促的缺陷。”随后，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叠写了人名、地址和简短说明的稿纸递给我说，“这些是我考虑应该去访问的大夫和老师，我希望你不但访问他们本人，最好通过组织介绍，能和熟悉他们的人多交谈，听取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认识和评论。访问下来，不必整理出文字记录，只要当天向我口头叙说就行。”可惜我一直珍藏着的这些说明姓名、职务、地址、哪位大夫、哪位教师要着重谈哪方面的情况的老舍先生的手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被洗劫得荡然无存。事隔40多年，我现在还记得的是，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按照老舍先生列出的名单，挨个儿访问了当时协和医院、北大医院、人民

医院许多有名的大夫，也访问了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师大附中等几所中学的校长和教师。每当我到丰盛胡同向老舍先生汇报材料时，他总要先喝几口热茶，让我自己到桌上的瓷筒里选一支爱吃的冰糖葫芦，一面吃着，一面就像叙家常一样把我访问过的大夫或老师的谈话，连同他们的衣着、神态都向他述说一遍。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说起协和医院脑外科的陈大夫原来家境贫寒，发奋苦读考进了协和医科大学，他想学外科，但外科主任说，外科大夫的手必须细致得能够绣花，他那粗手大脚的，哪能学外科。陈大夫当时二话没说，跑到街上买回软缎、丝线和刺绣用的工具，开始学刺绣。等到医学院正式分科，他提出选外科的同时，交上好几件精美无比的绣花制品，那位外科主任终于被他的坚韧毅力所感动，让他攻习外科。老舍先生听后很感动，他说：“你采访时能注意这种素材，很好。要真正熟悉和了解一个人，这些细微末节的事往往很关键。这次虽然用不上，以后如果写一个性格坚毅的人，它可能就是很好的细节。”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市委有过指示，在先生写作期间，不让其他的事情去打扰他。所以我去丰盛胡同时，大多数时间家里都十分清静。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极其清楚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上海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等著名越剧演员来北京演出。她们希望能拜访老舍先生，听他谈谈对她们演出的意见。她们是下午来的，那天天气很好，北屋前正洒落一片温煦的阳光，老舍先生让人在门前摆好一圈椅子，他和大家团团围坐在阳光下，非常轻松愉快地聊天，既赞扬了她们精湛的演出，也谈了一些戏曲改编文学作品的意见。一次是曹禹先生刚随赴苏代表团参观考察后回北京不久，没有事先联系跑来看他。进门不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老舍先生放下工作，招呼大家一起到东厢房的餐厅里。只见餐桌上摆满了各种蘸饺子吃的佐料和剥好了的蒜瓣儿。还没有入座，曹禹就问饺子是什么馅儿的，一听是三鲜馅儿的，他乐不可支，指手划脚地对我说：“咳，这可是赶上了，他家的三鲜馅饺子堪称一绝。注意，吃起来可得一口一个。”老舍先生马上接口说：“是不是一绝还不敢说，吃起来得一口一个那是不假，饺子讲究的是要包得个儿一般大小，能一口一个才不会把馅儿里的汤汁流出来。”

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时，真让我这个南方人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见过包得这么精致、漂亮的北方水饺。有的简直就像能工巧匠捏出来的工艺品。曹禹先生吃得高兴了，说起他这次去苏联和吴晗同志先走，没有翻译同行，他们不会俄语，一路上瞎指着菜单点菜，尽吃肉，实在腻味透了。看着吴哈那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服务员递上菜单时，他对服务员说了一声“米沙”——俄语，肉的意思——马上张开双臂上下舞动，同时嘴里发出“咯咯，咯咯”的叫声。那位服务员恍然大悟，那顿饭他们终于换了口味，吃上了铁扒鸡，看着曹禹先生一面表演，一面得意的讲述，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老舍先生一面笑，一面大声说：“快斟上酒，切一盘德州扒鸡来，为曹禹老弟的绝妙高招干一杯！”整个下午就在欢笑中轻松地度过，我记得这是老舍先生接受创作任务以来，唯一没有工作的一个下午。

第三次是老舍先生正向我交代要用车接我访问过的哪几位大夫到丰盛胡同来开个座谈会。他预备动笔了，想亲自和几位大夫谈一谈。我们还没有计划好，却被两位上海私营制片厂的客人打断了。其中的一位，我记得是上海著名的演员周伯勋。他们急于要见老舍先生是商谈购买《龙须沟》的摄制权

问题。他们说了一些有关私营制片厂目前的处境，希望轰动全国的名作《龙须沟》的拍摄，能对他们的发展有帮助。当时我在波儿同志身边工作，知道电影局对帮助私营厂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作了安排。同时我也想到老舍先生的力作《龙须沟》如果让实力不足、和北京又相距甚远的上海私营厂来拍摄，肯定会影响作品的质量。但是以我的身份和地位，又不容许我插嘴说什么，尽管心里非常着急，也只有在旁边坐立不安地瞪着眼看看老舍先生，又看看周伯勋和他的同伴。当我终于听见老舍先生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请让我和市委商量一下再作决定。”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送走客人以后，老舍先生问我为什么一言不发，干瞪眼？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道：“谢天谢地，您实在英明，我真怕人民艺术家的伟大作品，拿到上海私营厂拍会糟蹋了。这件事我回去马上向波儿同志汇报，希望您一定把它留给电影局所属的国营制片厂拍。”老舍先生点了点头说：“刚才瞧你那样儿，我知道你心里有个小九九。”略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说了一句：“你能够掌握分寸，挺好！”

后来《龙须沟》终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影片的导演是洗群，主要演员除程娘子改由蓝同志，丁四改由张伐同志扮演外，其他都是人艺的舞台演出原班人马。据说老舍先生对影片还比较满意，对于蓝同志扮演的程娘子，不但演出了她外在的泼辣的一面，也刻画出了程娘子内心深处的善良、淳朴的本质，尤其感到高兴。为此，他曾亲笔题写了一幅立轴送给于蓝，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幅立轴却被抄走，失落了。

经过几个月听取素材和酝酿，老舍先生于6、7月间写出了题为《人同此心》的电影文学剧本初稿，他把手稿交给我说：“你带回去请陈波儿、袁牧之同志他们内行看看，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请他们提提意见，我可以抽时间修改。”初稿没有打印，只在陈波儿、蔡楚生、史东山、章泯、王震之等几位同志中很快地传阅了一遍。读过剧本的同志从电影对文学剧本的要求出发，提了几点意见，由我陪同王震之同志到丰盛胡同向老舍先生传达了大家的意见，并对他不辞辛苦地为电影局写文学剧本，表示感谢。没过多久，老舍先生对剧本作了修改。修改后的剧本由创作所打印后分送到文化部各位部长和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常委，请他们审阅和提意见。我记得由文化部部长兼电影指导委员会主任沈雁冰主持召开的讨论剧本的会议，老舍先生亲自参加了。现在我仍然准确地记得参加了那次会议的有陆定一、周扬、邵荃麟、丁西林、李伯钊等几位同志。可能因为分送剧本的是电影局创作所，而通知开会的是文化部的同志，工作上有些脱节。也可能是到会的都是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工作忙，抽不出时间看剧本，所以到会的很多同志一面向老舍先生祝贺他又写出了新作品，一面又抱歉地说他还没有拜读过大作，只能带着耳朵来开会。那天陈波儿同志恰巧因公外出，没有出席会议，王震之同志和我面面相觑，急得直冒冷汗。虽然把带来的几份打印稿一一送到没有看过剧本的同志的手上，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沈部长虽然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是事已至此，也只好宣布开会，当沈部长说完这部影片是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和周总理的指示，电影局才商请老舍先生执笔写剧本的原委以后，老舍先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听说很多同志没有来得及看剧本，今天多耽误大家一些时间，由我先朗读一遍剧本，然后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说完，他坐下来，翻开面前的剧本，开始高声朗诵。一部4万字的文学剧本，他竟声音洪亮地一口气读下来，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参加会议的同志被他的激情感染，一时

间都说不出话来。会议室里静悄悄的，真是连根针掉下来都听得见响声，后来还是沈部长说，大家刚听完剧本，先休息几分钟，准备意见，15分钟以后复会。这时候老舍先生嘱咐我说：“回头大家提意见时，你好好记录一下。”以后，我整理的记录交给了老舍先生，原始记录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失落了。现在虽然无法记述当时究竟对剧本提了些什么意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议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否定这个剧本的意见，也没有作出不拍这部影片的决定。

老舍先生奉命创作的这部作品被扼杀，是一位特殊人物一手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当时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委的江青，知道陈波儿同志回到北京后，特地来找波儿商量，准备召开一次电影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1952年电影创作题材的规划。她说：“在这次会议上，要设想工、农、兵题材各占多少的恰当比例，更应该制定出写三大战役的宏伟目标，至于由老舍执笔写的《人同此心》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

江青进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让我回避，听了江青说的这些话，我真感到进退维谷、忐忑不安，幸好这时候波儿同志让我去找蔡楚生、王震之同志到她办公室来，我如释重负，赶紧趁这个机会溜之大吉，通知了蔡楚生、王震之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办公室去。直到后来波儿同志生病，找我帮她整理完成《人民电影事业从无到有》的总结时，我才知道那时候江青已被任命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波儿同志不久也将到中宣部去担任电影处副处长，江青是以中宣部电影处的名义否定《人同此心》的。这是后话。就在我躲出办公室的那天晚上，波儿同志找到了我，她很郑重地对我说：“今天上午你在办公室里听到的事情，绝对不能外传，老舍先生是知名的作家，他很热情地为我们写剧本，我们决不能让他感到不快。明天你陪王震之同志再去一趟丰盛胡同，带上《龙须沟》的稿费，由你们亲自交给他，告诉他《龙须沟》的摄制计划已经制订，将来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还会为剧本的改编、外景的选择、演员的深入生活等许多事情去麻烦他。《人同此心》的摄制计划如何安排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剧本的修改可以缓一缓……”波儿同志说到这里有些犹豫起来，好像不敢肯定这样说是否妥当。这时候，我忽然冒出了个主意，我说：“波儿同志，老舍先生特别喜欢花，现在街上卖的玫瑰花甭提有多好看，不如买两盆特别好的玫瑰给他送去，就说《人同此心》的写作让他受累了，送上两盆鲜花，请他休息时欣赏。先别忙着改剧本，等投入拍摄时再说。”也许当时波儿同志确实内心深处感到不安，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居然同意了我的办法。于是第二天我陪着王震之同志，带上支票，带上一盆黄色的、一盆深红色的玫瑰，一起来到了丰盛胡同。两盆十分出色的玫瑰还真让老舍先生高兴得赞赏不已。因此王震之和我就比较轻易地完成了任务，告别了老舍先生。

虽然几十年政治上的风云变化、生活上的坎坷起伏拖住了我迈向丰盛胡同的脚步，但是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却永远深藏在我心底。“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是蹲牛棚的牛鬼蛇神，所以发生在太平湖的悲剧一直到我们被发配到干校时才知道。在悲痛中我想起1951年在丰盛胡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老舍先生不顾自己的健康，满腔热情地赶写《人同此心》的情景。

42 年过去了，许多知道老舍先生曾经奉命创作过《人同此心》的同志，都已经先后与世长辞。我应舒乙同志之请和《电影创作》编辑同志之约，追忆往事，将我记得十分确切的情景如实地写下来，以寄托我对敬爱的长辈和老师——老舍先生的深切哀思。

1993 年 11 月 10 日

“三年了，你还外行！”

谢 晋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对各行各业充实干部，加强领导。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夏公是电影界的前辈，当然是懂行的。而具体抓电影创作、生产等工作的是刚从中南局调来当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同志。他是搞评论、文学工作的，对电影生产规律，确实不很内行。他上任之后，努力做了不少工作，但自己总觉得对这一业务不是很熟悉的。有次在国务院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讲到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许是出于谦逊，或是作自我批评，更是对领导表示愧意，说自己本是搞文学的，对电影是外行，以致有些工作没做好，因为一连讲了几次“外行”的词儿，周总理就插话问：“荒煤，你调到电影界有几年了？”荒煤同志回答说：“三年了。”总理马上严肃地说。“三年了，你还外行！”

总理这句带有感叹色彩的批评，给荒煤同志很大的刺激，对他以后的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此，他不敢再说自己是外行，而是专心钻进电影业务中去。以后几年，他在抓创作时，无论是提意见，指导生产，安排计划都较符合电影工作的规律，大家也喜欢和他谈创作，谈业务，听他作报告。他真正成为具有较高威信的“内行”了。在我拍了《红色娘子军》以后，有次在火车上跟他同在一个车厢，他谈起了总理的这句话，事隔几年，仍很感慨又很遗憾。他说：虽然搞电影工作七八年了，比较熟悉了，你们送来的剧本，看了，也谈了，但我没有像夏衍同志那样能看分镜头剧本，夏公可以在分镜头剧本上批注详细的具体的诸如镜头作用、长短等意见，我就不能，只能笼统的谈一些意见和看法。接着又很诚挚地说：哪一年有点空，把工作安排一下，到你的摄制组去蹲点，专心待一段时间，看你们是怎样分镜头，怎样具体拍摄的。很遗憾，他的这个愿望因历史的原因没有实现。

在掌握社会主义电影的创作、生产方面，我们确实走过不少弯路。由于当年领导电影生产的同志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终于逐步掌握了电影生产的规律。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左”的路线，在文艺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风暴，在“文革”前，夏衍、陈荒煤被诬为“夏、陈文艺黑线”的代表，终于被迫离开了电影界。

时隔几十年，当我想起周总理的这句话“三年了，你还外行”，仍感触很深。我认为，总理这句话不仅是对主管某一项业务的干部提出严格要求，任何事物，任何工作都有它的规律，熟悉了，掌握了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我们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家，对各项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但在担任总理以后，也有许多方面是新的事物。正是由于他善于由外行变内行，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治理得有条不紊，博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他看来，党和政府派你来到这个岗位，领导这门工作，你就应该从“外行”尽快地作调查研究，接近群众，刻苦学习，摸清规律，变成一个内行。你不能老是拿外行来搪塞，好象我是外行，工作没做好是应该的。当时荒煤同志如果刚调任三个月、半年，说“我是外行”情有可原，不致挨批。可是已经三年了。从他自己来说可能以为时间不长，而在总理看来，三年就不算短了，你还没有掌握工作规律，自称“外行”，就不可原谅了。周总理30多年前说的这一句话，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启迪，我们主管各项工作的干部应该从“外行”尽快变成“内行”。搞科学有科学的规律，搞商业有

商业的规律，商业的规律不同于文艺的规律，即使在文艺领域中，音乐有音乐的规律，电影有电影的规律。当然，我们不要求领导干部的水平达到导演、摄影师的专业水平，但应该要求尊重各个行业的规律！今天在纪念周总理时，温故知新，重提“三年了，你还外行”这句话，我认为仍有现实意义的。

清风亮节

李 準

大约是 1956 年春天，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一个小型作家座谈会。五六十年代，总理经常召开一些小范围的座谈会，征询文艺界同志们的意见。有时三五人，有时十几人不等。

这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作家稿费问题。因为当时的稿酬偏低，作家们有些意见，而文化部又要取消印数稿酬，所以周总理请了十几个作家来座谈，作一些调查研究。

参加会的作家我记得有郭老、老舍先生、曹禹同志，还有刘白羽、周立波、艾青、赵树理等同志。约摸有十几位，大约因我也是一种类型，属于青年作家，也通知让我参加座谈。

大家陆续来到，周总理很平易亲切地和大家拉家常。本来很紧张的我，顿时感到如坐春风。正在这时候，周扬同志进来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学艺术。曹禹同志在门口沙发上坐。看到周扬同志进来，曹禹同志稍微起身让了个座。

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不料被周总理看见了，待周扬同志坐定后，周总理温和地说：“曹禹同志，你是作家，作家是为民者清，我们是当官的，为官者俗，周扬来了，你就赶快起身让坐，可见也不太清嘛！”

当时听了这一席话，在座的作家虽然鸦雀无声，但是内心无不激动万分。我当时 28 岁，看到总理这种高尚的风范，觉得我是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一直到今天鬓发皆白，仍然不敢忘记。

稍作沉吟，总理又微笑着说：“曹禹同志，我今天这样批评你，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偷眼看看曹禹同志，他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因为要讨论稿酬标准，总理就调查作家们的开支情况，我记得是先算老舍先生的每月开支花销。总理算得很仔细，连茶叶、招待烟都得算上。开初我并不了解总理的意图，是要当时的文化部领导，不要把稿酬压得太低。算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的工资是 65 元，有三个孩子，但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落户”当农民，所以也够花了。总理马上说：“你这个没有代表性。一个作家的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应该有所照顾。”

算到最后，大体上得出按当时的物价，每月要 300 元左右，当时 10 个人去吃烤鸭，一顿也不过 12 元左右。所以大家都十分欢欣雀跃。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还讲了一段话，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意是，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还要过较长时间的艰苦生活。但对作家、艺术家，不能难为他们，要出大作品好作品，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我们国家现在才有几个作家！应该让他们安心创作，无衣食之虞。

会议开得很成功，都感到有一种祥和畅快的气氛。说话间，到了中午时分。总理又说：“大家今天就在这里吃午饭吧，我们没有准备什么好的菜，请大家吃包子。”虽然没有什山珍海味，但那一顿包子的味道好极了。因为作家们都体会到，什么叫“无微不至”、什么叫“如冬日之阳，人赖之以温”。

1962 年春天，电影《李双双》刚拍摄完成，张瑞芳同志来到我住的宾馆说：“不要抱太大希望，大概还过得去。”说话时脸上还有一丝忧郁。她走

后，我体会到她大约是怕我企望过高，看后反而会失望。另外这是她的谦虚，她不爱说过头话，话虽这么说，心中毕竟有些牵挂。

到了5月份，全国公开上映，大出我的意外，受到全国观众热烈的欢迎。就在这时候，瑞芳同志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她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说：“李準，我告诉你，周总理看了《李双双》了，非常喜欢，那天总理还请我在他家吃了饭，总理说：‘我今天不是请你来吃饭，而是请“李双双”来我家吃饭。’在吃饭间，总理又告诉我说：‘李準的小说原来是写妇女办食堂的，现在电影是写李双双推行记工分的，情节变了，但人物性格没有变，依然个性鲜明、生动活泼，可见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李準要不是生活底子厚，这个电影怎么能出得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一天我想了很多很多……总理那么忙。居然连我的小说也看了，特别是总理审美的品位，太令人感动了。一部黑白拷贝影片，只投资了那么一点钱。布景荒村茅屋，服装荆钗布裙，但总理却能干风尘中看出它的质朴的美，心灵的美，性格的美。

同时，我体会到总理是有极高文学素养的，他那“高屋建瓴”的风格，真知的见的识见，不为任何舆论所左右，特别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他大力提倡，不遗余力，但他还严格的把握着艺术关，单有政治，没有艺术，他决不随便肯定。

五六月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奖时，总理说：“今年的‘百花奖’我投《李双双》一票。”后来《李双双》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故事片大奖，同时还获得其他五项奖。

“百花奖”领奖时，当时我在河南信阳于家村搞社教。我是真想去北京领奖，倒不是想参加那个热闹场面，也不是想去领我那块“最佳编剧奖”之牌，主要是想看总理一眼，好多年没有看到总理了……

因为社教工作刚开始，工作团的领导劝我请假。我请假了，那天晚上我在一间破旧的茅屋里听了广播……总理出来了，我好像看到了总理……也好像总理看到了在一团茅草上躺着的我……

1992年1月2日北京

围绕着影片《李双双》发生的……

张瑞芳

《当代电影》向我组稿，要我写一次难忘的角色创造，最好写“李双双”，我感到很为难。虽然在生活里，时常有人将我的名字和李双双联系在一起，但我和李双双这个角色却阔别了22年了。

我很羡慕戏曲演员，她们一生中可以有自己的拿手戏，可以从自己年青时候一直演到年老，角色永远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可以通过演出不断地丰富它，随时可以获得新鲜的创作体会，而电影演员则是刚刚演完一个角色，角色就离她而去了。留下的往往是创作中的遗憾心情。

对于李双双的人物塑造，当年我也曾写过关于创作的体会等文章。如今时间隔得越久就越感到难以追忆，如果今天来写它，只能越来越理性化，甚或会变成事后有先见之明式的空泛议论了。

但是我对影片《李双双》，确实是有着特殊感情的。

这感情的特殊不在于我因为扮演李双双获得第二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而由于它从刚刚拍摄完成，特别在十年浩劫中被批判为毒草之后，周总理都曾经为它讲过话。当时的情景，铭刻在我的心里，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成为我思念周总理时，最容易引起感情激动的回忆。我愿意在这里写出来，作为纪念我的艺术生活的最珍贵的一页吧。

1973年4月14日晚9时在北京人大会堂上海厅，周总理接见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出国人员共54人。

这是在“文革”当中第一次派出的出国代表团，是由周总理亲自点名组成的，从团长到团员名单的确定，都是几经周折和斗争才得以拟成的，因为团员中大多数都是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当时还戴着各种帽子靠边站的各界代表人物，很多都是已不被“四人帮”承认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尽管团员中这些专家、教授、劳模、民主人士有着丰富的出国经验，但这次出国无不感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况且团里还有于会泳、浩亮和其他少数“四人帮”的新贵们，他们习惯用挑剔的眼光，扫射着这些“罪孽深重”的人们。

周总理十分了解大家的心情。在三个星期的集中学习的时间里，一再传话要大家尽量提出思想中存在的问题，他将予以解答。

我是唯一的电影界的代表。我想到1962年秋天，我第一次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随团携带着《李双双》影片去日本放映；1966年5月我参加电影代表团第二次访问日本，正巧在日本收听到国内批判“三家村”的广播；如今我将第三次访问日本了，我应当怎样回答日本朋友们对我国电影事业及影片《李双双》的关心和询问呢？在学习中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代表团将离开北京的前夕，周总理接见我们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这样气氛特殊的接见。

周总理在姬鹏飞、朱穆之等同志的陪同下进到大厅里来了，全体人员沉默地站了起来。要是过去，大家会高高兴兴地迎上前去，我也会欢快地奔到周总理面前，而现在我也一动不动地站着。

周总理沿着排列整齐的沙发座位，缓步走着和大家见面。可能大家都

像我一样，自从“四人帮”掀起黑风恶浪之后就没有面对面见到周总理了。

周总理首先和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同志握手，在他面前停了好长一会儿。说些什么？因为距离远我听不清楚。以后又和楚图南、马纯古、华罗庚、董其武、荣毅仁、王芸生……一一握手，在每个人的面前都停留一会儿，低低他说几句什么。

我等待着、等待着，感到时间特别长。……近了……近了……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两只手变得冰冷了……周总理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

七年不见面了，凡秒钟的对视，我感到一阵心酸……

周总理瘦了。他一向光采照人的面容明显地憔悴了，脸上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老人斑，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显得有些暗淡疲乏。

我哪里想得到，他那时候已经得了严重的疾病啊！

我心里有着千言万语，眼睛却只能定定地望着周总理。

周总理也打量着我。

“头发染了？”周总理声音里含着笑意。

“嗯。”我完全没有想到，连忙答应。

“再长出来怎么办？”周总理俏皮地歪着头微笑。

“再染！”我条件反射似地回答。

“哈哈，谁给你出的这主意！”随着轻轻的笑声，周总理又回看了我一眼，走向站在我右手边的上海劳模倪海宝面前。

我努力抑制着要涌出来的眼泪，无法形容当时既难过又高兴的心情。周总理无形中是在告诉我，我的情况邓大姐全都告诉他了。因为就在三天前的晚上，邓大姐曾派车来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周总理那晚正巧接待外宾，我没能等到周总理回家来。

在我被隔离审查关进牢房期间，当我被勒令一定要交代出有关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等罪行来的时候，我困惑不解又痛苦万分。曾经有好心的同志偷偷建议我：你给周总理、邓大姐写信吧。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心想：当我有一天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应当能告诉他们二位老人家，我经受住了大风大浪的考验。

但是，在我失去自由的25个月里，在我不安的睡梦中，我几次梦见我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他们……没想到这次，我真的又坐在他们朴素的家里了。

这个晚上，我面对着日夜想念的小超大姐，尽情地倾诉着我7年来想告诉他们的话。我当时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亲人面前一样，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

我特别伤心他说：“我今年已经54岁了，以后即令能让我工作，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邓大姐安慰我说：“你的样子并没有多大变化呀！”

我说：“我前边的头发全白了，为这次出国才临时染黑的。”

周总理在大家座位前转完了一周，回到中间沙发上落座了。

在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他谈了无数的问题。实际是针对大家的思想顾虑，明确地谈出自己的观点。

他让大家要发挥主动性，要敢于讲话，不要因怕说错话而不说话。

他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部民族资本家的资本只有22亿元，很可怜的数目，不要为定息而不安。

他询问工会工作、妇女工作、农村工作，……由各方面的代表一一回答。他谈到身体健康是大事，询问代表团里医疗人员配备的情况，并问董其武等老同志的健康状况如何。

他像想起了什么，笑着说：“叶帅曾建议，将中年的划分升高到60岁，我很赞成。”

又略提高了声音对着我坐着的方向说，“瑞芳，你还有6年啊！”

这突如其来的最后一句话，在座的人可能听不明白，而我却立即感到心里热烘烘的，像是有只无形的手在抚摩我的痛处，我的眼泪又一次涌满眼眶，越想忍住反而更忍不住，我怕被人发现，不敢抬起手来擦拭，只得任它在面颊上流淌下来……

当谈到文艺界情况的时候，周总理情绪开始有些激动起来，他问为什么不允许黄宗英去深入生活？他谈到严凤英的死是由于没有人关心她。“要关心人啊！”周总理一再强调说。

最使我难忘的，是周总理用相当长的时间谈到了《李双双》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它的罪名是：“工分挂帅；阶级斗争熄灭论；中间人物论……”。

周总理不无气愤地连声说：“《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是工分挂帅？为什么要批判？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

全场沉默。

周总理严峻地直对身任国务院文化小组负责人的“四人帮”亲信说：“于会泳，你说，为什么要批判？”

于会泳支支吾吾：“我没有经手这事……”

周总理又问：“浩亮，你说！”

浩亮没敢回答。

周总理转向对李炳淑说：“你是演员，你看这电影有什么问题呢？”

李炳淑说，“总理，我说不清楚。”

周总理又对谢冰心说，“谢冰心同志，你是老评论家了，你说说看，这部影片有什么问题？”

谢冰心同志说：“当时看过，觉得不错，现在记不起具体内容了。”

我感到我这当事人不能不讲话了。我说：“1962年放映的时候它是好的，如今看来它不符合样板戏总结出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按‘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李双双算不上是英雄人物，因为她阶级自觉性不高，只能说她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作风简单，时常和人吵架。她学习文化只看识字课本，她没有学习《毛选》”

我的回答现在看来是那么可笑。而当时我确实是非常认真他讲出来的。

周总理对我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他沉默了一会儿，口气较缓和了些：“李双双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公的嘛，只是她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要历史地看这个影片，整个影片的倾向是好的嘛！现在，连李双双的歌也没人唱了。”

是啊，曾被郭兰英唱得风行一时的“歌唱李双双”这支歌，周总理也会唱的。在1964年和1965年期间，几次在交谊舞晚会上，当乐队奏起“歌唱李双双”的乐曲时，周总理总会向我走来邀我共舞，引得全场一阵欢笑。周总理在跟着音乐随口哼唱着，并说这歌词不好记，因为抽象的描写多，唱起来几段之间容易串行。又说他已经学会并记住好几首革命歌曲了。

当1962年影片《李双双》刚刚拍完之后，由于在喜剧的艺术处理和技术质量上还存在不足，它并没能得到专家权威们的赞扬。但影片却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喜爱。

1962年秋天，我第一次访问日本回到北京，邓大姐约我到他们家里去吃晚饭。周总理一见到我就说：“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个好戏。”

对于《李双双》这部影片的评价，我原本也是站在专家权威一边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演喜剧，在分寸的掌握上自觉不够火候。加之多年来文艺创作上“左”的条条框框的威力始终存在，使我

们未能从“火烛小心”的创作心理下完全解脱出来。导演鲁韧自党责任重大，因此特别小心谨慎，紧紧把关，他认为：宁愿温点，千万不能因强调喜剧效果而落得个丑化劳动人民的罪名。因此在每个镜头面前，导演和演员之间，都进行了在表演分寸上的推敲和争论，最终往往是采取最保险的方案。我时常自嘲说：“我的表演像打了半个喷嚏，很不痛快。”我确实没能达到作者李卜对角色所希望的，这个人物应当比我现在的处理更疯点、傻点、毛手毛脚一点。

因此，当周总理肯定我拍了一个好戏的时候，我立刻问：是不是因为正好配合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政策了？

周总理说：“你不能完全这么看，这个影片在艺术上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你的表演也有新的东西。”

自从新中国成立，我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之后，我拍的每一部影片，不管好坏周总理几乎都看过，回想起来，他鼓励我的，多是我能投身到现实生活里，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形象的戏。尽管我在表演上存在不足，他也会说：“有点样子了，你应当再努力

下去。”当我为演这样的戏感到吃力不讨好的时候，他对我说：“演古人比演当前的人容易，因为没人见过他们，演现实生活里的人不容易，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来他像不像。”他喜欢李双双这样的人，因为她是胸襟坦荡、一心为公的，在生活里，他也鼓励我要敢讲话、讲真话……

这次，周总理在“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情况下，公开为影片《李双双》恢复名誉，目的不仅是为一部影片平反而已，而是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鼓励。会后，华罗庚、郑凤荣、林丽蕴、邢燕子等同志都奔走相告，无不感到十分鼓舞。尽管当时大家日子还不好过，但我们感到不应当消极，因为周总理是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二三十年来，在我的亲身体验中，周总理从不对我“耳提面命”，他总是用自己的言行激励我，用自己的爱憎感染我，启发我的自觉。

周总理最后一次对我的接见，留给我的教诲仍然是很多，很多。引导找想得很远，很远……它将不断激励我前进，直到我生命的终结。

1984.6. 29 于上海

周总理的两次电话

张瑞芳 1963 年 1 月到 1965 年 8 月，整整两年零 8 个月，我都在创造着同一个角色——在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和根据这个话剧改编的电影《李善子》中，扮演朝鲜农村姑娘李善子。在两年零 8 个月的过程中，周总理直接关心着这次创作。他热心地支持和鼓励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但伴随着“山雨欲来”的“文革”前的风雨阵阵，《红色宣传员》话剧虽公演了，电影《李善子》拍成后却未能通过江青的刁难和阻挠，被不明不白地关进仓库。

如今，历史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被世人认清了。我不再对这两年零 8 个月里发生的一切反常的事感到困惑和苦恼。沐浴着三中全会以来的春风，我回顾往事时，留在我心里的是对周总理更深的敬仰和怀念。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 12 周年的祭日，我特地从当年的创作日记上，原文抄录周总理在看话剧《红色宣传员》前后的两次电话记录，以纪念周总理诞辰 90 周年。感谢他生前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爱护和对文艺创作的大力支持。

第一次电话

1963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1 时半，总理来了电话。

我：真好啊，我正等着您的电话呢，知道您来上海开会了，我想可能会有电话来，我昨晚就在等着了。

总理：（笑）你想到了吗？你们的戏演得如何，听到反映说不错嘛！

我：一般舆论很好，学习了北京的演出以后我们又有些发展；也应当演得好一点。

总理：对！你们没有什么过份的地方吧？

我：大概是没有。不过有一次我曾紧张了一下。郑律成同志来看了戏，他和我并不熟悉，但打电话找我，说感到戏里滑稽的东西渲染得太多了，冲淡了李善子严肃的地方。我们曾考虑了他的意见，演员在可笑的地方，表演分寸注意掌握一下。第二天刘白羽同志来看了，他认为比在平壤看这个戏时更让他感动，因为语言懂了。他说没有郑律成同志那样的感觉。昨天吴强同志来看戏，他刚看过北京的，认为上海的演出有许多动人之处。

总理：领事来看过吗？他的意见如何？

我：他看过的第二天就到外事处谈了意见。满意我演的善子和张雁演的崔镇午，提了点有关服装的意见。

总理：你们改了吗？

我：改了。他很感谢如此重视这个戏的演出。他是和柯庆施一同看彩排的，还送了大花篮。柯庆施批评了外事处，说为什么让他们送花篮，又不是正式公演？

总理：（笑）电影的事怎么样了？

我：我正想写信给您暴露思想呢，舞台上我演善子没问题，我觉着在银幕上我显着年龄太大了，不如年青的演员扮演更感动人。

总理：你是不是分三个阶段呢？一开始很热情积极，后来担心年纪，演出以后又有了信心？

我：不是。我不担心舞台而是担心银幕。舞台和观众有距离。电影虽然可以用摄影帮助，但这个角色又不宜加工过多。

总理：这么说还是得要我给你打气了。

我：赵丹也在犹豫。他说演崔镇午演不了张雁那么好。

总理，北京青艺的张雁吗？

我：不是，是过去在重庆的。阿丹还说总理并没有点他的名，只是郑君里硬拉他上去的。

总理：你们都这样，君里就泄气了，他已经在说你们不肯同他去朝鲜。

我：我们都表示不愿意和他从搞剧本开始就泡在一起。我们应当是第二线，否则就没有新鲜感，意见也提不出来了。

总理：当然你用不着从话剧演出中撤下来。他正在找编剧，他想要李準，而李準在写吉鸿昌（不要用真姓名，搞成典型人物）；况且李準熟悉河南，并不熟悉朝鲜。建议他还是找上海合作过的人。

我：他和王炼合作过《枯木逢春》。

总理，他大概是接受了。赵丹到哪里去了？

我：到福州。和徐韬、艾明之、钱千里一同改编一个电影，是写林垦区的叫《落户的喜剧》（注：电影拍成后叫《青山恋》）。

总理，他的夫人呢？

我：黄宗英到温州去了。走前告诉我，在写邢燕子，但又担心会像李善子，她自己没戏，因为什么都正确就没有了戏，譬如李善子这角色就写得不如转变人物突出。

总理：邢燕子是北方的，为什么到温州去？

我，温州是她的老基地，况巨不光是写邢燕子，而是集中写那样的人。

总理：听说他们心里有别扭？

我：什么别扭？没有啊！

总理：关于创作方面的。

我：那是现代题材问题吧？过去注意不够，现在突然去抓。现在大家都在拍现代题材（注：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在春节接见文艺界。会上提出要“写13年演13年”，许多非13年的戏纷纷下马）。

总理：《鲁迅》还搞不搞啦？

我：导演陈鲤庭还在医院里，赵丹是在思想里暂时把它丢开了，生产计划中今年也没有安排。

总理：（笑）也不要把它全部丢了，已经下了许多工夫。老严在于什么？娃娃在家吗？

我：严励去北京一个月了，和一个青年作家浩然改编一个电影。孩子上幼儿园了，5点钟回来。

总理：噢。

我：浩然是《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写了很多短篇小说，现在《红旗》给他创作假。荒煤也帮着抓这个材料，是农村现代题材的。

总理，这很好。

我：您身体好吗？

总理：很好。

我：您有可能来看戏吗？

总理：今天晚上。我：这太好了，大家早就盼着您能看戏，果然实现了。总理：你们演的和北京有什么不同？我：我们要求更生活些，感情更浓一些。我演的善子也尽量使她感情更重一些，如她骂官粥不爱生他养他的故乡时，她自己也激动得哭了，不光是冷静严肃地批评他。总理：你的身体还好吧？

我：年纪大了，休息不好，嗓音有时听来吃力。总理：年纪大了？我：我已经满44岁了。总理：那还早呢！你正在做什么呢？我：我正在写市人代会上的发言稿，要我谈演现代题材问题。但还写不出来。总理：上次在北京电视台谈李双双，你没写稿不是讲得更好吗？我：这次不行了，要印出来。总理：《人民日报》上你不是写了一篇吗？我：这不能完全用上。总理：下午别写了，好好休息，晚上演戏。我：对，好好休息，等着您来看戏。

第二次电话总理来看戏了，迟了一刻钟开幕。观众有预感，都静静地等着。同来的有康生，以及邓小平等同志，柯庆施、陈丕显、曹获秋等陪着，陈家康同志也来了，吕复、李太成局长也早就来

闭幕后，观众热烈鼓掌，以为总理要上台。我们也站在台上等着。但总理没上台，有事，先走了。陈家康同志上台来，悄悄告诉我：总理很满意。陈丕显、曹获秋同志传达总理的话，说不能来看大家。他们并说戏有进步。

大家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失望，但主要是又高兴又激动。

晚上11点55分回到了家。12点半电话铃响了。

总理：我刚才忙着去开会，没有上台，你告诉大家吧。现在我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一进门就给你打电话。

我：我正在等着。

总理：戏很好，你的善于给我的印象很新鲜，出乎我的意外，和过去别的角色不一样，年轻有了，朝鲜味也有了，是像个年轻的娃娃；只是过于注意了这一点，在有的地方就使你语言感人的长处发挥不出来了，还可以放开一些。譬如第四场，你堵水口子大家抢救你回来，我等待着感人的语调，可是没等到。语言的感情不够。年轻问题可以不顾虑了。

我：在舞台上我还有信心，在电影上不一样。

总理：你可以回忆一下演《国家至上》的时候。

我：那是1940年，我真的是个小姑娘。

总理：现在是经过艺术加工得到的，最感人的是第六场暗转后，四场、三场也好。三场语言受了拘束，还可以继续努力。演了几场了？

我：22场。

总理：主席也问你们的戏了，同去的人都说好，当然他是不看话剧的。你们演出水平是高的，只是感到有些地方还不十分调和。有的人夸张得多些，有的人少些。回去我要再看一下北京的演出，再比较一下。

我：北京的演出很调和。我感到善子太平静不突出，只看到崔镇午。整个戏抒情味处理比我们淡。

总理：崔镇午只是有保守落后思想，还是个憨厚的农民，你们这样处理好些，像个朝鲜老农民。福善婶子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过了，不如朝鲜的福善婶子。

你还是应当去朝鲜一下，向他们学习。我们已经和金首相谈了，你们去要真的好好学习。好好做一下调查研究，学习他们青山里精神。君里说要看你们的，你们不能泄气。如果他明天回来，我打电话给他。如果我回到北京他还在，我看过人艺的演出后再找他谈谈。把意见转告给你们。

我：我不是泄气，如果有比我更合适的年青的善子，我可以在摄制组中做其他的工作，帮着创造。

总理：要真有认为合适的人，多去几个人到朝鲜学习当然也可以，不过你也要有信心。

我因为开会，急着赶回来了，你告诉同志们，我们来了这么多人而没有上台。

我，大家等着见总理，但知道您忙。您能来看戏，大家兴奋得不得了，有的人“吃螺蛳”。我一上场也“螺蛳”一个！

总理：（笑）还不觉得。

我：青年话剧团有人听到外边传闻，说我们要到朝鲜和北京去演出？

总理：这当然是传错了。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电影放映了，你们应当写文章介绍一下。

我：电影的放映已经影响我们的卖座了。话剧贵，有的单位就组织看电影了。

总理：这剧场也太远了（注：是市府大礼堂）。

我：最近上海组织学习该看的戏大多了，《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还有《红色宣传员》电影，大家一个月看不起3次戏，我们就吃亏了。

总理，你们可以向文化局反映一下嘛。或是你们停一个时期再演。

我：我们这样的团体不好停，一停下来就散了，有的人要去拍电影了（注：是由上影演员剧团和青年话剧团共同合作的一次演出）。

总理：他们年青演员也很好吧？

我：他们还没有上，现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才好。正在电影放映的时候，如果再换人，恐怕卖票又会受点影响。现在主要演员都是上影的。青年话剧团的演员的戏是很好的。

总理：我刚开会回来，进门就打电话给你。你也才回来吧？

我：我回家路上要三刻钟。

总理，你们没有点心吃吗？

我：有。有的人来得及在后台吃了，我每天回家后才吃，把点心带回来。我刚吃过稀饭。正等着您的电话呢。

总理：过了6月，你们下半年就可以去朝鲜了。在庄稼长出来的时候，生活一下，多多向他们学习。在工作和生活里学习政

我：是。我们尽量能学更多的东西回来。

总理：好吧，再见吧！柯老也说你们演得比上次好多了，有提高。

我，那次是彩排，舞台不熟、演员也很紧张。

总理，好了，电话打了，你可以睡得着觉了。

我，青年剧团的同志让我向您问好！（昨晚演出，接受总理意见，我把声音放宽了，雨真声说话，不用高音，现在想来，第三场我为显出对福善婶子像个女儿的样子，声音用得娇气了，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能体现出总理对我提的意见。— 1963，4，27日记）

1988年1月8日于上海

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水华 于蓝 1964 年 12 月《烈火中永生》的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有些领导同志看过后，都给以赞扬和鼓励，林默涵、周扬两位同志都给以很高的评价，但，12 月下旬某天，忽然接到通知说江青要看，厂里决定由副厂长田方同志（厂长汪洋当时已经因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受到批评而开始靠边站了）和导演张水华以及演员于蓝陪同观看。厂内有关宣传人员具体安排这项工作，地点在新街口北大街，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标准放映室。

听说江青要来看片，大家知道她是 30 年代的老演员，50 年代初又担任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因她的身份，大家一直很尊重她，所以对于她的到来，大家是真诚而又认真地愿意倾听她的指教。在热情的等待中，江青身着一件黑色斗篷来了，她一进门就说：“我不是你们邀请来的，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我自己来的！”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迎来的是这样的冷漠和有责怪意味的语气，不理解她话里的究竟。顿时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她坐下看片了，经常带有嘲讽意味的口气，一会儿说倒水声音大了，一会儿说关门的声音大了……这本是一个工作样片，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在“混录”时肯定要加以调整的，她是一个老电影工作者当然是全知道的。一会儿又说许云峰气质不对，一会儿又说江姐没有英气……，令人感到不安，气氛有些紧张。看到中间，她说要休息一会儿，暂停审看。她身着斗篷到院里去散步，走来走去，我们跟着她，准备倾听她的指教，她却一言不发，只是走来走去、既冷漠又高傲，气氛十分紧张。

看完影片，大家围坐在她的前边，平心静气，准备聆听她的“指教”。她第一句话，冷冷地说：“噢！？这部片子，他们是不愿意拍彩色的！？”“他们”指的是谁？当时主管电影的陈荒煤同志已调往四川，夏衍同志已受到批判靠边站了，指的是他俩？党内的同志为什么要讲成“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令人感到异常！她为什么要这么强烈地责备？这么对立的情绪！话中有内含却又不明说！是说他们对革命题材不重视，还是其他？真令人不解，大家心里非常纳闷，气氛沉重极了！

大家沉默着，聆听着，等待着，江青停顿一阵开口了。她说：“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电影不像桌椅板凳做好以后还可以锯掉一点……小改也没有用，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她又停顿有顷接着说：“也不要像以往那样，一下子把影片放到仓库里！可以拿出大家批判嘛！……发行公司也可以赚一点钱嘛！……”

真是晴天霹雳！大家懵了，在回家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还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吗？！没有！就是要批判！“不准改！”“不准收起来！”“要大家批判！”问题真是严重极了！只有等着批判！到底批判什么呢？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错在那儿？大家更是不知道。痛苦、苦闷笼罩着我们！大家想小改一下，也可以少受点批评呀！这只是工作样片，不是完成片，按工作程序，还要仔细剪接调整呀！甚至她对演员不满意，也还可以调整呀！可是她却说不让改要批判！厂里也不知该怎么办，大家在苦痛中熬煎。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沙滩（中宣部办公地址），见到周扬同志，向他做了汇报，希望他给我们一点办法。他知道我们希望做些修改，以减轻批评的严重性，他说影片可以适当地作些修改，但剧本不要再改了。后来，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慢慢他说：“最近，还有些影片受了批评，比如《霓虹灯

下的哨兵》，这也是当时已得到普遍好评的影片……”继之，他思索了一下，并不十分顺畅地说：“……还有一些影片要批呢！……批吧！……”我们并不十分明了，为什么要批一些已经得到好评的影片呢？！只感觉到他是尽力宽慰我们，但他似乎也有难言之隐。那天，他尽量未流露什么信息，但也使我们感到他并不平静。

几天以来，我们心神不安，这里边有什么政治性的原因吗？（当然我们做梦也难以想到以后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竟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再说中宣部、文化部都不认为是坏片子，而江青却认为要批判，而且态度那么严重！要批判什么呢？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十分十分苦恼！

就在这苦恼万分的时刻，一个偶然的时机，我遇到了许明同志（周总理的秘书）。她十分兴奋地问我：“听说你和阿丹（赵丹）演了一个很好的电影？”我马上告诉她，关于这部影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且江青还说影片上映后叫大家批判！她听后十分惊讶。我请求她转达：“是不是请总理帮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影片？”她点头应允了！

敬爱的周总理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听到了我们的困惑和要求，很快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敬爱的邓大姐也和周总理一起来到了钓鱼台，准备审看《烈火中永生》双片。那天，由于机器有故障，画面跳动，影响视力和新片效果，周总理马上决定易地再看。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周总理来到了原新影的标准放映室。那一天到场的还有文化部的许多领导，像管电影的赵辛初副部长，电影局李榕局长等等。都是周总理邀请同来审看的！邓颖超同志因身体关系未来。这次审看与江青看片同是一个地点，但是气氛却完全不同，周总理向在场的同志一一打了招呼，平易近人，亲切安详，大家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关系自然，有轻松愉快感。

看片开始，影片字幕中编剧写的是“周浩”，周总理好像发现了新人，马上问谁是周浩？导演告诉他这是笔名。周总理对电影的创作干部还是十分熟悉的，这个名未听过，所以十分关心，这是总理一贯关心新人的态度。看到龙光华给江姐送水，被狱中看守长“猫头鹰”开枪射击而牺牲时，他唉了一声，竟自言自语他说：“很感人嘛！”周总理看片时的反应，给人消除了紧张，有安定感！和江青看片全然不同，他不是挑剔，如有不足，他总给以积极的建议。他并不回避江青已有批评，该肯定的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

看完双片，总理认真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汇报，又问：“除了这些意见，还有什么外界的人看过？看的人不少吧？电影系统是否全看了？”厂宣发部门同志说“有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和日本电影作家代表团看过，一致反映很好。”（大意）于蓝因参加了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工作，也亲耳听到了日本人的意见，就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日本代表团团长说：“像《早春二月》拍得很好，但日本有很多这类影片。而此片（即“烈”片）在日本是没有的。影片告诉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一部好影片，我们很喜欢！”（大意）也有人汇报了日本代表团的作家井手雅人等当夜就给日本国内打电话，说看了一部好片子，总理听后点点头，又向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一再嘱咐要大家回去充分讨论，快点提出意见。他不是那样武断，定调子，而是按照组织原则允许大家讨论后拿出意见。他又问赵辛初：“文化部有什么意见？（此时文化部已换成肖望东、石西民、赵辛初等部长）今天是14日，最好两三天内就把意见拿出来！”在讨论过程中还研究了影片该叫什么名字，（《烈火中永

生》还是周总理后来帮助定下的片名。)又对影片中许、江一拉出监狱，画面就转到迎接解放军的场面，总理说：“太快了，就义应该有形象的表现，当时许多共产党员牺牲时都高喊出：‘共产主义万岁！，应该有一点壮烈的场面！……”这时，我们又担心他说：“赵丹已经回到上海了，怎么办？”周总理说：“打电话叫他来嘛！”其时，赵丹已在上海受到批判（批判 30 年代），抬不起头来！周总理说可以叫赵丹来补戏，是对赵丹的关心，同时也是帮助解决赵丹的银幕形象可以更好些！多么细微的关怀呀！总理还说：“今年上映的还有《霓虹灯下的哨兵》、《节振国》……”意思是说这些影片都不错！给电影工作以极大的鼓舞！临别时，他走到门口，转过身来笑着对我们说：“现在支持的人不少了！你们赢得了观众！”周总理的到来，和江青多么不同呀！总理坚持组织原则，不独断专行，允许大家讨论，让大家拿出他们对影片的意见，同时又是多么鲜明地保护对人民有益的影片呀！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烈》片经过一部分修改，1965 年夏终于上映了，而且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当扮演江姐的于蓝到山西南柳去劳动，路经太原市时，受到了少年官少先队员的热烈欢迎。1966 年 3、4 月间，此片还要送到日本，又遭到江青的阻拦。但，中宣部因此片受到周总理的关怀，还是坚持把影片送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观众极大重视。……这一切都说明影片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因而在当时并没有达到江青所希望的那样——“大家都来批判”的目的。

然而，1966 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了建国以后 17 年的一切工作，包括文艺工作在内，说“文艺黑线”是又粗又长（从 30 年代左翼文联批起）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烈火中永生》当然不能逃脱厄运，也受到了批判。1966 年所谓的“造反派”揭发“文艺黑线”的材料中，就公布了 1965 年 11 月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批判了的众多部优秀影片，都列为毒草。其中就有《烈火中永生》一例。说《烈》片等大毒草，是为当时重庆市委书记翻案，是把华蓥山的斗争说成城市领导了农村，违反了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教导……等等。总之，说《烈》片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就不难看出 1964 年 12 月下旬江青去责难《烈》片的用意所在了！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真正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捍卫者，在 1964 年（“文革”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了，他毫不回避，勇敢捍卫人民的利益，他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他的心和人民连在一起，他的感受与爱好是和人民一致的！他要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受到人民欢迎的文艺作品！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烈》片完成至今已有近 30 个年头了，它以革命先烈的精神气节教育了几代人！演员都因此片受到人民过厚的爱戴！这部影片是整个摄制组在革命先烈精神感召下刻苦努力的结果。（当然不是说它已十全十美了！）同时，这部影片更凝聚了敬爱的周总理所给予的关怀与扶持！周总理不只是对这一部影片如此爱护，可以说“文革”前，50 年代，60 年代，许多优秀影片都得到了周总理思想光辉的辐照！建国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周总理的汗水和爱抚！

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桑 弧

1952年，夏衍同志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他建议上海电影制片厂给我一个任务：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优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银幕，以满足全国广大城乡电影观众的需要。

这一年冬天，在首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以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工作的成就，这也提供了条件，使全国各戏曲剧种创作人员有一个互相观摩交流的机会。黄佐临同志和我相偕赴京观摩，这对正在筹拍《梁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正是在第一届戏曲会演中，我们得以饱览了全国著名剧种的代表剧目和演员。例如川剧的陈书舫、周企何，汉剧的陈伯华，桂剧的尹羲，豫剧的常香玉等，这一次全国大会演充分展示了中国民族戏曲的丰富蕴藏和宝贵传统。会演结束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闭幕仪式。主持会演组织工作的周扬、田汉等同志都讲了话，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表演艺术大师也都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也亲临会场，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

与会者受到极大鼓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周总理的言论丰采。

在赴京前，我和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徐进同志已经根据《梁祝》的舞台演出本改编成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的初稿。会演期间，我们观摩了各地如此丰富多彩的优秀剧目，拓宽了视野，也为把越剧《梁祝》搬上银幕增强了信心。

1953年上半年，摄制组进行了排戏、分镜头。美术设计、彩色片摄影、洗印的各项技术试验。影片于7月初开拍，对这部新中国第一次拍摄的彩色戏曲艺术片，周总理和陈毅市长都倾注了很大的关心。1953年冬，影片摄制完成，夏衍同志邀请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陈毅市长来审看样片。他们看后十分高兴，对袁雪芬、范瑞娟的优秀表演以及摄制组集体的创作劳动给予很多鼓励。周总理还详细询问了拍摄情况。他知道舞台上的《梁祝》要演三个多小时，这对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过量的负荷。因此，如何把影片的长度控制在电影通常所允许的二小时放映时间之内，而又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突出舞台上的精华，这确是一个难题。摄制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尽如人意。周总理沉思片刻，用商量的口吻问我们，为了剧情的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再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我们觉得总理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短短四句唱词，却把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

1954年，周总理出席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他把影片《梁祝》也带了去，招待各国代表，还邀请电影大师卓别林来观看。卓别林十分欣赏《梁祝》，他由衷称赞中国民族戏曲的优秀传统。他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梁祝》于1955年获捷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并获中央文化部优秀影片金质奖章。

周恩来总理生前经常和文艺界人士接触，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1958年，他曾倡导电影界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拍摄一些“艺术性纪录片”，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使创作人员多接触工厂、农村的实际，来弥补生活底子不厚实的缺陷。可是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电影界的领导和创作人员都不免头脑发热，跟着工农业“放星”，强调产量和速度。摄制棚内用闹钟来限制每个镜头的拍摄时间，甚至一天要拍一百多个镜头，根本顾不上艺术质量。因此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这股风虽然不久就被刹住了，周总理却深自负疚，在很多场合作了自我检讨。我们都明白这个现象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形成的，我们都为周总理的勇于自己承担责任的襟度所感动。

1960年12月中旬，上影厂派张瑞芳、秦怡、王丹凤和我4人随同周总理所率领的庞大代表团去缅甸作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由政府代表团以及军事、边界、佛教、新闻、文化艺术、体育、电影等分代表团组成，人数多达数百人。电影代表团由八一厂厂长陈播任团长，团员除上影4人外，还有田华、崔嵬、李恩杰、王心刚、秦文、庞学勤、王苏虹、杨丽坤等。我们到达北京迟了几天，总理已经接见过全体团员了。12月15日上午，总理专门派车来接我们到中南海他家里去吃午饭，邓颖超同志也亲切地会见了我们。总理显然是因为我们报到迟了，特地接见我们一次，以示关怀。他向我们讲了这次出访的意义和应注意的事项，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总理家的饭菜十分简朴。午饭后他还和我们在林荫道上散步，并且和我们一起打乒乓。总理谈锋很健，庄谐并作，他的音容笑貌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就在总理接见的当天晚上，我们电影代表团就和其他代表团一起搭专车离开北京，转道昆明去缅甸了。

周总理的座机是在1961年1月2日中午飞抵缅甸首都仰光的，和他同来的有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以及政府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先期到达缅甸的中国友好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到机场欢迎。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在总理座机着陆后，走上飞机，迎接周总理到机舱门口，总理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时机场上出现了无比热烈欢腾的景象，充满了中缅两国人民友好的“胞波”情谊。当天晚上，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在总统府的大草坪设宴欢迎由周总理率领的全体中国友好代表团。中缅两国总理在宴会上作了热情诚挚的讲话。缅甸是佛教国家，当晚的宴席全部是素食，并且按照中国口味烹调，这也是一个特色。

我们电影代表团于1月6日在总统电影院举行“中国电影周”的揭幕仪式。两国总理都莅临参加。缅甸影剧协会主席吴丁内和陈播团长先后讲话，接着介绍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我们合唱了“缅中友好之歌”和“中缅两国是胞波”，并由王苏虹独唱“美丽的祖国”，王心刚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幕仪式结束后，放映了新影厂摄制的纪录片《欢迎你，缅甸胞波》。这部影片是纪录1960年10月吴努总理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盛况。影片放映时，观众反应强烈，不断爆发热烈的掌声，陈播团长还代表周总理将该纪录片的拷贝两部赠送给缅甸政府。在这次“中国电影周”的开幕式上，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深刻。原来在电影周准备放映的影片中，有一部是崔嵬和陈怀皑同志导演的戏曲艺术片《杨门女将》，因此在开幕式登台的电影代表团中，就有穆桂英的扮演者杨秋玲在内。周总理隔天晚上审看了登台者的名单，他认为饰演穆桂英的杨秋玲和饰演余太君的王晶华都是光彩照人的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所以也应该把王晶华列入开幕式登台的电影

代表团之内。好在王晶华这次也来了缅甸，她和杨秋玲都是文化艺术家分团的团员，要到缅甸各地去参加歌舞戏剧演出的，因此在开幕式上，王晶华就和杨秋玲一起登台，接受缅甸电影演员的献花。从这一件小事，我深深体会周总理考虑事物的周密，以及他对艺术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在缅甸逗留了半个多月，在缅甸政府和电影界朋友们的妥善安排下，访问了几个城市，参观了名胜古迹和几个电影制片厂，也观摩了一部分缅甸影片。在这期间，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肖明参赞代表中国政府向缅方赠送了上影厂拍摄的《缅甸歌舞》纪录片，影片内容就是纪录去年随同吴努总理来华访问的著名艺术家们的一部分精采节目。

周总理在离开仰光回国的前夕，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缅甸总统吴温貌和总理吴努都出席了，气氛十分热烈愉快。宴会后由中国艺术家表演了精采的歌舞节目。散席后，客人们相继离去，周总理要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留一留。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他明天就要回国了，他认为这一次友好访问很成功，他说，代表团的各分团还要继续进行各种访问活动，他要我们谦虚谨慎，本着热情诚恳的精神，胜利完成作为友好使者的任务。总理的谆谆教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制订的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英明伟大。

1961年6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6月19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发表讲话。著名的“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主张，就是他在那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总理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7页）

不能忘记周总理讲这一段话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就电影战线说；从《武训传》于1951年被批判开始，《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相继受到批判。1957年到1959年的反右扩大化，电影界也有不少人被错划。1958年到1959年的“大跃进”以及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使许多创作人员逐步形成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扭曲心态。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各故事片厂摄制了一批优秀的献礼片，周总理充分肯定了这些影片的成就，并且勉励大家努力奋进，拍出更多革命的、健康的又是艺术的影片来。可是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以及“左”的影响仍束缚着创作人员的手脚。1961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创作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这两个会议的目的本来是为了纠“左”，使创作人员解放思想，敢于大胆创作。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大家曾对长影王家乙同志导演的《达吉和他的父亲》展开讨论。家乙同志曾提心吊胆，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所以影片中该让观众哭的地方，也不敢让人流下泪来。直到有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周总理也肯定了影片的成就，不过他也指出导演思想上显然有许多顾虑。总理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在总理的鼓励下，大家比较能够敞开心扉，在会议上互相交流几年来的切身感受。有的同志讲到慷慨激动处，不免声泪俱下。6月28日，周总理让大家到香山休息一两天，以消除开会半个多月来的紧张疲劳。6月30日晚上，又让我们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庆典。当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欢声雷动，兴奋雀跃，达于极点。大会

由周总理主持，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散会后我们仍坐车回香山休息。第二天7月1日，是党的生日，周总理特地到香山来看望大家。他和我们共进午餐，并和大家一起散步游山，闲拉家常，使我们感到十分快乐和幸福。

创作会议于7月2日闭幕。会议期间，周扬、夏衍、陈荒煤等同志多次讲话，或参加座谈讨论，听取意见。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制订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电影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但是，这两个文件终于没有实施，成为一纸空文，在上海，连周总理的讲话都不允许传达。电影创作会议是在新侨饭店召开的，在“文革”期间，被江青一伙诬称为“新侨黑会”。在十年浩劫中，大批文艺界的领导和创作人员都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前几个月，看了革命历史巨片《周恩来》，不禁感慨万千。王铁成同志饰演的周总理形神兼备，演得十分成功。他把周总理一生最后10年的忍辱负重、支撑危局的形体和内心活动展示得非常充分。凡是曾经和周总理有过接触或者听过他讲话的人，看了片子无不为之感动。“化悲痛为力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句悼念逝者的话，可有时用得滥，也会变成“套话”。但是，我感到这句话用在周总理身上却十分恰当。周总理逝世已经16年了，我们痛切悼念他过早地离开我们。在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上国际间的风云变幻，我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感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周总理的光辉一生中汲取力量，这将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征途中，增添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1992年1月8日

敬爱的周总理永在我心中

王 莘

记得那是 1937 年底的事。我们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在陕州演出，来之的同志从武汉回来，告诉大家：“演剧队的形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救亡演剧队第一队要解散，部分同志去延安，部分同志回武汉。”不久我和宋之的同志回到武汉。一天我俩去三厅向郭沫若、田汉两同志汇报。正巧，周恩来同志也在那儿，立刻接见了我俩。当时我很紧张，生平第一次见到有崇高声望的共产党领导人感到手足无措，十分拘束，语无伦次。周恩来同志看出我的紧张，他平易近人的言谈，把我当成家人一样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使我的情绪很快被他的热情所缓解。我们汇报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半年来的工作和要恢复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设想。周恩来同志很赞成我们的计划，并要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作和演出一些宣传抗战的剧目。我俩一直把这金玉良言铭刻在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以及他给我留下的一个极其美好的印象。

1940 年，来之的同志在重庆创作了五幕话剧《雾重庆》。这是一部揭露国统区黑暗政治生活的作品，周恩来同志给了该剧极大的关怀，在当时周恩来同志肩负着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日理万机，异常繁忙。但是他挤出时间经常来看我们排戏，并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供我们研讨；《雾重庆》上演后，也经常到剧场着演出，有时台上的演员忘了台词或说错了台词，周恩来同志即到后台给大家指出。他对我们的艺术要求是严格的，而对我们的生活则又给予极大的热情和关怀。他就像一团火，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1941 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屠杀人民，重庆也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为了抗议国民党这一残酷行动，我们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去香港开展戏剧活动，成立了旅港剧人协会，演出《雾重庆》、《北京人》、《马门教授》等三个多幕剧。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恩来同志指示东江纵队：“要把香港的 3000 文化人，一个不少的撤回到大后方。”我们于 1942 年回到重庆，成立了中国艺术剧社，直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戏剧活动，直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我们就如同游子回到母亲的身边，感到无比的幸福。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天，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飞达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9 月 3 日和 9 月 22 日，毛主席两次接见文艺界人士，我荣幸地被接见了。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把我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王莘，宋之的夫人。”毛主席立刻接着说：“啊！南京娜拉。”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我，一个普通演员，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他们却记得我那次演出，肯定我 10 年前演出《娜拉》时一点微薄劳动。这使我永远铭刻在心。

我再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是 1958 年第二届全国文代会的时候，那时正是我极需要帮助和鼓励的时候，宋之的同志逝世不久，我还没有能完全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四个孩子都未成年，生活的担子很重，所以精神状态也不大好。会议期间夏衍同志把我引到周总理面前，周总理温暖的手握着我的手，他记念着宋之的同志，并劝慰我节哀，同时间孩子们好，要我好好教育孩子。周总理还亲切的对我指明了发展电影事业的重大意义，鼓励我尽快的跳出个人悲痛的圈子，把精力投入到人民电影事业中去，为党和人民拍

出更多更好的影片，便是对宋之的最好的悼念。我很激动，我把总理对我的期望当做党和人民对我的鼓励和要求，总理的亲切话语凝聚成巨大精神力量，激励我战胜一切困难。总理的谆谆教诲是我在电影艺术园地上努力工作的力量源泉。

1962年我继导演《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江山多娇》、《遥远的坳沙》等片后，导演了《槐树庄》，并荣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发奖完毕，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二人和我们获奖同志合影。在拍照时，两位总理无论如何也不肯坐在中间的位子，那种谦虚、甘做人民公仆的伟大品格光彩照人，既是人民的好总理，又是人民群众中普通一员，这样的例子何止千

万！

记得我接受周总理的指示，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影片完成回京后，又在总理亲自领导下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影片的导演工作，领导小组要我负责电影的总导演。我想，这么一个近5000人的摄制组，人才济济，影片又是三个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我便请示总理：“我可以做全部工作，我还是导演中的一员，不要用总导演的名义。”总理听后连声说：“好，好，这样好！”总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尊重别人，尊重科学，在工作中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当时彩色胶片很困难，是总理批外汇去买的。幻灯背景拍摄时，遇到极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好总理不知和我们看了多少次试验片，最终帮助我定下背景用幻灯。再有我们拍摄场地共有三处：一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最大的摄影棚，二是人民大会堂，三是北京体育学院室内运动场。拍摄宽银幕和普通银幕两套并第一次搞立体声，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许多新事物有待我们去学习去解决，总理时刻在我们身边，困难也一个个的迎刃而解了。

我们这个组负责人民大会堂的拍摄工作，每到夜深两点钟左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办公休息时，就来到我们的拍摄现场。大家一见总理来了，精神十足，瞌睡疲倦全跑了。有时无戏的演员躺在大会堂的观众席上睡着了，总理总是轻轻地把他叫醒，并说：“这样睡要着凉感冒的，到休息厅的沙发上去睡。”有时大家围在总理身旁问这问那，叨叨的没完，他们多想多听听总理的讲话，多看总理几眼。总理发现这种状态后立刻就说：“我得赶快走，赶快走了，不然影响你们的拍摄工作。”总理就是这样热爱他的人民和人民的电影事业。大家望着总理辛劳而又慈祥的面孔和匆匆远去的伟大身影，每个同志心里都翻腾起一股暖流，激发起强烈的工作责任感，顺利又超额地完成当天的拍摄任务。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十年浩劫”使我们党和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困难，我亦未能幸免。“抄家”、“揪斗”、“黑楼”、“下放劳动改造”等等的残酷迫害，始终没有使我丧失对党和人民的信心，因为党和总理水在我心中。

“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受到公正的历史审判，国家与人民新生了。然而令我无限悲痛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却因积劳成疾，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未能看到“十年浩劫”后人民欢庆胜利的一天。

他像山河一样永存

钱江去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南方治病，极度的悲痛使我几次哭晕了过去。我再三请求一定要回京参加追悼会，向他老人家的遗体告别。可是万恶的“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就是不准。我怀着一颗被撕裂的心，满含热泪，遥望北京，那是多么令人悲愤的时刻啊，我竟没能见到总理最后一面。总理逝世整整一年了。可是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的音容笑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老人家仿佛仍然在日理万机，昼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操劳；仍然在意气风发地指挥我们亿万人民去战斗，去夺取胜利！365个日日夜夜，我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怀念着总理。他老人家对我的谆谆教诲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不能没有总理。我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党和周总理亲手抚育我成长，把我培养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电影工作者。几十年来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永志不忘。我的父母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我父亲钱壮飞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为党工作。1930年，由于他和李克农、胡北风同志将一个叛徒投敌告密的消息及时报告了党中央，使党的组织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得以安全转移。我父亲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来跟随毛主席长征，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保卫工作。1935年3月在贵州息烽县沙土镇附近光荣牺牲。

1930年我们与父亲离散了，全家流离失所。当时我11岁，寄居在别人家里，生活非常困难，脚上穿的一双套鞋，半年多换不

下来，最后脱下来时，里面一双力士鞋的前半截全磨没了。后来我又辗转各地。党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还一直惦念着我们，想方设法寻找我们。终于，周副主席派李克农同志在重庆找到了我们，我和弟弟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副主席。找到党，我们就像孤儿又见到了亲娘，感到无限温暖，心里充满了阳光。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的形势非常紧张。周副主席代表我们党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决定把一些同志尽快地从重庆疏散走。我和弟弟遵照副主席的指示和安排，从重庆市两路口换乘总理的汽车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在除夕的晚上，化装成办事处的警卫人员，一路上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阻挠，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了延安，副主席又介绍我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和延安电影团学习和工作。副主席经常从重庆回延安，与党中央毛主席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工作十分繁忙。可是每次都叫我去杨家岭去看他，他关怀我的每一点成长。当时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副主席从重庆给我带来物理、无线电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书，让我好好学习。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次周副主席送给我一本亲笔题字的革命小说，当时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本书我看过，现在送给你。一个青年人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有革命的理想，要把一生的精力献给革命。”几十年来，周副主席的话一直铭刻在我心头，一直鼓舞我不断前进。周副主席还让我去看延安的革命烈士展览会，教育我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先辈

的革命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的鼓舞和教育下，在党组织和周副主席耐心地帮助和培养下，我从一个世事不知的孩子，跨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行列。

周副主席在政治上关心我，在其他方面对我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1944年5月，我生病发高烧，处于休克状态，住到延安的中央医院。周副主席得知后，亲自打电话给医生说：“钱江的父亲为革命牺牲，是烈士子弟，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接着又打电话给傅连璋同志，再三关照这件事情，说：“我明天回重庆，把他交给你了。”医生遵照周副主席的嘱托，在延安那种困难的医疗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从垂危中救了过来。是党，是敬爱的周副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周副主席对于我和其他许许多多烈士的遗孤，都是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像慈父一样关心、体贴和照顾我们。副主席就是这样把党和毛主席对革命后代的关怀，具体入微地体现出来，这种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1946年，副主席指定我和弟弟、爱人去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我们刚到重庆，办事处的钱之光同志就通知说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要接见我母亲和我们全家。在曾家岩50号，副主席请我们全家吃饭时告诉了我们父亲牺牲的消息。他对我母亲说：“你多次托我打听钱壮飞同志的情况，我都没说，钱壮飞同志早已光荣牺牲了。他的牺牲是为党、为革命，人民和党是不会忘记他的。”我母亲听了悲痛地哭了起来。副主席说：“你别难过，你还有任务，要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你已经把子女教育成人，为革命工作了，还要把孙子培养起来，革命要一代接一代。”当我母亲表示了一定要坚强起来，多做工作，培养好孩子，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我父亲的决心以后，周副主席当时感情深沉、思绪万千地说：“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我们是幸运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肩负着无数先烈的未竟事业，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奋不顾身、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忘我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崇高的思想和品德永远是我们亿万人民的光辉榜样。

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周副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美蒋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我们也于1946年转到南京做电影工作。周副主席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还常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他派同志按时给我们送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每次我们都把读完的文件材料装在点心盒或水果篮中，甩掉国民党特务的尾巴，到梅园新村30号去见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作和学习情况。周副主席指示我们：要团结搞电影工作的人，为迎接我们党的胜利做好群众工作。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撕毁了和谈假面具，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周副主席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让我们离开南京，转移工作地点。临别时，他充满胜利的信心对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长不了，有机会你们就转道去东北，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全国解放后，总理日理万机，工作更加繁忙，然而对我们各方面都关怀备至。特别是当我母亲卧病不起时，总理、邓颖超同志经常派人来慰问，安排治疗。就连我母亲是安徽人，生日是哪天都记得清清楚楚。1962年，我母亲生日时，总理、邓颖超同志特地送她安徽的茶叶、芝麻饼等四样土特产。总理每天有多少国内外大事要处理，可是他对一个革命烈属却这样挂在心上，关怀备至！敬爱的周总理就是通过这样的具体行动，把毛主席党中央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和对先烈家属的亲切关怀，感人地体现出来。联想起总理

1972年患癌症以后，仍然废寝忘食地坚持工作，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潮激荡。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心里牵挂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可唯独没有他自己啊！

367

对于党的电影事业，总理一向是十分关怀的。

我们拍摄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创作到拍摄，总理都亲自过问、审定。他是名符其实的总导演。在选材和节目的安排上，他力求突出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影片开拍前，总理在他特地召开的摄制组会议上曾作了明确指示：影片一定要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的光辉思想生动地显示出来。对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革命业绩，他都做了细致周到地安排和表现。记得有一次，陈毅同志对总理说，“你这个总导演大‘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你都表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总理听了只是爽朗地笑了笑，又一次地拒绝了重复提了多少次的这条意见。

1975年，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病重住院了。在病势垂危的时刻，他照常处理党和国家的许多大事，同时仍然十分关心党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在医院中，周总理调看了被“四人帮”及其爪牙扼杀的《海霞》双片。邓颖超同志还向有关负责同志建议，用这部影片招待在京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朋友们。正当“四人帮”大搞白色恐怖，围剿《海霞》摄制组的时候，这个消息传来，使我们万分激动。我深深懂得，周总理对《海霞》的关怀绝不仅仅是为挽救一部影片，他是在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六条标准和各项文艺政策，他是在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总理的关怀和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勇气，坚定了我们同“四人帮”及其在文艺界的爪牙们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病魔和“四人帮”，夺走了我们的好总理。然而，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永远地和我们在一起。他像真理一样朴素；像历史一样长青；像山河一样永存；像人民一样不朽。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永远以总理为榜样，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要永远听总理的话：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深情忆总理 教诲铭心中

田 华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快 20 年了，每当我捧起这张珍藏多年的照片，耳边就回响起总理那爽朗的笑声。30 多年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往事的记忆逐渐淡漠了，但是，和总理在一起的那些情景，却永远铭刻在心底，而且越来越鲜明、清晰。

1961 年 6 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聆听周总理的重要讲话，陪同周总理一起去香山，这一切真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新侨会议”是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会前，总理多次认真地重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电影界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会上做了极其重要的讲话。许多电影界的者前辈、同行，聚集在一起，畅谈学习总理讲话的体会，研究如何使故事片更上一层楼，如何用实际行动贯彻执行总理的指示。当时，大家是带着许多问题来参加会议的，听了总理的讲话以后，心里如同点燃了一盏灯，顿时明亮起来。

记得，总理作报告时说过：“你们要我谈，我就谈一谈”，“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总理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民主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会议结束以后，总理亲自指示：“同志们开会很紧张，可以安排到香山休息几天。”6 月 30 日这天，总理在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来看我们，陪我们一起游览了香山，和大家共进午餐之后，同志们提出来想和总理合个影，请总理站在前排中间，可总理怎么也不肯，还非常和蔼地对我们说：“我为什么不能站在旁边啊？”大家只好听总理的安排。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总理就是这样，即使在照像这样细小的事情上，也想得那么周到。他，永远是人民的总理，永远置身于人民之中。

1979 年 1 月 12 日，我们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又聚集在新侨饭店举行座谈会，重新学习总理在新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大家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雨斗争之后，在我们终于从“四人帮”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之后，又来到当年亲耳聆听总理重要讲话的新侨饭店，真是百感交集，心潮翻滚。被“四人帮”诬蔑为“大反复”的“新侨黑会”终于得到平反，江青之流诬陷周总理的大阴谋已彻底揭穿。几位文艺界的老前辈和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都作了发言。有的同志说，总理的讲话在理论上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展，总理在讲话中对如何发扬艺术民主，如何正确开展文艺批评，以及文艺规律问题，党的领导问题，都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今天读起来仍然十分亲切，不仅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重新学习总理的讲话，想到总理对自己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更加怀念总理。我的床头挂着总理的遗像和总理在 1960 年给我写下的题词：“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工作”。我经常默然地站在这面镜子的前头沉思，惭愧的是，这十几年来，我学习得不好，改造得不够，为人民作的工作也太少，总觉得对不起总理对我的教导和期望。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不要怕听改造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认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

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总理自己也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敬爱的周总理，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我将永生遵循您的教导，“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努力工作”。

“辛勤的耕耘才会有灿烂的未来”

陶玉玲

我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一样，经常想念着敬爱的周总理，一起缅怀他对我们的关怀。

每当这个时候他的音容笑貌便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时常在想，总理啊，您还活着，你从来也没有离开我们啊！

1958年，当我还是南京军区话剧团的青年演员，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总理是闻名于世界的伟人，管理着党和国家的大事，而我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艺工作者却那么荣幸地受到了总理的接见。听着总理温和慈爱的话语，一股暖流滋润着我的心田，深感青年一代对祖国肩负着重任，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事隔一年，我被借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片。北京饭店举行庆祝国庆10周年的招待会时，在陈播厂长、王苹导演的带领下，我也有幸出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对我太关心了，只有这么几个名额，却让我这个外请的演员占了其中之一，当时心里非常感动，又想到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高规格的国庆宴会，心情不觉又有点紧张。当我们等候宴会开始时，忽然接到通知，敬爱的周总理在另一休息室先接见电影界的同志，真是喜出望外呀！我庆幸自己马上就能距离很近很近地看到他老人家啦。当周总理身穿银灰色的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会议室时，我屏住呼吸，凝望着

373

他那两道浓浓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双目，弯曲的右臂和潇洒自如的神态，顿时感到真和电影片上的他一模一样。不由得使我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周总理快要走到我的面前了，他伸出右手将要和我握手了，我的思绪还在飞跃，好像做梦一般，心里一下子蒙住了，想说的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只是紧紧握住他的手，只会朝着他傻傻地笑。结果还是总理先开口：“你是在《柳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甜啊！”我怔怔地点点头，轻轻地答应了一声“嗯”，声音小的连自己都听不见。他又慈祥地说道：“演得不错嘛，可是你还很年轻，不要骄傲，好好努力。”我赶紧回答：“我一定记住总理的话。”这时，只见闪光灯一亮，新华社记者唐理奎同志拍下了一张我终生珍藏着的周总理与我握手的照片。这次接见和他老人家对我的要求照亮了我这个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走的道路，我将遵照他的谆谆教导谦虚谨慎，永远进取。

转眼过了5年，前线话剧团奉命到北京汇报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我在剧中扮演春妮。这一回我又幸福地多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他到剧场观看演出后，十分高兴，休息时接见了作者和导演。演出结束后，又健步登上舞台和演职员一一握手。说来也真奇怪，这一次和总理握手，我自我感觉很好，一点儿也不紧张，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摄影师邓守智同志忙得满头大汗，为许多同志拍下了总理上台接见的照片，其中也有我再次和总理握手的珍贵留影。到今天，我还时时取出这张照片，仔细端详，久久地沉浸在那无限美好的回忆之中。是啊，从照片上看，我真是满心的喜悦，像是在长辈面前撒娇的样子，连扮演春妮用的道具——那根长长的线还挂在身上未及摘掉呢！后来，邓大姐告诉我们总理看完戏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为了使这

出戏得到提高，他老人家先后看了六遍，全团上下为此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周总理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看戏，而且非常认真，几乎每一次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如第二场赵大大捡到林乃娴的钱包没有马上还她，到第六场才还，总理指出：这样不妥，有损赵大大的形象。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交还。他不仅亲自指导修改，还请来了文艺界老前辈田汉、夏衍、曹禺等和许多领导同志来看演出，并且亲自主持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周总理对我们演员如何塑造好角色也极为重视，要求演什么人就像什么人，既要符合人物身份，又不能概念化，例如：女特务曲曼丽穿了一身考究的裙服，总理马上指出，“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种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导演遵照总理的意见，让演员换上了工装裤。不久，总理又来看戏，发现曲曼丽的裤腿改得又瘦又短，看上去像个阿飞，他马上又提出来，裤子要再改一改，既然给她穿工裤，就要像个工人，不能妖里妖气，不要一出场就让人看出她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加深，逐步揭露出来，不然就看不出她的伪装。意见是那样中肯准确。听着总理的话，深深感到他的思维是如此敏捷，知识又是那么渊博。心底里充满了崇敬之情。

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总理和蔼地对我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人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我惴惴地回答：“小学文化程度。”总理笑着：“哦，高小文化程度，能说出俩小无猜吗？”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又说：“唔，这句词也很不口语化，可以改一改嘛。”我想了想：“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好吗？”总理马上给以肯定：“对，很好啊！”他总是在富有风趣的对话中使我们得到教益的啊！记得还有一次，在总政排演场的休息室里，沈西蒙部长像往常一样，让我坐在周总理的身旁，聆听他的教诲。总理高兴地鼓励我：“你的戏不多，演得很好啊。”但又接着告诫我：“你还要努力啊，不要因为我们称赞，你就不努力了。”我的心激动得砰砰直跳，心里想着，

375

我只不过为人民演了一个戏，总理就给了我这么多鼓励，怎么可以不再去奋斗呢？

周总理的兴趣非常广泛，抽暇还会去参加舞会。首都文艺界热情友好地多次为我们组织了联欢会，总理忙完国家大事，有时在夜里10点左右赶到来参加跳舞。总理一进场，乐队就奏起了《洪湖水，浪打浪》的曲子，张泽易团长让我代表女同志请总理跳第一只舞。总理迈着轻快的舞步，不时还轻声地哼着歌曲，他一边跳舞，一边幽默地对我说，“小陶啊，我年轻时也演过戏，还念过信呢。”我随着总理的脚步，觉得自己也轻松自如起来，衷心为自己能和总理一起跳舞而感到自豪。

3月8日是我们妇女的节日，外面飘着漫天大雪，女同志宿舍却是暖融融的。演出归来，谁也睡不着觉，不知哪一位提议，我

们给邓大姐和总理写封信好不好？大家热烈响应，让我执笔，你一言，我一语，不一会儿就写完了。在信中，我们倾诉了对总理和邓大姐的敬爱和感激之情。当我们又一次见到总理时，他老人家高兴地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是大姐在吃饭时念给我听的，不应该感谢我们，应谢谢你们，祝贺你们节日嘛。”

没过几天，张团长对我们说，总理要请剧组同志们到家中作

客。我们个个喜出望外，女同志都翻出自己最好的衣服，我也选了一件自己最满意的格子中装上衣，坐上大轿车去往中南海。在途中车厢里显得格外安静，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这次不寻常的会见。总理和大姐早就在客厅等候我们了，还特地请了我们的老首长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同志以及总部的首长，我被安排在总理的身旁就坐。在席间，总理仍然是那样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印象最深的是，他风趣地告诉我们：“今天大家随便，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菜，但你们要把定量的粮票留下来，因为我和大家一样，粮食也是定量供应。”逗得在座的人哄笑起来。是啊，总理密切联系群众，和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他是总理，更是普通公民。

由于总理的关怀，我们剧团在首都演出了很长时间，受到了成千上万观众的欢迎。总理又安排我们给毛主席演出，我们剧组再次进京，于11月29日在怀仁堂上演。开演前邓大姐代表总理来到后台看望大家，要我们不要紧张，把台词说清楚。不知怎么的，在北京的每场演出，我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凡是戏里提到党的培养这些活时，便觉得是那么具体，真切，自然而然产生了新的感情，每场演出都充满着真情实感。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大灾难中，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总理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老人家处境是那么艰难，他在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受着磨难。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砸烂‘三名三高’”的口号之下，我和大家一样，在劫难逃，被迫复员，脱了军装，下放到南通晶体管厂当工人。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我来了北京。我多么想见见敬爱的周总理啊！从报纸的图片上，我看到了他一次比一次瘦了，国家处于巨大灾难之时，我想，我是不可能再见到总理和邓大姐了，虽然我是那样思念他们二位老人家，心里怀有那样亲切的愿望，那只不过是美好的幻想而已。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平息自己的愿望，于是我鼓足勇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心情、处境和苦恼。我安慰着自己，这次虽然不能见到总理，通过文字也就像和他们二位老人家说过话啦。我整理行装，准备很快便返回南通去。

真是没想到，信发出去的第三天，总理办公室突然来了通知，要我上午10点钟到中南海总理家去见面。偏偏那天我去亲戚家告别，等我中午回来已经赶不及，我赶快打去电话：由原来的上午10点改为当天下午4点钟。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想得非常周到，详细又具体的告诉我怎样搭乘公共汽车，在什么地方换车，如何进中南海等等，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衣服，心里激动得怎么也平

377

静不下来。下午3点多钟就到了中南海门口。我在门口走过来又

走过去，左思右想着以前到这里来是和剧团里的同志一起，今天却只有我一个人，还脱了军装；“文革”期间一切变化巨大，总理还接见我，我的心情确实找不到更好的词句来表达，我只盼望着立刻见到总理和大姐，但又想到以前团里总是这样说，首长接见

时不能迟到也不能早到，应该遵守规定的时间。我想一定等到4点钟准时进去，不要多占用总理宝贵的分分秒秒。我在中南海门口来回的走啊，不时抬起手腕看看手表，只觉得手表上的分钟走得那么缓慢，竟好像一动不动，我长长地叹息了，这20分钟的时间可真长呀！

终于时针指向了4点，我急步走进中南海的大门。就在这时候，一辆红旗轿车缓缓地从里面驶出来。透过车窗，我惊讶地看到了周总理亲切的面容，他还是那样精神焕发，朝我招手微笑，点头示意，他原来因为临时有事又出去。

到了总理家，是在西花厅一个不大的四合院。我见到了想念

已久的邓大姐，我十分懊悔地说：“上午通知我不在呀！”邓大姐抱住了我慈祥地说：“你先别着急。总理约你上午来，没找到你。约你下午来，可是他又因为有事情出去了。临走时留下了几句话，一定要我转告你。他说：‘告诉小陶，要演好工农兵，一定要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现在，你当过兵，又当了工人，还应该到农村去熟悉农民，这样才能真正演好工农兵。如果不能去的话，也要发挥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学习，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你为人民服务就会有光辉的前程，辛勤的耕耘才会有灿烂的未来。’”听完邓大姐这一席话，我半晌说不出话来。那时周总理是在国事繁重，力挽狂澜的日子里，听说总理还身患重病，“四人帮”正在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运动，矛头直接对准了周总理，从1972年起他就身患癌症，全国人民都在关切着总理的身体健康。他老人家却这样细致地关心我这么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我泪如雨下，在我有一点成绩的时候给我莫大的鼓励，同时指出我的前进方向，当我在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时，他又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接着邓大姐又和我作了长时间的重要谈话，关心着我的工资、孩子、家庭，并用她的亲身经历教育我，安慰我，鼓舞我一定要顽强的生活下去。

从那以后，敬爱的周总理就住院治疗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南海门口匆匆的一面，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呀……

1976年，我参加话剧《第二个春天》的排练，在上海沪东造船厂体验生活，1月9日清晨，打开收音机，我呆住了，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日夜想念的周总理竟与世长辞了！我泣不成声，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昏昏沉沉地向领导请了假，赶到市里的邮电局，我当时一心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立刻发出一份电报，向敬爱的邓大姐表达我极为沉痛的哀悼！我气喘吁吁地敲开了大门，说明了来意，邮电局的同志说，那是他们当天拍出的第一份悼念总理的电报。

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但他把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规划，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遗愿留给了我们，把朴素的作风勤奋的精神留给了我们，把希望和关怀留给了我们！他用自己光辉的革命实践在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了不朽的丰碑。我们世代代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永生难忘的三次亲切接见

谢 芳

人类想必是有灵魂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人在世多年之后还会有人纪念他。被纪念者也不必定是何等人，任何人死去都会有人纪念，只不过纪念者有多有少、有远有近、有善有恶。曾经担任过 2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至今就有许多人怀念他，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国际的多在政治、外交方面，国内除全国百姓之外，尤以文化艺术界为甚。诚然，纪念是为了继承，继承那些为历史所需要，值得借鉴，引以鞭策的东西。

在我的青年时代，承蒙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崔鬼同志的举荐，曾经在电影《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中担任女主角，因而受到过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使我有幸目睹和亲聆这位伟人的风采与教诲，这是我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那是 1959 年 9 月的某一天，北影《青春之歌》摄制组通知我随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以及导演崔嵬、陈怀皑，作者杨沫同志等一起前往中南海，陪同周恩来总理审看刚刚拍完的为国庆 10 周年献礼的影片《青春之歌》，已是深秋了，浓荫覆盖着的中南海内，凉风习习。傍晚 7 时左右，我们驱车到达中南海。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周总理，他身穿浅灰色的中山装，没有戴帽子。总理目光明亮，诚挚有力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是那样的慈祥、简朴，又是那样的敏捷、潇洒、风度翩翩。放映中，总理的兴致一直很高。不时地询问着拍摄的外景场地，以及演职员的情况。当看到有趣味的地方，便温和地笑着首肯。因为影片较长，放映到一半时，休息了片刻，总理凭着他艺术作品高度的鉴赏力，已看出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了。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成功！”并问我是哪里来的，在什么单位工作等等。

第二次见到总理是在北戴河，那是 1962 年夏天，我正在准备拍摄《早春二月》的时候，在座的还有夏衍、汪洋、金山、孙维世、于蓝、岳野等同志，总理亲自过问了我的工作调动问题（1963 年我和张目同志从武汉调到了北影）。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总理是用自己的生活补助品来招待我们的，我还见到了可亲可敬的邓颖超同志，她像慈母般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告诉我在健康方面应注意些什么问题，使我异常感动。

总理的第三次接见是在 1972 年，那是我从“五七”干校调回来接待朝鲜文化代表团。在代表团结束我国各大城市的访问回到北京之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家，当我跟在代表团后面依次进场时，总理一见我就招呼道：“谢芳同志！”我非常高兴，时过 10 年，总理仍记得我。

接见中，当总理和客人谈到我时间道，“你多大年纪了？”我回答：“37 岁！”总理接着对客人说道：“37 岁，那就是说解放时她才 14 岁！”为受极左思潮迫害人的不平义愤溢于言表。

当谈到影片《早春二月》时，总理问我：“鲁迅为纪念柔石写的诗你念过吗？”并当场背诵了这首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缙衣。

接见完毕后，我走到总理面前满怀敬意地问道：“总理的身体还好吗？”总理微笑着说：“还好，就是感到累。”我怕过多地耽搁总理的时间，说了声“保重身体！”便匆匆离开了那里……

日理万机的结果是集中在一个字上，那就是“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终于积劳成疾，在他精力远未衰退之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今我们纪念他，自然要学习与继承周总理将一生献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与宗旨。

周总理关怀文化艺术事业的动人事迹，有口皆碑，不必多讲。仅就我演过三部电影便受到三次接见一事为例，亦可见总理与电影界关系之切。其所以如此，一则表明总理自身良好的文化素质，二则说明周总理十分重视我国精神文明的发展。

有无精神生活，是人类区别于低级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社会来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缺一不可。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们只在为一件事而奋斗：“争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与相互协和。”一方面是原子弹上天，一方面是文艺为国庆10周年献礼，总理把这两样的事情及工作处理和安排得恰到好处，且卓有成效。

作为国家一级的最高领导人，值得珍视的还有周总理平易近人，与民为友的不可多得的个人修养。照理说，总理在北戴河，疗养就是疗养，大可不必工作（联系干部、群众），即便“工作”也未必能轮到我这样的普通演员的身上，然总理待人之亲切、平和，使人感觉到在他眼里只有同志、朋友的情份，没有高低、荣贱之区分。一般来讲，骄傲或谦逊常常会本能地以人们才干的高下而转移，居功易做，因而才、德不易兼备。然居功自傲者虽不可取，但无能过谦的人亦无多大用处，因此，只有那些既具才华又谦虚廉洁的人才是圣者。这样的人为人民所急需，这样的人越多越好。以才华而言，总理近乎神化，以风格而论，总理最近人情。总理是将神化与人化最谐和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中的一个。我以为周总理令人怀念之魅力实在于此。

至于那首诗的背诵，过去我只是为周总理非凡的记忆力而感动，如今重新回顾，才知总理是在进行一场与错误路线誓不两立的顽强斗争，其意深远，其志刚毅。从这里，我们可看到总理为人的另一面：那为了解放全人类，百折不挠，百战不殆，乱云之中从容镇定、义无反顾的铮铮铁骨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境界。

周总理与电影《东方红》

集体写作马路执笔

在 1964、1965 年的中国文学艺术舞台上，曾经有过一次空前的盛举，那就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简称大歌舞）的创作演出和拍摄成电影，受到首都观众和前来参加我国国庆的几十个国家来宾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和普遍赞扬。10 月 6 日，毛主席同人民解放军 8000 官兵一起观看了演出，10 月 16 日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大大会堂宴会厅接见《东方红》全部演出人员。（接见中，总理当场向大家宣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惊人喜讯）《东方红》大歌舞演出盛况空前轰动了北京城，也在全国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反响。

《东方红》荟萃了半个世纪以来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的音乐舞蹈艺术精品，构成了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建立新中国的艺术史诗。大歌舞在庆祝建国 15 周年之际，集中了全国 16 个专业艺术团体（包括少量业余演员在内）共 3000 余艺术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演出。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倡议组织领导了这次伟大的艺术活动，因此，人们都亲切地称周总理为《东方红》大歌舞的总导演。大歌舞国庆演出结束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奉命同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起承担拍摄电影的任务。我们几人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有幸参加了《东方红》电影的拍摄。工作中曾经不止一次接触过总理，耳闻目睹了这位伟大的领袖人物是怎样为这部电影的诞生，花费那样大的精力，付出那样多的心血的。30 年过去了，许多事于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奋不已。

第一件事是拍电影前，总理在人大大会堂召开电影艺术家座谈会，集思广益排除干扰，明确决断。

《东方红》在舞台上是一次成功的演出，但怎样把它搬到银幕上，并且同样是成功的，甚至比舞台演出还要有所发展和提高，这却是个非常艰巨的创作课题。

1965 年 1 月上旬，在人大和政协两会闭幕的第二天，周总理专门约请参加两会的全国著名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的同志们，以及三个制片厂的领导、电影摄制组的主创人员等在人大大会堂北京厅开会座谈。总理亲自主持了这次座谈会，与会的还有彭真同志、周扬同志。江青也参加了。座谈会开得十分好，艺术家们就未来电影如何既保持舞台演出的优点，又能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纷纷各抒己见，献计献策。记得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郑君里、张骏祥、黄佐临，徐肖冰、成荫、陈播、冯一夫等同志。

总理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两次插话和一次发言。

第一次插话是座谈会发言开始不久，总理借插话机会扼要他讲述了《东方红》大歌舞出台的来龙去脉。大意是说：陈毅副总理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看到一台朝鲜大歌舞，觉得很好，回来后对上海同志说了。他们得风气之先，也搞了一台歌颂工农兵的大歌舞，观众看后很受鼓舞。陈老总陪外宾看，外宾反映也很好，他就鼓动我去看。我是今年 7 月，访问缅甸回北京，经过上海时看的，受到感动，想到了要搞大歌舞庆祝建国 15 周年。回到北京，请人捎信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得到他们的热心支持，又找到周巍

峙同志商量，然后指定了一个领导小组（即周扬、林默涵和梁必业三同志牵头的小组）。我这是搞强迫命令瞎指

385

挥了，主要是搞军民合作，以军队为第一位，牵头，政治挂帅，这样搞起来的。这个决心是下对了。8月份开始动作，到了9月15，彩排就出来了。国庆15周年时，《东方红》正式演出。最后请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意见是：长了，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将来再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主席这个意见很重要，这样内容也更突出了，更集中了。所以说，搞这个大歌舞的过程是很仓促的，远不是什么经过千锤百炼了，才只经过几锤几炼，还要不断改进。不过，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艺术无止境，好了还要更好。大家千万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固步自封，这是主席再三强调的思想，这次人代会修改政府工作报告，主席又特意加了一段话，讲事物不断前进的道理。

总理的第二次插话是在江青发言之后。

江青的长篇发言是这次座谈会上的不谐和音。她一上来就阴阳怪气地说：歌舞我看得很少，因为我是个弱点，怕鼓掌。接着她对《东方红》拍电影表示“非常担忧”，然后大批电影界，从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起，说是模仿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说《球迷》只看了两本，恶心得要吐，应该拿出来见见太阳，批严寄洲导演的《哥俩好》，看了难受，那些兵活像疯子。她重点批判王苹，说王苹刚刚拍成的故事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丑化了人民解放军，把反帝的内容抽掉了，这是夏衍、陈荒煤他们搞掉的，有人反映王苹一年未下去了，这很成问题等。接着，她又批了北影厂水华导演的《红岩》，说影片没有生活，没有时代特点。许云峰没有一点工人的气质，江姐像个家庭妇女，等等。然后又返回来对《东方红》大歌舞提出问题，说《东方红》从始到终没有贯穿的东西，艺术上也平，原因是艰苦不够，革命乐观主义不突出等。显然，江青发言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对《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出及拍电影唱反调泼冷水。

江青说完后，其他同志有点楞怔，不好接着发言了。这时周扬同志用强调的语气说了一句：“主要问题是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吧！”改变话题，扭转气氛。总理马上接过周扬同志的话头，说了这样一段插话：

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这是中心思想。电影应该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内容与形式要统一，内容又是主导的。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至于30年代，也有好的，在座的就有周扬同志、江青同志你们这些人嘛！今天看来，总理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言简意赅是直接回答江青的。特别是对30年代不要一概否定，对历史、传统的东西要一分为二这个重要思想，总理曾经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说到，显然，这也是总理指导《东方红》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

座谈会最后，周总理对《东方红》拍电影问题做了重要讲话。

总理说：搞大歌舞的指导方针和目的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舞台演出是如此，拍电影也是如此，而且是更进一步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舞台演出在北京也没有多少人能看到，电影的作用广大得很。当然，舞台演出时能吸引人，有环境和背景的因素。背景是主席思想引导下28年的成功和胜利；环境则是大家热烈庆祝建国15周年时，在人民大会堂看演出，一进大会堂就吸引人。以后看电影时这个环境就不存在了，也没有了那种热烈气氛了，

这是个问题。在这里总理实际上提出了应让观众“像坐在大会堂里看《东方红》演出”作为拍电影的总体要求。

总理对电影创作做了四点指示：

一、电影要在舞台演出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不能是简单地把演出搬到银幕上。对舞台演出要扬其所长，补其所短。对电影要有高要求，拍电影要有高姿态，不要怕麻烦，要像主席写文章做诗那样，肯再三再四地改。

387

二、要敢于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有破有立，敢于创新。希望《东方红》电影在创作上有更多的新创造，为中国电影树立一面旗帜。

三、创作中要走群众路线，搞三结合，导演、摄影师要跟大家讨论，这样方能多谋，然后还要善断。

四、组织好。除原来的大歌舞领导小组陈亚丁、周巍峙、丁里等同志外，还要扩大吸收一些有关同志，增加司徒慧敏、王牧、李牧、彭后雌等同志。指挥部仍由陈亚丁同志总负责。用分门别类、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统一的方式进行讨论，然后实践，在实践中要一切经过试验。摄制电影的组织机构，以八一电影制片厂为主，八一厂党委领导，不管哪个厂参加的人员，统一归八一厂一领导。八一厂领导陈播、张景华、王牧同志，你们逃脱不了责任。政治领导要加强，艺术领导要统一。由八一厂牵头共同组成摄制组，导演王莘、李恩杰，摄影薛伯青、钱江、张绍滨和董健。

总理的指示，对同志们鼓舞很大，明确了拍电影的方针和目的，也指明了工作方法与要求，坚定了拍好电影的信心。对座谈会上因江青不谐和音造成的阴影，也冲淡和削弱了许多。

第二件事是，1965年3月，总理对舞台演出进行电影拍摄前的定稿审查。

《东方红》拍电影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修改舞台演出，使之定稿。修改的内容，一是根据主席看后意见，演出结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就要将原来的八场压为六场；二是一些重点场次如“秋收起义”、“遵义会议”等要进一步加强；三是其他一些节目内容和艺术处理、包括朗诵词的调整加工。修改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并且均须得到总理最后认可。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改一场审查一场。这样的审查从1964年11月下旬开始，一直延续到1965年3月上旬，3月5日是最后一次六场联排审查，也即最后一次全剧定稿审查。照例晚8点以前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总理来到，等到9点还是没有来，一直等到差10分10点，总理才匆匆走进大会堂，刚一坐下即发话“开始！”总理看演出时聚精会神，十分投入，有时还跟着台上演员的表演轻声哼唱着。曾有同志对总理说：你白天工作那么忙，晚上还不能休息，太辛苦了，总理回答说：我看演出是休息，辛苦的是你们，因为你们在工作。其实，总理看演出才是更紧张的工作，他全神贯注于台上的一切，不放过任何值得推敲的内容和细节，并随时向坐在周围的工作人员说出三言两语的意见。这当中总理秘书还不时走过来在总理耳边报告和请示些事情。

演出结束已经午夜12点了。总理随即在北京厅对指挥部领导、舞台演出和电影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谈意见。

总理对这次演出改得好的地方给予充分肯定。特别是“遵义会议”一场，总理说：前面加了一段“红军想念毛主席”的歌，这个设想很好，反映了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结尾的大船（象征中国革命航

船乘风破浪的舞蹈造型)也想得好。但是舞蹈不整齐,再排练排练。

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一场,总理说:大家对这次的修改比较满意,现在更完整些了。游行一段很好,京戏的别扭劲也少了。这里总理提到的“京戏别扭劲”问题,需要做些解释。原来大歌舞里没有京戏片断,江青在一次审查演出时提出,现代京剧改革

有成绩,为什么不在大歌舞里体现呀!演出导演团对江青提出的问题感到为难,加一场不可能,只好在最后群众欢庆场面中加了两段京戏动作,但效果仍很别扭。最后还是把它删掉了,总理支持了这一删剪。

其他逐场逐节谈的审查意见,大小共有20多条。大的涉及党的政策或重要的时代背景。例如“长征过彝族区”一场,演出中

389

把彝族头人给红军带路改成彝族老人带路,总理对此意见非常大。他说:少数民族的头人在当时也是受国民党压迫的,当时不团结头人,你就过不去。遵义会议前,“左”倾路线不讲统一战线,把自己搞得很孤立,使苏区丢掉百分之九十,白区丢掉百分之百。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后,讲统一战线,这正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主席对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不能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眼光看过去,那就什么都不是味了。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至于不要把红旗交给头人,这是可以的。其实,给红旗也可以,我们当时甚至和头人喝了血酒嘛!又如“打土豪分田地”一场对地主的处理,总理说:现在是三个地主,增加得好,比一个地主清楚,但用梭标押下场,像是要把他们杀了。当时在毛主席领导下,杀的很少,还是处理成戴高帽游乡好些,不要让人家看了,以为我们抓了就杀。

对“井冈山会师”,总理指示: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子可以不要,会师两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用红军的军旗,都写“中国工农红军”。总理说,这段的朗诵词里已经提到“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次革命武装”这就行了。在这里,总理又一次以马列主义者的谦虚态度对待他所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原来《东方红》自排练以来,一直不断有同志提出应正面表现南昌起义,而总理则一直不同意。总理说:南昌起义不能同秋收起义相提并论,并且南昌起义失败了。总理肯定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但强调这是党领导的,不是我周恩来个人领导的。据说,陈毅、贺龙两位元帅坚决主张正面表现南昌起义,意见十分强烈,为此罗瑞卿总长曾专门指示陈亚丁同志应很好考虑两位元帅的意见。大歌舞指挥部经过研究,曾排练了两种方案(即正面反映南昌起义和不正面反映的)。后来周总理坚决不同意,正面反映的方案没有拿出来。又据陈播同志回忆,在上面谈到的座谈会上,他也曾提到表现南昌起义问题,这时彭真同志还插话对周总理说“那是中央让你去领导的”,总理未说话,但在座谈会最后讲话时,还是重申不要把南昌起义同秋收起义相提并论。这次修改,只是在井冈山会师场面中出了一面写有“南昌起义”字标的旗子,总理发现了,仍然不同意,周总理从不宣传自己,向来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事件。总理的高风亮节令人仰止。

小的细节,如背景上一个标语,旗帜上一句口号,演员一个化妆,只要有不当之处,总理都一一指出,给予纠正。“苦难的年代”背景里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总理说,这个牌子的字应该从右到左写,

或者上下写。现在是从左到右，这是今天的写法。又如，“工农兵”一场，其中有面旗子上写“工人万岁”四个字。总理说：这旗子肯定要改回来，还是“劳工神圣”有鲜明的时代感。我记得李大钊同志写过一篇“劳工神圣”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至于说这是用的日本词汇，那当时许多新词汇比如“干部”、“罢工”等，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人也用过我们许多词汇。总理还指出，（苏区）女赤卫队长要梳短发，一条大辫子不合乎当时的情况等。

关于游击队员之歌，演出后有种意见以为这个歌的旋律轻快抒情，写抗日战争的艰苦不够，曾经把它拿了下去，这次修改又把它拿回来了。总理就此发表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意见，说：陈毅老总也觉得没有《游击队员之歌》可惜了。现在又加上了，很好。对30年代的作品，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30年代的文艺做了具体分析，肯定了革命方面，批评了消极方面。有些事是历史事实，不能全按今天来要求。《东方红》里不就是吸收了30年代许多好的东西么，如《九一八》，好

391

的、对的总是不朽的，不要抹杀。不能批判30年代，把自己也否定了，那国歌还承认不，还有聂耳，更典型。表现革命有时需要雄壮的东西，也有时需要些轻松的东西。原来以为京戏的程腔表现革命用不上，只能用比较高亢的梅腔，但在《红色娘子军》、《六号门》里都用了程腔，因为表现的内容需要这种比较悲壮的调子。程腔都用了，革命歌曲的《游击队员之歌》更可以肯定下来。这个歌当时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把水上的一段（舞蹈）去掉了，也很好，加强了战斗气氛。

总理在这次谈话中还特别指示，舞台上谁唱的，电影就拍谁；不要唱是一个人，拍电影是另一个人，那种做法不好。

关于电影工作，总理指示：下一步，先把所有词曲都印出来，然后把领导小组、导演团未看过的同志，词曲作者统统请来看一下，大家讨论定案。然后搞电影剧本，同时试拍。

总理谈完意见离开北京厅时，已经是3月6日凌晨两点。总理当年68岁，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看演出谈意见整整4个小时，直到深夜，始终神采奕奕。3月6日上午大家休息，下午收音机里播出新闻报道：当天上午周总理陪同正在北京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游览八达岭登上了长城。啊，我们的总理，他那伟大的工作精神和那异于常人的旺盛精力，实在是令人崇敬和钦佩。

第三件事是及时处理制片中的关键问题，帮助指挥部领导定下拍摄决心。

《东方红》演出内容、分场、长度审定了；拍电影的方针也明确了，但在实际工作进行中仍有若干关键性的具体问题尚未解决。诸如，到底能不能用幻灯背景拍电影？原来大歌舞全部演出的幻灯背景，是由200多个小幻灯同时投影到天幕上，组成大约800平方米整幅巨大的，可以有简单动作（如流水、飞云、光芒等）的画面，气势恢宏，变换画面迅速，几乎同电影的切换镜头差不多，有很好的艺术效果，构成舞台演出的一大特点。但这一舞台演出的特点到拍电影时都成了特大难点，主要是幻灯背景的亮度不够，拍电影时强烈的电影灯光打到台上，幻灯背景就成了白茫茫一片。这就需要五六倍地提高灯亮度，而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又如相当多的镜头需要在

会堂用原来演出的舞台拍电影，这就要继续占用大会堂，至少3个月，这能办得到吗？若不行又到哪里去搭这种宽36米，进深14米的大舞台，和左右各伸出几十米长，站10排1500名合唱队的翼台。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又都联系着能不能实现总理提出的“坐在大会堂看大歌舞”的拍电影方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遵照总理指示紧张地进行试验，为了试验提高幻灯的亮度，经总理亲自批示，向上海商借全国著名的制灯专家蔡祖泉同志来《东方红》摄制组参加工作。另一方面，摄制组内部也进行着各种不同意见相持不下的争论。此外，还有像为了保证电影的艺术技术质量，能否得到当时相当难解决的外汇在国外购买伊斯曼彩色胶片等等。有段时间，这些问题困扰着指挥部领导同志，一时难下决心，工作进展迟缓。

正在这关键时刻，周总理来了。1965年5月25日晚，总理及时来到八一厂审看《东方红》试拍样片。同来的还有康生、罗瑞卿总长、周扬和赵辛初同志。审查前，指挥部陈亚丁同志扼要地向总理汇报了近期电影工作进展情况和问题。审查的两场试拍样片，一是在人民大会堂舞台上用经过改进提高了亮度幻灯背景拍的“保卫黄河”，一是在摄影棚里用绘景方法拍的“工农兵”。

看完试拍样片后，总理当场明确指示：我倾向于多搞舞台上拍的，多搞幻灯背景的，这样风格统一。要使人感到是舞台上表演，国内外要求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也是希望得到舞台纪录片。这个方针问题，帮你们确定下来。过去担心的幻灯背光问题，

393

这一关算是过了，这是不容易的。

接着，总理又对两项摄制电影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做了答复，说：使用大会堂的问题，最近没有什么大的外事活动，天热了，有些大的群众活动可以到体育场去。这问题可同周荣釜同志、外办、市委谈谈，宁可多占用一些大会堂，拍快点。胶片，如果伊斯曼的好，可买点。请外贸部协助到伦敦去买，告诉林海云同志，说是我说的要买的。但这回要买到新货，签订合同，保证是好的。

总理的决断，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更加激发了同志们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东方红》电影摄制工作的顺利展开，六、七、八，仅三个月时间就全部拍摄完毕《东方红》一部彩色宽银幕和一部彩色普通银幕两部电影所有镜头。

在拍摄过程中，总理也非常关心。有段时间，可能因为外事活动繁忙的缘故，总理就居住在大会堂西南角的二楼里，晚上从外边回来，有时就悄悄走进大礼堂，坐在后边观众席里看一会儿拍摄现场。有谁发现了，摄制组同志和演员就一齐鼓掌向总理致敬，总理便对大家说两句慰问和鼓励的话，然后并不多呆，说声“你们忙”！就离去了。这中间总理还几次专门委托邓颖超同志来看望大家，使同志们深受感动。

那年的“八·一”前后，有个重要的群众集会要用大会堂，主办单位通知摄制组当天晚上就要来拆台，即把为拍电影改造过的舞台暂时恢复成原样。当我们说明《东方红》正在紧张赶拍，这是总理限期完成的任务。主办单位旋即请示总理，总理果然请他们另找集会地点，保证《东方红》拍摄。

1965年9月，总理偕罗瑞卿总长和刘志坚副主任再次到八一厂审查，通过了混合双片。至此，《东方红》电影终告胜利完成。

《东方红》电影以及整个《东方红》演出，正如周扬同志在后来的讲话中指出的，如果没有总理的领导那是不行的。大家知道，1964、196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大批批判的锋芒已经毕露，形势相当严峻。一大批电影已经遭到批判，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领导人也已受到指责，文化艺术界空气很是紧张。这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顾日理万机之疲劳，不怕如他自己所说的“背包袱”，在人民共和国国庆15周年之际，掌握革命要义，荟萃艺术精华，铸成《东方红》电影这一经世不谢之花，传诸后代，今天想来，总理之用心良苦，总理之用意深矣！然而待到电影发行拷贝做齐并且发向全国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轰然袭来，江青当即将《东方红》电影打入冷宫，不许放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初，方得重见天日，同全国广大观众见面，受到热烈欢迎。这时竟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了，而距电影拍摄完成之日，竟是12载了。

《东方红》是总理倾心吟诵的诗；同时《东方红》电影对周总理也是一份永存的纪念！

（注：本文根据八一电影制片厂部分参加《东方红》电影摄制工作同志的回忆写成。他们是杨庆卫、赵彭、黄宝善、殷齐方、马路等。文中总理几次插话内容均系根据马路同志当时记录整理。马路同志执笔。）

艺术民主与领导风格

瞿白音

37年前，在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革命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和当时的历史要求，着重批判了与当时的革命文艺不相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右的文艺思想和倾向，引导文艺工作者走上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方向。

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18年前，是在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讲话的中心是批判文艺领导工作上的“一言堂”、“五子登科”等不民主作风。通过对“左”的思想作风的批判，改进和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使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得到正确贯彻，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得以繁荣，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建国以来，我们党对文艺领导和评论中的右的思潮，进行了多次批判运动，提高了警惕；但事实表明，对于文艺领导和某些评论中的“左”的思潮和“宁左勿右”的倾向，没有给予同样的注意和同样有力的批判，致使它萌生滋长。毛泽东同志针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双百”方针，因而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受到了不容忽视的干扰。1961年周恩来同志发表讲话的当时，这种“左”的思想倾向潮头的冲击，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重视并大力纠正的地步。而在周总理讲话仅仅5年之后，由于已知的和尚待揭露的种种原因，这种“左”的思想倾向，被心怀篡党夺权阴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丑类恶性发展成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他们拉大旗作虎皮，篡改、歪曲毛泽东同志1942年的《讲话》，在文艺领导上搞“一家作主”。他们对革命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实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们把“五子登科”搞成了家常便饭，还开设了大规模的花样繁多的“帽子公司”和“钢铁工厂”，真是做到了“杀人如草不闻声”。他们独霸文坛，使文艺百花园经历了万树凋残、万花萎谢的十年浩劫！

回顾十年的血的教训，我深深体会到，周恩来同志1961年6月19日的讲话，闪耀着光辉的历史预见，是在一场浩劫即将来临前夕的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虽然，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必然性或还不明究竟的原因，他的预见和警钟没能消弭那场浩劫；但是，今天重温他的讲话，却更深刻地理解了他的预见的科学性，他的振聋发聩的警钟声仍在耳边回荡！对当前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时期的文艺领导工作，有着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周总理的讲话，都特别强调发扬民主和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一致性，表明这两个文件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出的真理。

发扬艺术民主的讨论已经展开，重温周总理的讲话，必将使讨论更深入发展。在文艺领导上发扬民主，是为了充分调动文艺工作者的一切积极因素，改变不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管理、活动、思想等方式，使文艺工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必要，原因就在这里。

对艺术民主的重要性，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艺术所固有的规律上去理解，另一种是从“赐与”或“恩赐”的观点去理

解。两种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真民主还是假民主；长期稳

定、不断扩大的民主，还是权宜之计、不稳定、极有限的民主。

要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需要真正的长期稳定和不断扩大的民主，这就需要从文艺的规律上去理解它的必要性。列宁早在1905年就阐明了保证文艺工作者有思想、幻想等方面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的必要。毛泽东同志就是根据艺术规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也说：“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又说：“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这些论断，都是从文艺的固有规律中得出的。

毛主席在论诗的一封信上说，诗要有形象思维。试问，如果不经作者亲知、亲见和亲历，只凭道听途说，剽窃他人牙慧，或离开实践而去苦思冥想，或奉长官之命勉强写作，难道这样能构成真实生动的形象？人们通常说：文艺作品的思想，是要通过形象表达的。试问，如果作者不以正确世界观为指导，深入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并刻苦思索，得出自己在正确世界观指导下对生活的独特见解，而只凭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或根据报刊社论上所表达的现成论断给以图解，难道这样就能在作品中表达出自己有深切感受而又能动人心弦的思想？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什么“主题先行”，什么“领导、作家、群众三结合”等等谬论，以及由此而炮制的一些阴谋文艺，不就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产物？

也许有人会说，奉命写作是应该的，鲁迅不是说过，他是遵先驱者之命而写作的吗？这样的说法是误解，或是无知，或竟是为“一言堂”作拙劣的辩解。遵先驱者之命，是指先驱者们指引的革命道路。也就是周总理讲话中所说的大框子。他说：“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鲁迅的文章的总的精神，是遵先驱者之命而写的；但决非有什么领导人给他出题作文，或通过什么“三结合”组织形式才写出来的，他有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思想，自己所亲知的见的形象，自己的风格、形式。要发扬艺术民主，就要用合乎艺术规律的方法，引导文艺工作者自觉地以文艺作品为革命的大框子服务，当前就是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品中应该包括周总理讲话中所说的，能调剂精神的有娱乐性并寓教育于其中的抒情的、轻松的作品。而不是一定要作者非写这个、非这样那样写不可，这样的领导，就不是发扬民主，就是周总理所批评的“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小框子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如果不从文艺规律上理解，而把发扬艺术民主作为领导者的“赐与”或“恩赐”，就会使民主变成权宜之计，变成一种看风使舵的手段：东风来了就“赐”一点，西风来了就收将起来，仍“按长官意志办事”。这对文艺事业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了社会主义，并不是为了在社会主义下丧失民主；相反，是为了取得更广泛的真正的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广泛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和可靠的保证。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岂有缺少民主或不要民主的人民而能创造历史的？自然，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民主是集成的基础。没有民主的集中，就是“一言堂”，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发展成过去时代的封建主义。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争来的，不是反动派“赐与”的；我们的宪法所

规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也不该是什么领导者的

399

“恩赐”。

我们要批判“恩赐”观点，提倡学习周总理的崇高风格——谦逊。讲话中说：“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这样的语言在讲话中是很多的。我还清楚记得，周总理讲话中检讨那几年他自己认为在文教工作方面有过的错误时，有人对他说：“你不要再检讨了”；周总理回答说：“不，要检讨，一直检讨到你们不要听为止！”这是对自己的何等严格的要求呀！

广大人民衷心敬爱周总理，公认他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讲话中所表现的崇高的谦逊风格，正表明了他是真正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文艺领导干部学习的风格。

周总理离开我们3年多了！但重温他的讲话，深感所受的教诲是永远难忘的。我深信，学习他的讲话，将使艺术民主得到更大的发扬；文艺领导工作将会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文艺创作将会更加繁荣，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文艺需要民主

柯 灵

我曾经有幸亲聆总理的讲话，现在重温，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文艺界所引起的激动。我不禁想：如果总理的这个讲话得到贯彻，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会是什么情况呢？——文艺工作不是孤立的，文艺界的冷暖，总是和政治气候密切联系着。

建国初期，一般人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得到的一些不完全的常识，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以为全国解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个胜利还有个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后来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革命应该不停顿地前进，这当然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但这后面却严然站着不容否定的事实：广大新解放区的人民，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解脱出来，一个箭步，就直接跳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许多人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在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前不久还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社会；蒋介石的统治是反动透顶的法西斯统治，当然没有丝毫民主可言。中国人民从来不知道民主是什么。长期身受专制主义荼毒的知识分子，受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曾经向往于西方式的“民主”，为“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华丽词藻所陶醉。解放以后，为此长期地受到批评，也不断地作了严肃的而不是敷衍塞责的自我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思想需要改造，觉

401

悟需要提高，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破是为了立，后顾是为了前瞻。批判是扬弃，应该有很好的分析：这些思想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后来怎么走向了反面。还应该用有力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不要民主，不要法制；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广泛和实在得多，无产阶级的法制比资产阶级的法制更严密和合理。不幸的是，从古到今，在中国人民漫长的生活史上，民主完全是一页空白。好不容易争得解放了，享有了美好的民主集中制，结果却还是集中太多，民主太少。在有的时候，有的场合，连民主的影子也望不见。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甚至囫圇吞枣到了这种程度，一听说民主，就毛骨悚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

中国人民有了免于受压迫和剥削的权利，这是了不起的天翻地覆的大事。但没有民主，这种神圣的权利是不完全的，没有保障的。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艺术迫切需要民主，因为文艺创作是精神活动，思想感情高度升华的产物，在重重的精神束缚中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革命同志在敌人的刑场上就义前宣布结婚的动人事迹，这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突出表现。但世上决没有有在刑场上谈恋爱的事。在文字狱的阴影下面，只会产生两种文艺：奴隶文艺和奴才文艺。前者是迂回曲折的战斗，后者就只剩了顶礼膜拜。而人民需要的，是健康壮实，生机蓬勃，多种多样，能够反映而又帮助他们战斗与休息、生活与愿望的精神食粮。在过去 20 多年里，毛主席提出过双百方针，十大关系，还就民主集中制作过专门的报告。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过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目的是要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为此欢欣鼓舞，满怀热情，期待着一幅美妙的政治蓝图—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能够早日实现。

但乍晴乍阴似乎成了一种规律，太阳刚露出云缝，接着就是疾风骤雨，然后是一连串的阴天。——“为问闲愁愁几许？一江春水，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人们的热情慢慢减退了，鸦雀无声代替了谈笑风生。既然不便说话，自然少说为佳。这还算是好的。鲁迅说“专制使人沉默”，但如果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里，还允许人们效“金人三缄其口”，在我们的社会里可不行。开起会来，怎么能老是相对无言呢！何况不说话本身也就是一种说话，还有些神经过敏的同志在旁边瞪着眼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这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那就是说假话。

最后一幕就是天昏地暗的大悲剧：林彪、“四人帮”粉墨登台。

根据历史辩证法，林彪、“四人帮”的出现和完蛋，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民主生活的窒息必然给资产阶级野心家制造机会，而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把戏必然是自取灭亡。粉碎“四人帮”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党和人民从这里取得了极其深刻的教训。坏事变好事，当前的大好形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必须补充一句：这个代价太惨重了！如果我们党的民主传统没有中断，这一段弯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周总理的讲话被束之高阁，将近 20 年，这对我们的文艺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莫大的损失，这是一件令人万分惋惜和痛心的事。现在是水到渠成，条件成熟了。重新学习总理的讲话，不能不使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保卫总理的讲话精神，把它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实际工作和实际生活中去。而且——十分重要的是，要吸取 20 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把任何可能导致反复的路子堵死。这是我们对举世敬爱的周总理最好的纪念！

澄清是非解放思想

张骏祥

今天重读周总理在 1961 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感到无比激动；又引起了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想起了在他亲切的关怀和指引下工作的幸福日子。那些年，每次来北京开会，总理知道了，总要约大家会谈话，有时是约少数几个专业的，有时是约文艺界各方面的同志一起谈，从思想到措施，帮助我们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总是感到眼睛更亮，信心更足，想的就是如何能多做一点工作，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回想起来，那些年总理的指示，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地得到贯彻，也不是没有任何阻挠的。例如这个讲话里总理自己提到的 1959 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那次谈话，当时就确是像总理在这里讲的那样，被“打入了冷宫”！那次谈话先是总理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对去看望他的几位上海电影界同志讲的，后来又在紫光阁对文艺界很多同志讲过，讲了文艺工作十个对立统一的问题。事实上，1961 年的这个讲话里有些意见，总理在 1959 年那次谈话里就已经提到了。可是那次谈话，在上海就一直不准传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上海市电影局才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出来。我想，北京的同志们可能记得更详细更准确，希望能好好整理一下，也把它印出来供大家学习。

现在我想根据记忆所及，谈一点 1961 年周总理这次讲话的背景和后来的遭遇。当然，我只能就我个人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主要是结合上海的电影界的情况来谈。

1957 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的条条框框，特别是行政方式的领导提出了改进意见。这立即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在电影方面，当时实行了创作下放，各制片厂成立了创作集体，试行了导演中心制，电影创作初步呈现出繁荣活跃的景象。但是不久，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党不得不起来进行反击。不幸的是，当时的反右扩大化，电影方面也有不少人被错戴上了帽子，不少作品被打成了毒草。按理，在反右之后，应该好好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确理解和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求得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事实却是，1958 年春未夏初，那个后来当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司令部的总顾问的“理论家”，就将对电影抡起了大棒，在文化部的一次座谈会上，一口气否定了好多部影片，咒骂电影事业的领导和创作人员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而且提出了他的灵丹妙药，叫做“审查审查再审查”！

回想起来，当时虽然有些影片政治质量艺术质量不高，甚至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总还不能像这位“理论家”那样一律视为毒草。例如《球场风波》这部影片，水平确实较低，但绝不能像他那样，因为影片中有一个做体育教员的市人民代表对一个工厂的办公室主任阻挠业余体育活动讲了话，就说这是“党不说话，要人民代表说话”，因此就指为毒草！

后来，周总理听取了电影方面的汇报，指出当时的根本问题

是创作人员长期脱离生活，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要求，接着就提出电影编导演深入工厂农村，拍摄艺术性纪录片，反映“大跃进”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并从而吸取营养的好办法。可惜由于我们理解错误，后来拍出了许多叫作“纪录性艺术片”的，实际上仍是由演员扮演的故事片。这里面当然也有些比较好的，但大部分确实是比较粗糙。这些片子观众当然不爱看。结果连累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个讲话里还作了检讨，其实责任完全不在总理。当时，电影领域里也刮了一阵浮夸风，干了不少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事：放卫星，追数字，甚至出现了各厂在数字上你追我赶打擂台，支部书记手拿秒表在摄影棚“督战”，限几分钟拍好一个镜头的荒唐事！总理这个讲话里提到的1959年就讲过不要订指标搞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就是针对这类事讲的。那时，创作集体解散了，导演中心被否定了，创作人员心情很不舒畅。正如总理在讲话中说的：“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了思想。”

也就是在这个1959年，各厂拍出了《林则徐》、《风暴》、《青春之歌》等十几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优秀影片和上面说的那些只求数字速度不问质量的纪录性艺术片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庆后举行的献礼片庆祝酒会上，周总理肯定了这些影片。记得他还说了电影和戏剧是文坛上两朵最鲜艳的花朵的话。文艺创作究竟应该怎么搞，电影怎么才能繁荣。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但是那时却不能说，因为在庐山会议之后，电影界又在反右倾。当时，文化部电影局的负责同志陈荒煤到上海遭到抵制，上海市电影局长袁文殊同志受到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人员更是战战兢兢，下笔顾虑重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这种现象也不只是上海电影界的个别情况。总理讲话里不是提到长影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叫观众要哭又哭不出来吗？这部影片的导演王家乙同志就在那次电影创作会议上诉说过自己的苦衷，说他在刀口上做戏，怕一不小心就要犯错误跌进“人性论”的陷坑。所以，后来周扬同志在会议上发言时，呼吁“不要搞那么多深渊”叫创作人员“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种紧张状况一直继续到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文艺方面也提出了贯彻双百方针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5月到6月紧接着召开了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大家踊跃发言，主要意见可以说是集中在两点上，就是要求艺术民主，要求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最后，周总理到会作了这个重要的讲话，事实上是集中了这次会议上各方面的意见，是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这次会后，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也满以为从此党的文艺方针可以得到认真贯彻了。以上海而言，回去就召开了上海电影创作会议，电影创作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景象，编剧、导演、演员都踊跃提出自己希望编写、拍摄的题材。《红日》、《舞台姐妹》、《白求恩大夫》等影片也就是这一时期拍出来的。可惜好景不长，这股热烈情绪很快就被浇了冷水！就在文艺工作座谈会期间，上海那位后来被“四人帮”捧作“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人就一再三令五申：“只要带耳朵，不要带嘴巴！”我们因为在会议上检讨了几句，回上海后就受到他和张春桥的指责，从此就被斥为“只听夏衍的话”。今天事实证明，我们不过是听了周总理的话。赵丹、张瑞芳等同志也被这位“好学生”和张春桥斥为“通天演员”，而事实上所谓“通天”无非就是能够直接向总理反

映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人员怀有戒心是很自然的事，所以那时想重新组织创作集体就无人积极响应，原来编导人员自己提出来的题材也都不了了之。到了1963年元旦，那个“好学生”就提出了所谓

407

“写13年”，首先在题材上设了禁区！1964年，那位“理论家”就又抡起大棒，否定了《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一批影片，张春桥更在上海声嘶力竭地搞所谓批判夏（衍）陈（荒煤）路线！于是1965年就出现了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纪要》，挥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板斧！这样，1961年的这两个会议，1962年的广州会议，就全部遭到否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控制下，更干脆被诬蔑为“黑会”！凡是宣扬了、执行了这次会议的精神的同志，全部被打成“黑线干将”！那时节，谁讲过一句要“艺术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反攻倒算，谁讲过一句“因人制宜、发挥特长”就是向反动权威投降，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讲过一句要“重视艺术创作规律”就是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谁讲过一句形象思维，就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谁讲过钻研业务练基本功，就是“鼓吹白专道路”、“业务第一”！总之一句话，凡是敬爱的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所维护的一切，那时都成了所谓“三反”言行！

以上只是我个人记得的上海电影方面的一些情况。但就从这一点事例中，也不难看出敬爱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针对文艺领域内一次再次“左”的干扰而发的，是冲破那些“左”的迷雾，使文艺事业能够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顺利前进的罗盘。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次讲话是怎样立即受到了阻挠，没有真正得到很好贯彻。这些干扰后来还发展成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就是为什么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今天仍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热烈欢呼这个讲话的发表的原因。它的发表澄清了一场多少年来被颠倒了的大是非。同时，它的发表又对于进一步澄清当前文艺领域内许多理论是非，和指引今后的文艺道路，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以电影这个受到“四人帮”特别重视因而破坏得最厉害的重灾区而言，“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了，影片的创作和生产确实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和文学、戏剧等比较起来也落后了一步。这是从电影工作者到观众都在焦虑的问题。为了把电影从数量到质量都搞上去，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首先还是得把一些理论上的是非分清楚，否则不能真正解放思想，迈开大步前进。就以前面提到过的，编导人员在“因人制宜、发挥特长”的鼓励下提出自己的题材规划这件事来说，因为被“写13年”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后来“四人帮”更对此大打棍子、大扣帽子，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在题材问题上还是“火烛小心”。今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竟很少有人敢提出改编五四以来文学作品的设想。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周总理这个讲话中是早已明确地得到了解决的。发表这个旗帜鲜明的讲话，认真学习这个讲话，我们就能分辨是非，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致为一些吓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我们的电影创作就一定会繁荣起来，电影事业就一定能搞上去，为当前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服务，唱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最强音！

要敢于写无产阶级的人性

王愿坚

在深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那一套封建的、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揭发了他们在文艺战线犯下的血腥罪行之后，大家都在回顾、思索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了。周总理的讲话，为我们思考着的种种问题作了最好的总结和概括，给我们提供了拨乱反正的有力武器。

周总理的讲话，澄清了多年来许多被搞乱了的问题，比如“人性”、“人情”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篇讲话中，周恩来同志称赞了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说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又两处称赞了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称道它有艺术感染力；然而，同时又指出，作品被某种框子框住，遭到了压力，受了束缚。周总理说：“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通过这些创作的实例，周总理批评了当时那种过左政策下定框子、打棍子的危害，也表达了对创作人员的热切期望，希望创作人员能够解放思想，突破束缚，敢于创作；希望他们所加工的文艺产品，敢于描写无产阶级人性，敢于抒发革命的感情，更好地发挥文艺的教育和感染作用。

实践证明：周总理的这些讲话精神，是完全符合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的，要是大家都能够不受干扰地去贯彻实行，那该多么好呵！

文艺，包括社会主义的文艺，从来就不是一种无情的东西。它的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有情。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所当然地要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感染和影响人民，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所以，周总理在这篇讲话中问道：“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并且批评有的人“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指出：“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这样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分析来看问题，而是从唯心主义看问题。”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人性论”等概念确实是被有些人弄得混乱不堪，特别是到了林彪、“四人帮”手里，搞得更加荒谬绝伦，成了他们绞杀革命文艺的大棒。他们在人性和“人性论”中间划上了等号，不论文艺作品写的什么样的人，一概贴上“人性论”的标签，送给了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不许写情，不许写爱，谁写了情，就一定是“人情味”，谁写了爱，就一定是“人性论”。就连胜利的欢笑、怀念先烈的泪水和战场的光荣牺牲，都成为罪不容诛的了。谁写了，就是“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就是“渲染和颂扬革命战争的恐怖和苦难”。歌剧和电影《洪湖赤卫队》就挨了这种大棒。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就是被这种大棒打死的。我曾经写过一些描写革命战争的艰苦困难和战士思想情感的短篇小说，也被一律扣上了这样的帽子：“用精心炮制出来的孤儿寡妇的眼泪作炮弹，肆无忌惮地攻击革命战争。”

文艺创作是写人的。写人，就要描写活生生的人，就要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要写人的特定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具体的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只有把

这具体的个性写出来，才能把阶级性体现出来，形象才能有艺术感染力量。这，不仅是文艺这一精神生产的特点，也是为生活所决定的。革命者，革命人民是最富有感情的。他们有深沉的爱，也有强烈的恨，他们有欢乐也有悲伤，他们为革命流血流汗有时也流下眼泪，这种情感，这种人性，一点也不抽象，而是革命人民才有的；它闪耀着革命的光辉，是革命的人性美、人情美。在毛主席诗词里，就到处洋溢着这种情和爱。周总理热爱人民的深情，也是家喻户晓。一个老同志说“周总理是很有阶级情义的”，这决不是贬词，而是对革命之情的极好概括。“一声周总理，双泪落襟前”，人民对好总理的衷心热爱，爱得又何等深沉。最近听说：贺龙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折磨，身体极其衰弱了，一天夜里晕倒在走廊上，看守把他抱回床上。当他醒来时，听到看守的战士在窗口轻声地唱：“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贺老总，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师流下了热泪。这不是革命战士深深的爱情又是什么？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正是要发现、搜集、体验、理解这些美好的心灵里所流出的美好的感情，了解这些无产阶级的人性美，并且在自己加工过程中，努力把它们表现得更高，更强烈，更美。

林彪、“四人帮”不让我们写无产阶级人性和情感，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卑污的灵魂浸透了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毒液，是一伙灭绝人性、无情无义的人面东西，当然不会爱革命人民；也必然要把人性抹尽灭绝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我们自己。由于曾经被“人性论”的棍子抡打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又由于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把它变成了格杀文艺的凶器，表现无产阶级人性美、人情美，描写革命感情便成了创作的“禁区”和一副精神枷锁。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或者是杯弓蛇影、心有余悸；或者道理上勉强可通，拿起笔信心不足；或者竟至身有余毒，走上了“无情最保险”的邪路。这些，都说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当然，思想解放了，敢于创作了，也还有个善于表现的问题。创作人员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写进作品里献给读者；创作人员头脑这个“加工厂”不干净，也不能加工出表现真正无产阶级人性的作品，因此，按照周总理讲话去做，真正面向人民，深入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并不懈地进行思想改造，仍然是极其重要的。

周总理对我们创作人员的期望是殷切的。我们应当按照讲话提出的要求，发扬文艺民主，解放思想，自己努力去挣断束缚在我们身上的绳索，砸烂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敢想敢说，敢于创作。

棍子，是凶狠的东西，但也是一种落后的、不文明的并且是短命的斗争武器和斗争手段。而人民斗争生活之树以及由此加工而成的革命文艺作品，只要经受住群众实践的检验，它却是常青的。

让我们以周总理的讲话为武器，投身到思想解放运动之中，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寿者周总理，您与天地共存

白 杨

严冬已过，春意正浓。今年3月5日，迎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80诞辰！好总理啊，在我认识您的40个年头里，从不知道哪一天是您的生日，如今我知道了，就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这些天来，我老是长久地凝望着案头上一张总理的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总理逝世前不久拍的，题为：“最后的时刻”。总理坐在沙发上，望着左前方，面容那样坚毅、安详。从微微灰白的鬃丝到那苍劲而消瘦的手指，铭刻着多少为革命奔波的烙印，蕴含着多少为人民操劳的心血啊！这是伟大的人，永生的人！望着您啊，想着您，我的泪水又禁不住夺眶而出，多少难忘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在我的眼前浮现。……

总理啊，是您那有力的手，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7年9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和上海一些电影工作者到达重庆开展抗日救亡演剧活动。国难当头，可是当时那些四川军阀还在寻欢作乐，硬发“请帖”叫我们去吃饭、跳舞。我们将计就计，干脆就在餐桌前进行抗日救亡的演讲，弄得军阀们饭也吃不下，舞也跳不成，那些坏家伙气呼呼地走了。后来，我们到成都演出，成都警备司令又发来了“请帖”，我们拒绝赴宴，他竟恼羞成怒，下令驱逐剧团出境，我们处在黑暗势力的威胁之中。

就在这时，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送来了光明，送来了温暖。1938年底或1939年初在重庆，我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副主席和邓大姐。那天，周副主席经过繁忙的工作刚躺下准备休息一会儿，我们走进内院，他听到人声，马上不顾疲劳地从内室迎了出来。周副主席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一听，我愣住了。周副主席很快接着说：我看过你演的戏，不就见到过了吗？这下子大家都笑了起来。周副主席关心地问起我们初到四川演抗日戏的情况，当我讲到我们剧团将计就计大闹军阀宴会的时候，总理仿佛看到了军阀们的狼狈相，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是那样地爽朗，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也顿时增添了力量。周副主席耐心地听完汇报后，热情地鼓励我们说：我们都要有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中国人怎么能够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坚持抗战当然会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能多演些抗日救亡的好戏。

1941年的重庆，浓云密雾锁山城，各方面都死气沉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充分暴露，在国民党控制的电影厂搞抗日戏剧就更困难了。在这艰苦的环境里，周副主席主张利用话剧作为击败国民党高压政策的突破口。在周副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由党给予资助，成立了民办的剧社，并编演历史剧，借古讽今，揭露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郭沫若同志在这期间写了不少历史剧，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屈原》，从创作到演出，周副主席都十分关心，亲自过问。《屈原》的成功演出，轰动了整个山城。在重庆的岁月里，我作为一个演员，从心里感到周副主席真正是文艺界的知音。他懂戏，懂艺术，更深深懂得演员的内心。他常常帮助剧作家修改剧本、帮助演员处理角色，但从来不强加于人，而是作为一个诚恳、知心的朋友，循循善诱的长者，不断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雾重庆的斗争中，周副主席成功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使许多编剧、导演、演员等，虽然人在国民党管辖下的制片厂、剧团、演剧队，拿的是国民党发的薪水，却只听共产党的指示，逐渐形成了一支党所领导的国统区的革命文艺队伍。

后来，周副主席从延安回到了重庆，给我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副主席让秘书张颖同志组织、辅导我们学习讨论，又在重庆郊区化龙桥新华日报社的广场上，组织了秧歌剧的演出。来自延安的同志演出了《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等，这些同志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那朴素而崭新的革命文艺，生气勃勃的工农兵形象，给我们开了文艺的新生面。看后，内心非常激动。在回城的路上，周副主席对我讲了《讲话》发表的伟大意义，谈到了在《讲话》指引下产生的秧歌剧，在工农兵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周副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国统区虽然不可能直接创作演出这样的戏，但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广大群众服务，要读些鲁迅的著作，学习他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现在啊，我才懂得了，周副主席为了人民的事业，正像鲁迅所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他总是在废寝忘食，奋不顾身地操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了上海。一些从重庆回来的电影工作者，准备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时，周副主席在思南路办事处接见了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情况，我汇报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准备开拍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写作情况。《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反映抗日战争期间，党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的救亡活动，并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周副主席鼓励说：努力演好它，演剧队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少作用。周副主席最后还跟我们谈了当时斗争的形势。他说：我们就要暂时地分开一个时期了，时间可能长一些，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要坚持进步，多做工作。周副主席这番话，坚定了我们前进的脚步，也激励我认真工作，决心演好《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

1949年2月，北京刚解放不久，党就联系让我从香港乘船赶到北京。周副主席在建立新中国的千头万绪繁忙之中，还抽空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我们高兴地握着他的手，他说：分开没几年吧，你看不是又见面了。新中国要成立了，深入工农兵有条件了，为工农兵服务，如今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同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周副主席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文艺工作要坚持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后来一直珍藏着那次文代会的纪念册，那上面写着周副主席的亲笔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总理光辉的一生就是最形象、最典型的楷模。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和反动派的唇枪舌剑的斗争中，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日子里，他都有一颗无比热烈、赤诚的心，忘我地为党、为人民尽心竭力地斗争、工作。敬爱的总理啊，在您广阔的胸襟中，装得下亿万人民，唯独没有自己。总理是最辛苦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的一生正说明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幸福。

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我被通知参加中国文化职工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观礼。动身前，我见到了总理。总理日夜操劳国家大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竟忙碌得声音都沙哑了，还耐心地叮嘱我们说：“你们有今天出国的机会，这是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能忘记。你们出去要学习人家的好经验，取长补短。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出了不少好影片，

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417

1957年，《祝福》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特别奖。我回国后，在北京见到总理，汇报情况时，提起某些国家责难我们的战争片太多，火药味太浓。总理对这种论调立刻予以驳斥说：“这要看什么战争嘛，没有正义战争，怎么能打倒帝国主义反动派，怎么能保卫胜利果实！”

1961年，总理和陈毅同志到上海，曾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几位电影工作者，并在一起吃饭，席间谈笑风生，话题很多。总理关切地问起我们读些什么书，从读书谈到了演员的基本功。总理从戏曲的基本功谈到舞蹈的基本功，又问到电影演员的基本功，总理用强调的语气说：电影演员也应该要有基本功嘛。总理还几次提到电影演员也要注意学习政治理论，要多读些历史书籍，熟悉些历史。总理还说基本功的训练，除了业务、书本以外，还要走出电影厂，走向社会，加强实践，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去。光是强调电影表演的特殊性是不对的，但不能否定电影表演有它自己的特点。后来，总理又问：电影演员唱歌唱得好的多吗？能歌善舞的更不多了吧。电影演员的基本功包括些什么啊？你们是老行家嘛，要下功夫摸出些规律来。当时，陈老总也插话说：对嘛！什么行当都有基本功，不说别的，写好一首诗，至少也要懂得一点格律，这就是基本功，不然就不像诗了。谈话之间，可以明显感到，总理对电影演员不讲究基本功是不满意的。我们为此感到非常内疚，虽说自己从事电影演员工作多年，但却一直没有很好地把点滴体会整理出来，听了总理的讲话，我们下了决心，一定要把有关电影演员基本功的一些问题重视起来。

就在这一次谈话当中，有一位同志热情地说：总理，您给我们写一本书吧！还有人说：总理太忙了，没有时间写。总理笑了一笑，很爽快地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中的错误。又风趣地说：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们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站在总理的身旁，聆听着总理的这番话，无不为之感动。总理的胸怀是何等光明磊落，总理的情操是何等纯洁高尚！岁月将会流逝，但是这番深含哲理的话语，却会永驻我们的心头。

总理十分重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电影创作，1959年，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向总理汇报了关于影片《春满人间》的情况，总理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的电影要反映新人新事，新的英雄，这样才有生命力。在前进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些都不用怕，拍这个戏时所发现的缺点，在搞下一个戏的时候，就有注意改进的地方了。反映新时代、新社会的电影，我全力支持。总理常谦虚地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用这些话来勉励我们。这字字千钧的话语，虽是铭刻在心，可是在我自己的行动上，却是做得多么不够啊！

1964年底，我从深入生活的解放军部队，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在大会上，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展望着无比美好的未来，他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见到总理时，总理关切地对我们说：要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总理的亲切话语，一直在我耳畔回响。邓大姐那时也关怀地对我说：“小杨，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戏啊！”当时我还满怀信心地说：我正在部队里搞一个戏，很快排好了，就请您来看……。

但是，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次的会见，竟是我见到周总理的最后一面。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聆听总理的亲切教诲了……

想着，想着，我的视线不觉从总理那幅被人称为“最后的时刻”的照片，转回到年历上3月5日的红色字样，我顿时悟出了：

419

我们的总理啊，

您，

只有诞生的年月，

永远，永远，

没有“最后的时刻”！

——总理不是正在思索着国家、人民和时代的未来么？那深邃的目光，已刺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妖雾，那消瘦而苍劲的手啊，正弹指欲挥，誓将害人虫彻底扫荡！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总理病危时还唱着的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声音，将永远永远地鼓舞着我们前进！

周总理恩情暖人心

秦 怡

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 80 周年的今天，回忆总理对我的多次教育和帮助，心情十分激动。我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从 1939 年抗战时期第一次见到总理，直到 1965 年的最后一次，20 几年中除解放战争一小段时间外，几乎每年都能见到总理，每次都从总理那儿得到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教诲。至今回想起来，总理当年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总理的亲切教诲仍铭记心中。有这样的几件事情使我终身不能忘怀。“唱抗日歌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1939 年年底的一天，我在重庆的一个朋友家里吃饭时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当时我才 17 岁，各方面都很幼稚。虽然参加抗日文艺活动，但是政治觉悟很低。闲谈中，总理问我在哪里工作。我随口说：“合唱团！整天唱歌，可是我嗓子不好，唱不好，真没什么意思。”总理问我：“合唱团都唱些什么歌？”我说：“可多了，尽是抗日的，《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大路歌》等等。”总理一听说是这些歌，十分高兴，不由自主地哼起《大路歌》来。吃完了饭，他对我说：“唱抗日歌曲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你不要不满。你要好好地练，好好地唱。我们多少同志正是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行斗争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你怎么能说没有意思呢？”总理态度平易近人，说话十分和气。直到他走了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周总理。当时总理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工作。他肩负着重任，却关心着我这样一个年幼无知的青年，对我进行教育。像我这样在总理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真不知有多少。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真理。从此，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敬爱的周总理的谆谆教诲。

“你们应该多演一些反映
当代伟大斗争的戏”

周总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做出了光辉的榜样。1953 年，我们在北京演出历史剧《屈原》。我们在总理家中谈到了这个戏。这个戏抗战时期在重庆上演过。总理对我说：一个戏的演出，要看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更有教育意义。你们那时候演出，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揭露了国民党的假抗日、真投降的嘴脸，有很大意义，对全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比起今天来，更有价值。他教育我们时刻记住在今天文艺要更好地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社会。

1958 年，周总理来上海时，我正在演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总理看过后，就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多演一些反映当代伟大斗争的戏，要不失时机地反映这种生活。”但是总理又考虑到生产故事片的周期较长，因为剧本等等不可能一下子成功，如果一定要等深入生活结束再来反映，时机也就过去了。因此指示我们在创作故事片的同时可以多搞一些艺术性纪录片，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日千里的景象。总理非常关心我们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的问题。1959 年，我们到北京，当时总理正住在医院，还是把我们找去了。他躺在病床上还谆谆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指出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有感情。1960 年，我们将随中国电影代

表团出国访问，在北京会齐时，见到了总理。总理一看见我们就惊讶地问：“你们怎么搞的？一个个又瘦又黑。”我们笑着回答说：“来北京之前正在马桥公社劳动，同贫下中农一起抢种油菜。”总理听说我们在劳动，高兴地说：“啊！是这样。好！那就再瘦一点也不要紧。这是一个锻炼！”并且还同我开玩笑：“秦怡，你不能再胖了，再胖下去，还有许多工作怎么做啊！”

“唔，你这个党委书记还可以”

1964年，我在北京拍一部故事片《浪涛滚滚》，扮演一个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拍完后请总理提提意见。总理来了，一看见我就问：“你们那个工地怎么样啊？”开始我愣住了，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总算立即想到，总理是在把我当作一个真正的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在考问呢。我就开始按剧情中所描写的那样回答了。总理接着问了一系列水利工程的问题，如坝有多少米高，多少米宽，是拦洪为主，还是发电为主，灌溉的面积有多大，泥沙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在施工中遇到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等等，总理没有把我当作一个演员，而是当作一个水利工程的党委书记在同我谈话。他是在考验我究竟有没有深入生活，进入角色。我告诉总理，自己在深入生活和拍摄电影时，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党委书记所应该做的那样去做的。总理看了我一眼，说：“哦，你是这样吗？你这个党委书记还算可以。”总理日理万机，对一个演员所扮演的角色都这样关心入微，这不仅说明了总理对文艺事业的关心，也是对水利工程的关心。他所问的有关问题，就是我们在深入生活时，水利专家们同我们谈到的一系列专业问题。对这些问

423

题如果不了解，怎么能演好这个角色呢？总理是在考我深入生活这一课上得到底怎么样哩！

“在错误面前不要灰溜溜的”

我们知识分子往往容易受到一点表扬就高兴得忘乎所以，对一切都满意极了，稍微受到一点挫折，又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总理了解我们这些弱点，总是教育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问题，他常常拿自己的经验教育我们。

1961年，我们在北京碰到周总理。大家谈到如何根据电影特性，提高表演技术水平的问题。总理肯定了我们一些成绩，并叫我们要放开来演。我说过自己曾经演过一些坏戏，内心很是不安。我恨自己当时没有认识。总理鼓励我说：当然，你们那时演了一个坏戏，从政治上讲是不好的，你本来应该进行抵制和斗争。但是你们有些演技是好的，应该把这些演技用来为好的内容服务。这些技术不应该丢掉。并且对我说，你不要老是灰溜溜的，不要老是因为演了一个坏戏就以为一辈子有了一个污点似的。不要那样子，我可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们要认识它，正视它，也不要怕。总理就是这样苦口婆心地教育我，要我振奋起来，改正错误向前奔。

最使我激动的是在1964年，我参加拍摄的一部故事片受到了批判。当时，心情十分沉重。有一次在北京，周总理见到我就问：“怎么样？紧张了吧？”我当时说不上话来。总理笑笑说：“你们不要紧张，一个人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不要老是灰溜溜的，不要老是挨批的样子，应该振作起来。”并说：“我明天让国务院办公厅送些票子来，请你们去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你看了这个戏之后，思想境界就会同现在不一样，你的眼界就开阔了。”总理的话像春风吹拂了我心头的冰块。本来我以为自己犯了错误，有人都在批判了，我怎么办呢？总理一定是大大地批评我一顿了。没想到总

理是这样地对我进行教育，鼓励我提高认识，继续前进。《东方红》正是体现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一个伟大成果，看过以后，我心情确实不一样了，我不再陷在个人圈子里了，而是冷静地分析自己的问题，从中吸取教训。周总理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是多么耐心呀！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同志们十分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还这样镇静？我就把总理的话给同志们说了，同志们都十分欣慰，并增强了更加搞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总理是人民的知心人

周总理对人的关怀，从思想到生活上都是无微不至的。哪个同志有了点小事，有时连自己也忘记了，可是总理却深深地给记着，关心着，1940年，我在重庆战火纷飞中生了一个孩子。当时因为工作很忙，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孩子寄养在一个同志家中，十分瘦弱。有一次周副主席看见了这个孩子的状况，十分惊讶，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这样瘦呀？”有同志告诉他说，“这是秦怕的孩子。秦怡因为整天忙演出，没时间照顾她。”哪知这样的小事，事隔20年后还记在总理的心里。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一次会议，同总理一起吃饭。总理特意问起我，“你那个菲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胃病好了没有？”听他这么突然一问，开始我还感到吃惊。心想，总理怎么会知道我那孩子的呢？原来是我自己把总理见到过我孩子的这一细节忘记了。总理这种惊人的记忆力，来源于他对人民疾苦的关注，他心中时刻装着群众。不仅是对我，就是对其他许多同志的家庭也是十分关怀的，碰见了常常要问这问那，问得那么仔细。总理关心人民，把人民的疾苦装在心里，人民爱戴总理，把总理的形象，总理的崇高品质，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中。

深切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于 蓝

迎春的爆竹伴着小孩的欢叫引起我思绪万千。我倚窗凝望，窗外瑞雪纷飞。又一个新春佳节来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的大好形势，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郁，更加热烈。在这欢庆胜利的时刻，我不禁想起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文艺战士的关怀和教育，一件件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如在眼前。

25年前，也是一个新春佳节，我应邀到北京饭店参加春节联欢晚会。那天，文艺界的同志们济济一堂。尤其使我们感到幸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出席了这次联欢会。总理一年到头奔波操劳，我们请他坐下来好好休息休息。总理安详地坐在椅子上，欢快地欣赏着年青的文艺战士高歌欢舞。一会几，他转过头来，炯炯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对大家说：“这是第三代，你们是第二代，第一代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凝眸深思，眼睛里闪耀着光芒，我感到他想得很深很远，静静地听他继续说下去。他深沉地加重语气说：“你们是第二代，他们是第三代……。”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在这个欢庆胜利的时刻，总理想到了在党和毛主席的哺育下壮大起来的这支文艺队伍的成长史，想到了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了培养和教育这支文艺新军，我们的好总理倾注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工作啊！他总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勉励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前进。

记得是1951年，《翠岗红旗》拍完之后，我们心里惴惴不安，我们知道，这部片子艺术上还比较粗糙。有一次见到总理，他却诚挚地对我说：“《翠岗红旗》好，主席看了好几遍，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苏区人民。”有一次，总理还提到另一部片子。我对总理说，电影圈子里的人对这部片子反映一般，总理说：“从技巧上看可能不是很成熟，但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妇女的成长，对观众是有教育意义的。”总理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他是在鼓励我们努力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只要方向对头，他从不求全责备。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汹涌澎湃。总理语重心长地对电影工作者说：“你们要赶快下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当时我在实验话剧院工作，得知总理的指示，立即向剧院党组织汇报。我们遵照总理指示的精神，奔赴农村，一边接受教育，一边创作了一些小节目。回北京之后，总理在颐和园的一个小院里接见我们。听我们汇报下乡的收获，看我们演出自己编排的小节目，热情肯定我们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所取得的一点一滴的进步。

1961年，一部表现革命历史的影片上映以后，有一次，总理高兴地对我说：“你演了一个很好的电影，演了一个革命妈妈。我看过了，主席也看了，他也说好，就是认为开头那一部分戏湖南的特点不够，如果这部分特点多一点就更好了。”我随口说：拍片的时候，我们要求到湖南去生活，厂里没让我们去。总理马上把田方同志找来，认真地对他说：“以后一定要让他们到要拍摄的地方去生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这样一丝不苟，严格要求。

敬爱的周总理对于我们文艺战士的关怀，从政治到思想，从工作到生活，细致入微，温暖备至。1954年，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在怀仁堂开会，要

我在会上发言。我在舞台上演过戏，可是

427

在这样庄严的会场讲话是多么怯场啊！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忽然身后传来亲切的声音：“于蓝，不要紧张。”我听得出，这是总理的声音。我含着泪花，充满着力量，走上了讲台，总理的鼓励使我把心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激情一泻无遗地倾吐出来。

我永远忘不了 1957 年春天的一件事。在总理为欢迎港澳电影演员而举行的一次茶会上，邓大姐关怀地问起我的身体，叮嘱我们要好好休息、好好疗养，并问我准备到哪里去养病。我告诉她，可能到杭州吧。过了不久，我到了杭州，住在一位朋友家里。一天傍晚，我同朋友从外面归来，只见小巷里外，密密麻麻围着许多群众，他们都在兴奋地议论着。原来，我们的总理陪同外宾到杭州访问，顺便到这小巷里来看看我。他老人家徒步走进巷口。周围的群众发现是总理来了，立即亲热地围上来。我们的好总理同群众心连心、心贴心，他热情地向群众问寒问暖，畅叙家常。后来，因为我不在家，总理事情又忙，就走了。但是见到总理的群众却迟迟不肯散去，大家仍然沉浸在同总理亲切会见的幸福之中。那一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坎上。第二天，秘书送来总理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于蓝同志：

小超大姊告诉我，你在西湖养病，并且要我得便看看你。我到西湖的头一天，就托人打听，直到昨天才知道你就住在孤山的朋友家里。现在托人送信问候你。请告我，你休养情况如何，能否出来走走？如不能走动，也望照实告我。侯复，并问你安好！

周恩来

一九五七·四·二十七凝望着那遒劲的笔迹，我的热泪扑簌簌往下流。人民的好总理啊，您为人民日理万机，还记挂着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

……夜色渐浓，窗外雪住了，市街庭院，银装素裹。突然，彩色缤纷的焰火腾空而起，化作喜雨飘洒大地。一群盛装的儿童在雪地里欢腾雀跃。附近，谁家的收音机里，传来音乐学院应考新生的悠扬的独唱——我默默地想：这是第四代了，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大有希望。我依稀觉得，那彩色的焰火里，有着总理深邃的目光在闪烁，那热烈的鞭炮声中，有着总理欣慰的欢笑。

周总理在我们身边

黄宗英

钟摆，摆来摆去，前进；思想，摆来摆去……？

周总理说，他在1961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18年前向总理反映问题的众人里就有我一个。当时的情景，今天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我长期从事演员工作。在党的培养下，我也渐渐学着用笔。

1959年，宣布我为上影专职编剧，我一下子脑袋涨得老大。

1960年，我忙活了一年，剧本绝少成活，真是“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1961年5月，我病倒了。6月，故事片会议在北京召开，因担心体力顶不下来，乃请病假。正巧，全国影协书记袁文殊同志为别的事给上海电影局打电话时，还是希望我到北京参加会议。北京，党中央所在地，有学习的机会，我便带病赴京开会。

6月16日晚上，全体代表观摩影片去了。我因低热不适，和衣躺在床上，打算翻翻报，就关灯早睡。突然，赵丹一路嚷着进来：“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我一打挺跳下床，总理已经笑声朗朗地进屋了，我赶忙迎上去，和总理握手。总理端详着我的素布衫裤、家制布鞋，笑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我说：“常下乡……”总理赞许地看着我，说：“好。”又随随便便地说：“改造，也不在外表。”这话，总理对赵丹也说过，因为赵丹往往过于不修边幅。

急匆匆，喜洋洋，赵丹又奔去寻找其他未去看电影的同志。原来这天晚上演两个片子，赵丹看完一个便好心地带回来给我，在新侨饭店楼梯口，巧遇才接见过外宾的周总理。总理知道我们在京开会，（总理知道得真多啊！）问：“都有谁在？”赵丹回答以后，总理便乘电梯来到我们这里。不一会儿，文化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沈浮同志等都被赵丹喊来了。饭店的服务员们兴奋地端来茶盘、捧来暖壶、送来扇子，还笑嘻嘻地看总理、看我们。新侨饭店的服务员不是没见过总理，更不是没见过我们。只因为总理像看朋友似地走进这间小小房间，新鲜！总理和蔼地问服务员：“能给我们来点冷饮什么的吗？我请客。”服务员高高兴兴拿来几瓶桔子水，一小碟琥珀桃仁、一小碟琥珀杏仁，才恋恋地、礼貌地退出屋去。

这里，是一间普通客房。总理和沈浮同志坐在小沙发上，丁一坐椅子，其他都坐在床边。赵丹挨门奔跑了一阵，此刻，端坐在床脚头，和总理面对面，边喘气边擦汗，嘿嘿傻笑。总理顺手把自己的桔子水递给了他。噫！今夕人间何夕，共此灯烛促膝。总理仿佛不是坐电梯上来，不是走进门来，而是童话般出现在我们身边啊！

总理冲着我摇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我答：“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陈荒煤开玩笑地说，“五个书记去‘挂帅’，把宗英的灵感……”我赶忙打断他的话：“我抗议你们把人家在小组的发言，摘三句五句上简报。赶明儿闹个‘反对书记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可不是玩儿的。”那年月，艺术家们向中央的部、局长抗个议，没啥。陈荒煤接过话茬：“总理看，连宗英也怕抓辫子！”大家都“苦滋捂拉”笑笑，只有总理的眼角眉梢全无笑意，

却极

431

为严肃地说：“讲讲嘛，怎么回事？”我只好一一从实招来，在座诸君也纷纷补充。

我们先是反映了在小组讨论会上，同志们对电影剧本审查关口过多，层层领导提的意见又往往很不一致，造成很多一再返工、无效劳动的情况。我们举了一些使人哭笑不得的实例，总理听得很认真。总理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坐得更舒展了。每看到总理这个姿势，说话的人会感觉到总理很愿意再多听一些，甚至愿意人们当他的面展开争论，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我说：“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想到就说嘛。”总理说。我说：“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领导也好，我们隔行的人也好，对他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我的话很尖锐，总理的面部表情也很严肃。我笑笑：“大道理我也说不清，我同意同志们说的，艺术有它本身的规律，应该尊重。”接着我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

不久前，我接受《好当家》电影剧本创作任务。这本子，是上海市委交到上海电影局的重大题材、重点剧目。要求塑造公社书记的光辉形象。能参加这个重点创作组，是党的信任，可偏偏我这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自己更没这种体会。现在，一个剧本，一般给两个星期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提纲，再一个星期交初稿，然后就无止境地改下去，或很快流产。反正成活率极低。我们这组集中了三个算是强的创作干部，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有县委）层层挂帅抓，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阵，可算重视了。可是我们都不熟悉书记，搜集些素材后，我们现买现卖去编，副书记也日日夜夜陪着我们，很辛苦。有时候，我们三个海阔天空地谈，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好容易想出点戏来，副书记就问：这个情节和主题有什么关系？这个细节怎样体现主题思想？问两问，我们就傻眼了，灵感跑了，想不下去了。艺术创作哪能那么清醒、冷静、理智？有一天晚上这个书记生病了，睡了。我们一口气搞到天亮，把个提纲顺下来啦。说到这里，总理大笑起来，并看着丁一同志问：“是咱们这位女书记丁一同志吗？”我说：“不是她，她好哄。她看电影，该哭的哭，该笑的笑，该着急时还说话，嘱咐影片里的人：‘哎！你可别上当啊，人家骗你哪！’哈哈……”我连说带比划，总理笑得前仰后合，丁一自己也笑出眼泪来：“总理，瞧宗英把我形容的，什么事情让演员一说就热闹了。”我又说：“我们那位副书记也是大好人。他很朴实，很辛苦，工作认真极了，确实是个好干部。不过他的脑子更习惯于用逻辑思维。党交给他的职责是把主题思想关，他当然要忠于职守啦。我们那剧本，作者生活底子薄，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

大家有说有笑地探讨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艺术规律的关系问题。还向总理反映：会上争得最热烈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很多同志觉得电影没小说感人。这不是王家乙同志的导演水平问题。小说作者高

纓同志也参加了改编工作，他把小说里动人的地方改的改、删的删，害怕有“人性论”。会上热烈争论什么叫“人性论”？根据大家要求，每人发了一份小说，对照影片，进行讨论。总理伸出手来对荒煤同志说：“能发给我一本吗？”赵丹把自己那本给了总理。我轻声嘱咐：“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总理笑着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433

总理离开时相当晚了。总理才走，看电影的同志们就回来了，纷纷串到我们屋里问这问那，还提一些问题要向总理反映。人们抢着甜甜的核桃、杏仁，点着我的鼻子说：“因病得福，因病得福！”捶着赵丹说：“小子走运，好心好报。”……

第二天，总理继续调查，都找过谁，我不清楚。据我所知，特别找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谈话。越是有矛盾，越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一贯作风。晚上，许多同志陪着总理看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同志们，电影界的问题，占总理所关心、处理的工作的百分比是微乎其微的。365个不眠之夜啊，我们的总理，这两夜，那堆着厚厚文件的案头，又增加了我们的小说、剧本、大会简报、代表发言……。总理认真地做了准备才在会议讲了话，对文艺事业作了精辟的论述，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我还记得1961年7月1日，周总理到香山来和参加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们共同欢度党的诞辰。烈日炎炎，翠谷青青，我们随着总理拾级而上。赵丹死心眼儿地还盯着总理议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赵丹则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两人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略停脚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林彪、“四人帮”把1961年故事片创作会议诬蔑成“大反复前夕”“牛鬼蛇神总动员”的“黑会”，那一晚的谈话，竟被说成是“阎王殿”、“四条汉子”的“主将”陈荒煤、袁文殊，“蓄谋策划”，密调“黑干将”（我们）去提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重型炮弹”，是“围攻总理”。在场诸君的遭遇不言而喻。我也毫不例外地度过了几年“牛鬼生涯”。

敬爱的周总理啊，全国人民多少年来有多少掏心窝子的话想对您讲。周总理，我们只有今天才能把曾向您讲过的话再倾诉出来！钟摆已经滴嗒、滴嗒地摆过 $18 \times 365 \times 24 \times 60 \times 60$ 次了。您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您对文艺工作者的教诲，犹在我们耳边回响，说明您确实还活着。您回来了。您的民主作风的典范作用渐渐地、渐渐地回到我们党里来了，回到祖国的大地上来了。亲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总理与我的一家

项堃口述项智力整理

我是南京国立剧专（现中央戏剧学院前身）的早期学生，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邀请与主持下，于1940年在新加坡、马来半岛巡回演出，宣传抗日、为抗日募捐3年后，返回祖国的。当年24岁的我，原打算经滇缅公路，过重庆后到延安。途经重庆时，有幸与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结识，并在副主席和阳翰笙、王瑞麟挽留下，留在了重庆，进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拍摄阳翰笙编剧的《青年中国》影片时，我在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山洞中结识并相恋了厂里的演员阮斐，结成了一对抗日夫妻。当时的结婚启事就登在《新华日报》1941年1月1日版上，主婚人是阳翰笙。谁知婚后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抗议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当时，周副主席不再参与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活动，郭沫若也采取相应立场，我和阮斐随阳翰笙、应云卫退出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我和阮斐是不惜放弃高薪坚持抗日立场的。随后在周副主席直接关怀指示下，由阳翰笙、陈白尘同志经过短时间的积极筹备，迅速创建了中华剧艺社，用文艺武器配合形势向抗日的大敌展开了不屈的斗争。我和阮斐就参加了中华剧艺社。当时的中华剧艺社条件非常艰苦。在重庆山上租了几间房，又是住房又是排练场。那时剧团不论演员大小、干何工种一律吃的是大锅饭，忙起来大家竟能连续一个月见不到太阳，一天三场演下来人累不说而且每人最多只能多分一碗面线。我外出内江、自流井办外交租剧场，因穷得买不起像样的衣服，经大家认可，只能穿着戏里的剧装去办事。我们一对新婚夫妇也因剧团只能提供仅有的两间房而各住各的男、女宿舍。但大家工作效率极高，抗日情绪高涨。一星期或八九天便排出一个新戏。中华剧艺社的开场戏之一便是阳翰笙同志用40天赶写的剧本《天国春秋》。与周副主席当时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相呼应。成了周副主席题词的具体形象化的缩影。我当时是与白杨、舒绣文、耿震同志分别饰演韦昌辉、洪宣娇、傅善祥、杨秀清的。每当戏一演到台词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大敌当前不要再自相残杀了！……”时，观众都禁不住呼声雷动，全场起立，群情激昂啊！《天》剧首演即遭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破坏，他们假扮伤兵，砸戏院子直砸到后台，大打出手，以为能恫吓住观众与演职人员。

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后台化妆，中国电影制片厂送给我、阮斐、应云卫等人每人一份解雇通知书。并当众宣布我们几人被解雇了！我们几个人接过来看都没看，一边当场撕了解雇通知书，一边笑着说：“我们早已不在你们那儿领工资了！到底谁辞了谁大概还没有搞清楚吧？！”引来后台一阵哄笑……。

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副主席为了支持我们，每当剧艺社上演新戏时，就带新华日报社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到场看戏。有的戏甚至每次复演都来看，看到精彩之处还带头鼓掌。戏散了，周副主席还到后台来，像老朋友一样与正在卸妆的演员拉家常，细致地关心大家的的生活、工作并和大家谈一些国内外的形势，给我们以鼓励与关怀，使我们斗志更加高昂。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我们的演出很成功，首演时卖座就纪录空前，久演不衰，观众人数创当时话剧的空前高纪录。也不知何时，在我们中间无形中形成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们这些人每

排一出戏或要接什么角色，只要周副主席点头我们就去干，反之坚决不去。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教育、组织群众，剧艺社不仅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演，还多次到成都、内江、自流井等地巡回演出。为大后方的团结抗日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日寇投降后，在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期间，为了配合形势，我与王瑞麟（曾任长春市副市长、长影厂第一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商量后，剧团第六次复演了《天》剧。当敬爱的周副主席在国民党的张治中先生陪同下来到抗建堂剧场再度观看此剧时，观众发现了周副主席、张先生自动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迎，表达了全体演职员与观众一致呼吁不要打内战的真正心声！应该说：在周副主席亲自关怀支持下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在这一重大历史时期，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组织群众坚持抗日，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每每想起总理与邓大姐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总是感到温暖和幸福。

我们婚后不久，由于营养不良与长期的疲劳导致了阮斐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病，大口大口地吐血。周副主席得知后不仅见面时间长问短多方关照，还多次派秘书徐冰同志（建国后曾任统战部副部长）亲临病床前探望。在病情严重时，为避开重庆雾季与白色恐怖，经地下党组织安排阮斐回到了上海家中养病。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有一天，周副主席鉴于政治与军事形势危机，得知日寇马上要全面攻占上海时，让人通知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新华日报馆二楼。当我赶到那里时，周副主席顾不上寒暄，开门见山地嘱我火速启程把阮斐接出即将沦陷的地区，并对我往返旅途作出详尽周密的安排。我按照周副主席制订的时间表，日夜兼程接出了阮斐。同时，一批剧团家属也随阮斐转移到了重庆。回来的途中我们前脚刚离开金华，金华就沦陷了，进攻金华的日寇飞机一直追着我们乘坐的火车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余悸未消呢！我们的二儿子项智力出生时，周副主席亲派秘书张颖同志前往宽仁妇产医院看望，知道阮斐肺病无法自己喂奶，还专门送去了当时紧缺的炼乳、红糖等营养品及鲜花，并作了细致具体的关怀。阮斐出院后，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时，敬爱的周副主席、邓大姐为避免国民党对我们的注意与迫害，又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名义邀请我们夫妇到苏联大使馆与他们晤面。当我们来到苏联大使馆（现人民医院）院内主楼前，见周副主席与邓大姐早在台阶上等候了。寒暄后，周副主席与我一旁说话，邓大姐双手紧握着阮斐的手关心地询问她和孩子的近况并对她产后和治疗肺病要注意的事项逐条给予了关怀和叮嘱。在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地下党又通过司徒慧敏给我和阮斐两人发了周副主席亲笔请柬（当日接见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共6人），把我们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里与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同志见面。上午在“八办”会客室里我们聆听了毛主席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与我党方针的精辟论述，晚上大家一起座谈了重庆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现实状况与工作特性……。在那里，周副主席与大家一起共进了午、晚餐。席上他还风趣地告诉我们：“大家请放心吃吧，这里的菜全是我们的办事处同志们自己种的！”当时“八办”外，巷子里全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有的化妆成焊洋铁壶的，有的扮成卖香烟瓜子的，还有的化妆成卖麻糖、椒盐花生、炒米糖开水的……挤满了整条巷子，进出“八办”的人全被拍下

照片来，当时要不是我已被报刊杂志誉为大后方的“话剧皇帝”，有很大的社会影响的话，恐怕那时也早遭国民党特务暗算了。会见结束了，为防意外，周副主席考虑非常细致，由他亲自指挥用他仅有的一辆汽车把我们男女6人分两批在雷雨交加的夜幕掩护下安全送返

439

了

各自的驻地。

上海解放后，我是天马电影厂第一任演员部主任兼工会主席，全上海市的优秀工会工作者、劳动模范。当上海庆祝“鲁迅纪念馆”落成时，我主演了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饰演阿Q一角，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市。不久，在一次见面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你该把重庆时的一些好戏再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演一演，也好给青年演员们做个示范嘛！”我笑着说：“我老了，一些戏又演又杀又武刀斗剑的，我怕演不动了。”总理当时转向大家放大声音风趣地说：“你们大家说项堃同志老了吗？我看不老嘛！”望着总理那充满信任鼓舞与期望的眼神，谁又能拒绝呢？在大家一片欢笑声中，我高兴地答应了总理，一定好好为培养新中国的年青演员们多做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被错划成了右派。当了22年“摘帽右派”。多种因素造成了我主动断绝了与总理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对这样残酷的事实自己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心里自然更不愿给总理以拖累。直到1962年，我这个当时全国仅有的重返银幕的“摘帽右派”，在临时借来参加拍摄故事片《停战以后》时，当总理与陈毅、贺龙、叶剑英元帅同来北影厂审查样片时，才又得知了我的下落。当时总理没能见到我（其实是我内心很矛盾，当了“右派”后，不知如何再见总理……而故意没见的），就通过该片导演成荫同志转达问候，他一边称赞我的戏仍然演得那么好，一边动情他说：“我打听了他好几年了，听说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从样片里看到他很瘦很虚弱，你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身体，一定要让他恢复健康……”（当时我被打成“右派”后，1959年1月举家被赶出上海，我到山东去接受劳动改造。正赶上全国度灾荒，山东又是重灾区，生活异常艰苦，以至一年中三次肺炎差点送了命）那次我是带着病参加拍戏的。当时总理通过成荫对我和全家表示了真诚的关心，并对全家5口人逐个做了细致的了解和询问。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百忙中仍没忘了我和全家，对我的坎坷经历表现出了如此深情的关怀，听着听着，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随后不久，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通过彭真同志亲笔致函山东省委，将我们全家迁入北京，我才得以正式重返了电影界。

十年浩劫中，因无故地批斗、打骂、非人的折磨，导致我整个人几乎全面崩溃，使我原本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发展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面对我当时那吓人的病情，“革命造反派们”三次被迫把我送到了当时的红卫医院（即现安定医院）看精神科。是敬爱的周总理又一次在危急关头挽救了我们全家，挽救了我本人。当时我被内定为“六厂二校”经验中所谓的“从严典型”，准备报批后，第二天要戴上脚镣手铐送往秦城监狱的。整我的重点正是在重庆这一阶段历史。我的3个孩子也因而受株连。几个单位的工、军宣队串连起来，我和3个孩子纷纷在各自的单位挨批斗，被办专政学习班，其中老大和老三还先后被戴上了“专政对象”的帽子……，全家人人人自危，苦不堪言！整我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幸好总理亲自过目，当时不但没有批准，相反还做了明确的具体批示。以至工、军宣队紧急开会，第二天马上来了一

个 180 度的大转弯，对我一口一个：“你要好好感谢党！”“好好感谢中央首长的关怀！”并马上宣布我被“解放”。一夜之间，做梦都不敢相信的奇迹出现了——我竟成了“从宽典型”！

我们全家的几十年来虽然备受波折坎坷，但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通过总理体现出来的党的政策在时时关怀、保护着我们，才有了我们这个完整的家和我们全家人的今天啊！是历史把我们一家与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敬爱的总理离开人世的噩耗传来时，真似一声晴天霹雳。我和老伴阮斐在 7 口人 10 平米的斗室里哭昏了过去，几个孩子也都哭肿了双眼。当时；由于“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们时刻都狠狠地盯着我们，在总理追悼会那天，我和老伴只能在二儿子项智力的陪同下，趁着夜幕降临天色昏暗时偷偷骑自行车跑到西单，为总理送行。春寒中的十里长街，挤满了自动前来为总理送行的人们。我们 3 人怎么也找不到可以挤到前排去的机会，最后我们只好沿着人海的“墙”，跑到稍微宽敞些的民族文化宫门口西侧，找了个前排几个人个儿都不高的地方，等候良久。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人群中一片哭泣，突然东边的人群中有许多人追着灵车跑来挤到了我们前面，一下子啥也看不见了。急中生智，当年已 61 岁的我赶忙在智力的撑扶下，站到了自行车后座上，老伴紧紧抓着儿子的肩膀半骑半站在自行车横梁上，好看清楚点，再清楚点，最后看一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灵车来到了我们跟前，当时我们脑子几乎都空白了。除了悲泣外只知道使劲伸长脖子，穿过无数人的头顶使劲往灵车里看。当时也搞不清是人挤还是忘情，老两口差点失去了重心，从自行车上半摔半跳了下来。灵车继续缓缓向西开去了，周围留给我们的除了一片悲恸，就是一片昏天黑地。然而，隐约中使人感到人群中蕴藏着一股无法压抑、征服的内在爆炸力和总理用他那伟大坦荡的一生在人们心中所激发的巨大凝聚力。面对这些，我突然感到热血在我胸中涌动，使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清明节来了，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严厉封锁，全家还是派儿子项智力去了天安门。在英雄纪念碑前给总理献上了一束自制的白花。低声地向总理倾述了全家人的心愿并深深地鞠了 3 个躬。回来后，他把看到感受到的那感人心魄的一切告诉了我们，不料他这一去差点又成了全家挨整的把柄。有人在会上检举揭发：“项智力去了天安门！……”一时间又上窜下跳嚷着要揪智力的后台——我。眼看大祸又要临头，全家人只能围挤在 10 平米小屋内，压低了嗓门商量如何订立攻守同盟以度难关……

春雷一声：“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在欢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锣鼓声中，我和老伴在中断了演艺工作 10 余年后，再次得以重返银幕。第一部戏便是我、老伴阮斐和儿子项智力三人一起拍摄主演的《生活的颤音》。影片拍出来了，送到中南海审查时，邓大姐高兴地一连看了两遍，不但对影片纪念四五运动悼念总理的主题、演员的表演，音乐、美工给予了明确的肯定。还关心地问到了我们全家。其中还特别问到了片中“韦立”的扮演者项智力是不是就是当年在重庆亲自抱过的在宽仁医院生的那个孩子？听说是时，邓大姐又详细询问了孩子项智力现在在哪个单位？搞什么工作？生活近况……并满心高兴地相约我们到了中南海总理和邓大姐的住所——“西花厅”去话旧。当邓大姐得知我们至今珍藏着毛主席当年去重庆谈判时总理给我们的亲笔请柬及总理和邓大姐当年为见我们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名义出面邀请我们的请柬时，非常地高兴、珍惜，马上安排中南海机要局的老惠同志借去影印复制

后，又还给了我们。在那刚刚度过严冬的日子里，邓大姐的关怀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们全家。拍完《生活的颤音》7天后，我们3人又满怀对总理的爱与缅怀之情，一同拍摄了纪念总理当年战斗在重庆的影片《山城雪》。回想起来，粉碎“四人帮”后那一年，竟成了我建国以来最高产的1年。当年63、64岁的我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1人拍电影演话剧（《于无声处》饰何是非）近10部。这工作量之大，连年轻高产的走红演员也望尘莫及啊！而这一切又都真正来源于我们一家人对敬爱的周总理发自内心的缅怀；来源于对总理的真情与热爱啊！

要写要说的还大多大多，千言万语汇一句：敬爱的周总理您安息吧！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全身心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不懈努力！

借此纪念、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之际，我们全家也在此衷心祝愿敬爱的邓大姐健康！长寿！

1992年春于北京

我那幸福的十二月

王丹凤

12月，是一年中的岁末，它孕育着新的一年将诞生，春天将降临。

北京的12月，总是瑞雪纷飞，银装素裹。在这千里冰封之中，唯有那青松挺拔，傲梅吐蕊，把芬芳留给人间。

我爱12月，更爱北京的12月，因为，我曾在北京度过一个终生难忘的“幸福的12月”。

那是在1960年岁末，我接到上海电影局的通知，让我和张瑞芳、桑弧、秦怡4人立即去北京，参加由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赴缅甸访问。这一突然的喜讯，使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激动得夜不成寐。

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在旧社会演员是被社会所歧视的，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地位，而今天，在新中国，不仅受到社会的尊重，观众的热爱，还能有机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我亲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所以，这次去北京的心情不比往常，是格外的兴奋。

我们4人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是个400人的大型代表团，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还有北影、八一、长影等电影厂的导演、演员参加。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招待所里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他们都说：“哎呀，你们要早来两天就好了，前天晚上周总理接见并宴请我们全体代表团成员，就缺你们上海几位呢！”

离赴缅甸只剩没几天了，一天上午，团里没有安排活动，我和瑞芳、秦怡3人去东安市场看看，还没有逛上一圈，突然，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急促的话音：“请上海来的电影演员张瑞芳、秦怡、王丹凤注意，请你们听到广播后马上回招待所去，马上回招待所去！”这时，我们3人都愣住了，什么事？谁也摸不透。此时此刻，也只能急匆匆地寻找出口处，赶紧回招待所。

“你们总算回来了！”桑弧导演着急他说：“刚才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我们上海来的4个人在招待所里等，一会儿就派汽车来接我们去中南海，总理要接见我们。”

听了桑弧导演的一番话，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太幸运了。

当我们坐上总理办公室秘书来接我们的汽车，驶进绿荫葱葱的中南海时，我的心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我真想这车开得慢一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10亿人民的中心，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我要把这里的一草一木看个够，可是我又嫌车子开得太慢，因为我迫切地想早一刻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

汽车在一座宁静的小院里停住。周总理和邓大姐已经在客厅里等我们，我们赶紧上前，总理和邓大姐与我们一一握手，招呼我们就座。

我是第一次来到周总理的家，又是第一次见到敬爱的邓大姐，心里不免有点紧张，可是当我握着邓大姐温暖的手，望着她慈祥的笑容，和蔼可亲的神情，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周总理笑着跟我们说：“你们没能赶上前天的宴请，今天我和邓大姐请你们吃一顿家常便饭。”

总理亲切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溶入心田。我们的总理，日理万机，操

劳着国内外的大事，工作如此繁忙辛劳，然而，对我

们上海代表没有赶上宴请这样一件小事都想得这么周到，这么细致入微，特地在百忙中把我们请到他家中做客，陪我们吃饭。面对这样一位受亿万人民尊敬又处处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一顿饭，是总理和邓大姐与我们共进午餐，饭桌上简朴的菜肴，胜过宴会上的山珍海味，邓大姐还不时地给我们夹菜，关照我们不要客气。饭桌上，我们又说又笑，洋溢着极其和谐的气氛，真好似是在家中一般。

饭后，总理又陪着我们在院子里散步，时值岁末，寒风扑面。

然而，这一天，我们围在总理周围，边走边谈，直觉得温暖如春。总理十分关心我们的艺术创作和生活情况，他几乎对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很了解。我们在总理身边显得无拘无束，心地舒坦地交谈着。

不知不觉地，我们踱步至一间休息室，总理领我们进去，只

见室内陈放着一张墨绿色的乒乓台。看来，总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很重视体育锻炼，他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注意锻炼。

当总理拿起乒乓板，与瑞芳她们对打时，我这个好静不好动，平时对任何运动都不碰的人就心里怦怦地跳，我直躲在他们的后面，想最好总理别点我名。谁知总理与他们三位打完后，真的要我上去打。这时，我的脸涨得通红，胆怯地跟总理说：“总理，我不会打的。”总理却一再鼓励我：“不要紧，来试试。”总理就是那么亲切、平等待人，他要和我们每个人都打一遍，我只好拿起球拍上了。可想而知，面对这么一位国家领导人，我的手脚就格外地笨拙，球儿不是碰网，就是出界。总理看我确实不会，也就不难为我。他放下球板后叮嘱我：“打乒乓是很好的运动，以后要学学。”我听赶忙不迭地频频点头。这一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一年以后，有一次，周总理来到上海，接见了文艺界人士，总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王丹凤，学会打乒乓球了吗？”真没有想到，总理还记得这件事，我们的总理真关心人啊！

敬爱的周总理，在您博大的胸怀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心，处处想着人民、热爱人民，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30多年来，我的心中一直怀念这幸福的12月，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1991年12月写于上海

重温教诲想总理

纪 叶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一向对我国的文艺事业，如同对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一样，无限热爱，精心关注，他对艺术创作做过很多重要指示，对作家、艺术家们有过无数的深刻教诲，他对文艺工作者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这种感情的集中体现。

1961年6月，我在参加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曾经亲耳聆听过周总理的这个讲话，他那伟大胸怀、真挚的感情和勇于揭示真理的精神，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和激动人心的记忆。经过18年的风风雨雨，现在重读这篇闪耀着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的珍贵文献，不禁心潮翻滚，思绪万千。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亲切的教诲和动情的语声索回在我的耳边，他那赤诚的心意跃然纸上，充满字里行间，它拨动了我的心弦，激起了我对周总理无限深切的怀念。

周总理从来不说空话，也决不盲发乱箭，他在任何时候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阐明事物的本来面貌，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1961年的《讲话》，正是根据当时文艺界的实际状况抒发的肺腑之言，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忠实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文艺路线，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了创作的积极性，在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辛勤劳动，取得很大成绩，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和人才，文艺事业得到繁荣发展，文艺界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不幸的是，1957年以后，那个窃踞高位的权威，假借反右之风，恣意扩大化，用极左的手段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污蔑文艺界和电影界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日笑东风”，提出要在文艺战线大拔所谓“白旗”。很多文艺作品被简单地定为毒草或严重的倾向性错误，不少文艺工作者受到各种形式的批判和斗争。与此同时，极左思潮大加泛滥，种种违反艺术规律的做法盛行一时。这种风气延续到1959年至1960年，又广泛的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更多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无情的批判，极左思潮发展的更加严重，以至完全颠倒了敌我界限，把艺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思想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混淆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以政治代替艺术，以思想代替形象。把专家和群众对立起来，用群众取代作家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规定了无数清规戒律，给文艺工作者身上强加了一道又一道锁链。爱情不能写，感情不能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能揭示，生活真实不要，人物性格发展必忌，题材只能写大的，不能写小的，只准写工农业方面的尖端技术创造，不能描写具体生活现象，革命历史不能写，知识分子不能写，甚至只准谈论政治和思想，不准研究艺术和技巧，只准喊口号讲概念，不准提倡形象化的表现手段，只准讲共性，不准讲个性，只准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准描写具体的人情和人性。否则就给加上“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潮”，“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这些荒谬的主张，与当年苏联早期的臭名远扬的拉普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艺术领导方面，更是以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有些领导者，不仅给作者指定题材，还要指定主题，限定时间，规定作品必须达到的“高度”和“水平”，炮制一个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

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法。作家不得有异议，否则，就是“右倾”，“资产阶级思想”，“不听党的话”，甚至是“反党”。同一个人，如果今天你是什么官职，你就是绝对权威，可以对文艺创作发号施令，蛮横粗暴，说一不二，明天你如改做业务，你就除了挨批判之外，什么权利也没有，把文艺工作者视为对党有二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有人以外行为荣，完全不懂文艺的特殊社会作用，从不研究艺术规律和特性，却一味地热衷于反右批修，好像只有他才是最革命，使文艺界的空气十分紧张，”文艺工作者常常是提心吊胆，含着眼泪在工作。

对于这一切，我们的周总理是深刻了解的。他，也只有他挺身而出，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说话了！他并不是简单地责备什么人，也没有草率地斥责什么倾向，而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分析问题，指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极左思潮的危害，进一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阐明了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号召文艺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贯彻“双百”方针，实行艺术民主，提倡“五不主义”。并且具体地阐述了艺术规律和特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以及文艺领导等重大问题。我曾想，如果没有对文艺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艺术的特殊规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就决不可能有这样令人佩服的深刻讲话。他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我们受到巨大鼓舞和极其深刻的教育。他拨开了蒙在我心中的迷雾，解除了我精神上的沉重负担，顿觉心情舒畅，满心欢悦，我真切地感到周总理和我们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周总理讲话时对文艺工作者充满了无限爱护和同情，有些话，他是带着激动的感情讲的，我们是含着眼泪听的，我曾一边记笔记一边不住地拭泪。尽管我当时对周总理讲话的深远意义，一时还理解不深，但我却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听到了我们伟大的党的声音。

周总理还在日理万机之际，抽出宝贵时间多次同与会同志广泛接触，倾听意见，了解情况，甚至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香山同我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从整个革命事业谈到文艺事业的发展，从世界观改造谈到艺术创作，同过去每次接触他一样，如果发现我们有缺点或不正确的想法，他总是恳切地批评教育；如果做的对，想的好，他就予以热情鼓励；我们有什么困难和障碍，他总是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他关心我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连许多同志的身体健康状况都放在他心上，并且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谈笑话讲故事，同我们随便地挤在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心情愉快。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受到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深厚感情。他既是我们敬爱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像是我们的长辈和兄长，他平易近人，待人平等，他和我们像亲人一样地互相理解，互通感情。他是我们之间的人，他热爱我们，他像爱护幼苗一样地培育我们，保护我们。他是我国文艺园地里最细心的育花人，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最热心的扶持者，是世界上少有的热情关怀文艺工作的革命领袖。有的朋友若要知道，周总理为什么能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对周总理充满深厚的感情？我们为什么永远深切地怀念他？这不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吗？

周总理热切地期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通过艺术形象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成绩，我们每个人也都怀着一颗热乎乎的心，要为繁荣创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事隔不久，多年形成的那股极左思潮势力，视周总理的讲话如洪水猛兽，想方设

法进行抵制，不但不很好贯彻，有的部门竟拒不传达。1959年，周总理在病中做的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被他们打入冷宫，曾使周总理“很难过”。1961年的这次讲话，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文艺界仍然继续反右，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曾很不理解地思考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直至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后，更变本加厉地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历代反动的封建统治，我国整个文艺界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党的文艺事业受到严重摧残，以至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我们是带着严重的创伤，忍受着巨大的隐痛，跌跌撞撞地举步前进。

我们的党是多灾多难的，我国的文艺事业也是多灾多难呵！

我之所以提起过去的一些事，并非为了算旧帐，往后看，而是为的接受教训，使今后的路子走的更正，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难道不应该变得更聪明些吗？

20多年来，文艺界一直不停地反右，反右！破坏性极大的极左思潮却越来越猖獗地占着统治地位，直到现在仍然有很深的影响。什么右倾，什么形左实右，都是闭眼不承认事实，实际上是人为“左”比右好。有的说右是修正主义，是敌我问题，“左”是方式方法，内部问题，好像右是可怕的，“左”是可爱的。果真如此吗？右确实坏，极左竟能为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做了掩盖和幌子。多少事实教育了我们，右倾机会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左倾机会主义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周总理的讲话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今，周总理的讲话公开发表了，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经过18年的实践检验，周总理的教诲更显得无比正确，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必将指引我们克服“四人帮”造成的困难，清除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使我国文艺事业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中得到健康的发展。我们身受过周总理关怀爱护的文艺工作者，将对周总理的无限深情，倾注在文艺事业上，实现周总理的遗教，以实际行动纪念我们的亲人——周总理。

恰如春温上笔端

王家乙

我们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吗？和总理很久不见了，突然有一天，有朋自远方来，带来了总理的问候，那时候啊，哪怕是严肃的批评，心里也是暖和的，犹如扑面的春风。这春风，在“四人帮”高压的岁月里，不曾有一天离开我的心，纵然是“相思不可寄”，却仍然是“直在寸心中”。

幸福的回忆和辛酸的往事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痛愈重，爱愈深，18年前，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总理那知人之深的谈话，一直刀刻斧凿般地铭记心田。作为亲自聆听总理教诲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重读总理的讲话，恰如“春温上笔端”，倘不把总理关心创作人员疾苦和良师益友般的深厚情意告诉天下的读者，心情是无法平静的。

伟大广博、胸怀坦荡总是和待人以诚、深沉的爱联系在一起的。古人说，知人难，知心尤难。我们的总理是千古伟人，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知心人。他在世的时候，不要说怎样关怀我们的工作、进步了，就连我们许多人的脾气、性格、嗜好都了如指掌，像母亲了解儿子一样。

总理讲话时，针对当时文艺界现状批评我导演的《达吉和她的父亲》说：“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这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记得会议结束以后，总理挽留电影工作者一起在京欢度党的40周年生日，并且在6月30日陪我们去游香山。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情景，总理一见到我，就招手让我过去，对我说：“家乙同志，我告诉你，邓总书记看了你的片子，跟我的意见一个样，你是既要让人感动，又不让人掉眼泪。你说说你有多别扭！”我说：“我没处理好。”总理笑着说：“得了吧，又是人性论，又是温情主义……连我说了都不算，你敢吗？”

总理多么了解文艺工作者的心！是啊，在拍摄《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部影片的日子里，我不正是在别别扭扭的委屈中提心吊胆地进行艺术创作的吗？当时，正是全国报刊上批判“人性论”达到高潮的年月，似乎无产阶级不要感情，都是冷血动物。那真是帽子满天飞，棍子胡乱打。大家都清楚，远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以前，那个自命“左派”的阴谋家、两面派不是就伙同江青在残害文苑的百花了吗？1958年，这个家伙窜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一闷棍打下去，把不少好影片打成毒草，临走前留下两句恶毒的黑话：“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随后，我们所在省的领导机关就召开了一个所谓“招魂会”，顾名思义，要为我们这些被称为“渣滓”的文艺工作者“招魂”。从那时起，我们这些在延安、在敌人炮火下成长的文艺干部竟成了资产阶级的渣滓，历次政治运动都挨整的“老运动员”了。

总理说的“连我说了都不算，你敢吗？”这话既是对小丑们的鞭挞，又是对创作人员的理解。同时也道出了严酷的现实。

试想想，《达吉和她的父亲》是怎样出土的吧！它犹如在乱石丛的高压下，勉强从缝隙中钻出的小芽，实在不易啊！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眉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两个省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是支持的，但也十分不放心。一个省的宣传部长三天两头跑来看样片，并且眷意劝告我：“你不要在刀刃上跑马呀！”

另一个省的宣传部长则不断来信询问，婉言奉劝我，如果不行就赶紧下马停拍。

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连我自己的感动都在“禁”之列，哪里敢叫别人下泪？下泪仿佛就是罪过，无产阶级似乎都该是草木之人、铁石心肠！于是，被迫下剪刀，凡是渲染情的，有的整场剪掉，或者煞贫苦心地在人们能够下泪的戏里剪剪、补补，让观众看不到眼泪，尽量冲淡一切感情。就像总理讲的，“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

难道一个从事多年文艺工作的导演会连“寓理于情”的道理都不懂了吗？难道一个导演会忽视艺术感人的魅力吗？会舍得剪掉感人下泪的戏吗？不是！但我深深知道，“渣滓”一旦翻上来就会被一网打尽，连为人民讴歌的一点仅有的权利也就被剥夺了。我这种难言的苦衷，总理是完全理解和体谅的。总理是批评我，重点又不在批评我。那充满爱护的肺腑之言，我这些年来无数次地重温过，每一次都是热泪滚滚、心潮起伏。

《达吉和她的父亲》能够和观众见面，那是由于我们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向我表示“表现无产阶级人性，不算你的政治账”，——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没有逃脱大算特算的命运。后来，不是连《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样水平的片子也拍不出来了吗？影坛的每况愈下是因为电影界“谈情色变”，无产阶级之情已经比虎狼还可怕，还有什么艺术可言？

18个年头过去了，今天重温总理在1961年的教导，感到格外温暖。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指南，总理的讲话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可贵发展。

目前，影坛内外都在讨论电影为什么上不去，一条很重要的教训是，不按艺术规律办事，文苑、影坛就势必百花凋零。

艺术的春天是毕竟要来的，正如春风不会因为严冬的奇寒而逆转一样。

总理暖如春风的话语、诲人不倦的教导永远激励着一个年过花甲的文艺工作者壮心不已。我相信，在总理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有党中央的关怀，有我们广大文艺界同志的努力，艺苑里群芳斗艳的春天一定会来的！

由《达吉和她的父亲》所想到的

高 缨

一个文艺工作者，当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爱护、支持和教诲的时候，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呵！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到了好些文艺作品，其中多处谈到《达吉和她的父亲》。作为这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的作者，我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有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有欢欣，有幸福感，有沉思与回顾，也有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我想，这个影片的导演、演员和摄制组其他同志，也会有相同的心情的。

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工作纲领性的文献。它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贯穿于整个文献的精神，是发扬艺术民主。艺术民主，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是阳光雨露，是百花赖以生长的空气和水分；离开了它，则必定是艺术的灾荒。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建国以来，每当发扬了艺术民主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就向前发展，就出现万紫千红的新局面；反之，文学艺术就停滞、倒退、凋零。在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简直就是漫漫长夜，革命的文艺，几乎被他们掐死光了。

周恩来同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艺术民主，与林彪、“四人帮”所搞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条路线。周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伟大的园丁，而林彪、“四人帮”则是绞杀革命文艺的刽子手，这就像白天与黑夜一样的明白。

《达吉和她的父亲》仅仅是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小花，但它的遭遇，却正好说明艺术民主是何等的可贵。

这篇小说酝酿和创作于1957年。当时，正是毛主席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文艺界的思想是比较活跃的。记得我在写这篇小说时，心情舒畅，毫无顾忌，我的笔敢于去反映真实的生活，敢于抒发自己真实的感情。小说发表于1958年初，很快就受到文艺界及广大读者的注意。不久以后，《新观察》予以转载并加以评介，读者面就更宽了。画家把它编绘成连环画，出版社将它印成多种版本，广播电台把它改编成广播剧，有些大学生，还将它改写成诗剧搬上舞台。总之，它得到了群众的检验和承认。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嵋电影制片厂决定要我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这时，对这部作品的议论渐渐多了。有少数同志指责它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人性论”（当时，我的另一个作品、叙事长诗《丁佑君》，刚刚被文痞姚文元在《收获》上打成“人性论”和“资产阶级艺术倾向”）。所以在改编过程中，不仅是导演王家乙同志，我自己也是顾虑重重，总觉得是“走在刀刃上”，生怕被戴上“人性论”的帽子。果然，在电影剧本发表后，指责这部作品（主要是指小说）是“宣扬普遍的爱”，是“人性论”的议论便见诸文字了。影片拍好后，恰值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据说，会上对这部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赵丹、黄宗英同志更喜爱小说一些，在他们去看望周总理时，便向总理推荐了。听说周总理当晚便读了小说，以后又看了电影。敬爱的周总理对文艺事业关怀备至，像《达吉和她

的父亲》这样普通的短篇小说和影片，也得到了他的爱护。周总理在他的讲话中，提及这个作品时说：“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周总理明确地指出：“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总理还说：“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在这里，周总理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周恩来同志在他的这次讲话中，倡导了艺术民主，文艺界为之振奋，学术空气接着活跃起来。当时对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便是一个例子。那时，在《文艺报》、《四川日报》、《电影文学》、《四川文学》等报刊上，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文艺界一些老同志和不少业余评论工作者都参加了，发表了数十篇评论文章。大家各抒己见，相互研讨，有的意见针锋相对却又心平气和、以理服人，谁也没有被打棍子、戴帽子。这些文章大多是有份量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论，阐发了不少关于典型、关于艺术规律的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有很多干部、工人、大学生在关注着，并且参加了这场讨论。我认为，这是一次真正发扬了民主的学术讨论，对于当时的文艺创作和评论，无疑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发扬艺术民主的前提是政治民主，没有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艺术民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窒息着整个国家，文学艺术更是处于严寒之中。像许多文艺作品所遭受到的厄运一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达吉和她的父亲》便被“四人帮”的黑手押入了刑场。叛徒江青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问题大做文章，硬要诬陷林默涵同志以《达吉和她的父亲》抵制了她所剽窃的《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的改编。为此，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公开给林默涵同志戴上了可怕的帽子，公开点名《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情味”。以后，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达吉和她的父亲》定罪为“文艺黑线的黑标本”。与此同时，导演王家乙同志、主要演员朱丹南、刘莲池等同志和我自己，都挨批挨斗，遭受到残酷的迫害。

“四人帮”搞这一手，不仅是要扼杀一部作品和迫害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也不仅是要诬陷、迫害林默涵同志，他们罪恶的矛头，是明目张胆地对准周总理的。他们明明知道周总理的那一次讲话，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爱护和肯定的，却硬给这个作品加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情味”的罪名，还戴上“文艺黑线黑标本”的帽子。这又一次证明了凶恶而狡猾的“四人帮”猖狂反对周总理的罪行。

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人情”，宣扬阶级调和，宣扬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普遍的爱”，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的确写了“亲子之爱”，但它是通过描写劳动人民的“亲子之爱”，来表现和歌颂阶级友爱和民族团结，揭露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罪恶的。它的主题思想是民族团结；它的主人公，一个是奴隶女孩达吉，一个是饱经苦难的彝族奴隶马赫尔哈，一个是贫苦的汉族石匠任秉清。经过一场离合悲欢，他们消除了剥削阶级所制造的民族隔阂，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凉山而奋斗，这怎么能说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人情呢？恰恰相反，它所歌颂的正是无产阶级的人性，劳动人民的人情。

“四人帮”挥舞批“人性论”的棍子，打击了许多革命文艺作品。只要那个作品写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写了人的感情——父子之情、夫妇之情、兄弟之情，甚至写了同志之情，他们通通地斥之为“人性论”，并给戴上“毒草”的帽子。在他们眼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只应该是愚昧的“群氓”，只应该是毫无感情的木头，只能是随着他们的指挥棒打转转的“会说话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劳动人民之间只准“斗、斗、斗”，而决不允许团结友爱的，更不允许亲人之间有正常的亲属关系的，否则便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而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他们所搞的阴谋文艺，不恰恰说明他们自己在搞资产阶级人性吗？不，连资产阶级人性也不配，只能说是法西斯的兽性！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这正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和发扬的，也是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应该加以表现的。文学是写人的，是写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是通过形象来表达人的政治思想和抒发人的阶级感情的。多年以来，“四人帮”在文艺理论上制造了大多的混乱，只要你提到“文学是人学”，提到“革命人道主义”，提到“人情味”，便都成了“修正主义”，甚至连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的，也都被诬为“全民文艺论”，真是荒谬绝伦！

文学是写人的，并且是“以情动人”的，怎能离开对“人性”、“人情”的表现？不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情，便是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情。资产阶级的古典作家，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是何等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所理想的人性和人情，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反封建、反专制主义是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的，而且往往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修正主义的文学，不也是打着抽象的人性、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旗号，去蛊惑人心，欺骗群众，为他们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吗？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人性论，却应该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高尔基的《母亲》，把母子之爱和阶级之情交融在一起，把母亲对儿子的爱，升华到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爱，塑造了母亲和伯惠儿的典型形象，表现了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著名的歌剧《白毛女》，不也是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的父女情、喜儿和大春的爱情及所受的迫害，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我国现代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无不在描写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贯穿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人性和人情，所以这些作品，不仅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且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就拿当前的一些优秀作品来说，比如《于无声处》，在反映和“四人帮”生死搏斗中，也是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革命者的无产阶级人性美，有力地揭露和鞭打了“四人帮”爪牙的法西斯兽性。我们的一些作品，显得概念化，不能激动人心，其原因之一，是不是缺乏点无产阶级的人情味呢？

由此我想到，周总理在他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无产阶级的人性”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探讨，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贯彻的。

感想与回忆

白 刃

周恩来同志最讲民主。他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话都说到大家心坎里了，但他还谦虚地说，那只是一个胎儿，要求大家提不同的意见。末了还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凡是接触过周总理的人，都感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爱护同志，关心文艺工作，民主作风好。他每看一次演出，总是细心地看。看完了肯定优点，指出缺点，提出修改意见。他提意见用商量的口气，绝不强加于人。他看了三次话剧《兵临城下》，谈了几次话，都是这样的。

周总理第一次看沈阳话剧团演《兵临城下》，是1962年10月9日在政协礼堂。看完戏，要和大家摄影留念。总理问导演孔方同志，是不是人都到齐了？当他听说还有两个搞灯光的同志在高架上，一定要等他们下来，和他们握完手，再一起照像。这看来是件小事，却给剧团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天以后，周总理第二次看《兵临城下》，是在地质部礼堂，剧场在一条小胡同里，设备不大好。剧团事先不知道，总理到了以后，就叫警卫秘书去买票。听秘书说，总理有一次看演出，保卫人员为了安全，让前面空出好几排，总理很不高兴，亲自招呼后排的观众坐到前面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当周总理知道话剧要改编电影，叫秘书许明同志打电话找我。当时我正在外地，秘书留下电话号码，要我回京立即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回来后心里想，总理日理万机，忙于国家大事，不愿占用他的宝贵时间。因此在打电话时，对许明同志说：“总理很忙，他的指示我都知道了，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改编。如果总理有什么新的指示，请你转告一下。”我还对她说，已经买好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后天就要动身。许明同志叫我先别放下话筒，立即去请示，很快地回来说：“总理要你明天下午5点半，到中南海办公室来谈谈。”听完电话，我很感动，也很懊悔，觉得不该告诉秘书后天要走，以致总理在时间上反而迁就了我。这件事，至今想起来，我心里还感到不安。

周总理在这篇讲话中，谈到习惯势力时说，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一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

周恩来同志一生平等待人、反对特殊化，处处以身作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上面说的几件事，仅仅是我们几次接触中见到的。这种可贵的优良作风，不但是领导干部的典范，也是我们努力学习的榜样。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文苑中最辛勤的园丁。想想看，文艺队伍里面，有谁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总理的教育？好的作品当中，有几部不注进总理的心血？

起初我不懂得，为什么周总理在短时间内，要三次看《兵临城下》？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总理对剧中个别人物和情节的安排，感到有问题。但他不肯轻易提出，而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进行调查研究后才郑重地提出修改意见，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刻。

第一次看戏，总理对剧中我地下工作女同志杨玉芳的活动，感到不妥当。但他只说了一句：“杨玉芳太活跃了。”第二次看完戏，总理指出，李忠民的爱人杨玉芳太活跃了，容易暴露自己，我们这样做地下工作的很少。特别是阻拦蒋家训（蒋介石在地方军中的特务）那段戏，容易引起蒋家训的怀疑，另外，总理还提了三点意见：一、姜部长（我敌工部长）进励志社的行动太冒险，不必要，作用也不大，惊险的场面太多了。二、钱孝正（地方军的参谋长）这个人物，应描写成蒋介石亲自派来的，这比剧中说他是地方军系统要好，可以使矛盾更尖锐。三、蒋家训两次看见燕明（我地下工作人员），不太合理，第一次可以不见面，这样可免去对李忠民的怀疑。

总理看得很仔细，考虑得很周到，沈阳话剧团已经作了修改。但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后来演出，仍是最初的本子，所以总理在1963年3月9日看他们演出后，又进一步指出杨玉芳的问题。总理说，“三八节”刚过，我看了，感情很不好受。我们党不能通过这种方法做地下工作，杨玉芳这个人物，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像国民党的女特务。不单中国共产党没有这种事情，就是外国共产党也不用这种方法。国民党作我们的工作，采取过这种方法，后来看我们不吃这一套，也不大用了。杨玉芳这个人物，可以用家属的面貌出现，做做赵师长太太、郑汉臣太太的工作。

这次看完戏，总理还提出写反面人物不要脸谱化的问题。总理说，写反面人物要写其本质，不要一出场就使人看出是个坏蛋。国民党是有假象的，背后有很多肮脏的东西。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是和其政治放在一起的，而是以那些冠冕堂皇的假象去迷惑人。不然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统治中国20多年。话剧不同于活报，活报是游行配合任务的一种宣传形式，一出场就可以看出哪是好人，哪是坏蛋。话剧是一种舞台艺术，使人看了以后，既受到教育，又留有回味。你们的演员一出场，就能看出是好人坏人，为什么偏在化妆上搞这些呢？坏人不一定都是歪嘴斜眼。

1963年4月4日下午，我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同来的有陈荒煤和林杉同志。总理和我们握过手，坐在我的对面。他首先问我《兵临城下》是根据哪些素材写的？剧中人物的模特儿是些什么人？我回答后，总理谈了他的看法，说，看了几次《兵临城下》，有几个原则性问题要谈谈。现在提倡写革命故事和新人新事，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这个趋势是好的。话剧和电影比较接近。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分开来讲，实际上是一致的。文艺既然要为特定阶级服务，因此，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无产阶级思想。这一点，在许多干部的头脑中，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文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时，采用旧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新的思想，往往要带着一些旧的意识。艺术上可以采取一些过去的东西，但要批判吸收。

总理开门见山谈了这段话，使我醒悟过来。这其实不光是如何改编电影的问题，而是要对我进行一次政治和艺术关系的教育。

总理说，看了三次《兵临城下》，首先是喜欢，要肯定成绩。但对剧中个别人物和情节的安排，也发生怀疑，感到不舒服。

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呢？总理自问自答，剧中的政治思想，必须通过艺术来表现。但是许多旧的艺术手法，与新的思想是对立的。作家要考虑思想性，也要考虑艺术性，表现人物要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我每次看到杨玉芳的戏，都很反感。杨玉芳像个女特务，这种人物在中国很少，包括戴笠、康泽下面的特务，女的也不多。中国过去是个半封建的社会，有自己的民族性。

我们不采取这种方式搞工作。

总理谈到扮演杨玉芳这个演员戏演的不错，但有点像他在重庆看的《野玫瑰》中的那个女特务。总理说，那出戏是国民党写的，这种艺术手法移到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就不合适。

总理严肃的指出：不要让后一代认为阿姨、妈妈们搞革命，是采取这种手段。再过几十年，咱们这些人都死了，戏还在演出，后一代就会这样认为的。

总理说，长春起义虽然有地下党员做工作，还是在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能成功，是以农民作为同盟军，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依靠群众力量，依靠党的政策。光靠地下工作，靠神出鬼没，就能骗过敌人？这与党的作风不合，与阶级作风不合。

谈到剧中姜部长进励志社的戏，总理认为太冒险。他说，要是我主持这件事，一定不赞成他去。总理回忆过去在上海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说那是幼稚。虽然没有被捕，但是偶然的。总理说，革命不排除冒险，但要是值得冒险的地方。董存瑞、黄继光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冒最大的危险牺牲了，这是值得的。但姜部长冒险去励志社，就不大必要。

提到敌人让范国良枪毙燕明（都是我地下工作者），看了感情上很不舒服。总理说，开始我以为会让燕明跑了，或者两人一齐跑。作者的意外处理，让赵崇武阻止，这是偶然的，不是典型的。这种惊险场面，看了很不安。总理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手法。

总理认为写革命故事、新人新事，从鸦片战争到现代革命，内容很丰富。如何把政治与艺术结合好，要打破习惯势力、传统势力。要创造新的，但不要稀奇古怪。要写日常生活，写我们社会上有的，不要落到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套子里。旧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要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不排除艺术夸张，但不要夸张到像诗词一样。音乐有狂想曲，写成戏就有困难。我们的天地很大，要创造有时代特性的东西。

总理谈了1小时45分钟，涉及的面很广。从莎士比亚、易卜生谈到中国的戏曲、现代的一些电影和话剧，举了许多例子，但都围绕着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运用旧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政治内容，针对《兵临城下》里过分追求戏剧性、惊险情节和无批判的采用一些旧的艺术手法造成的缺点，对我进行反复的深刻的教育。总理在前几次的谈话中，还涉及话剧演员的基本功、舞台的灯光、演员的化妆和音乐，这里就不细谈了。

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我又一次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一股暖流沁进我的心田，想到半年来他为《兵临城下》所操的心，所费的时间和精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想多握一会儿，总理含笑他说了声“再见”！我只好依依不舍的松开。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成了最后的见面，永别的握手。

喜读新发表的讲话，回忆15年前的教诲，我应如何努力为“四化”多做点事，才不辜负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啊！

“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

孙 瑜

1961年6月19日，我有幸亲聆了敬爱的周总理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如何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献。今天回想起来，言犹在耳，感到无比的亲切；特别是对当前如何提高电影艺术质量的问题，更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周总理当时就提到了影片数量多，质量不高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在文艺事业曾遭受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严重破坏、流毒未清之际，我们的影片虽经有关领导和创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但不用讳言，从观众的不大踊跃上来衡量，可以说，我们影片的质量还是不够高的，周总理在《讲话》中谈到“为谁服务的问题”时说：“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这里我想单就这一深切的教诲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周总理说：“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我体会到，衡量一部影片的质量高低，同群众的喜爱与否是有着密切关连的。电影，由于它是各种文艺形式中最易迅速传播、并能拥有最多观众的宣传教育武器，而且完成一部电影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如果影片拍成后群众不喜欢看或很少来看，那么这一切的努力都将成为极大的浪费，使电影不能很好地发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用。一部电影的失败，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但其中与领导发扬民主作风不够有关。

“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周总理这两句话讲得多么深刻，多么好啊！这样说，决不是主张不尊重或不要领导。而恰恰要求领导干部首先在政治上引导方向，并像创作人员一样，在提高思想水平的同时，提高艺术的修养，从而加强对香花的扶植，和对毒草的识别。在创作人员的各种不同的风格、样式和艺术处理上，领导就不必干涉过多，定下一些框子，或从个人的爱好来判断作品艺术质量的高低。我们绝不是把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分割开来，而是要求把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区别和联系辩证地结合起来。周总理抓住发扬民主这个中心环节，正确处理领导、创作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关系，这样才能上下拧成一股绳，水乳交融地共同努力，把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搞上去，这样的电影才能起它应有的教育宣传作用，才能得到人民的批准。

《讲话》在引言里首先就提到了艺术作风应当改变，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也提到“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作风”。周总理把文艺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地领导文艺，并充分发扬民主作风看得多么重要呵！周总理对文艺领导干部的期望是无比殷切的。文艺领导干部是否能真诚、忠实地领会和做到周总理的谆谆教导，这确是关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是否能够发扬光大的问题。

对我们文艺创作人员来说，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发扬民主，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解除各种不合艺术规律的框子，解除“一言堂”和“五子登科”的余悸，解除少数人那种“只面对领导”，看领导个人爱好而从事创作的错误想法等等，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道路上

阔步前进。

“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这绝不意味着文艺领导和创作人员可以在“人民喜闻乐见”的借口下迁就观众任何不合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这里有一个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如何统一的问题。周总理指出，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群众来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但这一情况常常被我们有些文艺领导和创作人员忘记或忽视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周总理所说的“寓教于娱乐之中”。过去我们也拍摄过一些喜剧电影和抒情的、轻松的电影，但近来却又少起来了，甚至能写喜剧的作者不敢再写喜剧。我的体会是，电影不论是正剧、抒情剧，甚至悲剧，如果在影片中穿插一些轻松的、幽默的、健康的笑料，会起到一定的调剂和衬托作用，并有助于节奏的变换和情感的起伏，从而使电影的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更能力观众所易于和乐于接受。否则，观众是不大愿意到影院来看一本正经说大道理的、公式概念化，或标语口号式的电影的。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主张每一位创作同志都要在他的作品里穿插一些轻松的笑料和抒情的东西，或者配上一两个喜剧人物，作为“苦药中的甘草”，才能拍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好电影。各个创作同志完全应该根据各自的生活积累、创作意图、艺术修养，以至于兴趣爱好，创作出各个不同的风格、形式的影片。至于我自己，年届八十，电影创作生活过了漫长的五十年，在旧的世界观向新的世界观不断改造的过程中，回忆自己每一个粗浅作品中，不难发现这里大多是采用了“苦药中的甘草”的艺术手法。因此这也只是我自己在长期电影创作实践中的一得之见，其中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愿提供出来作为同志们在今天创作实践中的参考和借鉴。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电影在和国外影片的文化交流中，观众的视野扩大了。如何更好地吸收和溶化外国影片中的好东西，摒弃那些不符合我们需要的东西，周总理在“讲话”中谈到“遗产与创造问题”时也已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让我们电影工作者一起认真地学习周总理的讲话，同心同德，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符合广大观众需要的更多、更好的电影吧！

“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

艾明之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忘的片断，不管岁月如何冲蚀，它们永远在心灵深处闪闪发光，时间愈久而弥加辉耀。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对于每一个与会的人来说，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

建国以来，文艺战线历受“左”、右倾，特别是“左”倾思想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对右的批判和斗争有时失之于过头，对于“左”的面貌和危害，认识却又不足，也缺乏认真的分析和批判。在电影战线上，“左”比右好，宁“左”勿右，……这些公开泛滥的错误论调，对创作人员起了很大的腐蚀和震慑作用。于是，创作人员中时时以“火烛小心”为戒的大有人在；“只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成了不少人创作上的座右铭；希望发一块“免斗牌”的又岂止是一二人？就在中国电影和文艺往何处去的紧要关头，敬爱的周总理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胸怀，毫无畏惧地挺身而出，给大家作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讲话。周总理高举马列主义的伟大旗帜，总结了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特别是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完整地、系统地、具体而又创造性地阐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方针和政策，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以身作则地大力倡导民主作风，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对于文艺（电影）领导和创作人员的解放思想，冲破不应有的框框，促进创作的繁荣，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已经18年了，现在重温周总理的讲话，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依然感到那么新鲜、亲切，这也是当前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的一个强大思想武器。

周总理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电影创作上各方面的问题，其中着重谈了文艺和政治的辩证关系问题。周总理说：“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

“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周总理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多么透彻、多么切中要害啊！文艺应该而且必须为政治服务。但政治不等于文艺，也不能代替文艺。在一部电影作品中，是否很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不在于影片中说了多少政治道理，背了多少段语言，也不在于人物身上贴上了多少政治标签。关键在于这部电影作品，是否能根据电影的特点和规律，形象地典型地再现生活；还在于电影艺术家在再现生活时是否寓于形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引导观众不自觉地跟着电影艺术家一起去找寻生活的正确答案，当一部作品，在观众中产生了这样的艺术效果，这部作品就达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

文艺作品的政治性是通过艺术性来表现，来完成的。二者有区分，但又紧密联系。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仍然是我们评价一部作品的主要标准。但政治第一，并不等于一切；政治第一，更不等于政治概念第一。实践证明，一部作品的产生，不同的作家，不同的题材，情况要复杂得多，也具体得多。

用一种政治要求或政治概念去框套各种不同的题材和作品，结果作品的艺术性被框掉了，作品的政治性也就变成了一些苍白无力的政治道白。可惜这种“左”的干扰，解放以来，经常发生，而到了“四人帮”横行不法的时候，这种混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以政治代替文艺，甚至动辄对作品及作者下政治结论的极“左”思潮，更是达到了恶性发作的程度了。

要突出政治。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要求。不论是电影，或是别的艺术作品，它的政治倾向只能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地流露出来。离开了形象、离开了情节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离开了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描写，要求突出政治，结果就出现了一批“拔高主题”，“说主题”，“唱主题”的影片。影片的“政治”固然突

出了，影片的艺术却消失了。正如周总理沉重地指出的，“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说什么为政治服务呢？”

以写人物为例。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英勇，最大公无私的阶级。社会主义电影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在银幕上塑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无产阶级的先进形象，和他

们的优秀品质。但是，把这个任务和文艺要“创造出各种各样人物来，推动历史前进”的任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特别是将原来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属性作为一种政治标准，来要求各个不同作

品里的不同人物，这就难免成为创作上的一种灾难了，我们过去就拍摄了一些这样的影人。影片的主人公，一举手，一投足，一罩一笑，都很符合“高大完美”的规格。他们一个个都仿佛六根清净，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决不谈情说爱，不管遇到多大的痛苦和灾难，决不掉泪，更不能牺牲，否则就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

威风，因为悲伤和死亡从来都不属于无产阶级，等等。……总之，这些影片里的人物，“伟大”是够“伟大”的了，可就是缺少一点人的味道。我们看不出这些人物是怎么生活，我们当然也就不能从他们所提供的形象中，重新认识生活，并从这生活的再现中得到教益。他们都是可敬的“神”，却不是有血有肉、可亲可信的人。这样的形象是不能感动人的。不能感动人的形象又怎么去完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任务呢？

又以揭示社会的矛盾冲突为例。要写主要矛盾，要写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矛盾的主要方面里，据说也还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创作常常就在这种奥妙无穷的“矛盾”框框里打转。也有人终于悟出一点窍门来：我们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是工农兵，因为矛盾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工农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这就比较的有点分歧了。但从已拍摄的一部分影片看来，答案似乎是这样的：工的主要矛盾是技术革新，提高生产，和保守落后思想作斗争；农的主要矛盾是坚持走组织起来的金光大道；兵的主要矛盾是要不要准备打仗。于是，创作的路子，就像钓鱼的竹竿一样，一节套一节，套到最后就只剩下瘦精精的一条细杆子了。你写知识分子么？那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准把知识分子当作正面主人公去塑造，那就是鼓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如果要写，也只能写一个被批判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形象。你写资产阶级么？明明写的是对资改造，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教育、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不是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主要矛盾了么？但不知怎么一来，结果又被说成了美化资产阶级。你写革命历史题材么？明明写的是一支解放军通

过各种困难和斗争，胜利完成了押解国民党俘虏的任务，却又变成了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大毒草。……于是，题材的多样化没有了，电影的各种不同样式（喜剧、惊险剧、讽刺剧、悲剧、生活短剧……）更是很少有人敢去染指的了。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在建国30年中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具有先进思想的英雄人物呵，在银幕上却很少得到反映，电影在这方面是欠了帐的。我们常常忘记，电影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文艺形式。它面对的是广大的包括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观众。就观众来说，他们不仅想通过银幕看到他们所熟悉的本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也非常愿意通过银幕看到他们所不熟悉的其他阶级、阶层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电影观众，包括工农兵，他们对电影的兴趣和要求是多种多样的。周总理在讲话中说得好：“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多么生动的说明了电影观众要求多样化的道理。

周总理的讲话，当时在文艺（电影）战线上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响和衷心的拥护。新侨会议一结束，电影战线上，不论是领导和创作人员的关系，创作人员思想的活跃，各种不同题材和不同风格影片的摄制，都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局面，这对某些人当然是很恼火的。1963年春，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就提出了所谓“大写13年”的号召，并且声色俱厉地说：只要是写13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去看；不是写13年的，请我看也不看。同年4月，张春桥和姚文元到北京开会时，他们在火车上你一句我一句的凑了一个所谓“写13年的十大好处”，向大会发难。在这个发言里，张春桥咬牙切齿地宣称：只有写13年，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叫嚣，矛头是针对党的“双百”方针，特别是针对1961年周总理的《讲话》的。只是迫于当时主客观的各种情况和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巨大威望，他们才检出所谓“写13年”这面“左”的幌子，来遮掩他们真正的狼子野心罢了。

周总理的《讲话》，距今已整整18年了。周总理在《讲话》中所涉及到的问题，仍然是文艺（电影）战线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篇经过实践检验的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电影）问题的光辉文献。今天，电影如同其他形式的文艺一样，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已经恢复了新的生机。但是，“左”或右的干扰今后是否就此消失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是否就此肃清了，看来还不能掉以轻心。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周总理的《讲话》，并且坚决贯彻周总理的《讲话》，那末，我们就一定能够排除一切干扰，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电影一定可以大展宏图，大放异彩的。让我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拍出更多的好影片，以告慰周总理在天之灵吧。

记周总理与聂晶干杯

纪 文

凡是与周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周总理不仅关怀人、体贴人，而且十分尊重人。尤其在你取得一点成就或为人民做了一点贡献之后，周总理便想方设法表扬你，代表人民感谢你，有时还要请你到中南海家中吃顿便饭。建国以来，不知他请过多少电影界知名人士到他家吃过饭，上影的白杨、张瑞芳，北影的水华同志等都曾经在总理家中做过客。周总理对电影演员陶玉玲的关怀更是路人皆知。北影电影演员于蓝、谢芳，还有许许多多创作干部的成长，都与周总理的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了解，周总理请客，一般都是四菜一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菜肴。周总理的用意无非是借吃饭之机，联络他与电影界人士的感情，进而了解创作干部或领导干部的疾苦和电影界的问题，不少重大问题都是在这种接触中了解到并得以解决的。这是周总理又一条行之有效的的工作方法。

1959年国庆节前夕，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审看北影的献礼片《青春之歌》，当他看到林道静夜读的几个特写镜头时，心情异常激动，他兴奋地问身旁的导演崔嵬和陈怀皑：“这部影片的摄影师是谁？多大了？”陈怀皑同志回答说：“摄影师叫聂晶，小我1岁，今年38岁！”周总理点点头又转向汪洋和导演说：“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特写镜头，他拍得这么大，这么美，太好了。”由于要向总理汇报的问题很多，这件事只是随便说说也就过去了，

481

许多同志都没有放在心上。

谁知，十几天之后，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10周年献礼片宴会上（出席宴会的有国务院有关领导及文化部、北京市委、电影局和各电影厂厂长及主要创作干部），大家举杯向周总理敬酒时，周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情地环顾着大家，举着酒杯频频向大家点头致意，当大家慢慢静下来之后，周总理突然用洪亮的声音问道：“哪一位叫聂晶啊？”正在另一张筵席上就座的聂晶听到总理叫他，心里直扑通：我和总理没有过任何接触，总理怎么会

知道我的名字啊！……坐在他身边的其他同志小声告诉他：“总理叫你呢？”不容多想，他蹭地站起来大声报告说：“总理，我叫聂晶！”只见总理高高举着酒杯，迈着有力的步伐一步步向聂晶的桌边走来，聂晶见总理朝他走来，虽不明其意，也身不由己地举着酒杯向总理迎过去，两个人走近了。总理停住脚步，与聂晶同志

碰碰杯，大声说：“聂晶同志，祝贺你为国庆10周年拍了一部好影片，我代表人民感谢你！来，干杯！”说完总理带头先干了杯。

当聂晶同志和在座的其他同志知道是为《青春之歌》那几个特写镜头，总理才向聂晶同志干杯时，大家都感动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一个国家的总理，日理万机，脑子里不知装着多少国家大事，在审查影片时，只是说了一次，而且是个普通的摄影师，因为他

为人民做出了一点成绩，周总理就没有忘记他。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着那么多国家领导干部，却要和一个普普通通的摄影师干杯，这不只是周总理记忆力惊人的问题，重要的是他脑子里时刻装着人民。多少年过去了，

周总理和聂晶同志也先后离开了人世，但周总理同聂晶同志干杯这件事一直在广大电影工作者中间流传着，流传着……

新侨会议及其前前后后

汤娟潘慧南许寅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这三年，全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特别是那些吃尽极“左”思潮苦头、伤痕累累的文艺界人士更是难忘周恩来同志的恩泽。大家相逢在一起，说着说着，话题便会转到周恩来同志身上。1979年1月6日上午，上海电影界著名人士白杨、秦怡、陈鲤庭、孙瑜、桑弧、刘琼、艾明之、李洪辛。谢晋、丁一、徐桑楚、王世桢等同志相聚一堂，缅怀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回忆周恩来同志为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同极“左”思潮进行的一场斗争，心中充满了暖流，也充满了感慨。这12位同志是1961年6月8日至7月2日的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因称新侨会议）的参加者。这次会议对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不断出现“左”右两种干扰，但是，到底是“左”的干扰危害大，还是右的干扰危害大？白杨等同志抚今追昔，深有感触。他们说，极“左”思潮的危害最大，造成的损失最严重。1958年就有教训。那时，林彪、“四人帮”的那个阴险毒辣、老奸巨猾的顾问，突然一头扎进长春电影制片厂，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要“拨银幕上的白旗”，要在摄影棚寻找阶级斗争！这一来，整个电影界，不论编、导、演，大家都搞得提心吊胆，领导与创作人员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愈来愈紧张。拍出来的电影，数量大而质量低。正如徐桑楚同志所说：“当时在

483

创作人员中有一种‘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思想，我们做基层干部的则感到，今天左面一棍子，明天右面一榔头，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正确，思想被搞得胡里胡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文化部决定请电影界人士出谋献策，于是乎就有了这个“新侨会议”。

改变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在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针对当时文艺界由于极“左”思潮干扰而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作了三天准备，阅读了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和毛主席的《讲话》，然后于6月19日向同志们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总结了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完整、系统、具体地阐述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于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贯彻毛主席的“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回忆新侨会议的时候，这些电影界的同志们，首先异口同声地赞扬了周恩来同志的民主作风。这篇重要讲话的《引言》，讲的主要就是民主问题，鼓励大家敢想、敢说、敢做。周恩来同志说：“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

怎样来造成这种民主风气呢？周恩来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好榜样。他说：“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这样讲还不算，他老人家还具体地分析了造成民主风气不够的原因，

强调指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这些话说得多好啊！在 18 年以后的今天来重温这些教导，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大浪、痛定思痛之后，再来重温这些教导，既使人倍感亲切，又使人感慨万端。秦怡、白杨、谢晋、孙瑜、桑弧等同志都谈到了赵丹同志在新侨会议期间的一句“眼泪汪汪”的“趣话”：“要是给我一块‘免斗牌’，我就什么话都敢讲了。”这句话，包含了多少文艺工作者饱经的“风霜”！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这些“风霜”，周恩来同志知之甚深。因此，文艺工作者在周恩来同志面前也无拘无束，能够把心里话都掏出来。

难忘的“香山一日”新侨会议期间，大家还和周恩来同志度过了难忘的“香山一日”。谈到这里，徐桑楚同志当场拿出了一张当年在香山拍摄的相片。从它的已经发黄的颜色上，可以看出它同它的主人在过去十多年间所经历的“风霜”。这张相片上所有的 100 多人（包括周恩来同志在内）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残酷的迫害。有的同志，像蔡楚生、孙维世、许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等，都已经含冤去世。面对这张相片，怎不叫人心潮起伏！拿起这张相片，我们习惯地从正中去寻找周恩来同志，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正在这个时候，徐桑楚指着相片说：“喏！总理在这里哪！”

485

顺着他的手指，一看：这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原来站在第三排的一个角落里（左起第三人），大家回忆当时现场的情景：同志们一致要把周恩来同志安排在正中，可是他老人家却说什么也不同意，还说：“我为什么不能站在旁边啊！”这种谦逊、平易的一贯作风，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榜样，就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激励和鞭策。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许多精彩镜头直到现在还深深地留在与会者的记忆中：

当周恩来同志正在同一些同志一起谈心的时候，有个同志反映：我们厂领导对创作人员管得很死，作风比较粗暴。恰巧丁一同志走过来了，周恩来同志就笑着说：“你们那里有几个书记？你们说的那个书记是她吗？”丁一马上说：“我们工作是有缺点的。”周恩来同志马上把话接过去：“有缺点，责任也不能让你们承担。主要是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许多事情没有讲清楚。”

在回忆这一情景的时候，丁一同志说：“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深极了。总理是这样襟怀坦白，为我们基层干部承担责任。一想到这件事情，更感到自己应该以总理为榜样，努力做好工作。”

周恩来同志还和大家一起上山游览。当路过原香山慈幼院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站定脚步，指给大家看：“这里是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会的地方，是有历史意义的。它最早是北洋政府的熊希龄建造的，因为熊是湘西凤凰厅人，当时人们尊称为‘熊凤凰’。可是，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历史的变迁，这些历史人物都已经风流云散了，当今的伟大是我们的毛湘潭！”

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正好刘琼同志在旁边。周恩来同志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啊？”刘答：“我是湖南湘阴人。”周恩来同志又问：“你知道这件事吗？”刘琼说：“我的历史知识太浅薄，不知道。”周恩来同志笑着指指刘琼说：“你这个湖南人哪！”

在去“鬼见愁”的途中，大家来到一座房子面前。周恩来同志又告诉身

旁的一些同志：“这个地方是当年毛主席发布渡江命令的地方！”

回忆到这里，白杨、刘琼、李洪辛、王世桢同志都感慨地说：“不仅在这难忘的‘香山一日’，而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我们都可以随时感到总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

在爬山中间，周恩来同志谈笑风生，最后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现在讲觉得不方便，以后可以写信给我。”说着又指指身边的许明同志说道：“你们把信写给他，我就可以收到了。”

是“长官”批准，还是群众批准？

大家在谈完了周恩来同志的民主作风之后，话题又转到艺术民主上来。孙瑜同志珍藏着当年参加新侨会议的记录本。他对周恩来同志强调必须由群众鉴别艺术作品的好坏、不能由领导“批准”这一精辟论述记得比较具体。文艺作品主要应该由谁“批准”？由“长官”批准，还是群众批准？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十分鲜明地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可是目前领导批准多于群众批准。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这段话，对我们今天文化部门的领导来说，仍然十分重要。

谈到这里，大家还特别提到周恩来同志所举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有一次一位文化部副部长到四川责怪川剧落后，得罪了

487

四川人，一位四川老乡当场给他一个钉子：“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 7000 万人去回答、去决定。”在讲了这件事以后，周恩来同志说：“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一提起周恩来同志的这段话，同志们都很振奋。桑弧、秦怡、丁一等同志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周恩来同志曾经风趣地讲过这样的话：“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

要“导弹”，不要“捣蛋”！

“白专道路”，这是极“左”思潮煽动者们经常拿在手里的一顶帽子。周恩来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分析。他说：“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接下去他又说：“聂荣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下面他老人家举了这样两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 5 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听到这里，当时大家都哄

堂大笑了。

无产阶级就不能谈恋爱吗？

英雄就不能哭吗？

在谈到极“左”思潮给文艺工作者设置的重重“禁区”和定下的条条框框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应不应该描写丰富复杂的感情的问题。他谈到了《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部影片。有些人硬说达吉同她的生父重逢、养父离别的时候所表现的感情冲突是宣扬了“人性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一情况，就在百忙中抽时间去看了这部片子；看完之后，不但认为它没有什么“人性论”和“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且还认为影片还没有充分反映达吉当时应有的复杂心情。他具体地指出：电影加工后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达吉看到刑具，本应伏在养父腿上父女同哭，表现相依为命，这是无产阶级的人性，但电影上却用手捂起脸，不让人看一眼。达吉到生身父亲那里去，但不立即去认，而要先缝一段衣服后再认，这也不近人情。

从这里大家又联想到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能不能写爱情，以及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能不能哭的问题。徐桑楚、谢晋、文明之等同志都记得很清楚：在新侨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以深切怀念的心情讲过周文雍、陈铁军这两位烈士的高尚爱情很值得歌颂。他又说：1948年我们在延安时，当叶挺、博古等同志由于飞机失事而牺牲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党都痛哭。文艺作品为什么不能写

489

“哭”呢？问题是怎么写。

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话打破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的许多“禁区”，使创作人员不仅对一些所谓“边缘问题”迎刃而解，来开会之前的一肚子苦闷也都烟消云散了，心情都十分舒畅。

决不能让极“左”思潮卷土重来

新侨会议以后，正是带着这种心情，大家兴高采烈地回到自己岗位上，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哪里知道早在会议期间，就从一些阴暗角落里刮起了阵阵阴风。会议之后，极“左”思潮的煽动者更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最典型的就是上海。丁一同志回忆说：“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总理讲话后，我心里亮堂了许多。一心一意想回来把工作抓起来。回到上海，我在一次大会上向大家谈了自己参加会议的体会，同志们都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可是会后有人却冷冷地对我说，‘你太过份了’。接着各种各样的禁令又一道一道下来了：不准认真传达，不准认真执行，不准议论，等等。”徐桑楚接着说：“还在我们出发之前就有人‘叮嘱’我们：你们去开会，要多听，少说话，也不要作什么检讨。”孙瑜、李洪辛、陈鲤庭等同志当场插话：这个时候张春桥在上海就颇有权力了。讲到这里，秦怡同志大声地说：“还有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的两面派哩！你们记得吧！1958年就是他首先大喊大叫要拔银幕上的白旗，在新侨会议上他却以反极‘左’思潮英雄的姿态出现。当总理讲到有些人专门定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时候，他在一旁煞有介事地插话：‘这是五子登科嘛！’有一次我还听到他对赵燕侠同志说：‘你敢不敢演《十八扯》？’赵燕侠同志回敬得好：‘你敢点，我就敢演！’”这时丁一同志打断了秦怡的话：“当时我们在会上却把他当作好人。他在会上作的报告，完全支持总理的意见。回来我们照他的

话办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新侨会议被打成了‘黑会’，我们这些人被打成了走资派，而他呢，却成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

尽管这些家伙疯狂捣乱，电影界的同志们还是坚决按照会议精神办事，而且很快就作出了成绩，像瞿白音同志的《创新独白》这样的文章，《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强的影片，都是这次会议的成果。遗憾的是，也是令人痛惜的是：好景不长！1963年以后，这个会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又因种种原因都被泼满了污水。到1966年，江青、林彪等人一手策划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更公然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两面派的煽动下，极“左”思潮逐步上升到了顶峰。这下子整个文艺界、电影界就遭了大殃了。别的不说，单是当年参加新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25位同志，就统统被关进了“牛棚”，遭到了无穷无尽的折磨和摧残，不仅艺术生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身心健康也都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这漫长的10年，真仿佛是漫漫长夜。现在，天亮了，长夜结束了。可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却没有看到太阳出来就沉沉睡去。周总理，我们多么希望你快点醒来看看这百花争艳的春天呀。为了迎接这个春天，你曾为之奋斗不息。在纪念周总理逝世3周年的时候，用什么来告慰我们的总理呢？电影工作者们表示：一定要把周恩来同志新侨会议讲话的精神认认真真地贯彻起来，按照周恩来同志讲话的精神来搞好文艺创作，使文艺的春天更加美丽。

后 记

10年前，我们在组织征集电影方面的党史资料工作中，收集到一些关于周恩来同志关心电影工作的非常感人的资料，这又引起我对周恩来同志的怀念，往事如潮，涌上心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也受周恩来同志言传身教的深刻影响，而这也是常常推动和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从电影工作领域里，回顾周恩来同志，了解他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的关怀和指导，是有更深层的历史意义的。这将会丰富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历史情况的研究。为此，我们就想在征集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出一本回忆周恩来与电影的书。这就是编这本书的缘起。当征集到20余篇文章之后，荒煤同志约请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文艺工作者，撰写回忆周恩来总理关怀文艺工作的文章，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的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对周总理的深情思念，透过思念，可以看到，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热情关心。在那本书中，有十几位是电影工作者写的回忆周总理关心电影的感人事迹。而荒煤同志和出版社副总编辑谭德山同志，又都有意再撰写一部《周恩来与电影》的专著。后来，荒煤同志知道我们已收集到了一些尚未发表的回忆文章，经跟文献出版社商谈后，决定由荒煤同志和我一起主编这本《周恩来与电影》。

从编入本书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是始终不渝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不断地调整和纠正偏离党的文艺方向及文艺政策的错误倾向和行为。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由于本书所收文章，基本上是在“新时期”以来所写，是在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写的，因而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持原则、尊重文学艺术创作规律和关怀电影创作人员的崇高品德；这些文章，对于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也是有深刻意义的。如夏衍同志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回忆文章《<武训传>事件始末》、于伶同志的《渝沪多年垂爱深》、司徒慧敏同志生前写的《电影事业时刻挂在他心中》等所提供的历史情况，很多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由于撰文者，大都是以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所以，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大体上按文章主要内容进行分类。在各类中，再以文章所讲事情的时间先后为序，尽管如此，因各篇文章内容都有旁涉，所以，在编排次序上实难划一和更为科学。由于周恩来同志接触电影界的同志非常广泛，我们在征集稿件中，仍难免疏漏，这只好在以后的报刊上发表或再版时补上。刘致祥同志作了前期的编稿工作，在奚姗姗同志和王永芳同志参与编辑后，重新调整编辑和组稿计划，进一步充实全书内容，荒煤同志后来又找到一些重要文章，使得内容更为全面。电影局党史办解治秀同志等参与了编务工作，为这本书出了力。还要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帮助。

我国人民电影事业，从无到有到成长、发展，从克服困难到繁荣、辉煌，都倾注着周恩来同志的心血和深情。当我们想起他曾经引导电影走出艰难困境的时候，当我们想起电影在历史上几度辉煌的时候，我们含着满眶热泪，伸手遥望长空呼喊：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想念您！”

在您离开我们20年的时候，我们仅以这本书奉献给您，把您

2

对人民电影事业的热忱关怀，对电影工作者的谆谆教导，传给当代人，传给后来人。

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陈播

1995年5月5日

